目錄

十周年中文版序 007
引子 013
第一章 跨過鴨綠江 016
第二章 三八線以南的潰敗 027
第三章 三個月的游擊生活 039
第四章 格琳醫生 050
第五章 巨濟島七十二聯隊 070
第六章 伍德沃斯牧師 082
第七章 出賣 091

第八章　一頓晚餐　098
第九章　甄別之前　106
第十章　甄別　120
第十一章　第六零二聯隊　123
第十二章　一齣戲的上演　138
第十三章　不尋常的請求　142
第十四章　一次考驗　150
第十五章　會見朴先生　157
第十六章　貝爾將軍　161
第十七章　扣押貝爾將軍　167
第十八章　勝利之後　193
第十九章　裴政委被捕　201
第二十章　到達濟州島　210
第二十一章　通訊與掃盲　216
第二十二章　裴氏密碼　224
第二十三章　一個年輕女人的來訪　234
第二十四章　升起國旗　239
第二十五章　又一個犧牲的性命　249
第二十六章　殺！　255
第二十七章　與拉爾森面談　262
第二十八章　娛樂和工作　272
第二十九章　意外　280
第三十章　最後的命令　284
第三十一章　重新登記　289

第三十二章　回到濟州島　300
第三十三章　疑惑　315
第三十四章　好夥伴　324
第三十五章　非軍事區內　328
第三十六章　不同的命運　343
作者手記　357
致謝　359
〔導讀〕
戰爭的印記　馮品佳　361
閱讀指南　365

十周年中文版序

《戰廢品》雖然是寫我父親那一代人的經歷，但與我自己也息息相關。我一九六九年底參軍，駐守在吉林省琿春的中蘇邊境上。當時中蘇雙方已經有小規模的軍事衝突，我們都覺得戰爭隨時會爆發。對於戰士們來說，打仗就意味著可能犧牲。大多數人對死亡有心理準備，但都怕被敵方俘虜，因爲那樣如果活著回來，自己就會成爲社會渣滓，成爲家人的累贅。父親是軍人，我小時候見過從韓戰回來的被俘人員，他們在邊境的農場做苦工，連他們的孩子也常受人欺負。我服役時候，軍中從不談論被俘後該怎樣應付，但大家心裡都明白要不成功便成仁。記得離家前，母親對我說如果被俘，千萬別背叛祖國。至於什麼是背叛，可能她也說不清。其實，就連在一九七九年的中越戰爭中，解放軍也是這樣對待自己被俘虜的狀況，有的戰士帶上「光榮彈」，一旦被俘好用它來自殺。那是雞蛋形狀的炸彈，上面拴著一根細白繩，一拉就會爆炸。

來美國後常常在電視上看見美軍戰俘回國受到熱烈歡迎，把他們當作英雄。有的戰俘甚至公開表示要把自己的經歷寫成書或拍成電影，有些參選的政界人物時常把自己的戰俘經歷掛在嘴邊，作爲政治資本。這種對戰俘的態度跟我在中國所經歷的截然相反。此外，在中國大陸，韓戰一直被認爲是一場勝利——中韓聯手打敗了美國。但我發現美國人並不認爲輸了那場戰爭，他們的實際傷亡也比中國宣傳的少得多。所以，我就開始收集這方面的資料，覺得將來可能用得上。

一九九九年底《等待》獲得了美國國家書卷獎。我剛從紐約領獎回家，我原來的一家獨立出版社就打來

獻給我的父親，一個朝鮮戰爭的老兵。

引子

在我的肚臍下邊，刺著一道很長的刺青：“FUCK…U…S…”那些圓點子上端的皮膚，皺皺巴巴，像被燒過的傷疤。這道刺青，是我的護身符，在中國保護了我將近五十年。來美國之前，我想過是不是該去掉它，後來決定還是留著。不是因爲我捨不得它，也不是怕動這麼個小手術，因爲要是去開這個刀，免不了會傳出去，要是讓領導知道了，可能會註銷我的護照，他們本來就懷疑我不會再回國了。更何況，我打算隨身帶上爲寫這本回憶錄而收集的所有材料，不能讓公安對我有一絲一毫注意，說不定會沒收我所有的筆記和資料。現在，我身在美國了，我的刺青已經失去了法力，相反地，它成爲我沒完沒了的精神負擔。兩個星期前，在亞特蘭大過海關的時候，我的心跳得像一隻落在網裡的鴿子，生怕那個語調歡快的大塊頭海關人員會起疑心，那樣的話，他就會把我帶到小房間裡去，命令我脫掉衣服。那道刺青可能弄得我被拒絕入境美國。

有時候，在這裡的大街上走著，我會突然感到一陣驚恐，彷彿一隻看不見的手一把抓住我的前襟，把我的衣服從皮帶底下掀出來，向過路人露出我肚子上的祕密。即便在悶熱的夏天裡，我也決不把衣服釦子全部解開。晚上沖個熱水澡是我喜歡做的事，也是我認爲最佳的美國享受。每次我洗澡時，都會小心地鎖上浴室的門，生怕凱瑞，我那柬埔寨出生的兒媳，會在不經意間看見我肚皮上的字。她知道我在朝鮮打過仗，也知道我打算利用在美國期間寫一本關於那場戰爭的回憶錄。此時此刻，我還不想對外人透露其中任何內容，不然，我會在拿起筆來的時候失去底氣。

上個星期五我正打盹兒，肚皮露了出來，我那三歲的孫女凱蒂，用她的手指頭順著那行字一路戳戳點點摸下去。她明白"C…S…"的意思，但不認識前邊那個動詞。我覺得癢癢的，醒來一看，只見她的蝌蚪眼睛正忽閃忽閃的。她先一咧嘴，又噘起嘴唇，一張蘋果臉繃緊起來。我還沒來得及說話，她已經身子一轉叫起來：「媽咪，爺爺的肚肚上有字兒！」

我一下子從床上跳下來，在門前一把抓住她。還好，她媽媽不在家。「噓——凱蒂，」我一邊說一邊把手指壓在嘴唇上：「別告訴別人，這是咱倆的祕密。」

「好吧。」她那笑容分明表示她已經起了疑心。

那天的下午我帶她去了八福路上的亞洲廣場，給她買了一大塊山楂糕，還有一盒洋芋片，把她樂得在我臉上猛啃了兩下。她答應我絕口不對任何人吐露我的刺青，連她哥哥鮑比也不能講。不過我懷疑她的諾言能守住多久。她肯定會記住看到過我的刺青，也一定會搖晃著她的小腦袋，去解開這個謎。

我的孫子鮑比，是個聰明孩子，快七歲了。我常常問他，長大以後他要幹什麼。他搖搖他那張圓臉，回答說：「不知道。」

「當個醫生好不好？」我慫恿他。

「不。我想當個科學家，當個天文學家。」

「當個天文學家就得花好多時間待在天文臺，那你想成個家可就難了。」

他媽媽圓潤的聲音插進來：「爸，不要又強迫他。」

「我沒強迫他做任何事情，只是提個建議。」

「他應該按他自己的興趣去做。」我兒子大聲說。

於是我閉了嘴。他們大概都覺得我是貪財，巴不得看見孫子腰纏萬貫。其實我的願望和錢一點關係也沒有。我打心眼裡相信，醫生是一個崇高、人道的職業。如果我再生一次，我一定會獻身於醫學。這個想法扎根在我腦海裡已經五十年了。我無法對兒子和媳婦詳細解釋，爲什麼我常常慫恿鮑比考慮當醫生，因爲整個故事會勾起太多的戰慄和痛苦。簡單地說，在朝鮮和中國我所看到那些白白死去的生命，在我的記憶中揮之不去，這些記憶，使我當醫生的願望越來越強烈。醫生和護士遵循一套不同的道德倫理，使他們能夠超越政治說教和人爲的敵對，而憑著憐憫心和人性尊嚴去行事。

再過八、九個月，我會回中國去，回到生我、養我，並最終埋葬我這把老骨頭的土地上去。我已經七十三歲了，老伴、女兒，還有外孫，都留在那邊家裡，我是不會再來美國了。在我回去之前，我一定要完成這部已經計畫了大半輩子的回憶錄。我要用我從十四歲起開始學習的語言——英語——來寫這本回憶錄；我要用紀實的方式，來講我的故事，以保證歷史的準確。我希望有那麼一天，我的孫兒孫女，還有他們的爸媽，會閱讀我這些故事，從而能夠感覺出我肚皮上刺青的全部分量。我把這部回憶錄，看做一個像我這樣的窮老頭兒，能夠遺留給他的美國子孫的唯一禮物。

第一章　跨過鴨綠江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奪取政權前夕，我正在黃埔軍校讀二年級，主修政治教育。黃埔軍校當時設在四川的省會成都，是國民黨政權的關鍵基地。蔣介石曾經是黃埔軍校校長，他手下的很多將軍都是從這裡畢業的。在某種程度上，黃埔軍校對於國民黨軍隊的作用，就像西點軍校對於美國軍隊的作用。

黃埔軍校的學員們對國民黨的腐敗已經十分厭惡，所以共產黨一到，大家就紛紛向人民解放軍投誠了。新政府解散了老軍校，把它歸入了西南軍政大學，讓我們在新的學校裡繼續完成學業，學成之後爲新中國效力。共產黨表示，會對我們一視同仁，決不歧視。不過，我並不敢對此抱太大的奢望，我不像其他同學，專業是軍事科學，我在舊軍校裡選修的那些政治課程，對人民解放軍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我更可能被看作一個落後分子，甚至被看成反動派。

軍政大學主要是爲了改造前國民黨的軍官和學員而建立的，我們在這裡要學習馬克思、列寧、史達林、毛澤東的基本思想，同時還得寫材料，交代自己幹過的錯事，進行自我批評和相互批評。幾個從舊軍隊留下來的頑固軍官，不肯放棄過去的觀點，在改造中受到了懲罰，被關在校園東北角上一座小房子裡。不過，我從來不與共產黨對抗，所以我感到還算安全。除了一些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我在新學校裡並沒有學到太多東西。

第二年秋天畢業以後，我被分配到人民解放軍第一八零師，這支部隊因爲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都立下過戰功而頗有名聲。我被分到師部當幹事，這使我很高興，因爲師部就駐紮在成都，我母親就住在這裡。我父

親三年前已經去世，我留在成都，就可以就近照顧母親了。還有，我剛剛和一個姑娘訂了婚，她是四川師範學校藝術系的學生，主修舞蹈，叫陶菊蘭，她也住在成都。我們計畫明年結婚——應該在秋天她畢業以後。不論朝哪個方向看，生活似乎都在向我微笑。所有的烏雲彷彿都散去了，共產黨給我們國家帶來了秩序，給普通大眾帶來了希望。我還從來沒有這麼歡快過。

我一個星期必須參加三次政治學習。我們要學習和討論中央下達的文件，學習史達林和毛主席的著作，比如《聯共黨史》、《論人民民主專政》、和《論持久戰》。我們師差不多有一半人來自國民黨舊軍隊，包括幾百名軍官，所以學習班只是走走形式，並不讓我反感。三十年以後成爲共產黨總書記的胡耀邦，當時擔任川北軍區政委，他在一次大會上甚至宣佈，我們這個師永遠不會離開四川，從現在起，我們應該全力投入國家的重建。我只覺得對共產黨滿肚子感激，它可算是給這塊飽經戰亂的土地帶來了和平。

可沒過多久，就風雲突變。一九五一年春節前三個星期，我們接到了命令，部隊要調往河北，那是與東三省交界的一個貧窮省份。我們被命令開到那裡集結，然後準備開赴朝鮮。這道命令著實令人意外，因爲我們是一支裝備很精糕的部隊，而朝鮮戰爭又是那麼遙遠，我們根本沒有想到會去參戰。

出發以前，我連和未婚妻一起拍一張合影的工夫都沒有，只能匆匆交換了各自的照片。她向我保證，我不在的日子她會好好照顧我母親。母親流著淚，囑咐我聽首長的話，勇敢殺敵，還說：「兒啊，好好活著回來，要不，我死都不會閉眼的。」我答應她一定活著回來，可是心底裡的擔心卻揮之不去，擔心自己會死在戰場上。

菊蘭算不上漂亮，但性情溫和，體形姣好，天生的舞蹈身材，四肢修長、柔韌。她梳著兩條粗粗的長辮子，一雙清澈的眼睛閃著天眞的光華，一笑就露出整齊的白牙。就是她那勾人魂魄的微笑抓住了我的心。我出

發得這麼急迫，讓她非常不捨，但是她明白，爲了祖國，個人難免要作出犧牲。當時，在很多中國人看來，麥克阿瑟麾下的美軍部隊再明顯不過地打算越過鴨綠江，佔領中國的東北，作爲一名軍人，我有義務奔赴前線，保衛我們的國家。菊蘭明白這些，在公開場合甚至表現出爲我而驕傲，可是一到沒人的場合，她就眼淚止不住。我盡量安慰她，「你別擔心，我去一兩年就會回來的。」我們互相發誓，一定要等著對方。她還把自己的玉鐲掰成兩半，一半交給我，作爲她愛情的信物。

坐了四天火車之後，我們師到達了河北滄縣一個叫泊頭的小鎮。撇下參差不齊的舊武器，換上了蘇製衝鋒槍和火炮。從現在起，所有的裝備都要保持統一。我們刻不容緩地開始學習使用這些新武器，可是所有的說明都是俄文，而我們師甚至沒有一個人認得俄文字母。有些部隊叫苦說，他們不知道怎麼擺弄高射炮，怎麼才能打得準目標。可誰能幫得了他們？他們問遍了周圍能問的人，也得不到任何指點。最後沒辦法，我們的師政委裴山，去問一個會說漢語的蘇聯大使館的武官，他們在天津一次宴會席上有過一面之交，不過，武官也沒幫上太大的忙。最後，士兵們得到命令：「在使用中學會使用。」

我是幹事，得到一支嶄新的蘇製手槍，換下了過去那支德國毛瑟槍。換槍對我來說倒不困難，我不是戰士，不必拿著新槍去操練。現在我明白了，我被分到一八零師的師部，可能是另有用場——我略通英語，在與美軍作戰的關頭可能用得上，我們師很可能早就被安排要上戰場了。我們離開四川之前，裴山政委就囑咐我，帶上本英漢詞典。當時他很和藹地說：「把它帶在手邊，俞元同志，它會成爲一件特殊武器。」裴政委三十二歲，高高的個子，紫膛臉，稍微有些謝頂，十幾歲起就投身革命了。和他在一起時，我總可以感覺得到他這個人的內在力量。

我們移兵東北之前，所有在國民黨軍隊幹過、現任團以上的指揮官都被下令留下來，這十幾個人的職位，

立刻被從其他部隊調來的共產黨軍官接替。這個大換血表明，是信不過從舊軍隊裡過來的人。儘管共產黨有他們的理由，但是臨陣換將，事後在朝鮮戰場上證明是一場災難，新的指揮官和自己的部下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互相了解。

春節過後的一個星期，我們登上了開往丹東的貨運列車，奔赴這個鴨綠江畔的邊境城市。我們下午出發，半夜時分到達邊境。我們師將在這裡休整、訓練半個月，然後開進朝鮮。

我們駐紮在丹東北郊的一個棉紡廠裡。丹東城內，到處是軍人和物資供應站，街上擠滿了機動車輛和牲畜拉的車。河岸附近一些住宅已經倒塌，顯然是被美軍的炸彈炸毀的。鴨綠江已經開始解凍，不過，沿著江岸還堆著不少冰雪。我曾經在一部電影紀錄片裡看過鴨綠江，但此時此刻，站在江邊去看它，鴨綠江和我想像得很不一樣，要狹窄得多，也湍急得多。急流激起水泡，形成很多小漩渦。江水是碧綠碧綠的，眞個是鴨「綠」江。一個在街上賣五香南瓜子的沒鬍子老頭告訴我，到了夏天，江裡時常發大水，沖毀莊稼、沖走蘋果樹和房屋。有時候，洪水還會淹死牲畜和人。

一天早上，我去城裡一處軍隊招待所，取一些有關朝鮮目前形勢的幻燈片，路上遇到了敵機空襲轟炸。只見一群美式野馬戰鬥機，向鴨綠江橋上正在幹活的人群大肆掃射。在空襲警報刺耳的尖叫聲中，十幾門高射炮衝著飛機開了火，炮彈在飛機周圍炸開了一朵一朵的黑花。一架剛扔了炸彈的飛機被擊中了，拖著一道長長的黑煙，一頭扎向黃海，看見這情景，觀戰的老百姓都拍手大喊：「打得好！」

我們一邊訓練使用新武器，一邊向其他部隊學習與美軍和南朝鮮軍作戰的經驗。我們都明白，敵人的裝備比我們精良，還有我們所沒有的空中掩護。上級則告訴我們，不要怕美國兵，他們都是嬌生慣養的，吃不了一點苦。他們的部隊根本走不了路，完全靠汽車；要是沒有車，他們就得雇朝鮮搬運工給他們扛著鋪蓋和食物。

他們當中就連當大兵的也不管做飯，連皮鞋都雇老百姓給擦。他們最糟糕的是，不是在爲正義而戰，所以沒有戰鬥到底的決心，人人一心惦記著每個月快點放假。就算我們在裝備上落後，我們可以充分發揮夜戰和近戰的傳統。一看到我們，都不用打，美國兵就得跪地求饒——他們只是一群膿包。爲了激起戰士們對敵人的仇恨，由一位教導員帶隊，戰士們拉著一輛手推車到處巡迴宣傳，上面裝著一顆大炸彈，作爲美國正在發動細菌戰的證據。他們每到一個營地就展覽這顆炸彈，還有傳染細菌的蒼蠅、老鼠、蚊子、蟑螂、蚯蚓這些東西的照片。這顆細菌彈據說是落在火車站旁邊，足有五尺長，兩尺粗，裡邊有四個隔間。宣傳隊告訴我們，這種炸彈不會爆炸，只是一投到地面就會打開，放出這些帶細菌的害蟲來。

我們中間不少人，曾在國民黨軍隊裡和美國軍人打過交道，說實話，大家心裡都沒個底，因爲我們都很清楚，我們的對手不僅裝備精良，而且訓練有素。

整個訓練期間，我們常常參加一些控訴會，老百姓和戰士一道，譴責美帝國主義。有位老農民說，那天他在靠近朝鮮的田裡收紅薯，美國飛機來了，把家裡僅有的兩頭耕牛都打死了。一位女兵舉著朝鮮婦女兒童被南朝鮮軍隊屠殺的大幅照片，在聽眾間走著，給大家看。一位記者歷數了美國侵略者犯下的種種暴行。可也有人抓住這個機會發洩個人私怨，他們把美國說成自己所有個人不幸的根源。一位黑臉龐的大學畢業生，甚至對著八百多聽眾說，他的健康就是被那些美國電影給毀了，他看了太多的色情片子，從中學到了怎麼手淫，他公開坦白，現在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這些控訴，多少鼓舞了戰士們的士氣，大家越來越坐不住了，迫不及待地要去爲人民殺敵。

三月十七日夜裡，我們跨過了鴨綠江。每個戰士都背著一支衝鋒槍，兩百發子彈，四顆手榴彈，一水壺水，背包後邊紮著一雙膠鞋和一把短鏟，還有一乾糧袋子的炒麵。由於西橋已經被炸毀了一段，我們小心翼翼

地從東橋上走過，每個人和前邊的人保持著三米的距離。橋下的江水漆黑一片，只聞湍急水聲。不時有人驚叫起來，因爲一腳踏進破洞裡去了。一頭拉著車的大騾子，後腿卡在一道裂縫裡，無論車把式怎麼拚命抽打，也拔不出腿來。我經過那駕已經歪斜的車身的當口，只見它顫抖起來，一下子翻了，連帶著那可憐的牲口一起跌進了江裡，濺起巨大的水花，在閃爍的急流中砸出一個大漩渦，滿車的醫療用品轉眼就不見蹤影了。

我們的帽徽、番號牌全部拿掉了，從現在起，我們稱自己爲中國人民志願軍，這是爲了把我們與國內的部隊區別開。這麼一來，等於中國沒有正式向朝鮮派遣正規軍，就可以避免與美國全面開戰。我們接到命令，要在十四天內，到達三八線附近的宜春鎮。從這裡到宜春有七百公里，我們全要靠兩條腿走過去。正值早春，還冷颼颼的，正在融化的冰雪把道路弄得泥濘不堪，給我們行軍帶來很大困難。師部有兩輛吉普，供首長們乘坐。有時候，吉普會先把首長們放下，回頭去接那些掉隊的戰士，那些腳上打了泡走不動的人。我一路上全是步行，只有一次，裴政委要我上他的車，幫他看看從路上撿到那些傳單上面的英文說什麼。我看了看，發現那是漢城一家餐館的菜單，一定是爲美國人預備的，因爲那上面只有英文。我不能完全看懂，但也能大致地把什麼菜什麼湯報給裴山聽，主菜裡有烤偏口魚片、牛排、炸雞、肉丸子之類。

除了政委的警衛員，還有個叫常明的幹事，他是負責出版師部通訊的，也經常坐在車上，爲此我很羨慕他。不論什麼時候部隊停下來過夜，常明就開始忙著採訪和寫報導。

裴政委似乎天生是個樂觀的人，他常常仰天放聲大笑，露出一嘴齙牙。他看上去更像個武夫，不像個幹政工的。相反，我們師長牛金平倒是個文弱之人，曾經當過六十二軍政治部副主任。我經常看到他那雙圓眼睛裡閃出一絲狡黠，凡是他在場時，我說話總是不敢大意。他笑起來幾乎是從不露齒的，聲音從鼻子裡發出來，好

像含了一嘴的東西。牛師長是桿菸槍，他的警衛員給他背著滿滿一書包名牌香菸。師長和政委都剛過三十歲，而且都沒有直接指揮過作戰。

在丹東那會兒，我根本想像不出戰爭破壞有多麼巨大。現在，我驚心地看到，鴨綠江東岸的村莊絕大多數已經成了一片瓦礫。百分之八十的房子已被夷平，沒倒的那些也沒人住了。朝鮮的農舍大多十分破舊，茅草屋頂，玉米桿外邊糊上泥巴就是牆了，很多住家只是些豁開幾個洞當窗戶的草棚子。地面上到處冒出石頭，有的尖有的圓，可以想像，在這種山地上種莊稼，一定很艱難，這裡星星點點能耕種的土地都被充分利用了，連山坡上都開闢出一小塊一小塊的梯田。我們在路上不時會遇到一些朝鮮老鄉，他們大多衣衫襤褸，女人的白衣服都穿得發黃，老人們戴著有帶子的黑帽子，讓我想起中國古代男人的裝扮。不少地段的小路是現鋪出來的，中國工兵忙著到處填洞補坑，用柳條筐運土運石頭。我們越往南走，沒炸毀的房子就越少見，弄得我們很多人只能睡在露天。

一般來說，白天行軍很不安全，因爲會遭到美軍飛機的襲擊。只有在天黑以後，我們才能往前推進。過了那個叫三登的鄉村小鎮之後，空襲更頻繁了，有時候夜裡也不能消停。每個戰士隨身攜帶的裝備至少有五十公斤，而每匹馬馱著足有二百多公斤。由於睡眠不足、休息不夠，部隊很快就疲憊不堪、走不動路了。行軍到第五天，天下起大雨，我們根本沒法躺在地上睡覺。政治部的幾個幹部只能擠在一塊支起的油布底下。很多戰士實在太累，竟顧不得傾盆大雨，把背包放在地上，一屁股坐下去，就那麼打起盹來。在栗樹林裡歇息的那些戰士，有的用繩子把自己捆在樹上，好能夠站著打打瞌睡。雨一直到下午還不見停，反正沒法睡覺，敵人的轟炸機在這種天氣裡也是不會來的，我們吃了些炒麵，就又接著趕路了。

第二天夜裡，我們快要進入一條峽谷時，突然前方上空亮起了三顆綠色信號彈。開頭以爲一定是我們的先

頭部隊，但是有幾個幹部馬上嘀咕，說山上可能有人給敵人發信號，指明我們的行蹤。我曾經聽說，有些朝鮮特務偷偷地幫美國人做事，但我卻沒有料到，會在這荒郊野外，遇到發信號彈的事。正在議論這些信號彈可能意味著什麼這當口，東南邊出現四架飛機，衝著我們來了。

「隱蔽！」一個聲音命令道。

我們有的衝向附近的灌木叢，有的在路邊的溝裡趴下。飛機扔下了幾顆照明彈，地面頓時一片雪亮，部隊和車馬立刻暴露無遺。接著，大量炸彈傾洩下來，機關槍開始向我們掃射。馬和騾子驚跳起來，踏過臥倒的戰士們，向黑暗處四散奔逃。一顆炸彈在我眼前爆炸，劈斷的半棵松樹被炸得飛到半空。我趴在一道水溝的斜坡上，焦糊的氣浪使我不敢抬頭，爆炸聲震耳欲聾，我拚命大張著嘴巴，好讓耳膜不至於被震破。身邊是一片哀號和呻吟，有人在地上翻滾掙扎，高聲求助。有些戰士已經死去或是失去知覺了，手裡還死死抓著自己的衝鋒槍。

轟炸持續了五分鐘，炸死一百來人，炸傷的更多。公路上，炸毀的馬車、山炮都在燃著火苗、冒著煙。我四下尋找常明，看見兩個通訊員架著一個人朝我這邊走過來。我認出了那人，是唐敬，師部的司務長。他不像受了傷，通訊員卻在一個勁地喊：「醫生！醫生！醫生在哪兒？」可是所有醫護人員都在忙著處理重傷員，把他們集中起來準備送回後方去。牛師長調來一個工兵連，在一個白樺林子邊上挖出一片大墳坑，來掩埋死亡的士兵。

最後總算把王醫生找來了，他打著手電筒，問唐敬：「打中你哪兒了？」

司務長沒有反應，胖胖的臉上毫無表情，兩眼閃閃放光，眨也不眨。

「你受傷了嗎？」王醫生又問。

唐敬張了張嘴，卻沒有發出一點聲音。他全身都在發抖，說不出一個字來。王醫生摸了摸他的額頭，又摸了摸他的脈搏。什麼都很正常，所以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們還得繼續行軍，可是拿不準應不應該帶上他。另外一個叫李文的醫生也來了，兩個醫生一起又給他檢查了一番，除了體溫略有一點高，他們沒發現任何毛病。

「彈震症。精神失常了。」李醫生說。

「他沒聾吧？」一個通訊員問。

「說不準。」

「我們拿他怎麼辦？」

「還是送他回後方吧。他一時半會兒還好不了。」

「眞想不到，」一直在旁邊看著的常明說：「他這麼身強力壯的人，怎麼這麼容易就瘋了？」

兩個通訊員把司務長架起來，把他送到擔架隊那邊去，擔架隊的民工會把傷員們抬回後方。來到朝鮮的中國民工人數之眾多，是我以前沒有想到的。他們大多是東北人，不少人已經超過四十歲了。東北人和朝鮮人在一起沒有語言障礙，因爲他們都會說日語，在日本佔領東北和朝鮮的年頭，他們在學校裡都要學日語；不過，民工的日子和士兵們一樣危險，他們要在飛機和大炮的轟炸之下搶修公路，搭建橋樑，裝卸物資，運送傷員，所以他們的傷亡也很大。我前邊正走著一個很瘦的男孩子，大概不過十五歲，抬著擔架的一頭，上面躺著一個滿臉繃帶的傷員。只聽見傷員不停地哀叫：「讓他們騙了！讓他們騙了！」

我們師的首長們被損失的士兵、裝備、牲口、給養給弄得六魂不定，我卻被唐敬的精神失常給嚇得不輕。整整一個星期，他那張沒有表情的臉總在我眼前亂晃。我從來沒有想到，一個人的神經這麼輕易地就被摧毀了。

第二天早上，在通往漢城的一條公路上，我們迎面碰上了一隊聯合國軍的俘虜，從我們身邊走過去。他們大約有七十來人，多數是土耳其人，高的高，矮的矮，個個形容枯槁。隊尾是十幾個美國兵，人高馬大者居多，都穿著大衣，其中一個還戴著金絲眼鏡，一臉落腮紅鬍子。俘虜們因爲負傷和疲憊，都走不快，不少人一瘸一拐的，有一個還拄著根鐵鍬把。押送他們的中國兵都端著上了刺刀的步槍，對他們很不客氣。一個當官的用刺耳的聲音叫著：「快點跟上！你們想坐車是不是？我告訴你們，沒有車伺候你們矜貴的腳。」儘管俘虜們聽不懂他的話，可他們人人一臉驚恐，耷拉著腦袋。

這個遭遇讓我們振作了一些。政工幹部們借這個實例，開始前後左右地做工作，讓大家明白敵人是多麼軟弱，別看他們有空中優勢。而聯合國軍方面，也同樣一刻沒有放鬆過心理戰，我們走過的一路上，都撒滿了美國飛機投下來，印著中、朝兩國文字的傳單，號召我們儘早投降。有一張傳單上寫著兩句古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還有一張上面是一幅木刻，畫著一個青年女子站在山肩，遙望遠方，盼著她出征的情郎回家來。上級命令我們不要看那些傳單。不少人便揣起這些紙片，留著捲菸或者擦屁股用。可是你一旦看一眼這些紙片，一陣濃重的悲哀就會在你心頭湧動，讓你的心一沉。

我們馬車拉著的食物給養，一個星期剛過就差不多用光了，現在唯一剩下的只有每個人身上乾糧袋裡的炒麵了。有人發現了能吃的野菜——蒲公英、馬齒莧、野韭菜、野蔥之類。朝鮮還長有一種野蒜，蒜頭還沒長大，可味道挺好，脆脆的，有點兒辣，可又不像大蒜辣得那麼厲害，蒜頭和綠葉子都能吃。不過，眼下這樣的早春時節，很多野菜才剛剛出芽，能吃的很不容易看見。有些樹上剛長出嫩黃色葉子，大家就去揪下來吃了。

我沒敢吃太多野菜和樹葉，因爲分不出有毒的和沒毒的。有的人不像我這麼小心，結果食物中毒了。

向前線和向後方調動的部隊非常多，以致天一黑，道路上就變得一片擁擠和喧鬧，塞滿了卡車、大炮、牲口拉的車、運送給養和彈藥的中國民伕、抬著傷員的擔架長隊。有一回我還看見一頭駱駝，馱著迫擊炮炮彈。每天夜裡，每一個團都有一百來人因爲腳上打泡而掉隊，或者累垮了。隊伍裡流行著「不讓一個同志掉隊」的口號，幹部和黨員幫著走不動的戰士背背包、扛槍和子彈袋。我看到班長和排長們給戰士端熱水燙腳時，不由得很感動，這就是共產黨軍隊和國民黨軍隊不同的地方。在國民黨軍隊裡，當個小官就能比當兵的吃得好，長官欺負下級是經常的事。

我們終於按時到達了三八線，但是全師有三分之一的人已經站不起來了。我的兩條腿都腫了，一隻鞋沒了鞋底。師首長向志願軍總部請求一個星期的休整，但上級只給我們一天的時間。我們飽飽地吃了一頓飯——米飯和蘿蔔粉條燉肉。吃完飯，我們像死豬一樣，在山間樹林裡睡了下去。

第二章 三八線以南的潰敗

第四次戰役二月剛結束，不知道爲什麼剛過兩個月，我們又發動了第五次戰役。一個大戰役的成功，取決於給養和軍火的齊備，取決於部隊的充分準備，這是常識。雖說剛從國內調來了幾個軍，可是部隊在艱苦跋涉之後已經極度疲憊，加上對異國的氣候和地形以及敵情又都不熟悉。上級告訴我們，我們這次戰役將殲滅美國和南朝鮮十個師團，把所有敵軍統統趕到三七線以南去，用上級的話說：「我們要給他們取消幾個番號。」我覺得很難置信，因爲我們的裝備差得太遠了，但我沒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任何人。我眼下的工作是協助常明編輯師部通訊報。常明畢業於北京大學，是學古典文學的，所以很受器重，連比他級別高的幹部都尊重他。他也懂英語，不過口語不很流利。我英語說得比一般大學生要好，因爲小時候我在家鄉上過教會學校，老師是美國的傳教士。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傍晚，我軍數千門火炮、榴彈炮、迫擊炮、喀秋莎大炮驟然向敵人陣地一起開火，拉開了第五次戰役的序幕。志願軍發動大型進攻時，天空中總是掛著一輪滿月，這次也不例外，月光對我軍的夜戰很有利。由一七九、一八零、一八一師組成的第六十軍，擔任了攻擊正面土耳其旅和美軍三師的任務。戰鬥進行得十分順利，順利得連上級首長都有些生疑了——一天之內，我們就向前推進了十六公里，沒有遇到任何像樣的抵抗。敵人爲什麼不與我們交戰呢？是被我們的炮火打垮了？還是在避開我們？這是不是一個引誘我們南進的詭計呢？上級有這樣的疑惑，可我們師的牛師長和裴政委兩人卻都缺乏高級指揮員必備的訓練

和經驗，無從判斷實際形勢，只知道執行指揮部的命令。沒有上級的同意，他們不能擅自主張，調動部隊。這條限制，使指揮官不能按照自己的判斷行事，直接導致了我們後來的失敗。

我們停頓了幾天，沒有繼續深入敵佔區。一個星期以後，戰役的第二階段開始了，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部隊突然轉而向東，向南朝鮮軍發起攻擊。我們師的任務是插到美軍與南朝鮮軍之間，特別要防止美國第一海軍陸戰隊和第七師，向東來增援南朝鮮軍。我們佔領了漢江南邊的山頭，漢江雖然水流湍急，但江水並不深，憑藉有利地形，我們在陣地上堅守了五天。美國的兩個師都沒能攻破我們的防線，儘管他們掌握著制空權，人數也大佔優勢。

至此，志願軍和人民軍部隊已經深深地插入敵佔區，有些部隊向三八線以南已經推進了一百二十公里。接著，所有部隊都接到命令，停止進攻。很顯然，這個仗打出了問題。部隊向前推進得太快，深入敵人防線太深，以致我們的給養線完全跟不上。除了後勤的問題之外，前線的傷亡也非常慘重。敵人採取了「磁性戰術」——不論我們進攻還是撤退，他們總是跟我們保持有效距離，給我軍造成傷亡。這次，他們把我軍深深地拖進南朝鮮，然後分割圍殲，各個擊破。很顯然，敵人佔了上風，志願軍總指揮部不得不下令停止進攻。大多數前線指揮員對整個形勢並不知情，有些人甚至以為我們已經打勝了。我倒還算了解實情，因為我常常在師部作戰會議上當記錄員。

幾天後，美軍發動了全力反攻。炮彈和空投炸彈瘋狂地傾瀉在我們師據守的山頭上，炸鬆了土地，炸斷了樹木，燒著的樹幹冒著火苗。儘管不知道該做什麼、該往哪兒去，我們還是死守著防線，打退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的進攻。直到五月二十二日下午，才接到命令，要我們向北撤退，渡過漢江，在漢江北岸構築一道防線。我們立即開始撤退。但是當天晚上，又接到另一封電報，命令我們不要過江，而要在漢江南岸建立一道防線，堅守四天，掩護從前線撤下來的傷員向後方轉移。這道命令，執行起來可不像說著這麼容易。部隊已經斷糧，而且我們的右翼已經失去掩護——那裡本該由六十三軍防守，但他們已經撤退到漢江以北。這個局面讓我們怎麼打下去？敵人看出我們的困境，所以調集更強大的兵力、更多的坦克和更多的炮火，要把我們趕盡殺絕。

在黑暗的掩護下，我們總算到達指定地點，在漢江南岸建立起一道防線。此時，敵人已經從三個方向向我們逼近，事實上，我們是留在漢江南岸唯一的一個師了。整整一天，我們雖然擋住敵人的進攻，自己也傷亡慘重。有報告說，五三八團一營在炮火攻擊中全營覆沒，剩下的每個營也都減員過半。師部裡，首長們舉棋不定，我們應不應該撤退？是過江還是在此死守？如果是死守，我們第二天就可能坐以待斃。可是，沒有上級的命令，大家頂多也就是說說而已，沒有人膽敢自作主張。結果，我們全師按兵不動，給了敵人時間，佔據了下游的渡口要道。

第二天，我們一整天死守著防線。傍晚的時候，命令終於到了，讓我們馬上渡過漢江，在江北岸重新部署一道防線。師首長並不知道哪裡是碼頭，只能盲目地選了一處做渡口。工兵排在江上拉起了三道鐵絲，部隊抓著鐵絲，踏入了急流。最近的大雨使江水猛漲，比一個月前我們向南渡江的時候水深了很多，有些地方水已經齊脖子深。經過一整天的激戰，我們又餓又累，有的戰士實在走不穩了。有人被急流沖走、淹沒了。還沒等到一半的部隊到達北岸，敵人的炮火就打了過來。緊接著，來了兩架飛機，向江中的部隊又扔炸彈、又掃射。爆炸掀起巨大的水柱，江水都被鮮血染紅了，人們在血水中呼號、掙扎。很多戰士抓不住鐵絲，被急流沖走，只見很多隻手臂在波浪之間揮舞著，直到被江水吞噬。此次渡江行動，大水捲走了六百多人，其中還有幾個衛生營的女兵。還有一些擔架，連同擔架上的傷員，也被沖走了。一車給師首長專用的食品也沖沒影兒了，一麻袋大米，幾十個魚肉罐頭，兩桶壓縮餅乾，一口袋豬肉乾，二十多包豆腐乾，一箱子香菸。新上任的司務長氣得

暴跳如雷，掏出手槍指著那個倒楣的趕車人的臉，口口聲聲要斃了他。

我們到達北岸時，敵人已經佔據了那一帶的制高點，馬上就向我們發起進攻。我們渾身還水淋淋的，就開始在幾個山頭上修築防禦工事。接下來的戰鬥進行得很殘酷，死了很多人。幸虧山地的地形不利於敵人坦克的行駛，要不然他們會把我們就地全殲。撤退的時候，爲了輕裝，我們把自己的山炮都丟在南岸，除了手裡的幾顆蘇製手榴彈，根本沒有任何武器阻擋坦克的進攻。當時戰士們拔掉了炮閂，把瞄準器扔到江裡，這樣就誰也沒法再使用它們。有些戰士不肯打死那些拉炮的牲口，又怕別人殺了牠們吃肉，就把牠們都放掉了。有幾匹馬和騾子不肯離開，一直跟著牠們的主人過了江，來到北岸。

第二天，天氣很熱。我們連餓帶渴，連師部的軍官都垮了。渴比餓要難忍得多，敵人很清楚這一點，他們把所有通向小溪的小道都封鎖了。牛師長派他一個警衛員，拿了一個汽油桶和幾個水壺，想到山腳下一個小溪裡去弄水，可是還沒能走到地方，就被敵人打死了，只好不再冒險取水。有些戰士餓得受不了，抓到什麼就吃什麼，南方來的人甚至吃蛤蟆和蛇。很多人因爲吃了有毒的蘑菇、或是吃了一種洋角蔥野菜中毒而死，這種野菜你嚥下去一會兒，嘴唇就變黑了。周圍到處是一片呻吟和咒罵聲，死去的人們隨處可見，像一堆堆破布，有的人到死嘴裡還含著草根、樹葉、嫩樹枝。

快到傍晚的時候，我們在半小時內一連接到兩道命令。第一道命令，指示我們師的各直屬隊，連同兩個團，一起向西移動，佔領馬坪里背後的大山，另一個團則沿著山路迂迴到那座山對面、面朝村子的駕德山，這樣我們師就可以從兩側打擊敵人，並掩護有著數千傷兵的野戰醫院撤退下來。從這道命令中，看不見上司對我們師兵力已經大減的考慮。一接到這個命令，師部馬上派出五三八團和五四零團往馬坪里方向趕去。可是還沒等師部出發，第二道命令又到了，讓我們派出兩個團去駕德山，另一個團把我們師的幾百傷員護送到馬坪里，

然後再去佔領馬坪里背後大山。上級強調，我們的任務是掩護野戰醫院撤出全體傷員，到時候一七九師會在後面掩護我們。此刻，南朝鮮一個師和美軍兩個師已經追上來了，他們的兵力正從右翼向我們包圍過來。面對兩道命令，裴政委和牛師長爲了執行哪一道而爭執不下，兩人坐在一塊大岩石後邊，猛抽著大生產牌香菸，一臉茫然。

裴政委主張，從現在起，在執行上級命令時，我們應該考慮實際處境。戰況每小時都有新發展，上級那麼遠，根本看不見我們面臨的是什麼。政委指著西北方向說：「情況明擺著，如果我們不搶先佔領那個山頭，可就很難撤退了。」

「你應該相信領導，相信兄弟部隊。」牛師長說。

「這不是信任不信任的問題，」裴政委回答他說：「這是咱們戰士的生死大事。」

「上級的電報說得很清楚，一七九師在村後山上呢，到時候會掩護咱們撤退的。」

「是不是這麼回事可說不準了。」

「放心吧，好不好？我們得執行第二道命令，那就是爲撤消第一道命令才下的。」

「可咱們師已經嚴重減員，只剩下三分之一的戰鬥力，沒有大炮，彈藥也快打完了，怎麼可能抵擋住敵人？」

「我知道，老裴，可是咱們軍人得以服從命令爲天職。」

裴政委再也沒話可說了。於是，他們刻不容緩地派出傳令兵，去追已經向西進發的部隊，傳達新命令，五三八團和五四零團轉向西南，在駕德山構築防線；五三九團則運送傷員去馬坪里，然後繼續向前，佔領村後的大山。說來奇怪，在傳達的過程中，命令卻走了樣，五三九團開到鷹峰山去了，那山在指定山頭的東北方向十

二公里以外！他們遭到了美軍的伏擊，全團覆沒。

我們就這樣失去了佔領馬坪里後山的機會，那是我們安全撤退和保存剩餘部隊的通道。我們只好在陡峭山路上繞道多趕了八公里才到達駕德山，艱難跋涉耗掉了我們的體力，延誤了我們的突圍。

黎明時分，我們到達駕德山沒多會兒，馬坪里村外的山坡上忽然槍聲大作。裴政委和牛師長慌了神，再次爭執起來。政委說：「敵人可能已經佔領山頭了。」

「你爲什麼就不能相信兄弟部隊呢？」師長反駁說。他現在看上去就像個憔悴的老頭，一臉皺紋還蒙滿灰塵，左臂掛著帶血的繃帶。

我正巧在場，於是政委笑著轉向我說：「你覺得應該怎麼辦，俞元同志？」

這話嚇了我一跳，因爲我不過是一個幹事。我大著膽子說：「也許我們應該先派些人去偵察一下。」

於是他們派了一個班，由偵察連長率領，到那邊去偵察。他們走了還不到五分鐘，敵人的炮火就響了，馬坪里上空一片硝煙塵雲。很顯然，我們的兄弟師根本不在山上，山頭已經落到敵人手裡了！（後來我們得知，一七九師曾派出一個團來營救我們，可是他們被美國兵堵住了，打得只剩下四個排。）我們現在完全孤立無援，離最近的兄弟部隊也足有六十五公里。不到一個小時，敵人就佔領了馬坪里和附近的村莊；而且，他們已經佔據這一帶的所有山頭。我們彈盡糧絕，全師只剩下三千人，完全陷入絕境。南朝鮮軍第二師正從前方向我們逼近。

更要命的是，從頭一天晚上，我們就與六十軍軍部和志願軍總都失掉了電訊聯繫。牛師長召集大部分團首長，開了緊急會議。簡單地向大家說明眼下的處境之後，他說：「現在我們必須決定該怎麼辦——突圍呢，還是死守、等待增援。」

會正開著的時候，炮彈就在指揮部周圍爆炸了。所謂指揮部，不過是一個牧羊人用來避風的地方，有一道石頭泥巴砌成的矮牆。炮彈不斷地尖聲呼嘯，接著就是氣浪，爆炸掀起的石子、土塊、渣子嘩嘩地往下掉。南邊和東邊，敵人近得已經可以看得見人影了，同時，美軍正從北邊逼過來。會場的一個衛兵竟被敵人的狙擊手射死。裴政委猛地一拍大腿，嗓音嘶啞地說：「這些天咱們的一個教訓是，眞正作戰中死的人，遠沒有炮火造成的傷亡大。如果守在這裡，咱們遲早都會被炸成粉末。還有，我們彈藥缺乏，怎麼能夠守住陣地？誰知道有沒有任何增援？我看咱們必須突圍！」

接著，其他幾位幹部也說，除了大炮，敵人還有飛機，他們作戰總是天上地下一起打。我們若是釘在一個地方，可就方便他們了。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只有突圍。我們師的炮兵主任郝超林，現在手下連一支槍也沒有了，他也說：「牛師長，下命令吧！咱們的人不能再讓敵人繼續這樣殺下去，這些人是咱們師最後的老底了！」他說話的時候，左眼邊上一大塊黑痣不停地抖動。

牛師長宣佈：「準備突圍！作戰科馬上向總部請求批准，一接到批准就立即行動。」

幸好，電訊聯絡又恢復了，但是我們等待上級的答覆等了三個小時。下午五點過後，答覆終於到了，批准我們突圍。電報命令我們趕到東北方向的鷹峰山去，同時又說我們的部隊正在馬坪里一帶重新集結。上級首長似乎也糊塗了——命令的內容說不通麼，這兩個地方根本不在一個方向。不管怎麼樣，我們六點鐘開始向東北方向突圍。

要到達鷹峰，必須通過一道很深的峽谷，峽谷長達三公里多。五三八團走在前邊，然後是師部，五四零團殿後。兩千多人擁進峽谷；在這裡，部隊根本別想有任何轉動，只能一個跟一個朝前走。很快地，部隊就陷入混亂。有人落在後邊，悄悄鑽進樹林和灌木叢裡去了。不怪他們啊，全師已經四天沒有開過一頓伙了，所以只

要一有機會，就有人離隊去找吃的。有時候他們會撿到一包從伙食車上掉下來的炒黃豆，或者從死去戰士胸前的乾糧袋裡找到一把炒麵。偶爾也碰上過南朝鮮部隊掉下的一袋大米。沒有時間煮熟，他們就把大米生嚼了吃下去。我們就像一群餓鬼，膽戰心驚，停不下來地四處覓食。部隊行軍之中，很多人都跟不上掉了隊。一有炮彈爆炸，那些新兵就會跪倒或趴下。大批從原來國民黨軍隊裡整編過來的士兵開小差了，其中的一個不光違抗命令，還衝著五四零團的代理團長開了槍，頭部傷勢嚴重的團長後來死在戰俘營的醫院裡。

走在前邊的隊伍幾次遭到敵人炮火的襲擊，遭受重大傷亡。拂曉時分，我們終於到達了鷹峰山的西側，這時我們師只剩下一千三百人了，而敵人已經佔據這一帶所有的制高點。五三八團的團幹部把全團五十來名黨員幹部集中起來，編成一個突擊隊，排成三角隊形，勇猛出擊，從敵人手上奪下主峰，於是我們暫時有一個立腳點。但是到了下午，在敵人的反攻之下，他們又丟了陣地。這也就是說，我們突圍的企圖失敗了。

黃昏的時候，我們又與六十軍軍部恢復電訊聯繫。洪軍長命令我們轉向西北，到史倉里去，與前來營救我們的兄弟部隊會合。一連幾個小時，我們的人都在滿山遍野地找東西吃，等到終於把大家集合起來的時候，發現只有不到四百人了。大家被編成三個連，然後一起向史倉里出發。師首長們疲憊加上虛弱，都得靠警衛員們架著走。我在他們後邊一瘸一拐地跟著；心裡充滿了恐懼，沉重得像灌了鉛。我從來沒有想到，仗會打得這麼混亂，這麼血腥。

我們又沿著來路往回走。從地圖上看，史倉里只有大約二十四公里遠，但是因爲疲憊，加上炮火的襲擊，我們走了一整夜才走了十六公里，大地在腳底下顫抖。有些地方，地皮都被炮彈炸鬆了，一腳踩下去，浮土沒過了腳脖子。第二天早上，在我們剛要進入頭一天走過的峽谷時，一個聲音突然從右邊斜坡下面傳來：「裴政委，裴政委，帶上我一起走！」

「是王醫生。」政委的警衛員虎子說。

裴政委對牛師長說了一句：「我下去看看，一會兒就回來。」

「老裴，別耽擱太久。」師長說。

「不會的。」

政委自己走不穩，所以虎子和我一起扶著他走下山坡去看王醫生。常明也要跟我們一起來，可政委不要，說我們馬上就回來。常明扭了脖子，只能歪著腦袋行軍，所以政委不讓他和我們一起下去。

王醫生的右膝蓋受了傷，頭天晚上昏迷過去而掉隊。他一看見我們就嗚咽起來：「求你帶上我走吧，裴政委！我還有用。」他的兩頰被眼淚沖得像水洗了一樣，身邊躺著一個皮藥箱。我把藥箱拎起來掛在肩膀上，再把王醫生扶起來，一起爬上斜坡，一路抓著灌木枝子爬上來，好去追部隊。

等我們上了路面，卻連一個人影也看不見了！我的心猛地一沉，又害怕又憤怒，一下子淚如泉湧。

「別哭，俞元。」裴政委對我說。

「沒想到他們會這樣拋棄咱們！咱們是他們的同志。」我哭著說。

「我日他媽的！」虎子破口大罵，他的娃娃臉上也滿是淚水。

我們一起走進峽谷。沒走幾分鐘，剛走過一處窪地，就聽見一片松林那邊有人叫起來：「裴政委來了！」

「帶上我們，裴政委！」

接著，眾人一聲聲地叫起來。只見從草地上站起一些人來，又揮手又叫喊。有幾個人還掙扎著向我們面前挪動。我們走過去查看，我感到很多雙眼睛從三個方向死盯著我們。

「發發善心吧！」一個人呻吟道。

「求求你們了，我爹媽只有我這麼個兒子。」

「送我們回國去啊！」

「天哪，別丟下我們不管！」

「我很快就會好的，裴政委，派給我一副擔架吧。」

「別把我們扔在朝鮮！」

山谷裡有將近三百人，多是在炮轟中負傷的，有些是被燃燒彈燒傷的，還有很多是吃了毒蘑菇和野菜中毒了，嘴唇烏紫，臉腫得老大。幾個星期以前，他們還都是生龍活虎的一群年輕人，可現在，可憐得還不如一群痲瘋病人。我驚駭無比，好一會兒說不出話來。

出乎我的意料，裴政委大聲宣佈：「同志們，我不會拋棄你們中間的每一個人。我們要奮力突圍，回到我們自己的陣地去。」

有人哭出聲來，痛罵著美國鬼子，也罵扔下他們的上級。在他們圍著裴政委集合起來以後，我們把他們編成三個隊。現在我必須承擔起某種領導責任了，因爲我是個軍官。我們用被單和薄毯蓋上死難者，簡單地給傷員包紮了一下傷口，安排了輕、重傷員兩人一對互相幫助。動身之前，政委作了一番簡短講話：「同志們，弟兄們，情況很明顯，咱們被包圍了。現在我們面前有兩個敵人：一個是美國侵略者，一個是飢餓。我們必須咬緊牙關，忍住飢餓，暫時沒有別的辦法。現在咱們就要出發了，每一個黨員一定要幫助他人，做勇敢和忠誠的模範。我們要利用黑夜的掩護，從敵人的防線上尋找空隙，衝出重圍——」

他的話被一架慢慢飛過的美國飛機打斷了，飛機的大喇叭不斷廣播著，勸我們趕快投降，他們保證人道地對待我們。一個悅耳的女聲，用標準的普通話喊道：「中國士兵們，你們國家的領導人說你們是自願到朝鮮來

的，但是你們心裡都明白，到這裡來不是你們眞心願意的。你們的領導人給你們強安了一個人民志願軍的名字，然後送到這裡充當史達林和金日成的炮灰。現在，你們沒有充飢糧，沒有禦寒衣，不敢說出眞心話，不能給家裡寫信。好好想想吧，弟兄們，你們眞的自願嗎？」

聽到這些話，幾個戰士失聲哭起來。等飛機飛遠了，裴政委說：「別上敵人的當。記住，我們是中國人，永遠不能背叛自己的祖國。要是我發現有誰想投降，我當場就斃了他。」他猛地把手槍一拍。

正在這時虎子來了，不知他從哪裡弄來一頭剪掉尾巴的騾子，一看就是拉過迫擊炮的。他拍拍騾子背上當鞍子用的半滿草袋子，很自豪地對裴政委說：「首長，從現在起您就可以騎這個了。」

「不，我不騎！」裴政委的眼裡閃著堅定的光芒。然後讓我們吃驚的是，他掏出手槍，對著騾子的腦門就是一槍。那騾子應聲倒地，大聲喘著氣，嘴裡流出鮮血，四條腿好像被看不見的繩索拉扯著一樣拚命亂掙。裴政委左手放在虎子肩頭，提高嗓音宣佈：「同志們，我們生死都在一起！我要和你們一起，走著回到咱們的陣地去。不要灰心喪氣。我們一定要互相幫助，找到突圍的辦法。」

他爲什麼要打死騾子呢？只是想對大家表示決心嗎？還是讓大家放心，他不會甩下他們自己跑掉？還是要震住他們、讓他們聽他的命令？我被弄糊塗了，虎子也是，一副委屈樣子，可我們都不敢說一個字。要是我們離開以前能有時間弄點熟騾子肉該多好啊。

我們動身向史倉里方向突圍。由於極度疲憊，我們沒法走快。這次敵人沒有炮轟我們；也許他們看出來我們只是一群傷兵，也走不到哪裡去，對他們構不成什麼威脅。夜深之後，我們開始加快向史倉里方向前進的速度，一個小時大約走一兩公里。沒有地圖，沒有指南針，看不見天上的星星，只能憑直覺辨認方向。政委、虎子、王醫生和我走在一隊的前頭，另外兩個隊都跟在我們後邊走。

起初我以爲會被指派率領一隊傷員，但裴政委命令虎子和我都緊隨著他。也許他是害怕。虎子背著一個皮包，裡邊裝著裴政委的私人東西。政委胃潰瘍犯了，不停地用拳頭頂著胃疼的地方。他告訴我們，要是衝不出包圍圈，我們就上山打游擊去，等待機會再回北朝鮮。

黎明時分，我們驚恐地發現後邊的兩隊人不見了，不知道他們是故意不再跟著我們了，還是被敵人抓住了，還是停在哪裡累得再也走不動了。我估計他們可能是都走散了。現在我們一起的只剩下八十來人，大多是警衛連和山炮營的，還有不少幹部也在我們這個隊裡。

第三章 三個月的游擊生活

整天東躲西藏，徒勞地在敵人的包圍圈裡尋找空隙，這樣過了一個月以後，我們隊已經只剩下三四十人了。每當有人被打死或失蹤，我都禁不住想起母親和菊蘭，我曾經向她們保證過要活著回去的。可是看這樣子，我可能沒法活著回家了。但是，儘管又害怕又悲傷，我還是強顏歡笑，特別是在裴政委面前時。他總是說，不管花什麼代價我們也得活下去。這些幹部裡有人對游擊戰術很熟悉，特別是隊長嚴文金，師政治部保衛科的科長，他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就領導過游擊隊打游擊。不過我們現在是在外國，語言不通，地形不熟，又沒有群眾，我們怎麼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援呢？那是游擊戰的基礎啊。

飢餓是我們最緊迫的難題。白天裡，我們在山上採摘野葡萄、野草莓，不過我們不敢走動太多，怕引起注意。野果子又小又苦，吃得舌頭都麻了，順著嘴角往外流綠水。裴政委胃疼難忍，我們採來的什麼他都吃不了，但他號召我們多找野果子和野菜自己吃。

一天早上，嚴文金興匆匆地跑來說：「樹林裡有一匹死馬！」

我們都趕過去看。是一匹栗色蒙古馬，死去有些日子了，馬鬃已經開始脫落，胸口上的槍眼化膿生了蛆，像一朵大白菊花，一群蒼蠅狂叮在上邊，拿樹葉枝子轟都轟不開。就是這樣，我們還是高興萬分——找到肉吃了。大家馬上四處去找刺刀、炮彈箱、鋼盔，好煮馬肉。我和兩個戰士一起爬上一個山坡，到一片小樹林那邊去找。正走著，忽然驚起成群的烏鴉，呱聲不斷。只見一個小高坡的後邊臥著四具南朝鮮士兵的屍體，他們中

間還躺著一個志願軍士兵，他的頭都碎了，面目已經被烏鴉吃得看不見了，遺體四周到處是手榴彈木把的碎片，很顯然他拉響了手榴彈，與敵人同歸於盡了。我們把他的遺體搬到一個松樹下的坑窩裡，用石頭和綠樹枝掩埋了他，向他默哀了一陣。然後我們告別他往回走，帶了兩把刺刀和一個空炮彈箱回來，在一個南朝鮮兵的口袋裡，還找到一個黃銅打火機。另外一撥人也找來了一把刺刀，三個鋼盔，和一些子彈箱。還有一個人，不知從哪兒竟找來一口癟了一塊的行軍鍋。

大家馬上開始割馬肉。發黑的粘血滴在地上，使空氣中充滿了腐臭。不多會兒，幾塊石頭支起的大鍋裡就煮起了大塊大塊的馬肉。這時候王醫生一瘸一拐地過來了，皺著眉頭看了看死馬，又用一把鑷子戳了戳鍋裡的肉，淡淡地說：「這肉已經腐爛了，吃了會中毒的。」

我們大失所望，只好走開，在一灘雨水裡洗掉滿手污血。有人不停嘴地罵著。

爲了解決飢餓的問題，嚴文金自告奮勇帶五個人下山去找糧食，裴政委同意了。太陽下山後他們出發了，我們一直焦急地等他們回來，可是五天過去了，沒聽到他們任何音信。後來在戰俘營的時候我才得知，他們幾個人伏擊了一輛載著一個班美軍和一些給養的軍車，結果三人被機關槍打死，嚴文金腹部中彈，死在去醫院的路上。這次失敗以後，我們又派過幾組人下山找吃的，但他們也都沒回來。有一次，我用望遠鏡正好看到我們的三個人怎樣落入敵人手裡。那天早上天空多雲，但視線清晰。我們的同志快走到山南腳下時，突然大約二十名美國兵出現在他們前方，還牽著兩條狼狗。我們的人趕快轉身閃開，向不同的方向跑出去，但是美國兵把他們都抓住了，摔倒在地，對他們狠命地又踢又踩。一時間飛揚的塵土遮住了人影，等我又能看見他們時，正看見兩隻狼狗在撲咬、撕扯他們。隔著相隔兩公里半的距離，整個場面毛骨悚然地安靜，沒有一聲槍響。我嚇壞了，趕快報告了裴政委。他的臉色陰沉，幾個鐘頭沒說一句話。

在東躲西藏的日子裡，又有幾個同志餓死了。不論我們怎麼設法，就是弄不到任何糧食，只能靠野菜、野果充飢，而野菜野果也越來越難找了。

一天下午，東南邊出現一幫光頭的士兵，朝我們這邊走過來，看上去是一個排。裴政委從望遠鏡裡看了一陣，斷定他們是自己人。果然，等他們走近了，我們認出了領頭的是萬樹民，工兵連代理連長。我們從駕德山撤退之前，他帶著兩個班去炸一座公路橋。他們完成了任務，卻與部隊隔斷了，陷在了當地。在那以後，他們四處輾轉躲避敵人，尋找回到自己人陣地的途徑，一直沒有成功。兩天前，他們在馬坪里附近撿到一麻袋帶有汽油味的高粱米，不打算獨吞，分了一些給我們。我們都高興極了，不光是因爲有了糧食，更要緊的是這些人都沒有負傷，也不像我們消耗得這麼厲害，他們的到來，增強了我們的戰鬥力，讓人感到我們又是一個健全的隊伍了。

裴政委的情緒常常影響我們。他是我們的主心骨，似乎總是知道該做什麼、該往哪兒走，其實他不過比我們大十歲。他高興的時候，我們也就情緒高昂。不幸的是，因爲胃潰瘍，他常常是陰鬱和痛苦的。不過，他現在可以吃高粱米粥了，所以我們專門爲他存了半口袋大約十多公斤糧食。又虧得虎子在給政委背著的那個皮包的夾層裡，找出一瓶多種維生素，還有一盒炮臺菸。裴政委把菸分給了大家，我那時候不抽菸，所以我沒要。從那天起，裴政委一天吃三粒維生素，這對他的病幫助很大。再加上炊事員給他的高粱米粥熬得很爛，已經熬成了糊糊，裴政委很快就不再反胃了，他的胃潰瘍奇蹟般地開始好轉。

我們再次開始努力尋找突圍出敵佔區。三個幹部組成的小組被派到敵人的陣地去偵察，可是他們再沒有回來。他們都是黨員，不可能開小差。實際上，如果他們想活著回到祖國，開小差是行不通的，因爲他們沒法混到朝鮮老百姓當中去，很容易就會被人認出來。按道理說，要想活命的唯一辦法就是向敵人投降。但是我們大

多數人都被那些美國人怎麼折磨中國戰俘的宣傳嚇住了，想都不敢想去投降。我們還聽說，敵人會把俘虜當成白老鼠，用於化學武器的試驗。這樣，我們大多數人寧可死也不願被俘。

四天之後還沒有那三個人的消息，我們決定自己尋找突圍路線。在一個地方待的時間長了是很危險的。我們動身向北，心裡並沒有任何特別的目標。走了將近五公里，我們在一個山頂上看見了敵人。敵人也發現了我們，馬上就開了槍；我們趕快鑽進不遠的一個松樹林，只聽子彈嗖嗖地飛過，打得樹上枝葉紛紛落地。現在很清楚了，那個三人小組一定是落到敵人手裡了。

我們爬上一個小山丘，又走進一個小峽谷，忽然看見一個山坡上冒起一股木柴炊煙。那邊一定有老百姓，於是我們衝著那火堆直奔過去。走近了以後我聞到像是煮米飯的香味，心頭狂跳起來。只見眼前一片空地，一個穿著白長裙的中年朝鮮婦女，正在用一把小斧子劈柴禾，往一個黑鍋子底下填。一看見我們，她驚叫起來，扔掉斧子就跑進一個小茅草棚子裡去了。

我們大聲命令她出來，但是她沒動靜。我們等了幾分鐘，就走進那間沒有門的小棚子。屋裡蜷縮著四個女人，其中一個很年輕，不到二十歲的樣子，中指上還戴著個鋁頂針。她們看上去很乾淨，都穿著樣式像小船似的鞋，完全是膠製的。從地上疊著的毯子和壓過的稻草來看，她們是住在這裡躲避戰火的。她們擠在一起，渾身打顫，有一個還哭起來。我們不懂她們的語言，也就不可能從她們嘴裡得到任何東西。我們把她們帶出小棚子，她們在太陽底下仍然渾身發抖。我把鍋蓋揭開時，一團蒸氣呼地湧出來。鍋裡的米飯看上去糯糯的，奇香無比。我很驚訝在這樣的環境下她們竟還有新鮮大米。我見過朝鮮農家吃的稀米湯，裡面米粒很少。現在所有的眼睛都轉向我，盯在那口鐵鍋上。我可以肯定，如果裴政委不在場的話，我們一定毫不猶豫地撲向米飯，狼吞虎嚥起來。裴政委掏出他的筆記本，寫下「中國人」幾個字，然後朝那幾個女人走過去，給她們看那幾個

字，對她們說，我們不傷害老百姓，叫她們不必害怕。年紀最大的那個婦女豎起大拇指，表示知道我們是支好軍隊，雖然她們顯然弄不明白裴政委說些什麼。然後他在紙上又寫了一個「米」字，讓她們看。

「歐帕桑米達！」那個年長婦女，搖著那張核桃一樣滿是皺紋的臉。也許她在說：「我們一點也沒有。」

我用英語問那個最年輕的：「你家在哪兒？」她不懂我的話，一個勁搖頭。要是我們有誰能說朝鮮話就好了。要不然，有幾瓶青黴素或瘧疾平藥片也好啊，用那個我們肯定能跟她們換來吃的，朝鮮女人很喜歡西藥和化妝品，連肥皂和牙膏都很受她們歡迎。大家不斷地瞟一眼她們那口鍋，卻不敢碰一下那米飯。

遇見了老百姓，我們就可以斷定一定會有糧食藏在什麼地方。我們守在對面山上，密切觀察那幾個女人，但她們白天從來不走出那片空地，就好像知道有人在盯著她們。我們分析，她們一定是山谷南頭那村子裡的人。夜裡，我們就去那邊被夷平的屋子周圍亂挖，希望能找到吃的，卻什麼也沒挖出來。

後來有一天，我們又發現一個被燒毀的小村，大家遠遠觀察著它，白天卻不敢走過去。那裡好像什麼都不剩了，卻有一縷炊煙從廢墟上升起來。我們正猜測著是不是有人在那邊做飯，就見一個又矮又粗的女人從村裡走出來，朝東邊山坡上去了。我們用望遠鏡盯著她，只見她進了一個灌木林。五六分鐘以後她又出來了，扛著鼓鼓的一個口袋，裡邊裝的準是糧食。於是，天黑以後，我們也到那個灌木叢裡去挖，果然挖出了一口袋大米，差不多有二十公斤。紀律規定我們不能拿老百姓一針一線，可我們實在是太餓了，有人餓得快死了。裴政委拿出筆記本，寫了一個借條，說我們借了糧食，等我軍隊再來解放南朝鮮時，就賠償給糧食的主人。他把這張借條放進空了的坑裡，用一塊石頭壓在上面。他的字跡很潦草，我懷疑失主根本就看不明白，一定會把我們罵死了。

要是我們有錢留給他們就好了。朝鮮人民軍和我們就不一樣，他們都隨身帶著現金，每人都有一疊，因爲

他們在漢城打下了南朝鮮政府的印鈔工廠。他們從老百姓那裡拿什麼都大把付錢，老百姓挺高興，一點也不知道那些鈔票已經不值錢了。我經常奇怪人民軍爲什麼不分點錢給我們，估計這裡面有個我軍尊嚴的問題。

爲避免敵人的追趕，我們又向南轉移，更深入敵佔區了。由於大多數莊稼地都沒有耕種，我們不指望秋天裡能找到成熟的作物，不過有的山上有果園和栗樹林。大家都盼著我們部隊快點發動第六戰役打過來，那樣我們就能歸隊了。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從現在起，再也不會有任何戰役了，戰爭雙方進入了僵局。

我們在一個樹木蔥蘢的山谷裡安營紮寨了，這裡有一條小溪，晚上聽見青蛙在水裡呱呱直叫。第二天，我們開始捉青蛙，那對我們可是美味，我們把牠們串在削尖的樹枝上，放在火上烤了吃。但是不到三天，所有的青蛙都被吃光了，夜裡再也聽不見牠們的叫聲了。偶爾我們聽到過狼啊，豹子啊的嗥叫，可我們不能打牠們，因爲不敢開槍。

我們不時派人去找糧食。幾乎沒有例外地都碰上敵人，又有人送了命。大約每得到七八公斤大米，就得犧牲一個人的性命，所以我們主要的充飢物是野菜、野草、蘑菇，還盼著到秋天野栗子成熟。有一次，二十多人吃了一種白顏色的菌類，都中了毒，那東西看上去像木耳，水靈靈、脆生生，挺好吃。一半人都吃了，我也吃了些。吃下去以後大家就不行了，有人開始呻吟起來，腹部絞疼得滿地打滾。幸虧王醫生一點也沒吃，他燒了幾大鍋開水，讓我們盡可能多喝，好排泄毒素。我大汗出得眼睛發花。這一次，雖然沒有死人，也折騰了我們兩天才漸漸好轉。

爲了遮風避雨，我們撿來美國兵沿路丟棄的紙殼箱，支起從燒炭人用過的倒塌棚子上揭下來的鐵皮，再把紙殼子鋪在地上，我們就睡在那上邊。我最恨走在山北邊，因爲那邊丟棄著很多中國兵、朝鮮兵、美國兵的屍體，空氣中充滿了腐爛的臭氣。當初在國內，我在黃埔軍校上學時學過，在打仗中一定要儘快掩埋掉陣亡者，

不能讓軍隊看見，否則，那些死屍的慘景會削弱軍隊的士氣。但是在這裡，在眞正的戰爭中，誰也顧不上那些了。

這裡的樹林很深，利於隱蔽。白天裡，我們盡量少活動；大多數時間裡，我只躺在窩棚裡休息。某種平靜籠罩著我。我隨身帶了一本《湯姆叔叔的小屋》英文原版小說，常常借助字典讀上一段。裴政委後悔沒有帶本書來，他的包裡只有幾本小冊子，不過是些宣傳品。他和戰士們都差不多，能忍受別的一切，卻不能忍受山裡的寂靜。不過他們知道怎麼消遣，自己用硬紙做撲克牌，用木片做棋子。白天裡，他們常常一玩幾個小時。我象棋下得不錯，但我寧可當個觀陣的。除了打牌下棋，裴政委每天還給大家講故事。他高中畢業，知道很多歷史傳說，講出來的故事把戰士們都迷住了。郝超林也給大家講了不少故事，主要是他從一些革命小說中看來的。我則講些《湯姆叔叔的小屋》裡邊的情節。不少人被裡面那個叫卡西的奴隸所感動，卡西用鴉片毒死了自己幼小的兒子，免得他被賣爲奴隸。大家都說，美國奴隸主一定比中國舊社會的地主還要殘忍，可是他們又很驚訝，竟然連奴隸都能吃上五花肉、豆子、糕餅、雞肉。我把克洛伊大嬸給奴隸山姆端來一大堆吃的那幾段翻譯給大家聽，在山姆向她報告了她兒子和女友已經逃到俄亥俄河對岸，所以奴隸販子再也追不上他們的好消息以後，克洛伊給他吃了很多好東西——雞翅膀、雞腿、火腿、玉米餅、火雞腿。就算那些東西都是奴隸主吃剩下的，在我們這些餓得發慌的人們看來，也眞是太奢侈了。

「火雞是個什麼味？」虎子眨著大眼睛問我。

「不知道。」我坦白說。

「一定是美味兒。」另一個人也搭了話。

我告訴他們：「火雞個兒很大，跟個小鴕鳥差不多。」

「好傢伙，那肉一定不少。」虎子說。

「我覺得美國的奴隸比我們村財主家吃的還要好，嘖嘖嘖。」一個寬臉的小個子戰士說。

說實話，我第一次讀到這些段落時，也有類似的想法。當時我想，美國一定是片富饒的土地，人人都不愁沒有好東西吃，奴隸們也不例外。

戰士們在一塊聊得很多，有的誇讚自己的家鄉，有的誇耀自己在國內時立過的戰功。他們還不厭其詳地描述吃過的和聽說過的美味：南京板鴨，金華火腿，街攤上的西北風味羊肉串，東北家宴上的炸全魚和烤乳豬。南方來的一個傢伙甚至盛讚油炸耗子有多麼香。我覺得好噁心，不管多餓我也不會吃那玩意兒的，雖然我知道那道菜是一些沿海地區的佳肴。

有人還在美軍廢棄的營地裡撿到過罐頭。我常常在想他們都吃什麼，他們的物資眞是豐富。虎子常說，他希望等仗打完以後能帶一堆美軍扔掉的炮彈殼回家，把那黃銅一賣，就足夠他後半輩子過的了。

漸漸地我和裴政委關係越來越緊密了，他似乎對我越來越親近。有一天，他私下對我承認，他一度對部隊裡的知識分子抱有疑心，但我使他改變了看法。對於大多數目不識丁的戰士們而言，每個大學畢業生都是大知識分子。除了我對同志們的忠誠，看到我沉浸在一本英文小說裡一讀就是幾個小時，裴政委也一定感到驚訝，他過去讀過這本書的文言譯本。他尤其高興的是，我夜裡會和士兵一樣站一小時崗。他對我說，如果他死了，應該由我幫助超林來領導大家。我說我承擔不了這樣的責任，我不是黨員，當領導不合適；另外，超林很能幹，也許根本不需要我幫。但是政委堅持說：「你的行動就是你的資格。如果發生意外，你要站出來領導大家。」

他的意思是，如果他和超林都犧牲了，就由我接替郝超林。其實，儘管我表面上平靜，內心裡卻十分擔憂。要是我死在異國他鄉，我媽可怎麼辦？我還非常想念菊蘭，她和我媽常常出現在我的夢裡，使我夜裡常常哭醒過來，也不知同志們有沒聽見過我說夢話。眞有心靈感應、讓我和菊蘭在夢裡交流嗎？還是我內心裡的念頭化作了夢而已？有天夜裡，我看見她神祕地笑著，臉上閃著光芒，好像有什麼祕密故意不告訴我。我伸出一隻手去摸她翹起的眉毛，她卻消失了，我醒過來，胸口隱隱作疼。

別人聽裴政委講故事聽得哈哈大笑時，我卻常常高興不起來。有一天政委對我說：「你教我們學點英語吧。」

「幹嘛用呢？」

「會有用的。我們還會和敵人作戰。教我們幾句戰場上用得著的話。」

於是我開始教大家英語，只是一些短語和簡單句子，像「舉起手來！」「繳槍不殺！」「我們不殺俘虜！」「不許動！」「投降吧，保證你的安全！」「別給美帝國主義賣命了！」等等。

沒有紙，我就用一根樹枝，把英語發音用漢字寫在地上，這樣，認識字的人可以有點「音標」。我沒法子讓他們發音準確，因爲有一半人連普通話都說不好。即便是抱怨英語發音把他們的舌頭和嘴都整得好累，有幾個人還說喉嚨都疼了，可是他們都學得很熱心。才幾天工夫，他們竟然就可以互相喊出剛學到的話了，讓我驚訝不已。他們多是聰明人，要是有機會或受過教育，一定都會大有前途的。我不明白他們爲什麼費這麼大勁，去學會幾個也許永遠也用不上的外國詞兒，天知道明天我們會碰上什麼事，我們隨時都可能被俘、被殺，北邊的敵人離我們不過三公里。

我想，對於他們來說，學習一定體現著某種希望，至少這意味著還有未來讓他們寄予希望。他們對世界的有限理解，對死亡威脅的遲鈍反應，賦予了他們生存下去的力量。他們在渴望學習中表現出來的堅韌生命力，

深深感動了我。

一天下午，我們坐在一處離峭壁不遠的地方學唱民歌，一個戰士從我們當廁所用的樹林裡跑回來，氣喘吁吁地喊道：「敵人！從兩側包圍過來了！」

虎子立刻把裴政委推向懸崖邊，那懸崖不很陡，雜草灌木叢生。「政委，您快下去！」他催促著說。裴政委正猶豫著，虎子猛地一推他的肩膀。政委翻了下去不見了；接著，又有四五個人跳了下去。虎子舉起手槍，對衝出樹林的敵人開了火。他剛要撤退時，一顆子彈打中他的胳臂，他「哎喲」地叫了一聲，這時，另一顆子彈打在他頸子上，他當場就死了，倒在花崗岩上，鮮血灑滿岩石。餘下的人被機槍火力壓住，動身不得。我正不知怎麼辦，一顆手榴彈落到身旁，我們炊事員一把撿起來，可他還沒來得及扔出去，手榴彈就爆炸了。我面前強光一閃，巨大的氣浪把我掀翻，然後就一切變成了黑暗。

等我醒過來，發現自己正在一輛車上，也許是一輛吉普。冰冷的空氣吹在我的臉上，臉一定已經腫了。天似乎很低，破碎的雲朵狂亂地顫抖著。有人用英語說：「媽的，讓那幾個傢伙逃掉了。」

一個輕快的聲音回答說：「行啦，夥計。我們抓住八個，不壞啦。」

「他們是朝鮮人還是中國人？」

「一定是中國佬。」

「你怎麼知道？」

「他們沒穿軍服。」

吉普車喇叭叫起來，然後是另一輛車開過去，也鳴笛作答。只聽司機旁邊的人喊道：「喂，怎麼樣啊？」

「還行。」一個聲音從老遠回答道。

他們抓住我了！這個念頭在我心上狠命一擊，我的心提起來了，似乎堵到了喉嚨。另外還有兩個中國人也躺在車上，看不見他們的臉，不知道是死是活。我的兩條胳臂還能動，可是兩條腿都是麻木的。我試著動一動腳趾頭，想看看它們還在不在；可我驚恐地發現，左腳竟然毫無知覺。我摸摸左腿，也是木的，我拚命努力，還是挪不動左腿，一定是斷了。我趕快摸摸胯裡——有人告訴過我們，有些美國兵會騙了中國戰俘——一切都在，只是我的大腿上裹了繃帶，抓我的人似乎要保住我的命。他們爲什麼不把我殺了？那比現在這樣要好多了，至少家鄉的人會把母親當作革命烈屬，政府就會照顧她了。

他們要把我帶到哪兒去？監獄？醫院？我被恐懼和恥辱淹沒了。該怎麼辦呢？除了自殺，從來沒有人教過我們一旦被俘該怎麼做。只有裴政委說過一次，如果我們落到敵人手裡，決不要告訴他們實情，隱瞞到底。那就是我應對眼下這種處境的唯一指導了。我搞不懂，美國人爲什麼不把我殺掉了事？那會省他們好多麻煩。

第四章　格琳醫生

我被押送到釜山戰俘集中營第一看守所。釜山是南朝鮮當時的臨時首都，有大批美軍和供應站駐紮，大街上鬧烘烘的，讓我想起了鴨綠江上邊的中國城市丹東，只不過這裡車輛更多，霧濛濛的港口上停泊的艦船，隱隱約約像一群小建築。除此之外，釜山比丹東要大得多，還有一個飛機場。我所在的看守所裡設有一個醫院和幾個被圈起來的戰俘營，每一個戰俘營裡都關著上千名戰俘。這裡的戰俘營是一個中轉站，受傷的戰俘在這裡接受治療，但大多數戰俘在這裡只待幾天，登記和審訊之後，就被送到其他地方的各個戰俘營去了。

我的左腿斷了，一塊彈片打到腹股溝附近，碎在大腿裡。因爲負了傷，我得以避免了去排隊登記，我聽說那是個冗長的程序，要排很久，儘管辦事員大多是人民軍戰俘，同情志願軍俘虜。我也沒有像其他戰俘那樣被審訊，那些審訊是很折磨人的。

不過，我還是被要求按了指紋，並躺在床上登了記。一個矮胖的美國軍官和一個中國翻譯來到我住的大病房，這裡住著七十多個傷病號，不是掛彩的就是生病的，都躺在帆布床上。病房是一個巨大的鐵架帳篷，地上鋪著膠合板，有兩個入口，裡邊空氣難聞。那軍官問了我的名字、官銜、學歷、部隊番號，又問我頂頭上級是誰。我告訴他，我叫馮延，是個新兵，在五三九團一個步兵連當文書。美軍一定已經知道了五三九團的番號，所以我如實說了，是「三六九二」。他給我看了一疊中國軍人的照片，好像都是軍官，問我認識不認識。我一個也不認識。我三天前剛動了手術，還很虛弱，所以軍官和翻譯又問了幾個問題以後，就走了，說回頭還要來的。整個問話過程，我沒說英語，怕暴露眞實身分。

圍著鐵絲網的營房外邊，離大門三、四十米遠的地方，有一座刷了白灰的兩層小樓，紅瓦屋頂，老虎窗。戰爭之前，那樓曾經是個學校，現在成了「開刀房」，病人們都稱它爲「屠宰場」。幾乎每天都有死屍從那裡搬出來，堆在看守所登記處外邊，和那些在來醫院的路上就死掉的屍體放在一起。三天以前，我就在那小樓裡待了四個小時。他們把我放在手術檯上，兩個醫生小聲地談著我的腿，我不完全明白他們說的，因爲我神志還不清醒，又不熟悉那些醫學的術語。聽上去他們也不能確定先做什麼。麻醉師在我的下腹部和腰背部注射了一些藥物，然後把我的雙臂和兩腿都綁起來。護士在我肚子上蓋上一塊白單子時，其中一個醫生苦笑著說：「我應徵時，從來沒想到有這麼多病人等我來動刀子，眞比任何住院實習都強。」

「看來，戰爭結束後我就夠格當個外科主任了。」那個淺色眉毛的高個子醫生說。顯然，他是主刀。

我意識到他們可能只是醫學院還沒修完功課的學生，心都打顫了。我緊緊地閉上眼睛，猶豫著我是不是應該求他們保住我的腿，可我決定還是不說了，忍著吧。窗外正下著瓢潑大雨，打得玻璃窗一片模糊。

「哎喲！」我叫起來，一個醫生戳到我傷口了。

「疼嗎？」一個關切的聲音問。

我還沒能回答，高個子醫生就說：「該開始了。」

麻藥還沒有完全起作用，他們就開始動刀了。陣陣疼痛傳遍我全身。他們在用器械探察我傷口，儘管我咬緊了牙關，仍然忍不住呻吟、扭轉。

周圍漸漸模糊起來，所有的東西，強烈的燈光，鋼架子上的藥瓶子，人頭上的藍帽子，都似乎漂浮起來，在我周圍蹦上跳下。沒過多久，我就失去了知覺。

我醒過來的時候，整個左腿已經綁上了夾板。「都給你弄好了。」高個子醫生朝我咧嘴一笑。「你的腿還在。」

「Thank you.」我鬆了口氣。

「你會說英語?」

我搖搖頭，悔不該脫口冒出一句英語。

「你聽得懂我的話嗎?」他又問。

我沒回答，只是瞪著他。他揮揮手，讓兩個勤雜工用擔架把我抬走。

除了美國醫護人員，醫院裡還有三四十名勤雜工，大多數是中國人，這些人跟敵人合作，被派在醫院裡負責搬運傷員，打掃衛生。作爲「合作者」，他們也許不會返回中國大陸了，怕因爲自己在這裡的行爲而獲罪，所以，他們對待我們的好壞就看他們的情緒和興致了，有時候，他們甚至可能會打病人。抬我回病房的兩個勤雜工一路上都在拿我開心，說大夫沒把我的腿鋸掉算我走運。

我一回到帳篷裡，就開始發抖。醫生沒有給我開任何止疼藥，我大汗淋漓地呻吟了一整夜加一早上。幸虧同屋的病友給我拿來水喝，還餵我吃了米粥，我才熬過了那一夜。病友中間有一個是我們師警衛連的，叫丁萬林，左脅中彈負傷，現在已經快好了，他的床就在我旁邊。他認出我來了，有幾次他見過我跟裴政委在一起，可我不記得他了。他很照顧我，那一夜他坐在我床邊好幾個小時，不停地給我擦去臉上的汗水和淚水。還有一個胸部負傷的朝鮮人，不斷地揮手狂亂叫罵，好像在和什麼人吵架。

丁萬林後來告訴我，我們師的人，那次在滿是掉隊士兵的峽谷扔下我們的兩天以後，就被敵人俘虜了，不過牛師長帶著他的警衛員和幾個幹部逃脫了，回到了北朝鮮，因爲當時有一個警衛班向另一個相反方向跑，把

敵人引開了。

儘管虛弱，我卻能吃東西，胃口出奇的好，也許是山林裡多日的飢餓所致。終於有飯吃了，雖然也不能吃飽。每天早上，我可以得到一碗牛奶，有時候晚飯還有一罐頭牛肉或金槍魚。有一次，還發給每個人一罐糖水水果，眞是好吃。一般每個病友每頓可以得到一碗米飯加一勺子菜，醃蘿蔔，或胡蘿蔔，或白菜，有時候還加半缸子湯。戰俘們用的標準搪瓷碗個兒不小，深八公分，上端直徑十五公分，底部直徑十公分。我提醒自己一定要多吃，養好身體，好完完整整地回家。

萬林和我商量好，決不對敵人暴露彼此的姓名和身分。他今年二十一歲，比我小兩歲，又高又瘦，直直的鼻樑，細細的眼睛，說起話來打點磕巴，好像還是個少年，無憂無慮的天眞妨礙了他把話說得清楚似的。他一笑就露出一口不齊的黃牙——我們很多人幾個月都沒有刷過牙了，所以，就算現在有了牙粉，牙齒還是很難看。我對他很感激，因爲他常常扶我上廁所，替我取飯打水。

帳篷裡有一個斷了腿的病友，叫周谷樹，人很瘦。他不是我們師的，去年冬天在原州附近被俘。他的腿上打著石膏，已經動過好幾次手術了。他疼得厲害，臥床不起，常常咒罵托馬斯醫生，就是那個高個子、淺眉毛、給我動手術的傢伙，說醫生在拿他的腿做試驗。他老是在哭，有的時候光號卻沒有眼淚。我覺得他太嬌氣，他應該控制自己一點，因爲帳篷裡有四十多個朝鮮人，會笑話我們中國人，把我們看成草包的。

有一天，他疼得太厲害，吃不下中飯，萬林走過去，把一碗菜湯往他身邊挪近些，想勸他好歹吃一點。說話之間，萬林看見一條蛆正在谷樹床上蠕動。他掀開谷樹的毯子，看見了更多的蛆。他把碗放下，就跑了出去了，沒多一會兒拿了個空藥瓶和兩根細棍回來了，讓谷樹翻過身去。他把那些蛆撿到小藥瓶裡，又掀開谷樹的衣服，看見一堆幼蟲在他後腰一帶擠作一團，至少五十多條。另外兩個病友也來幫忙清理。等把谷樹腰背上都

清掃乾淨了，卻看見從石膏頂端又爬出來更多的蛆蟲。我們全都嚇壞了——石膏裡邊，一定有大批蛆蟲，在吞噬著那條腿。

在其他病友的要求下，第二天早上，兩個醫務人員帶著鉗子趕來了。石膏被打開以後，成團成團的蛆暴露出來，四處亂爬。傷口周圍的肌肉已經發白腐爛，又是膿又是血的；蛆蟲甚至已經鑽進周邊部位，吞噬著原來完好的皮肉。我轉過臉去，五臟六腑一陣翻騰。

一整天谷樹都在不停地呻吟；他感到呼吸困難，時不時抓撓著胸口。他不住口地痛罵托馬斯醫生，說他有意搞壞了他的腿，把他當成細菌試驗的小白鼠。帳篷裡的很多人都相信他說得有理。

第二天，他被抬到手術室去了。他們從他的另一條腿上揭下一塊皮來，移植到傷口處。也不知道那些年輕醫生會不會皮膚移植，這很可能是他們的第一次。

下午的時候谷樹被抬回來了，晚上給他服了安眠藥，所以他睡得很沉。但是從第二天開始，他就不停地叫疼。「他們爲啥不幹掉我算了？我死了，他們願意怎麼用我的器官就怎麼用。」我後來得知，第二年他做了第七次手術之後，那條腿就麻木了。有一位美國醫生認爲有必要截肢，谷樹卻堅決不幹，說他寧可死了也不願意少一條腿。他們最終還是慢慢設法保住了他的腿，不過他走路必須拄拐了。

他的遭遇讓我害怕，因爲我的腿也一天比一天發燙，一天比一天疼得厲害。拆掉繃帶的那天早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傷口，根本沒有癒合，雖然傷口周圍已經開始結痂，可實際上，傷口已經感染了，裡邊一定有很多膿。看到這個糟糕樣子，我幾乎掉下淚來。萬林把一缸子涼水舉到我嘴邊，才讓我鎮定了下來。不論我怎麼努力，左腿都沒法動彈，不聽我的指揮，還把一波一波的震痛傳到脊椎。

那天下午，我拍了張X光。膠片上顯示，我腿裡還有一塊彈片沒取出來，引起了感染，我還需要再動一次手術。第二天，托馬斯醫生來到我病房，帶著孩子氣的傻笑告訴我：「如果你想保住這條腿，就得再挨一刀，不過，這個手術不大。骨頭接好了，這倒讓我放心。」

他說話的時候我一直看著他，沒等中國翻譯把他的話翻完，我就用英語聲嘶力竭地叫起來：「我不想讓你給我動手術！」

托馬斯醫生吃了一驚，對翻譯說：「他會說英語。」

帳篷裡的病友們也很吃驚。我又衝他喊道：「你是一個笨蛋屠夫，醫學院還沒畢業呢。」

他躊躇了一下：「你怎麼能肯定我沒畢業？我用得著給你看文憑嗎？」他一臉無辜的樣子，瞇起左眼，咧嘴一笑。

「你上次給我開刀時說過。你只是一個還在實習的假醫生。」

「哈，你的記性眞不錯。你猜怎麼著？我根本不喜歡這裡的工作。整天給人動刀子，我煩透了。沒完沒了的手術毀了我的心情，更別提我的胃口了，我好多天都不吃午飯了。你說得對——這種治病，的確讓我覺得自己像個屠夫。」

「我不讓你給我治。」

「那我可得想想。等明天吧，你知道，不是你說了算的。」

我沒再說一個字。他轉身出去了，瘦高的翻譯跟著他也走了。

托馬斯醫生一走，其他病友立刻圍了過來。「你英語說得眞好啊。」一個稱自己是尤上尉的長臉朝鮮人說。他看上去溫和又開朗；我常常看見他獨自坐在病房出口附近，翻看一本厚書。

我倉皇失措。現在他們認定我是軍官了，這可能給我帶來危險，敵人必會仔細地審問我。我該怎麼辦？對

這些人承認我上過大學？不行，如果說了實話，就會有人出賣我。

我用英語對尤上尉說：「我的英語都快忘光了。剛才是太生氣了，一急倒想起幾個詞來。」

「你上過大學嗎？我上過漢城大學，學經濟的，可我參加了朝鮮人民軍。我要解放和統一我的國家。」

「我沒上大學。」我說。「小時候在家鄉跟一個傳教士學了一點英語。」

「好啊，我眞佩服。」他發出一陣大笑。

六七個朝鮮兵也咯咯地笑起來，我不知道他們聽懂了我們的對話沒有。他們一定全都忠於共產黨軍隊，要不然尤上尉不會這麼痛快地談他自己。我聽說，北朝鮮軍的戰俘在戰俘營裡組織得很嚴密。醫院裡的一些醫生和護士也是朝鮮戰俘，而且朝鮮共產黨已經滲透到了整個戰俘營的各個部分。有傳言說，戰俘營裡甚至成立了一所金日成大學。

第二天，我第二次被放到手術檯上時，驚恐地看到托馬斯醫生就在旁邊。他走過來，笑著拍拍我的胳臂：「看，馮延同志，我今天大概還得開你這一刀。」

「你別碰我！」我說：「這就送我回去。」

「等等，咱們得搞清楚。」他刷地一下子板了臉：「別的醫生都有自己的一堆病人要處理，所以只能是我來幹。」

「我今天不動手術。」

「你怎麼就不明白我是在幫你，保住你的腿呢？」

「我不要你這樣的假醫生幫我。」

「你們這些赤匪眞不知好歹。」

「送我回去！」我嚷起來。

「不許喊！」一個男護士插了嘴。

另一個也幫腔：「你不應該這樣侮辱托馬斯醫生。他對你盡了力。」

我看見兩個勤雜工正從門外走過，就衝著他們用中國話喊起來：「兄弟，快來幫我一把！救救你的同胞！」

美國人似乎傻了眼，你看我，我看你，說不出話來，我在托馬斯醫生的眼睛裡看到了猶豫和著急。我繼續大喊：「幫幫我！把我送回帳篷去！兄弟們，我們還是戰友啊！務必救救我！」

但是那兩個人一個也沒進來。我合上眼，一個勁地喊下去。這時候，醫生和護士都走到一邊去了，他們站在一個窗戶前嘀嘀咕咕，說的什麼我聽不大見。然後一個護士出了屋子。

我繼續喊叫，拚命踢能動的那條右腿，腐爛和酒精的氣味令我噁心。兩三分鐘後，那護士回來了，叫來了一位我以前從沒見過的醫生。這個新醫生朝我走過來，拍了拍我的前額。我睜開眼，驚異地看到了一張女人的臉。她不到三十歲的樣子，身材苗條，面容清瘦，帽徽標示出是少校軍銜。她褐色的頭髮剪得很短，卻很整齊，從帽簷下露出來。她一雙明澈的淺褐色眼睛友好地看著我，笑起來的時候露出一口不太整齊的牙。讓我吃驚的是，她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我是格琳醫生。我能看看你的傷口嗎？」她略帶一點上海口音，可說得那麼自如，以致我以爲自己聽錯了。我呆住了，直瞪瞪地看著她。她又微笑起來，更帶上幾分半勸半哄的口氣，又問了一遍：「能看看你的傷口嗎？」

我點點頭表示可以。她彎下腰來查看我的腿傷，其他醫生護士也都圍過來看。我的傷口離腹股溝很近，這樣我的私處就全部暴露出來了，窘迫得我兩頰發紅，一聲不出地閉緊眼睛。她的手指很靈敏，在我的傷口上輕

摸輕碰，我覺得彷彿有什麼清涼、鎮靜的東西給敷到傷口上了，疼痛減輕了好多。

檢查完以後，她直起身來說：「你傷得很厲害，被送來的時候就化膿了。我們首先需要把壞死的組織去掉，然後等炎症消退一些，再取出骨頭碎片和彈片。我可以向你保證，托馬斯醫生上次處理得很好，所以我們今天可以打開傷口，取出彈片和碎骨頭了。」

「謝謝你，我一直心裡沒底。」我嘆了口氣，轉臉去看托馬斯醫生，他是個中尉。他朝我齜牙一笑，像個大孩子。

「我明白。」她說。

她簡單地和托馬斯醫生交談了幾句，又笑著問我：「今天我可以給你動手術嗎？」

我迫不及待地點點頭表示同意。她令護士給我打了靜脈注射，然後給我罩上乙醚罩。有她在，我覺得心安，彷彿她是被派來拯救我的。同時，我聽見一陣讓人不安的金屬碰撞聲，熱呼呼的什麼東西放在我右腿上了。

很快我就失去了知覺。

不知道過了多久我才醒來，一定有三四個小時了，因爲我醒來的時候聽見一個男聲在走廊裡喊：「開飯了，」然後我看見了女醫生，她光滑的前額上全是汗珠，大眼睛正注視著我。見我醒了，她說：「想看看我從你腿裡取出什麼來嗎？」

我點點頭，口乾得吐不出一個字來。她用鑷子從白瓷盤裡夾起一塊黑乎乎的帶血彈片，像一個被擰彎的鈕釦。她說：「就是這個東西，打碎了你的骨頭。我們還取出了所有的碎骨頭。」

「我以後還能走路嗎？」

「當然，我會讓你走路的。不過，現在你暫時還得在床上躺著。過不久我們還要給你再做一次手術，解決所有的問題。」

還要再做一次手術！我一下子淚水盈眶。又覺得丟人，就轉過臉去。

她拍拍我的肩膀說：「別擔心。我會讓你重新站起來的。」

我轉回頭再看她時，她正朝門口走去，白衣下的後背挺得很直，兩肩單薄又纖細。

這次手術減輕了我的疼痛，我身體上和精神上都開始好轉。不過我越來越想家了，夜裡經常撫弄那半塊玉簪子。俘虜我的人搜去了我所有的東西，只留下這塊菊蘭的愛情信物和她的小照，我把這兩件東西藏在貼身內衣的口袋裡了。玉簪的柔滑讓我想起未婚妻的皮膚，常常令我白日裡都想得發癡。

有時候我也會想到其他的女人——戰俘營周圍不知哪兒來的朝鮮女人，每天晚上都要唱歌，一唱就是一兩個小時。那些歌聲在黃昏裡迴蕩，憂傷又深情，有時候，她們的曲調充滿哀怨，好像在訴說某種情變，或是某種一去不復返的機會。不論什麼時候，她們一開始唱歌，我就仔細傾聽。空氣中好像通了電，病房裡的人都停住交談，所有人的眼睛都變得迷迷怔怔的，更明亮了，有些還濕潤了。我多麼希望能明白她們唱些什麼。她們勇敢的聲音讓人想起我們老家的鄉村姑娘，她們在稻田裡幹活，或在山上採茶時，常常比賽著唱情歌。要是我能走出帳篷，看看那些唱歌的女人就好了，哪怕是隔著鐵絲網。

萬林跟我說起她們，可是他也弄不清她們是誰。傍晚他常常出去；有一次他看見了幾個朝鮮女人，雖然好像也是囚犯，卻都是老百姓。我們的朝鮮病友肯定比我們清楚唱歌的那些人是誰，但是我們沒法談這個話題。我覺得，要去問尤上尉那些女人的事，太難爲情了。

在我的腿好轉的同時，谷樹的腿傷卻又惡化了。看我恢復得這麼快，他請求醫院也讓格琳醫生給他治療，

要不就把他交給那個從佛羅里達來的經驗豐富的奧斯曼上校，戰俘們都知道奧斯曼上校是個好心腸的人。

我手術兩個星期以後，格琳醫生和托馬斯醫生到我們帳篷裡來了，都穿著白大褂。一見他們，我就掙扎著要坐起來，但她按住了我，用英語說：「躺下。我們只是來看看你恢復得怎麼樣。」

她和托馬斯醫生一定是來查房的。她查看了我的傷口。「好極了，恢復得很好。」她說著，眼睛放出光來。「明天就可以給你動手術，把你的骨頭徹底修復。」

「謝謝你，格琳醫生。」我說。

他們走了以後我依然很興奮。至少，我相信自己還能用雙腿走路。

第二天，我第三次被帶到手術室，又看見了托馬斯醫生。等我躺到手術檯上之後，格琳醫生向前略彎一點腰，戴上了手套。她問我：「你很想走路不用拄拐，對不對？」

我點點頭。

「這次手術以後，你很快就可以走路了。」

我熱淚盈眶，趕緊閉上雙眼。她沒看見我的眼淚，因爲胖胖的麻醉師正把乙醚罩放到我臉上。不一會兒我就失去了知覺。

等我醒過來時，看見格琳醫生閉著眼睛，斜靠在牆上。她臉色蒼白，顯得很疲憊。我弄不清她是小歇一會兒，還是已經做完了手術。她的白大褂前襟上沾上了我的血，可是她沒有戴手套。看見我醒過來了，她勉強露出笑容，說：「一切都很順利。」她的話讓我放了心。

手術以後，她每三天來查一次房。天氣越來越涼了：柳樹上的知了不再鳴叫了，黃蜂也都不見了。天剛亮時，我常常看見病友們嘴上都飄著團團霧氣。更多的舊衣服也發下來了，現在每個人都有了一件大衣，加了一條毯子，一套橄欖色的軍用工裝。每件衣服上都印著兩個白色的字母，右邊袖子上有個P，左邊袖子上有個W，也有些衣服上，兩個字母都印在胸前的兩個口袋上。至於大衣，兩個字母都印在背上。我還不能穿褲子，只好總是把毯子蓋在腿上。白天，萬林不用床鋪時，我就把他的毯子也拿來蓋上。

我清楚地記得格琳醫生來給我拆線的那天，那是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志願軍入朝作戰一周年的第六天。我一共縫了十二針，她用剪刀和鑷子把它們全拆掉以後，幫我下了床，然後對我說：「現在看看你能不能自己站起來。」

我開始發抖，兩手緊緊抓著帳篷柱子。一開始我不敢鬆手，後來慢慢地把全身重量放到兩腿上，鬆開了兩手。她走到我前面，說：「哈！你現在能自己站起來了，很好，眞讓人高興。向我走一步。」

幾個病友在看著我們。儘管使了好大的勁，我卻挪不了步，兩腳好像是釘在地板上了。她又催我：「來呀，邁一步，勇敢點，當兵的。」

太不好意思辜負她了，我咬緊了牙，慢慢地伸出左腳。可是，在床上躺了三個多月，我都不會掌握平衡了。在我向前歪倒的當口，她伸出手來抓住了我兩個肩膀。她說：「來，再試試。不要怕，你能走的。」

她的臉離我的臉這麼近，我都能聞到她淡淡的香水味，我覺得自己臉紅了。我做出最大努力，挺直了身體，然後朝前邁了一步。奇蹟出現了，我並沒摔倒！

「好，再來一步。」她說。

於是我又走了一步，這一步標誌著我生命的新開端。她鼓起掌來，笑得像個孩子。如果她不是穿著軍服，沒人會把她當成一個軍人，更不用說還是一個敵軍。等她幫我回到床上時，我全身都在冒汗。她也坐下了。

「你叫什麼名字？」她問。

「馮延。」我對她的問題感到奇怪。

「我知道。我是說，你的名字是哪兩個字？」

我沒有筆，於是她拿出她的圓珠筆遞給我，還給我一張開處方的紙片。我寫出「馮延」兩個草體字。我練過幾年書法，所以寫出來的字很漂亮。她把那兩個字看了好一陣，然後說：「你是個書法家，又是個好脾氣的人，我能看得出來。你能不能教我怎麼寫中文？」

我不知道她是開玩笑還是當眞的，就回答說：「你的中國話說得很好，所以你的中國字也一定寫得不錯。」

「一點也不行。」她說。「雖然我在中國長大，又從同濟醫學院畢業，我一直寫不好中國字。我小時候沒花工夫練字。後來上大學了，在課堂上記筆記時，我都是亂寫亂畫，沒有注意過書寫。」

現在我明白爲什麼她中國話說得這麼流利，又對我們這麼好了。我沒問她父母的情況，他們一定是傳教士。上海同濟醫學院以它的西方式教育著稱，大多數課程都是用英語教的，有些是直接由外國教授上課的。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那所學校就關閉了。我忍不住好奇，對她說：「我能問你一個問題嗎？」

「當然可以。」

「你是怎麼到這裡來當軍醫的？」

「說來話長。」

「是自願盡義務的嗎？」

「也是也不是。去年畢業以後，我回美國去看我的生母。返回中國時我路過日本，這時朝鮮戰爭剛開始，軍醫極爲短缺，所以我被遠東司令部徵召了，就來了朝鮮。」

「我們與美軍交戰，你不恨中國嗎？」

「我參軍那時，從沒想到中國會加入這場戰爭。後來，中國軍隊開進來了，但說老實話，我還是沒法恨中國。我在中國長大，那是我的第二祖國。」她陷入沉思。然後又說：「我也有個問題要問你。你們沒有飛機，沒有戰艦，沒有坦克，你們怎麼可能打贏這場戰爭？」

我眞誠地說：「如果我們不到朝鮮來，麥克阿瑟的軍隊就會跨過邊境佔領我們東北，我們別無選擇，只有同裝備精良的侵略者戰鬥。但是，正義在我們一邊，我們會打贏的。」

「你很有信念。」看得出來她不相信。

這時候，好幾個病友圍過來聽我們談話，所以我換了話題。「你眞的要我教你練字嗎？」我問。

「當然。」

「可我怎麼教呢？」

「很簡單。明天我給你帶些紙和筆來，你寫一頁字當模子，我拿回去照著描。這是我打發下班時間的一個好辦法呢。」

我欣然同意，打定主意要做好這件事來報答她。

第二天傍晚前，她拿著一枝漂亮的黑白來水筆和一紮白紙來了。第一張紙上寫著三個大字：葛蘇珊，字體僵硬，向右傾斜。她的中文筆跡很明顯地受她英文筆跡的影響。她說：「這是我的中文名字。你看，我只能寫到這個程度。你可不可以先教我怎麼把我的名字寫得好看一些？」

我開始給她講解每個筆畫怎樣下筆，橫是怎麼寫，豎是怎麼寫。然後我用她給的水筆，給她演示撇、鉤、

點、捺。她自己練習寫了一些，可就是寫不好。寫這些筆畫對她竟是那麼困難，這使我感到驚奇，不過我也看得出來她以前還是練過字的，就和中國小學校裡所有的學生一樣，上學都必須習字。她寫不好，很喪氣，就讓我握著她的手來寫這些筆畫，好讓她能感覺到，筆是應該怎麼移動的。我們兩人都知道，這是教書法的常用方法，可是我很猶豫，不願碰她的手，部分是因爲我是一個戰俘，但主要是因爲病友們正圍著觀看呢，眾目睽睽之下讓我心慌。

「快點呀，」她說：「你們共產黨不是男女平等嗎？現在我是你的學生。」

她的話讓我很窘，所以我握住了她的手，兩人一起開始寫那些筆畫。她的頭髮和她的衣服都散發出一絲菸味；她一定抽菸，我注意到她的食指和中指都被熏得微微發黃了。儘管她的手皮膚光滑、手指纖纖，但很有力，肌肉結實，骨頭強健，很像是幹體力活兒的男性的手。這樣的手讓我心安了幾分。我們又練習了鉤和捺。她讓我握著她的手練字，在某種程度上讓我很感動。我渾身是滴滴涕味，那是剛剛噴在我內衣滅蝨用的。

練了半個小時以後，她可以把大多數筆畫寫得端正了。她對這點進步感到很高興。

我們練完了以後，她請我寫一些字，好拿回去在她下班以後臨摹，因爲她不能每天都到我這裡來。我想了片刻，然後仔細寫下一首古詩：

回樂峰前沙似雪，
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處吹蘆管，
一夜征人盡望鄉。

她默讀著這幾行詩，嘴唇一張一合，露出結實的牙齒。念完以後，她告訴我：「其實我在中學裡學過這首詩。可是現在再讀它，意義就不同了。」

她抬起頭，對周圍的病友說：「你們都應該好好照顧自己。等板門店談判一結束，你們就都能回家見親人了。」有人聽了嘆起氣來。她看了一眼那位沒有了手的傷員，又說：「我希望這是人類的最後一場戰爭。」

我想說點什麼，可所有的話都不知哪裡去了。

從那天起，格琳醫生每個星期到我這裡來一次，把她臨摹的字拿來請我指正，再帶回去一張我給她寫的字模子。她每次來還會檢查一下我恢復得很快的傷口。病友們都會圍過來看她的作業，常常對她的進步誇獎一番。谷樹十分愛慕她，說她是個活菩薩，因爲在她的治療下，他的傷口不再化膿了。

儘管我們病房住著七十多人，可很多床白天都是空著的。我發現很大一部分人都能下床，而且很多人實際上並沒有什麼病；他們留在這裡，可能是因爲醫院的食宿條件比一般戰俘營要好一些。我不知道醫生們爲什麼不讓他們出院。戰俘中很多人沒有說出眞實身分，他們通常把身分標籤毀掉，隨便改名字，所以醫生很難掌握所有病人的來龍去脈。毫無疑問，有些人還是裝病專家，很會假造出病來。醫院似乎成了很多戰俘度假的地方了。

現在我已經能夠自己走路了，我常常拄著拐杖走出帳篷。此時已經是初冬，絕大多數樹葉已經掉光，光禿禿的樹幹使土黃色的大地更顯單調，連南邊的大海都轉成灰色。但是北面山崗上還是綠的，松柏灌木叢滿山遍野。我常常看著在亂雲中翱翔的海鷗，沒有高牆，沒有藩籬禁閉那些自由自在的鳥兒。自由，對一個囚犯來說，是多麼珍貴啊！我禁不住把自己和能看到的所有造物相比。就連我眼中的美國飛機，都會讓我遐想：那些

飛行員，在高高的天空上會感到多麼自由啊。

一天，我聽到幾個女人在唱俄語歌曲，〈伏爾加船夫曲〉，這首歌在中國也很流行；後來，尤上尉告訴我，那個十二聯隊關的全是女俘虜。我可以看見她們牢房的一個角落，那裡邊一定關著幾百個朝鮮女人。我們曾經把她們當成老百姓，因爲裡邊有人是游擊隊，穿的還是長袖白衣服，黑裙子，或是大肥褲子。後來我聽說，那個聯隊裡只有一名中國女兵，我認識她，叫鄭冬梅，她是我們師文工團的，拖著兩條大辮子。她充滿活力，老是快快活活的，走到哪裡，你都聽見她不是唱就是笑。可她不是一個好兵，手榴彈扔不出十幾米，有一次實彈練習，她扔的一顆手榴彈爆炸的彈片，把自己的一顆門牙削掉了半截。

從我們這邊，只能看見隔著一條寬土路那邊女俘虜住處的一小部分。她們聯隊的那一邊是結核病房，住著幾百個肺結核病人。肺結核在朝鮮人中間仍很流行。傍晚時分，我會站在鐵絲網前邊，聽那些女人唱歌。儘管隔得很遠，還是可以聽得很清楚，因爲她們總是合唱。那些聲音把我帶入夢幻之中。她們什麼歌都唱，有時候激昂，有時候快樂，比如〈春天來了〉，〈金日成將軍之歌〉，〈朝鮮人民軍軍歌〉，還有〈中國人民志願軍軍歌〉。後來我還聽到她們唱〈保衛黃河〉，〈團結就是力量〉，〈東方紅〉，以及其他中國的革命歌曲，那一定是冬梅教她們唱的。她們也唱朝鮮民間歌曲，那些名字和詞兒我都不知道，但我最喜歡那些歌了。與嚴酷的戰爭氣氛相反，那些民間歌曲溫柔又充滿懷鄉之情，有時候就像是天籟。有天早上，我看見女聯隊裡有兩個很小的孩子，一個男孩一個女孩，正在玩罐頭盒和木棍，他們看上去髒兮兮的，穿得破破爛爛，可是大笑著跑來跑去的。他們的媽媽被關在這裡，於是他們也就成了戰俘。

離我們病房不遠，是第一看守所的登記處，所有戰俘都在這裡登記和受審。登記處小屋的前面放著幾十具屍體，堆在一起，像堆柴火。我不明白美國人爲什麼不趕快把這些散發著惡臭的無名屍體處理掉——再加上露天公共廁所的臭味，弄得空氣更加污濁。廁所是用油布圍起來的一大間，裡邊有四百個茅坑。

一天下午，我正沿著圍牆走著，忽然看見旁邊戰俘營裡有一個高個子的人，瘦骨嶙峋的身板和肩膀，從側面看去好眼熟，他正在四排鐵絲網的另一邊抽著菸。我走過去，只見他頭髮蓬亂，面色憔悴，一塊扭曲的傷疤把整個臉都破壞了；右前臂上吊著繃帶。我的心開始狂跳，認出他來了——裴政委！

他對我轉過臉來，眼睛一亮，但他一個字也沒說，只是微笑著。我悄悄停在他面前，說：「你好，政——」

「噓，現在我是魏海龍，過去是伙伕，叫我老魏。」

「好的，有人的時候我叫你老魏。」我不得不把聲音提高一點，因爲我們隔著四、五米遠。

「就說你是到了這裡才認識我的。」他說。

「我會記住的。我現在的名字是馮延。我告訴他們我是一個步兵連裡的文書。」

「很好。」

我們說話時，兩人都不時地向身邊瞟一眼，看看附近有沒有別人。他是一個月前被俘的，連同他身邊僅剩的三個人。他的身分至今還沒有暴露，不過他自嘲地說，這只不過是暫時的，肯定很快就會有人出賣他，因爲這麼多戰俘在他當政委的時候都見過他。我向他匯報了我的情況。令我吃驚的是，他已經聽說了我和格琳醫生的事，要我和她保持來往，以便得到外部世界的消息。我告訴他板門店的談判，這個他也聽說了。儘管在僞裝之下，他在這裡顯然仍是領導，消息靈通，計畫周密。他希望我繼續忠於祖國，把聽到的任何消息都告訴他。

對我來說，他的話就是命令，所以在後來與格琳醫生的會面中，我就變得不再拘束了。我把她留給我的紙拿一些給裴政委，他很需要。

大約半個月以後，格琳醫生在我大腿裡發現一個腫塊。她用指尖感覺了好一陣，然後告訴我：「看樣子我還得再給你動一次手術。」

我心一沉。「一定要做嗎？」

「對。不過，是個小手術。」

她讓我自己摸摸左腿後面的腫塊。眞的，腫塊很硬，有雞蛋那麼大。她說：「我擔心過，肌肉損傷得太多，血管破了，流出來的血就可能形成腫塊。上次手術時，我清乾淨了所有淤血，但就是這樣，這個腫塊還是在腿裡長起來了。如果不及時拿掉，腫塊可能發展成腫瘤。我可不想讓它長下去。」

別的醫生可能不會這麼願意幫助我，所以我說：「我聽你的。」

第三天上午我做了手術。因爲這一次我是俯臥在手術檯上，格琳醫生安排了一個男護士托住我的下巴，使我不至於窒息。這一次還是托馬斯醫生協助她，他似乎比過去技術熟練了一些；也許因爲我不再恨他了，才有這個印象。我沒有帶乙醚面罩，所以整個過程我都是清醒的。托馬斯醫生給我縫合時，格琳醫生來托起我的下巴，一直到整個手術結束。

這次手術很成功。從這次以後，我就能走得很穩了，只是一時還需要拐杖。每次格琳醫生來查看我的傷勢，交她的作業，我都會問她板門店談判是否有了新的進展，我們都知道談判陷入了僵局。然後第二天下午，我就把聽到的所有新情況報告給裴政委。

一九五二年春節後的第三天，格琳醫生來到我們帳篷，憂心忡忡地說，一批病人很快要被送到巨濟島去了，而且我也在名單上，還有萬林。她拿出一張紙，告訴我說：「我給你寫個醫生證明，說你至少在半年裡不能幹重活。如果他們讓你幹活，你就給他們看這張證明。」

我接過證明，但是不知道該怎麼辦。我能說的只是：「格琳醫生，我會一輩子記住你，謝謝你治好了我的腿！」

「那是醫生應該做的。」她微笑著又說：「你留著那筆做個紀念吧。也許哪一天我去中國，再上你的書法課呢。」

我一定眼淚汪汪了，因爲她是帶著感情說的。「別太難過，我們會再見面的。我所有的朋友和同學都在中國，他們都等著我回去呢。」

她拿出一個大信封遞給我。她說：「記著把這個給新地方的醫生。」

信封裡裝著我的病歷和X光片。在某種程度上，我是想離開醫院的，因爲我現在已經能走得很好了。還有，我們病房最近越來越讓人毛骨悚然了。一個星期前，一個沒腿的朝鮮軍官在帳篷柱子上把自己吊死了，我都不能想像他一個人怎麼能做到——他的同志們一定幫了他。

格琳醫生站起身走了。她離去的時候，萬林和我都站在門口，目送她邁著略帶蹣跚的步子遠去了。我倆喊道：「謝謝你，格琳醫生！我們會記住你的。再見了！」

她轉回身來，對我們揮揮手，然後繼續去查她的病房了。很快地，她就消失在兩個南朝鮮衛兵把守的大門外了。天正下雪，風一陣大一陣小地颳著。大朵的雪花飛舞著，像是漫天飛蛾。

「我會想她的。」萬林對我說，極力做出微笑，可是像哭一樣。

第五章　巨濟島七十二聯隊

巨濟島坐落在釜山的西南，距海岸大約四十公里。古時候，那裡是流放犯人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人在那裡關押過美軍戰俘。現在，擴建了的監獄成了關押北朝鮮和中國戰俘的最大戰俘營。在去釜山港的路上，我越來越感到此行前途未卜。儘管我將和數千名自己人關在一起，在他們中間，我可能會感到安全一些，可戰俘營的日子無疑要比在醫院裡艱苦得多。監獄的看守很可能根本不理會格琳醫生出具的證明，而派我去幹重活，我的腿骨很可能再次受傷。一想到這個，我就十分不安。

我和兩百多名戰俘一道，被趕進一艘美軍登陸艇，裡邊無遮無蓋的，讓我想起貨運列車。我們頭頂上橫插著很多鋼條，是下雨的時候支帆布用的。登陸艇是爲運輸車輛和坦克設計的，現在載重不夠，駛進大海以後，就不停地顛簸起來。有些戰俘解開衣扣，甚至脫掉鞋子曬太陽，衛兵也懶得制止。我靠在濕乎乎的牆上，一路都在打盹。

不到三個小時，我們就到了巨濟島。隨著一陣叮叮噹噹的金屬聲，登陸艇前門被放下來，一個軍官命令我們下船。外邊，陽光照在海灘泥地上，只見周邊一圈白花花的鹽印。幾條黑乎乎的漁船，桅桿傾斜、灰色的船帆半捲著，停泊在淺灘上，縷縷炊煙從船上升起。我看見腳下的黑色海灘上，佈滿了數不清的小洞，正琢磨著這些是什麼，一大群只有拇指大的螃蟹，突然湧現在那些洞口上。沒多一會兒，牠們又全都消失得無影無蹤，縮回牠們的老窩去了。我禁不住驚嘆牠們的動作那麼一致，不由自主地停下腳步。「快走！」一個高個子美國兵朝我喊道。

我們向東邊的戰俘營出發了。起先我還有點緊張，因爲不知道會走多遠。不過我們這群人裡有好幾個腿受傷的，所以大家都走不快。儘管一路上一瘸一拐，我很快就把焦慮拋到腦後了，那些清澈的小溪，還有道路兩邊的矮樹，把我迷住了。遠處的山巒也很秀美，松啦、柏啦，擠在一起好像一簇簇塔尖。在一個岩石頂上，一對白鷺在輕柔的白雲下飛翔。一路上我對自己說，這裡多像個世外桃源，眞是個理想的隱居地方。

這段路走了半小時。我們到達戰俘營以後，中國人和朝鮮人就分開了，隨後都被領進鐵絲網圍住的戰俘營。這裡有將近三十個戰俘聯隊，中國戰俘被送到七十二和八十六聯隊，朝鮮人去了其他聯隊。

戰俘營看上去很大，劃分成大小不等的很多長四方形營房，每個營房都是用木樁子拉起來的鐵絲網圍著，四個角落都設有近十米高的崗樓。大的院子有一個街區那麼大，小的也有足球場那麼大。在各個營房之間，也豎著很多崗樓。萬林和我被分到不同的聯隊，分手前，我拍著他的肩膀悄聲說：「好好照顧自己，活著回家去。」

他一臉愁雲，小聲說：「我會常想你的。」

「咱們永遠是朋友。」

「嗯，永遠是。」

他和二十多名戰俘一起被帶走了。他比別人高出一截，我看著他的腦袋在眾人頭頂上一閃一現的，大步離去了。

我們進入七十二聯隊前，三個美國大兵要對我們全體搜身。我已經把玉簪子塞到鞋裡，菊蘭的照片藏到裝著我醫療紀錄的信封裡，和X光片混在一起。一個細高個留著小鬍子的南美人衛兵，在我信封裡發現了那枝黑

鋼筆。「你用不著這個。」他一邊說一邊把筆插到他自己胸兜裡去了。

「求求你，那是一個醫生給我的禮物。」我對他說。

「我憑什麼相信你說的？」他把筆拿出來，指著筆帽上的一行小字。「看見沒有？『美國製造』。」

「求你還給我吧！」

「爲什麼要還給你？你從美國人身上拿下來的，對不對？」

「哪兒呀，這是釜山的格琳醫生給我的紀念品。你可以給醫院打電話去問她。」

「少跟我囉嗦。滾吧！」

「你這是犯搶啦。」

「你說什麼?!」他一拳打在我臉上，我立刻滿嘴是血，一顆前門牙也被打得鬆動了。

「我要報告你的長官。」

「是嗎？讓他們把我關起來、把我槍斃了吧，你這赤佬！你們從我們人的死屍上偷東西。」

戰俘營裡邊一群囚犯圍過來看熱鬧，看一個俘虜居然膽敢和一個美國大兵爭辯。我知道那枝筆要回不來了，只好不再多說，默默地走開了。我不知道那個衛兵是不是眞的以爲我搶了一個美國兵的鋼筆，也許他眞那麼想的。我聽說，一個志願軍俘虜有一次被幾個美國兵打得半死，因爲他們在他帽子裡發現了一個結婚戒指，上邊刻著一個美國人的名字。

我一進戰俘營，第一個印象就是又回到國民黨軍隊了：我往哪兒看，都看到人們戴著國民黨的青天白日帽徽，看得我心直往下沉。美國人只在門口站崗，不涉足戰俘營裡面，裡邊的一切都由犯人自己管理，很多人都是蔣介石軍隊的舊部，仍然效忠舊政權的親國民黨派勢力，已經完全控制了這裡的管理機構。戰俘中被推舉出來的軍官，也和國民黨軍隊裡的官級類似，別看他們也穿著跟其他人一樣的囚服，袖子上或胸前也有P和W字母。

這裡的八千戰俘被組成四個大隊的一個聯隊，每個大隊下面又有中隊和小隊。理論上說，除了聯隊的頭頭外，各級軍官是由戰俘選舉出來的，但是事實上，大多數都是由聯隊長韓述指派的。韓述在東京接受過美軍的訓練，然後被派來當聯隊的頭頭。和戰俘營裡其他地方一樣，會說一點英語的人通常擔任翻譯和發言人的角色。

我被分到一大隊的三中隊。我們這個中隊有五百人，中隊長是王永，前國民黨軍隊裡的一個下士。一大隊有一個警備隊，由兩百多名戰俘組成，由大隊長劉太安直接指揮。這些警備隊的人走到哪兒都隨身帶著棒子，我甚至看見過他們打盹的時候都懷抱著武器。每次碰上這群人，我都心裡發毛。

雖然人很多，七十二聯隊總的來說設施不錯，前院有三個水池，有一個澡堂，一個教育中心，一片晾衣服用的場地，一個巨大的倉庫，幾個小教堂，一個廟，一個清眞寺。大多數戰俘們在營地裡邊可以想上哪兒就上哪兒，但是，不是親國民黨派的人，包括我在內，就不能自由行動。

到這裡的第一天，晚飯是一碗大麥雜豆粥。吃完以後，我躺在稻草席子上，蓋著剛發的一條毯子，正在打瞌睡，王永來了。他把我叫起來，命令我跟著其他人到隊部去，報名去臺灣。這字一簽，就意味著我必須拒絕返回大陸的家鄉。我很震驚，但是沒有表示反對。在去隊部的路上，我溜進了廁所，後來也沒跟大家一起去中隊，這樣就避免了把自己的名字列入拒絕遣返的名單。

第二天一大早，王永又來了，讓我拿上自己的碗筷用具跟他走。我們兩人一同走到清冷的室外，我的傷腿還不跟勁，不能像他走得那麼快，於是他放慢了一點腳步。他是個骨架粗壯的人，中等身材，金魚眼，讓我想

起屠夫來。他不自然地笑笑，對我說：「馮延，你像是個念過書的人。說實話，我喜歡有文化的人。我不會強迫你做任何違心的事。不過，如果你決定了要跟共黨回大陸，我就只能讓你受點罪了。」

我沒說話。沒錯，我是站在共產黨一邊，可是這只是因爲我想回家去。王永帶我走到營地後邊，進了五小隊所在的帳篷。「好了，從現在開始，你和他們住一起。」他說完，沒再看我一眼就走了。

我看得出來，所有矮小破舊的帳篷裡關的都是想遣返的戰俘，我們在這裡顯然是少數。打算去臺灣的親國民黨派認爲，所有想返回大陸的人，都是共產黨，或者是親共產黨的。其實，我們很多人想回家根本不是爲了政治原因，而是個人的原因。戰俘營的前半部分區域是很多排鐵架子大帳篷，住的都是親國民黨派，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床鋪。而在我們這個只有八十多平方米的小帳篷裡，擠了有七十多人。帳篷中間的地上挖了一條排雨水的淺溝，水溝兩邊的所有空間都佔滿了。更糟的是，每兩個人只能合用一張草蓆。

夜晚，我們像沙丁魚一樣擠在地上，每張草席上的兩個人只能頭對腳地睡，才不至於對著席友的臉喘氣。就是這樣睡，你也只能把一條腿放在另一個人的肚子上或肩膀上，不然，你們兩人在一張草席上根本躺不下。每到夜裡，屋裡的空氣污濁得不能把門關嚴。至於食物，我們得到的也比親國民黨的人更少。當頭頭的每頓都可以吃飽，大帳篷裡的戰俘每頓可以吃一碗大麥粥，而我們每人只能得到半碗。一開始，雖然禁止我們走近前院，在自己帳篷周圍我們還是可以走動的。我們可以曬太陽，聊聊天；也可以到其他帳篷去串門，和打算回大陸的其他戰俘們打打牌，下下棋。但是很快王永就取消了這點有限的自由。我們再也不許到其他帳篷裡去，就連離開自己住的帳篷也被禁止。你想上廁所，要先向小隊長報告，有時候你還得等著和幾個人一起去。這種惡劣的待遇，漸漸地使得有些人改變了主意，報名加入拒絕遣返回國，好使自己搬到比較舒服的大帳篷去。

我夜裡睡覺時總是讓左腿屈著膝。腿還沒有完全復元，我很怕什麼人在黑暗中一腳踏上來。地溝的另一邊有個人睡覺很不老實，常常又蹬又踢，惹得被踢的人大罵。睡覺以前，我總會給傷腿做做按摩，撫摩一番傷疤。

有時候，我仍然可以感到格琳醫生手指在我腿上的觸摸，那清涼的、撫慰的觸摸，已經在我的皮膚和肌肉上留下了一種記憶。我甚至幻想著自己有一天也成爲一名醫生，也可以給病人動手術。要是我當年上醫學院，而不是軍校該多好。但那純粹是白日夢，就好像我也曾夢想當一名建築師，在家鄉建起一座堂皇大樓。我父母供不起我念正規大學，所以我只能去讀免費的軍校。格琳醫生和別人不同的是，她待我是出於眞正的仁慈，這種仁慈，一定不僅來自醫生職業訓練，而且來自眞正的人道心腸。和她在一起的任何時候，我都感受到，她的仁愛如泉水一般湧流出來，恆定又自然。

相反，我和其他戰俘，包括我的同志在一起時，卻常常不能不提高戒備，因爲每一件事，每一句話的後面，總是隱藏著別的東西，使我不得不加倍小心，避免受害。明明是在同胞中間，我卻感到了孤獨，常常一個人在帳篷外邊枯坐。要是能有一本書來讀讀就好了。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做，沒有朋友，我變得很沮喪。很快地同屋的人都叫我觀星人，因爲我老是看著天空，還能叫出幾顆星星的名字。

抑鬱而又無聊，我們牢房裡的很多人每天都靠賭博度日。他們沒錢，就用劣質香菸當籌碼。美國人一星期發給我們每人一包菸，偶爾兩包，也算是夠慷慨了。比較之下，志願軍裡當兵的每人有時一個月還得不到一包菸。從進七十二聯隊的第一天起，我開始學會了抽菸。剛開始，抽了幾口我就有點噁心了，可是兩包以後，就上癮了，儘管抽菸使我咳嗽加劇。白天，我們帳篷裡吵吵嚷嚷的，於是我就總是坐到外邊去。那些人讓我煩惱不安，我盡量躲著他們。我多麼希望萬林在旁邊啊。

大帳篷裡的那些人情況也好不到哪去。他們也賭博，而且爭吵得更厲害。有些人輸光了所有東西，帽子、

鞋子，甚至內褲。也不知道誰送給他們的麻將牌，也許是監獄當局，也許是那個每個星期天都來講道的胡牧師。他們自己做了粗糙的牌桌。沒有事情做，又有太多的時間閒得發慌，戰俘們簡直沒有別的地方消耗能量和發洩痛苦，賭博把他們退化成蠻橫的蠢人，不時爆發爭鬥。無所事事是多麼能助長人的墮落、引發出最惡劣的人性啊！要是把他們都弄去幹重體力活就好了，至少他們會累得沒勁兒幹架。

另一件讓我煩惱的事是，戰俘們經常在食堂裡搶飯。大帳篷裡的人比我們這些小帳篷裡的人先吃。當時的規定，每個戰俘每天的定量是半公斤糧食，但是各級的頭頭佔去了最大的份額。比如，當過排長、一槍未發就投降了美國人、操一口流利英語的聯隊長韓述，每頓飯都是四菜一湯，有專人廚師給他做飯吃，那人是從黃海上一條漁船給抓來的。所有的中隊長、大隊長也都可以吃小灶。結果，想回大陸的戰俘們，每人就只有最多半份定額了。很多人在食堂裡動不動就破口大罵，想也不想地就對他人大動拳腳。我發現，吃飯這會兒，沒有文化的那些人尤其脾氣暴躁，有人可以爲了一碗粥，就毫不猶豫地打掉別人一顆牙，或是打得別人鼻子流血。每一天，至少會有兩起鬥毆；有的時候甚至五六起。有一次，路對面北朝鮮戰俘營裡的戰俘鬧絕食，美國人把一桶桶飯菜放在他們大門前，卻沒人來拿走那些米飯和燉蘿蔔。戰俘營的協理雷諾上尉來叫我們去吃給朝鮮人看，讓他們瞧瞧這些飯菜有多麼香。兩百個中國戰俘便毫不害臊地蜂擁而去，撲到飯菜上狼吞虎嚥，那樣子、那聲音，活像一群野獸。我常常懷疑，這些人會不會爲了一勺煮黃豆而殺死自己的兄弟姊妹。

我至今記得親眼看到的一次鬥毆。一天晚飯的時候，排在我前邊的兩個人突然吵起來。「你是在我後邊的！」那個廣東口音的矮個子齜著板牙說。

「不對，我在你前邊。」那個高個子回了一句。

「別再插隊了！」

「你他媽的，我什麼時候插隊了？」

「你現在就插了。」

「少囉嗦，聽見沒有？」高個子一拳打在矮個子胸口上。

「你再碰我一下，我宰了你！」

「來呀。」他又打了一拳。矮個子撲上去，舉起碗向高個子腦袋砸過去。旁邊幾個排隊的人上去攔住他，把他拉開了。

這個場面讓我很喪氣。他們爲什麼火氣這麼大呢？大麥粥足夠每人半碗的，他們又不是多忙，有的是時間等，爲什麼兒起來像群惡棍一樣？私底下，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隊裡一個叫白達堅的戰友。他說，他們那是害怕，怕多等一會大隊長劉太安來了，又會毀掉一鍋飯，所以他們都急著快領到自己那一份。

達堅又給我講了劉太安的情況。他曾經是國民黨軍隊裡一個中士，在一次戰鬥中被共產黨俘虜，經過一個月的思想教育，被編入後勤部門。因爲他會開車，就派給他一部卡車開。他們師一過鴨綠江，他就找了個機會，把裝著三噸鹹魚的卡車開到美軍陣地，投了降。傳言說，他被送到關島受訓兩個月，然後回到朝鮮，被任命爲大隊長兼副聯隊長——協助韓述維持聯隊裡的秩序，因爲韓述是一個性情溫和的人，似乎有些優柔寡斷。劉太安極端仇恨共產黨，經常公開毆打想回大陸的人。美國人採取聽之任之的策略，只要戰俘們待在鐵絲網裡邊，他們才不管聯隊裡發生什麼事，所以劉太安把這裡統治得像個警察國家。就連一些美國兵都稱他是「小凱撒」。有時候，他會在開飯的時間帶著幾個保鏢到食堂來，往粥桶裡扔一把沙子，然後朝排著隊的人群罵道：「你們也配吃飯！你們的命都不值這飯錢！」有一次他甚至當著眾人的面，往一鍋蘿蔔湯裡撒尿。劉太安的陰影，使戰俘們爭先恐後，要儘快把飯吃到嘴裡。

不管是什麼原因吧，這些人的爭鬥讓我灰心。他們曾經是戰友，今後回到祖國，還會再成爲同志，爲什麼他們在這會兒像畜生似地活著？在共產黨領導下，他們曾經是好兵，似乎都有品格，生命都充滿意義，可現在，他們都快變成一群野獸了。在惡劣的條件下，人性的敗壞有多麼容易？當一個普通人失去比顧全自己更遠大的目標的時候，他可能墮落到何種程度？沒有一樁正當的工作，也沒有一個具有意義的信念，這些人，只是受活命本能驅使的一群烏合之眾。有時候，我懷疑我們中間有沒有共產黨人的基層組織，因爲我能肯定戰俘中間有黨員，應當領導起這群想遣返的人。可這裡所有的共產黨人都保持低調，與其他人很難區分。

一天早上，大概是我到巨濟島之後的三個星期吧，我碰見了常明，師部戰報的編輯。開始我不敢肯定是他，但他那雙濃眉，還有闊嘴，讓我認出來了，我高興得幾乎叫出聲來。他也看見了我，但兩人都裝作不認識，因爲旁邊有別人。他在鐵絲網另一邊的七十一聯隊。在他停下做操時，我蹲下身，假裝去繫鞋帶。等所有人都走遠之後，我倆衝向鐵絲網，激動地交談起來。他問我的頭一件事，就是我報沒報名去臺灣。「當然沒有！」我自豪地說。他現在看上去老了四五歲，不過還是精力充沛的樣子。他的厚嘴唇都裂了。他竟沒有受傷，眞是奇蹟。

隔著四排鐵絲網，他告訴我，看到戰俘們所處的混亂狀態，他和郝超林都向戰俘營當局公開了自己的軍官身分，這樣他們就轉到了七十一聯隊，那裡是個小圍場，只關了二百多志願軍軍官和堅定的共產黨。聽說郝超林也被俘了，我很驚訝。我估計，他們兩人一定是被原來聯隊裡無組織的人們和國民黨勢力嚇壞了。

「不過我們沒有告訴他們眞名字。」他說。「我現在叫馮文。」

「眞叫巧，我叫馮延！」

「現在咱倆聽上去像兄弟倆了。」他大笑——還是那自信的無憂無慮的笑聲。

「你在釜山見到過裴政委嗎？」我問。

「他也在這裡，在八十六聯隊。」

「眞的？他什麼時候來的？」

「一個星期前。他還沒有暴露，我們得想個辦法保護他。」

「你和他有聯繫嗎？」

「我們隔段時間從他那裡得到些指示。」

「我該做什麼？我們這邊有不少人想回祖國，可他們都像強盜一樣。」

「跟他們搞好關係，特別要團結那些想回國的人。你別孤立自己。我們去年秋天犯了個大錯誤，沒有多考慮監獄裡的領導位置。當時以爲很快就會被送回中國了，就沒有爲選舉多做努力。所以很多戰俘營都被反動派把持了。」

「好的，我會努力和他們相處好。除了這個我還該做什麼？」

「這個我們回頭再談。當務之急是把領導權抓到我們手裡。」

他還告訴我，還有一個七十聯隊，也是關中國戰俘的。那裡的戰俘經常外出到碼頭和建築工地幹活，大約有五百人，都是體格健全的人。我多羨慕他們！要是我沒有受傷就好了。我樂意每天都走出營地去，就算是去做苦力我也高興。

從那天起，常明和我差不多每天早上都見面。按他的建議，我開始和小隊裡的人交朋友。從我一個月前搬到這裡來的那一刻起，白達堅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他很眼熟，儘管我不能肯定以前是不是見過他。他二十一歲，有點靦腆，但是似乎可以信任。他不像別人，從不賭博，也從來不和任何人吵架，常常獨自茫然地坐

著。我倆更熟悉一些之後，我得知他竟是黃埔軍校的校友，只是比我低一年級。這個發現讓我倆親密了很多。他是學騎兵的，不過在軍校裡只學了一年。共產黨解散我們母校時，他還是個一年級學生，後來被分配到第四十軍。然後又說到兩人都訂了婚，於是都把未婚妻的照片拿出來給對方看。他的心上人，是瀋陽市裡一個護士，非常漂亮，大眼睛，高鼻樑，皮膚光潔，很像個電影明星。我們互相傾訴自己很想念女朋友，有一次對著她們的照片我倆哭了一場。

達堅在嚴寒中失去了兩根手指。他被俘的經過非常可怕，以致他一提起來就牙齒打顫。一九五一年元月一個早上，他們騎兵連跟著師長的蘇聯吉普去前線。北風呼嘯，山坡和道路上都堆起積雪，頭一年入冬前美國軍車輾過的車轍，把道路弄得坑坑窪窪，山路又滑又陡。走出山口時，師長發現他左側不到二百多米遠的樹林裡有一群雪人。他讓司機停車，心裡納悶究竟是誰在這種荒無人煙的地方還有閒情逸致堆雪人。他帶著警衛員，由一個班騎兵陪著過去查看。讓他們震驚的是，那是一些被凍死的人，有些站著，有些互相抱著，有些躺著，都僵硬得像塑像似的。他們刮掉一個人身上的雪，看見了志願軍的軍服。師長意識到，這些人是自己的戰士。

整整一個營，四百多人，死得連他們的上級都沒意識到。師長開始痛罵團指揮員，要把他們送上軍事法庭。可事實是，這些團指揮員也是他手下的，所以他自己也應該承擔責任。他的警衛員認出了營教導員的屍體，這個教導員以口才好著稱。師長脫下自己的大衣，蓋在那具屍體上。

然後師長命令騎兵連把遺體運回後方。達堅和他的同志們用繩子把屍體兩個兩個捆在一起，掛在馬背上。可是他們一次只能帶走二百三十具屍體，還得再回來運一趟。他們策馬返去時，師長帶隊繼續趕路去前線了。

傍晚，騎兵連到達一個冰凍的湖邊，準備休息一下。突然，一支澳大利亞隊伍，打著聯合國的旗幟開過來，包圍了他們，迫擊炮、機關槍一齊開火，命令他們投降。騎兵們已是疲憊不堪，布倫機槍和六零火炮又都

留在發現屍體的地方了，軍號也沒帶，無法反擊。就這樣，澳大利亞部隊一次衝鋒就把他們打垮了，他們全部成了俘虜。敵人讓他們卸下屍體，把所有的蒙古馬都交給一支爲聯合國軍運輸彈藥和醫療器械的南朝鮮騾隊，然後押著他們步行向東，穿過群山走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把他們交給了美國人，美國人把他們趕上三輛卡車，運到了釜山戰俘中心。就是那一夜的行軍，把達堅的左手凍壞了，後來在戰俘營，他的食指和無名指因爲壞死被切除。他的戰友們有三分之一死在那次行軍中，被遺棄在大山裡，被大雪埋葬了。

「共產黨當官的把冬衣都沒有的部隊送上前線，」達堅邊說邊搖頭嘆氣，「這是犯罪。他們用起人來就像用拉套的牲口，就像燒劈柴。」

他的話裡雖然有眞實的部分，我卻不敢在我們這裡這麼公開地譴責共產黨。我悄聲對他說：「噓，別這麼大聲，別人會聽見的。」

他對以前的上級非常生氣，常常稱他們是無賴。我對他的直言不諱非常擔心。

第六章　伍德沃斯牧師

星期天上午，所有帳篷裡的人都可以聚到一起，因爲胡牧師在國民資訊和教育中心的自由大禮堂裡佈道。這個「自由大禮堂」，是個可以容納坐下一千五百人的大帳篷。胡牧師雖然是從美國來的，卻用中文講道，有上千名戰俘都來聽他講。表面上，這個矮胖的牧師是中立的，對所有的人都很和藹；但實際上，他是仇恨共產黨的，是親國民黨派和監獄當局之間的聯絡人。所以，共產黨人都抵制他的教會。

聯隊裡還有其他宗教團體。我選擇去一個天主教堂，那是一個房頂上有個十字架的石頭小屋，伍德沃斯牧師每個星期天在那裡講道。我去那裡聽他講道，主要是想學英語，還因爲我母親小時候曾經是個天主教徒。另外，若是去聽胡牧師佈道，我可得罪不起共產黨人。伍德沃斯牧師這裡只有四十來人，但他的熱情絲毫不減，就和面對一大群人講道一樣慷慨激昂。憑這個，我就更欽佩他了。他是個瘦高個，大約四十多歲，綠眼睛，有張滿是皺紋又機智的臉。他兩條腿特別長，有的戰俘便管他叫「圓規」。他是一個隨軍牧師，像個軍人一樣總穿著軍服。

我第一次去教堂他就注意到我了，也許因爲在他講道時我聽得很專心。大多數聽眾，因爲不懂英語，根本不知他在說什麼，我的表情一定表現出聽懂了他的話。有一天，講道結束以後，他正在脫聖袍，我走到他跟前說：「伍德沃斯牧師，我可以求您一件事嗎？」

「我能幫您做什麼？」他說。

「可以給我一本《聖經》嗎？我想在平日裡讀一讀。」

「你能看懂英文的嗎？」

「能。」

他的眼睛一亮。「好吧，我會叫人給你送去一本。把你的名字和住所寫在這上面。」

他打開自己的記事本，我在上面寫下自己的名字和住所號碼。雖然我說可以看懂《聖經》，但對自己的英語並沒把握。要是我有本字典就好了。我被俘的時候失去了所有東西，包括那本字典和折了角的《湯姆叔叔的小屋》。不管《聖經》是本什麼樣的書，至少是我可以讀的東西。

在伍德沃斯牧師的四十多名聽眾中，不少人追隨他，也許因爲打算尋求他的保護，但也有人可能是眞的被他雄辯的口才和深沉的聲音所吸引。這些人比其他戰俘的教育程度高，大多數人都是親國民黨的。不過，誰的英語也達不到可以讀《聖經》或是與伍德沃斯牧師交談的程度，所以對他來說，我一定算很罕見的了。

一個星期四的下午，中隊通訊員來到我們帳篷，叫我到隊部去一趟。我起身跟他去了。隊部是個只有兩間屋的小房子，門上飄著國民黨的旗子和星條旗。我進門時，中隊長王永正坐在他的桌前。他示意讓我在他面前坐下，然後拍了拍桌上一個拆了封的包裹。他開口就說：「看起來，你是個挺好學的人啊，馮延。你懂外國字，嗯？」

「是。我能讀英語。」

他嘩嘩地往一個咖啡杯子裡倒了些清酒，把杯子遞給我。「來點這個。」他說。

「我不會喝酒，謝謝。」

「嘿，酒色不沾哪。」他譏笑了一聲。

他又遞給我一支菸，我接了，不知他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他瞇縫著眼睛說：「我告訴你，你一走進我們隊，我就看得出來你挺有來頭。」

「謝謝你瞧得起。」我假裝把他的話當成恭維。

「我的意思是，你是個當官的，不是『大兵』。」

「我只是五三九團三連的文書。」

「得了吧，別跟老子打馬虎眼了。我在白軍、紅軍裡都混過，見過的人多啦，知道你一定是個什麼傢伙。我勸你和我們一起去臺灣，不要跟著共黨。總有一天蔣委員長要消滅所有赤匪，反攻大陸。你現在決定跟哪一頭還不晚，你可要想明白了。」

「王隊長，」我眞誠地對他說：「說實話，我不是共產黨。我不能報名去臺灣，因爲我家裡有個老娘，她獨自守寡，我就是她唯一的孩子。我父親很早就去世了。」

「你看，共黨徵兵都徵到你這獨子頭上來了。他們把人當炮灰呀。媽的，去年春天，和英國一個營就打了一場，我們師就損失了上千人。山坡上血流成河，第二天早上，滿天的烏鴉翅膀上都沾的是血。就這樣，上級還說這一仗打勝了，因爲最後我們拿下了敵人的陣地。」

「沒錯。」我同意他說的，「我從來沒有想到這麼多中國人會埋在朝鮮。」他的話又讓我看到了腦海裡擺脫不了的可怕場景——戰爭就像個巨大的鍋爐，燒的全是士兵的屍體。

「好好想想我剛才說的話，馮延。我不強迫你，兄弟，不過老實說，你沒有多少時間猶豫了——過不了多久所有的人都得決定往哪兒去。」

「我會仔細想想的。」

「好吧，想好了就告訴我。現在你可以走了，拿上這個。」他指了指用牛皮紙包著的包裹。

我不敢惹他。如果對我反感，他可以輕易地把我毀了。他已經把一些人叫到連部，強迫他們簽署了反共誓詞，然後又把這些誓詞公開貼出來。這麼一來，就斷了那些人回大陸的路，從現在起，大陸那邊就等著懲罰他們了；他這麼做，迫使那些人只能選擇拒絕遣返。這些天，王永還忙著在親國民黨派中間推行刺青運動，把擁蔣反共的字句或圖畫刺在胳臂上、胸脯上、肚子上、甚至腦門上。這種原始的方式操作起來並不很疼——他們用毛筆把字句或圖畫畫在身上，然後用針刺染了黑墨的皮膚。字句主要是些口號，比如「鏟滅赤匪！」「抗俄反馬！」「活捉毛澤東！」「效忠黨國！」「根除共黨！」等等。圖畫則有閃光的太陽——那代表國民黨的青天白日，一把刀插進一口多毛的豬——那象徵朱德和毛澤東，一隻開向寶島臺灣的船，等等。刺了青的人們常常光著膀子到處遊逛，顯擺著那些字句和圖畫，確實震嚇住不少人。

在回自己帳篷的路上，我開心地看到包裹裡有一本嶄新的《聖經》。這是美國標準版本，赭色的皮封面，封底上將耶穌的話印成紅色，還有關鍵詞的索引。帳篷裡太吵，所以我坐到外邊去，開始讀〈創世紀〉。裡邊的字句讓我有些暈眩，倒不是因爲經文的意思，而是因爲我讀著的是一本正經八百的書，不是宣傳品小冊子。我有半年沒摸過眞正的書了，這種精神的匱乏更激起了我閱讀的貪婪。《聖經》中的英語不難，我很少碰上生詞。也就是說，從現在起，我每天可以讀上幾頁書了！

第二天早上我又見了常明。我告訴他，有人在逼迫我去臺灣，而且，過不了多久，所有的人都必須做出何去何從的決定。他說，他也聽說了。事實上，關押朝鮮戰俘的七十六聯隊，已經開始這麼做了。這個行動被稱爲「甄別」，每一個戰俘都要對自己願意去哪兒正式表態，朝鮮戰俘要表明是去北朝鮮還是南朝鮮，中國戰俘則要表明是去大陸還是臺灣。常明還說，有幾個我們以前的同志已經轉到裴政委所在的那個中隊去了，因爲

共產黨已經奪回了八十六聯隊第三大隊的領導權。常明不久也可能轉過去，而且共產黨已經向我們聯隊一大隊提出，用一個親國民黨派來換我，把我轉到同志們所在的八十六聯隊去，可是王永不肯放我走。這個消息讓我心神不寧。王永爲什麼要把我扣在手邊？我對他有什麼用處？我腦子裡靈光一現：共產黨和國民黨都對我有興趣，因爲——我懂英語。

除了講道以外，伍德沃斯牧師每星期三下午還在教育中心教唱聖歌。有個魁梧的朝鮮人用手風琴給他伴奏。參加唱聖歌的人比聽講道的人要多，也許大家是爲了娛樂而來的。不過，沒有幾個人明白歌詞的內容；吸引他們的其實是音樂。我非常喜歡讚美詩，不論什麼時候，我一聽到那歡樂、優美的曲調，我的心就會激動起來。且不管那些關於上帝啦、耶穌啦的歌詞有多奇怪，音樂，是這個地獄般的地方唯一美妙的東西。所以，來學唱的人越來越多。

三月裡的一個星期三，唱完聖歌，伍德沃斯牧師叫住我，我不安地向他走過去。他用洪亮的聲音說：「馮先生，我也想求你一件事。」

幾個正往外走的人聞聲回過頭來看我，因爲通常是沒有人稱一個囚犯爲「先生」的。「當然，您想讓我做什麼？」我問道。

伍德沃斯牧師撚弄著夾鼻眼鏡的繩子，說：「你可以把幾首讚美詩翻譯成中文嗎？」

「那可不行，因爲我對音樂一竅不通。就算我能把歌詞翻譯成中文，可能也沒法唱。」

「我不是要你把原文翻譯成歌詞。你只需要大致地翻譯一下，這樣大家學唱之前，我們可以先念給大家聽聽。我估計，如果知道了讚美詩的大概意思，他們就能唱得更好一些，你覺得對不對？」

「那倒是。」

他打開他的舊公事包，拿出一個新的筆記本，一枝鉛筆，幾頁散落的讚美詩。「你拿去。」

我很感動，就答應下來：「我盡力而爲。」

隨後整整一個星期我都在翻譯這些歌詞。翻譯起來並不困難——我只需要譯出每首歌的要點就行了。從這以後，每逢星期三，伍德沃斯牧師教唱時，我都坐在前排。我們開始唱之前，他會先叫我，說：「第七首，上帝慈悲寬如海洋」，或「第九首，萬古磐石爲我開」，我就站起來，轉向大家，把我譯的中文念給大家聽。我對伍德沃斯牧師的協助，在聯隊裡吸引了眾人的注意。戰俘營裡，每個中隊都至少有一名翻譯，他們通常只會幾個英文字。所以就有傳言，說我的英語比那些翻譯說得都好，也許因爲我在幾百人面前與伍德沃斯牧師交談時，一點也沒有顯得侷促。

我把鉛筆掰成兩截，在我跟常明星期二碰頭時，把沒有橡皮的一截給了他。常明得到鉛筆很興奮，說：「我會交給裴政委的。我們太需要文具了。他看見鉛筆會高興的。」

「他怎麼樣？」

「目前還好。」

「代我問候他。」

「我會的。對了，聽說你在給伍德沃斯牧師幫忙，是嗎？」

「是，就是他給我的鉛筆。他讓我幫他翻譯幾首讚美詩。」

常明的眉毛擰起來了：「你就照著做了，對不對？」

「對。」

「馮延哪，你太天真了。根據我們的情報，伍德沃斯也參與了迫害我們的同志，和胡牧師一樣。你可得小

心。」

「眞的？他看起來挺好心腸的。」

「那只是表面上。他是很多事情的幕後人。其實，裴政委聽說你在幫助伍德沃斯，很不高興。」

「我不明白他爲什麼不高興。」我很驚訝，原來裴政委對我的一切瞭如指掌。

「宗教是精神鴉片。伍德沃斯是要削弱咱們的戰鬥意志。」

「也許他可以幫助咱們。」

「不對。不要對他暴露任何東西。小心一些。他不是我們的朋友。」

「好吧。」

「你要向我發誓，不對他說任何事情。這是紀律。」

「行，我發誓。」

幾個戰俘走過來，我們不敢在一起待太久，就分開了。

雖然我不太相信伍德沃斯牧師參與了迫害想遣返的戰俘，常明的話卻讓我想了好多。星期三下午，聖歌班結束後，大家正往外走，我向伍德沃斯走過去，問他歌詞裡「感恩祭」一詞的意思。他對我解釋了喝紅酒和吃麵包的聖餐儀式。他說，星期天講道的時候也應該有這個儀式，不過我們大多不是基督徒，所以這個儀式就免了。我不能完全明白什麼是感恩祭，也沒有見過這種儀式。他看我一頭霧水的樣子，便又說：「感恩祭也可以解釋爲兄弟友愛。這麼去譯吧。」

我們朝門口走去。我又問：「伍德沃斯牧師，我心裡有個問題憋了很久了。」

「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告訴我。」

「你看，根據《聖經》的教導，這裡所有的戰俘都是罪人，所以應該是平等的，爲什麼有些犯人享有別人沒有的特權？」

我們現在來到屋外了，天氣暖洋洋的，有了春天的感覺。他停下來，然後說：「你指的是什麼？說具體一點，你這話裡有話。」

我指指大帳篷，再指指小帳篷：「這裡的戰俘待遇不平等。住在後邊的人甚至得不到他們定額的食物。」

「你也住在後邊嗎？」

「是。」

「很抱歉，但這是應該的。」

「爲什麼？」

「因爲你們大多數人是共產黨。對我和我的上帝而言，共產主義就是邪惡勢力。」

「但是我們很多人根本不是共產黨。我們和他們在一起，主要是因爲想回家。作爲兒子，我們有責任照顧父母。有些人是丈夫和父親，應該回自己的家去。」

「我能理解這是一個嚴峻的選擇，但是人生就是充滿選擇的。」

「對我們來說，沒有選擇。」

「馮先生，你應該知道，責任有不同的種類。最高的一種責任是你對上帝和自己靈魂的責任。」

「但是我們還沒有信仰上帝。你認爲那些要去臺灣的人都是基督徒嗎？」我的聲音裡含著怒氣。

「聽著，我不僅是一個牧師，而且也是一個軍人。我是帶著書和劍一起來的。」

看來爭論不出什麼結果，我嘀咕了一句：「我以爲你會幫助我們，因爲我們是一群受難人。」

「這裡所有的人都有選擇自己受難的方式。」

他挺直了後背，走開了。我曾想問他：「那麼你又爲什麼教我們聖歌，讚美上帝的慈悲寬如海洋呢？」但是我沒有問。也許他只是爲了掙薪水，和收納幾個教徒。我和他的這場談話深深地傷害了我，粉碎了我的幻想。我原以爲在上帝的懷抱裡，每一個人都能得到庇護呢。現在我有點相信常明的話了。

我對白達堅講了我和伍德沃斯牧師的談話，他和我現在是非常親密的朋友了。我對他像弟弟一樣，因爲他尊敬我，比我小兩歲。「伍德沃斯不是好心人。」他馬上斷言，大眼睛一閃。

「你怎麼知道？」我驚訝他說得那麼肯定。

「有一天，他們在前院用『水鞭子』抽一個人，伍德沃斯正好路過。那人直叫：『牧師，牧師，救救我！救救我！』可伍德沃斯看了他一眼，一句話都沒說就走開了。一個打手還說：『叫他上帝吧，他肯定會回來放你一馬的。』然後他們都怪笑起來。」

「水鞭」是親國民黨派發明的一種刑罰。他們把人綁在柱子上，用帳篷布擰成的鞭子，蘸著滿滿一桶冷水打人，一直打到把一桶水都蘸光。

雖然伍德沃斯從來沒有公開體罰過任何戰俘，達堅的話仍讓我對他失望。有傳言說，他送了我們的大隊長劉太安一把匕首。我曾經見過劉太安經常橫在別人喉嚨的一把刀，刀把子是白玉的。

不久，我和達堅就都不再去聽講道、也不再去唱歌了，但我還是每天讀《聖經》，作爲提高英語能力的一種方式。

第七章 出賣

我再次和常明碰頭時，他告訴我有人出賣了裴政委！我吃了一驚，本來想好了，請他轉告裴政委，我已經不再去聽伍德沃斯講道和唱聖歌了，聽他這麼一說，我把話又嚥下去了。「一定是出了叛徒。」常明說。「你聽說過了萬林嗎？咱們師警衛連的號手。」

「我知道他，他是我朋友，一個好人，很隨和。我在醫院的時候他照顧過我。你怎麼問起他來？」

「美國人把他帶走，審問了四天，前天把他送回來了。他的臉都被打爛了，腫成這麼大。」常明兩手在自己臉旁比畫出兩倍大的臉。

「他還是堅持要遣返，是不是？」

「對。可是兩天前，他被送回來一個小時後，幾個美國兵來帶走了裴政委。」

「他們把他帶哪裡去了？」

「先是在八十六聯隊的二大隊部，在那兒審問了他整整一夜。然後把他關到水牢裡，現在他被單獨關押著。」

「所以你們覺得是萬林告發的？」

「他有叛變嫌疑。」

「他怎麼會是叛徒？如果他出賣了裴政委，幹嘛還是要回大陸？這不可能嘛。」

「我只是說，他是懷疑對象。別擔心。」常明一個勁地磕他的後腳跟，他穿了一雙美國兵穿的那種鞋，不

過他那一雙不像是一對，有一隻的鞋舌頭翻著。

我把自己和伍德沃斯的談話告訴他。聽到我不再與牧師來往，常明很高興。

這天早晨很冷，地上的草葉都結了霜，北風陣陣，沒有人在屋外曬太陽了，所以我們比平常聊的時間長一些。他給我講了敵人怎麼處置裴政委的。有個叫弗萊德里希·詹森的美國上校，戰俘營裡都知道他是個中國通，因爲他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很有學者風度，從來不發脾氣，也不流露眞實感情，審問裴政委的就是他。詹森戰前在維吉尼亞一所大學當教授，在戰俘營裡，他經常把一本本中文古詩，送給戰俘中的重要人物，作爲「親善」的姿態。但是我們都知道，他到這裡一定有特殊使命。現在他終於出馬了，親自審問裴政委。但是不管他們怎麼逼迫，裴政委不承認自己的眞實身分，堅持說他只是個伙伕。他不承認是沒有用的，因爲敵人掌握了他的情況。顧忌到他職位高，當時沒有對他用刑。審問之後，他被關押在單獨的牢房。傍晚，五個中國人用手推車拉來一口大缸，放在他屋裡。然後又來了三個人，每人挑來兩桶熱水，都倒到大缸裡。後面還跟來一個人，拿著毛巾和換洗的衣服。領頭的那人對裴政委說：「呸，你不知道你有多髒，臭得像隻野山羊。詹森上校讓你洗個澡。」

「我不需要洗澡。」裴政委說。

「上面有命令讓你洗。」那個又矮又胖的領頭傢伙說。

「誰給我下的命令？」

「詹森上校。」

「告訴他我不執行他的命令。」

「日你的！你以爲你在這裡還是個人物呢，啊？」他手一揮，指揮其他幾個人：「把他按到水裡去，給他洗！」

他們把裴政委硬拖到大缸邊上，扒他的衣服，使勁把他往起拉，想把他放到熱水裡去。但是裴政委死死抓著缸沿，拒不進去，還大喊著：「我的靈魂是乾淨的。我不需要洗澡！」

他們開始搧他耳光、踢他屁股、用棍子打他、扯他的頭髮，但他就是不屈服。混亂中一個美國兵來了，幫著他們扯掉了裴政委的褲子。裴政委轉過臉來咬了那大兵的手，招來了更多的暴打；但不論怎麼打他就是不動，緊抓著缸沿像抓著救生圈。他不停地大喊：「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洗。打吧，來吧，看你爺爺洗不洗這個澡！」

又一輪連踢帶打之後，他們只好罷休，決定把大缸抬走。兩個人把缸裡的水舀回到桶裡，一邊舀一邊罵，說裴政委是個下流胚，裝模作樣的行家。有一個人還用手戳著裴政委說：「我們花了一下午，給你準備洗這個澡。我們還不如把你活煮了呢。」

敵人把裴政委看見澡缸便大喊大叫的狂暴反應，當成了某種恐水症，所以第二天下午他們就把他投入了水牢。這個水牢是按照日本式水牢的樣子建的。我在中國見過幾個類似的牢房，這裡的水牢樣子也差不多。水牢建在半地下室，有兩個水池，一個大，一個小，都被鋼條圍著，上面纏著鐵絲網，裡邊將近一米深的水又黑又臭。小池子用於單獨監禁，大的可以一次關進五個人。你在水牢裡只能站著，如果睏得站不住了，倒在鐵絲網上，帶鉤的鐵絲就會刺進你的皮肉。冬天裡，刺骨的冷水泡著你，凍得你滿臉青紫；夏天裡，蚊蟲不停地叮咬你，不到半天你全身的皮膚就開始潰爛了。通常，普通戰俘在大水池一次關五六個小時，可是裴政委在小池裡被關了整整一夜，他受不了了，要自己把自己淹死，他們才把他放出來。第二天，他們繼續審問他。不論怎麼逼問，他都不回答，還常常睡過去，一次又一次地被踢醒。有個人威脅說要把他送到刑訊室去，可裴政委回

答：「幹嘛不把我送到刑場去？我不在乎，已經受夠了。」他們看到實在從他身上得不到任何東西，只好把他又單獨監禁起來。

說到折磨人的辦法，中國人和朝鮮人比美國人要在行得多。美國人打你時，會踢你打你，會打斷你的肋骨、打爛你的臉，但是他們很少用精心設計的方式折磨你。這不是說他們不殘忍，他們會用菸頭燒人，甚至把人用電線捆起來，再搖電機通電。但是中國人，尤其是親國民黨派，對肉刑是很精通的，甚至通過折磨人來取樂。他們會用一種頭帶木瘤的硬棍子敲你的踝骨；他們把水管子插進犯人的肛門再打開水龍頭，有個人就這樣被整死了；他們把你手捆起來，往你的眼睛裡揉辣椒粉；他們強迫你跪在鋒利的空罐頭盒上；他們用刀削你的肉，然後把鹽抹在傷口上，說這可以防止感染；他們削尖了火柴棍，釘進你的手指頭，再點燃火柴；他們把你頭朝下放進一個空桶裡，用刷子刷你的腳心；他們把你捆在板凳上，往你肚子裡灌辣椒水；他們剝光你的衣服，把你放進裝了碎玻璃瓶的油桶，再把桶口封起來，推著桶到處滾。比較起國民黨人來，共產黨人沒這麼多點子，卻更直截了當。如果你犯到他們手上，他們不是打你個半死來警告你，就是乾脆把你幹掉。他們會把你打倒，在你後腦勺上壓上一個沙袋悶死你。他們幹什麼都是悄悄地，也許因爲他們是少數，在戰俘營裡勢力不夠。

裴政委被拷打的一個星期後，一天早上，一群戰俘被派去北邊不遠的一個採石場，往卡車上裝石頭。我們聯隊的人有時候會被派到碼頭或建築工地去幹一些緊急的活，通常是隨叫隨走。幹活的人由南朝鮮的衛兵押著，他們比美國兵對我們更兇，但是我們都很高興能離開營房到外邊去幹活，它給我們的日子帶來一些變化和幾分自由的感覺。儘管我的腿還不能承受太重的分量，我還是請求中隊長王永，讓我也偶爾出去幹幹活。現在，我覺得自己已經可以幹些輕活了，便越來越待不住，很想練練我的腿。王永一直說，工地上沒有適合我幹的活，而且他應該聽從醫生的囑咐，不能把我算個勞力，不過，今天不知爲何他讓我也出去幹活了。我對這個機會感到很高興。公平地說，王永對我還算通情達理，不像對待其他不肯跟他們去臺灣的戰俘那麼壞。直到現在，他沒有強迫我做過任何不願意的事，我甚至不必先請示他，就可以去別的帳篷走走。他還允許我在院子裡慢跑，來鍛鍊傷腿，只是，由於吃不飽，我沒有力氣每天都跑。有好幾次，他都請我和他一起吃東西（主要是麵包，水果罐頭，還有香腸），或喝點酒。我會去他的辦公室，但每次停留都不超過半小時。我從來不碰他的酒和吃食，雖然我很想吃。

大門開了，我們動身去採石場。那天是個暖和日子，天上雲彩不多。路邊的小草到處冒出芽來，像一把把小剪刀。附近村民因爲戰俘營的原因被強迫離開了這個島，丟下的稻田蒙了一層水藻，一些野鴨在田裡啄著蟲子和水草，空氣中瀰漫著的大糞味兒，直刺鼻孔。我很興奮，還有些緊張，不知道能不能正常地幹活。走到戰俘營柵欄的南角時，剛拐彎，隊伍就突然騷亂起來；有些人把臉轉向鐵絲網那邊，還竊竊私語：「有人死了。」一個衛兵大聲喊起來：「卡塞尤！」（快走！）但是我們都停下來，往那邊看。

在一個粗籬笆樁上，吊著一個人，瘦骨嶙峋，沒戴帽子，舌頭被勒出來掉到胸前。一隻袖子不見了，露出被打傷的胳臂，黃皮膚下的血管和青筋清晰可見。我抬眼細看那張臉，認出他來——是萬林！我不由地一陣暈眩，癱倒下去。

旁邊兩個人把我架起來。我不顧衛兵叫喊的命令，向萬林的屍體撲了過去，但被鐵絲網攔住。我痛哭起來：「他是我的朋友！他在醫院照顧過我！」我對所有的人不停地喊道。

沒人攔著我。他們都默默地看著，幾個人垂下眼，還有人在嘆氣。他們都尊敬看重友情、尤其是當著眾人面爲死者哀痛的人。四個衛兵把五十個戰俘又攏到一起，繼續往前走了，把我一個人留在原地。領頭的南朝鮮中士讓我回頭到採石場去找他們，採石場已經看得見了，就在北邊大概六百多米以外。我突然情感失控的原因

很複雜，有一種遭到背叛的感覺。我知道，策畫殺死萬林的一定是共產黨人，但是我不信萬林是叛徒。就算是他在拷打之下，供出了裴政委的眞實身分，他們也不用殺死他呀。他是一個好人，有一顆善良、單純的心，從來不會故意傷害任何人。共產黨一定是在殺一儆百。

我又仔細看一遍萬林，他發紫的臉被人狠揍過，連眼皮都腫了。毫無疑問，他們吊死他之前已經把他打得半死。他的雙手反剪，赤著的腳微微擺動，上邊的血跡上爬著蒼蠅。

十五分鐘後，我繼續向採石場走去。現在，我是孤身一個人，想上哪裡去都可以。衛兵根本懶得跟著我，一點也不擔心我會逃跑。事實上，一出戰俘營，中國戰俘都會服服貼貼，美國衛兵和南朝鮮衛兵是完全用不著費事的。幾個月前，一列車中國戰俘從前線被拉到釜山，一路上沒有一個衛兵押車，只跟來了一個美國醫生。大多數中國人都離不了群，太互相依賴了，極少有人打算逃跑。我們都不能忍受孤獨，相信只要大夥兒在一起，就更加安全。我們誰也不會說朝鮮話，不知道上哪裡弄吃的，不知道怎麼僞裝自己。所以，儘管我們常常談論怎麼逃跑，卻沒人眞的拿出勇氣，獨自把想法付諸行動。相反，北朝鮮戰俘不管什麼時候，只要一有機會，就會毫不猶豫地逃跑，所以，外出幹活幾乎從來不讓北朝鮮戰俘沾邊。我和別的中國戰俘一樣，也很膽小，也不敢逃走。

我慢慢向海邊的採石場走去，心裡充滿了對朋友之死的疑問和哀傷。經過八十一聯隊的時候，我看見北朝鮮戰俘在進行晨訓，他們一邊齊步走，一邊高喊著口號。有些人扛著削尖了頭的粗竹竿，像扛著一枝枝標槍，有些人扛著木棍和木叉，還有幾個扛著磨尖的鐵鍬，隊列排頭的四個人扛著擔架桿做成的鋁矛。他們情緒那麼高昂，看上去一點也不像是戰俘，更像是組織起來的民兵。怪不得常明跟我說過，朝鮮人比我們的人組織得好多了。他們的祕密組織已經滲透到戰俘營，控制了很多聯隊。我還聽說，大多數關押朝鮮人的聯隊都有一個鐵匠房，和幾百人組成、用自造武器武裝起來的自衛隊。裴政委有一次指示我們，要向朝鮮同志學習，因爲他們表現出了更大的勇氣。

但是我們的處境和他們不一樣。他們不但和老百姓交流起來沒有障礙，還祕密地和山裡游擊隊有聯繫。即使巨濟島上很多居民都搬離了，仍然有大批美國兵缺少不了的妓女在附近出沒。這些女人就是朝鮮戰俘與游擊隊之間的聯絡管道。更何況，有些南朝鮮衛兵就是北朝鮮的奸細。所以，北朝鮮戰俘在這裡如魚得水，比美國人還勝著一籌。

我到達採石場時，大夥兒已經在那兒幹活了，正在給兩輛卡車裝車，其他卡車已經走了。我的同伴都知道我腿不好，又正在哀痛之中，所以他們讓我只搬小塊的石頭。他們還告訴我，別上石頭堆，上面很滑。就是這樣，我每搬一塊石頭，都覺得腿上陣陣鈍痛，好像快要栽倒了。我後悔不該請求來幹這種重活，很擔心我會弄斷腿骨。有些石頭大得兩個人都搬不動，得用一塊厚板子架在卡車的車幫上，幾個人一起從後邊往車上推，同時另外四個人在車上用麻繩往上拉。大石頭一點一點地被拉上去，直到拉過車幫，待在車邊角落裡。我禁不住驚嘆這些人的力氣，要是我也那麼強壯就好了。

好在裝卸量不是很大，我們一個半小時就裝完了車。然後，六人一車，有十二個人跟這兩輛車到工地去卸車，剩下的人留在海灘上歇一歇，抽口菸。這是工作後最好的犒賞，讓你覺得有點像個自由人。我倚在一塊大石頭上，闔上雙眼，深深地吸進大海的空氣，腦子裡又出現萬林被殘害的屍體。眼淚刺疼了我的眼睛和兩頰。

幾個赤腳的男孩子在我們周圍打轉，每人斜掛著一個帶帆布背帶的擦皮鞋箱。他們濺滿泥點子的小腿，都細得像甘蔗桿。他們和衛兵搭話，卻不理睬我們，知道我們沒錢。一個朝鮮衛兵煩了，衝他們大吼：「卡拉！卡拉！」可能是在說「滾開」。戰俘們則一個個東倒西歪，享受著腥味的海風，觀看著海上的小船。

第八章　一頓晚餐

「他們爲什麼殺死丁萬林？」第二天早上，跟常明碰頭，我劈頭就問他。

他嚇了一跳。勉強擠出一個笑容，小聲說：「他出賣了裴政委。」

「你們怎麼能這麼肯定是他？」

「我們分析了所有可疑的人，覺得不是別人。」

「你說的『我們』是誰？」

「我不能說，俞元。我知道丁萬林是你的朋友，對不起。」

「他是被敵人打的，你們怎麼不想想他受的罪？打得那麼厲害，誰都可能受不了。你們至少饒他一次嘛。」

「俞元，不是我做的決定，是黨做的決定，這裡的鬥爭就是你死我活。有人出賣了我們，我們怎麼能饒了他？現在不給點顏色，我們以後還得被人出賣。」

「這裡誰代表黨？」

「我不能告訴你。」

「那你幹嘛還來見我？」

「因爲我們是朋友。老實說，我對黨的一些決定也感到不舒服。咱們都是大學畢業生，比別人更互相理解。不過，你還不是黨員，所以很多事情我不能告訴你，請你諒解我。」

他大眼睛裡的眞誠使我冷靜了一點。他繼續說，我應該小心一些，因爲甄別就要開始了，要不要回大陸，每個人都需要作出選擇。黨的負責人預計，在甄別之前和之中，會有暴力流血，因此，所有的同志要團結一心，互相幫助。

從和他的談話中，我可以斷定，戰俘營裡有一個祕密黨組織，很可能是在裴政委的領導下，因爲在所有被俘的人中間，他的級別是最高的。不過，處死萬林的命令倒不一定是他下的，因爲他被單獨監禁著，沒法跟任何人接觸。常明說了，他們盡了很大努力，但到目前爲止，還沒能夠和他說上話，也就是說，一定還另有一些黨員在暗中發號施令。

兩天以後，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我被叫到中隊部。一進那間小房子，就聽見裡間屋裡人聲嘈雜，有不少人。他們說話的聲音不高，但我聞到菸味，聽見碗筷碰撞的動靜。中隊長王永一個人坐在他的桌前，招呼我坐下。他面前放著一缸子熱可可，濃鬱的香味讓我感到飢腸轆轆。他疙瘩肉臉上堆著笑，說：「馮老弟，我們沒有多少時間再玩這個把戲啦。告訴我吧，你到底是誰？」

「我是連裡的文書。」

「別裝了。我們知道你上過黃埔軍校，對不對？哈哈，抓住你啦。」他仰天狂笑起來。

我有些慌亂，一言不發，心裡奇怪他從哪裡得知的。萬林也出賣我了嗎？不可能。我沒那麼重要，審問他時不會問到我。我勉強應付道：「你怎麼這麼說？我從來都沒上過大學。」

「那麼你怎麼懂英語的？」

「我是跟傳教士學的。」

「得了吧，別再矇老子了。我可以告訴你怎麼知道你來歷的。我們一個廚子曾經在你們學校的伙房幹過

活，他認出了你的臉，只不過叫不上來你的名字，他很肯定你在黃埔軍校上過學。你看，我什麼都不瞞你。」

我不知道說什麼好，只能死盯著翹起不平的桌面。

他繼續說：「馮老弟，我很喜歡你。你這麼單純，長得這麼俊，我敢打賭你從來還沒跟女人睡過覺呢。幹嘛把自己和共黨綁到一塊兒去？他們不會活著回去的，你不值得爲他們死，埋在這塊沒人要的臭地方，這塊亞洲的闌尾。」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對朝鮮的這種形容，覺得挺新鮮，就認眞地對他說：「王隊長，我不是共產黨，可是我得回家。我在大陸有一個多病的老母，還有未婚妻。」我把菊蘭的照片從口袋裡拿出來給他看。

他掃了一眼，顯然無動於衷，說：「我們在中國都有父母兄弟姊妹，但是好男兒志在四方嘛。至於你那女人，你說的根本站不住腳。」

「這話怎麼講？」

「我在共產黨隊伍裡幹過，知道他們的規矩。你不熬到營長一級，根本不會讓你帶老婆隨軍。可你什麼時候才能升到那一級呀？你能忍受那種分居嗎？記不記得在黃埔軍校時，你啥時候都可以挑個姑娘？這就不一樣，對不對？」

「我未婚妻是成都市的大學生，我們師就駐紮在成都，就算我不是幹部，我們還是可以住得很近。」

「老天啊，你怎麼傻到這種程度，還死心眼，你們師已經被美國人消滅了，不存在了。你怎麼回成都？和誰一起回去？」

一陣劇痛壓上我的胸膛，但我掙扎著說：「我訂了婚，有義務回去。」

「拉倒吧，老弟。臺灣有的是漂亮姑娘。咱們一到那裡，我保證出錢帶你去個快活地方，你會樂得忘了你家門朝哪兒開。」他停了一下，好像想起了什麼。「抱歉，」他說：「你知道我是一個粗人，只會說粗話。其實我連中學都沒進過，這一輩子我都沒看過一本書，我不該說這些髒話。不過，我是好意。」

「如果你讓我來就是爲了這個，我很感謝，隊長。現在我可以走了嗎？」

「別急呀，我們還沒談正事呢。」他站起身，繞過桌子走過來，一邊說：「今晚我請你吃晚飯，咱們可以多聊一會兒。」

不等我答應，他就抓住了我的胳臂肘，把我帶到裡間屋，只見屋裡有七個人，顯然都是他的心腹和哥兒們。我們進門時，掌聲響起來，一個人說：「歡迎，馮長官。」其他人也都一一對我表示了歡迎，好像我是他們的上司。很顯然，他們都知道我進過黃埔軍校了。

裡邊的空氣很嗆人，一屋子煙。五個落地檯燈立在骯髒的地板上，刺眼的燈光把巨大的人影投射到灰牆上。很顯然，他們這次晚餐是爲我安排的。高度數的檯燈是爲了讓屋裡暖和一點。幾個人圍坐的圓桌上有四道菜：一盆炸魷魚，一鍋白菜炒乾蛤，一缽朝鮮泡菜，一個長方形大鐵盤裡盛著一隻燉豬肘子，足有五公斤重。除了菜，桌上還放著一罈子燒酒，兩瓶白蘭地；一個鋁盆裡裝著米飯，上面蓋著一塊舊毛巾。食具也一應俱全，都是不同尺寸和顏色的碗和盤子，軍用茶缸，咖啡杯，刀、叉、勺、筷子。我被這一桌子豐盛宴席弄得眼花撩亂，不得不逼著自己把目光移開。這麼豐盛的一頓飯，我足足一年沒看見過了。他們從哪裡弄來這麼多好東西？難怪那麼多戰俘抱怨當官的貪污了。

王永宣佈：「今天，我們聚到一起有兩個目的。第一，讓兄弟們互相多認識一下。第二，慶祝我們馬上要投奔自由世界！」

他們都鼓掌歡叫起來，我也拍了手。接著他們聊起臺灣是個什麼樣子，他們去後怎麼開始新生活。一直到

這時候，大家多只是喝酒，沒有人急著動手吃菜，可我注意到，有幾個人不時偷偷地向豬肘子溜一眼。我用一個茶缸啜著白蘭地，不知道該怎麼辦——留下來，還是告辭？我知道待在這裡的風險：要是他們誰拍下一張我坐在這張桌前的照片，我就完蛋了，因爲他們會大肆宣揚，拿它作爲我跟他們合作的證據，那麼共產黨必定饒不了我。話又說回來，他們未必有照相機。

「馮長官，」一個長著一張光溜溜橢圓臉的人問我，「你和我們一起去臺灣嗎？」

「不。」我平靜地回答。話音沒落，所有的眼睛都轉向我。

「那麼去美國了？」

「那個國家不接受我們這樣的戰俘，你知道的。」

「那你去哪兒？」

「回大陸去。」

「爲什麼？我不明白。你幹嘛那麼忠於赤匪？你從他們那裡能得到什麼？」

「馮長官，」一個滿臉雀斑的人插進來，「別錯過良機。這次不跟我們走，你會後悔一輩子的。」

「好啦，」另一個人也插嘴，「馮長官，好好想想，有幾個人從黃埔軍校畢業啊？跟共軍打了那麼多仗，還有幾個活著啊？一到臺灣，你就是黨國的寶貝啦。蔣委員長對黃埔畢業的人就像對自己的兒子、孫子。跟著我們走，你會前途無量啊。」

「你說得不錯，」我說：「可是我家裡有個老娘，我不能丟下她不管。」

王永對他們說：「行啦，我們今天只管吃喝，不談政治。咱們聊聊友情和別的高興事，不說不相干的。」他給我倒了一杯燒酒，「馮老弟，我知道你平時不喝酒，但這次可能是咱們在這兒的最後一次聚會了。你至少應該喝一口，領我們兄弟這份情。」

看他一副那麼眞誠，甚至謙卑的樣子，我舉起杯子，喝了一口。

「乾了乾了！」有人鼓動我。

「乾杯！」

「就是，像個爺們，乾了它。」

他們有的喝乾了自己的碗和杯子，有的開始動手吃菜。我站起來說：「抱歉，我不能再待了。」

「不行，你還沒喝我的酒呢。」橢圓臉那傢伙攔住我，他已經有了醉意。

「你不能走！」一個結實漢子跳起來，一把抓住我的前襟，從他腰裡拔出一把匕首，一下子抵住我的喉嚨。另一個人一拳打到我臉上，我向後一個趔趄，坐到地上。

王永把我扶起來，轉身給了結實漢子一個耳光，命令道：「把傢伙收起來，你這畜生！你還沒醉呢。」

那人更加暴怒，又跺腳又掄匕首，他吼著：「馮延，你對我們大哥的好意不識抬舉！你瞧不起我們這些人。你算個什麼東西？你不過是黃埔軍校放出來的一個屁。你像條狗一樣跟著赤匪，你是我們黨國事業的叛徒。想想吧：我們從來沒強迫過你加入哪一夥，從來沒給你刺過字，我們給你一個戰俘能得到的所有好處——可你把我們的好心全當驢肝肺。你，你，老子今天非得割下你一塊肉不可。我就不信教不會你該怎麼做！」他一把刀甩到桌子上，砰地一聲，那刀戳在一個瓶子旁邊。

「你他媽的，滾出去！」王永對他大喊。幾隻手把他拉進辦公室，把他按在角落裡的一張小床上。

屋子裡一片死寂，我的心頭狂跳。

「都坐下。」王永說。等我們都坐下以後，他轉身對我說：「說實話，兄弟，我眞的喜歡你，喜歡你的能

耐和長相，就憑這些你就能有個好前程，當大官。還有，我看得出來你這人老實，我想跟你交個朋友。我是一個粗人，不懂禮貌，只上過三年學。要是和你這樣的人交上朋友，等於抬高我自己。我就打開天窗說亮話吧——我們想拉你一起去臺灣，將來有一天，好靠你得到點提攜。」

「靠我？」我很驚訝，心想他是不是也喝醉了？

「沒錯，靠你。」

「怎麼靠呢？」

「你是黃埔畢業的，你一到臺灣，蔣委員長肯定會提拔你當大官。可我們是誰？一群鄉巴佬和土包子，我們這幾個連小學都沒畢業。在大陸我們就被當成一堆垃圾，到了臺灣也一樣。你就不同了。所以我總想，等你當了將軍，你也許還會記得一個像我這樣的粗人，曾經待你像個朋友。馮延，你這麼年輕，可你的心已經中了共產黨的毒了。你爲啥不能和我們一道去臺灣？沒有一個有能耐的人跟我們一塊兒走，我們這些人誰也登不了天，早晚還是再落到社會最底下去。」他用兩手蒙住臉，傷心地哭起來。旁邊的人勸他別哭了，可他哭得更兇了，像個小孩子。看樣子，他也喝多了。

我被他的坦率感動了。我說：「王隊長，你不用過慮。你總對我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相信我，我不是共黨。我想回家，只是因爲太想母親和未婚妻了。要是扔下她們，我怎麼能夠在另一個地方過得快活？」我說著說著，眼淚也流下來了。我站起來，舉起酒杯。「王連長，我珍惜你的友情，永遠不會忘了今天晚上。來，咱們乾一杯。」

他們都站起來，往自己的碗裡、缸子裡、杯子裡倒上酒。喝乾以後，我說：「原諒我，弟兄們，我得走了。」我轉過身，走進辦公室，撩起門簾，踏進冰冷的夜幕。

星星在夜空中擠擠擦擦，月亮像一張露齒而笑的圓臉。遠處傳來狗叫聲，一條大船在海上鳴起笛來，活像發瘋的公牛。我頭疼欲裂，太陽穴一跳一跳的。我以前從來沒喝過這麼多酒，覺得直想嘔吐。搖搖晃晃剛拐過一座大帳篷的一角，一個影子跳出來。「誰？」我吃了一驚。

一個沉重的東西打在我後腦勺上，我被打昏倒地。

我在自己的小帳篷裡醒了過來，驚恐地發現肚臍下面被刺上了兩個英文字：FUCK COMMUNISM（操共產主義）。達堅，還有另外幾個人，坐在我旁邊一邊嘆氣一邊咒罵國民黨。一塊濕毛巾搭在我額頭上，可我還是覺得木頭木腦。這道刺青太可怕了。有這麼一堆字母在身上，我可怎麼回中國？眼淚又湧出來，儘管我使勁閉緊眼睛想把它們憋回去。好像心上被扎了一刀，我又昏過去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王永下令讓他們給我刺的字。他也許會，也許不會。我嚇破了膽，已經顧不得去找罪魁禍首，一想起自己沒法從身上去掉這些字，就心裡發慌得不得了。

兩天以後，達堅被王永的人綁架了。他們把他捆在連部裡一把椅子上，在他右臂上刺下了「反共抗俄」幾個字。他也嚇破了膽，一邊哭一邊說，這下子他可完了。不過，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還算幸運——他們還沒給我們刺個豬，那是他們用來形容共產黨的動物，意思是「殺豬（朱）拔毛」，毛澤東、朱德，都是他們最恨的人。親國民黨派的人，常常會給自己刺上一個中國地圖，地圖上面是一條本人選出來的標語，那中國地圖是把整個外蒙古，還有西伯利亞一部分也都包括進來的。達堅和我都不知道拿刺青怎麼辦，他指望我來拿主意。我對他說不要灰心，總有辦法可以證明我們是無辜的，可我自己，也和他一樣，毫無主張。

第九章　甄別之前

隔著鐵絲網，我給常明看了我身上的刺青。他看樣子並不吃驚，只是他也鬧不清，爲什麼給我刺上英文，沒刺上中文。「你說我以後能去掉這東西嗎？」我問他。

「開個刀就可以把它弄掉，我保證。」

「現在我怎麼辦呢？我身體上帶上這些話，怎麼敢回國去？」

我後邊這句話嚇了他一跳。他沮喪地說：「沒想到，他們還會在我們的人身上刺字。」

「你能不能問問裴政委，我該怎麼辦？也許他可以指點我們一下。」

「一直還沒能和他聯繫上呢。」

「要不要通過朝鮮人和他聯繫？朝鮮人一定有祕密管道。」

「我們會試試。」

「你快一點，不然就來不及了。要是甄別明天就開始，我們可實在不知道怎麼辦。」

我說「我們」，因爲我心裡還想著達堅呢。常明答應兩天之內一定告訴我怎麼辦。他近來看上去覺睡得不夠，兩眼無神，一臉疲憊，顴骨更突出了，但是他還是很樂觀，一直在說，一定會有辦法的。他甚至跟我開玩笑，說換了他，先飽餐一頓燉肘子和炸魷魚再說，吃飽了再跟王永說再見。他說我行事應該活泛一點兒，別死板得像個「書呆子」。

其實常明不可能體會到我的處境。儘管他也是大學畢業生，可我倆不一樣，他從來沒有和國民黨有任何瓜葛。在共產黨眼裡，他是個清白人，我卻背了很重的歷史包袱。要是我和王永他們一起吃了飯，全隊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吃完了，在共產黨面前，我怎麼洗清自己？他們會不會把我也當成叛徒？幸虧，那頓飯我碰都沒有碰，不然加上我肚子上這行可怕的字母，我與國民黨有什麼牽扯，可就渾身是嘴也說不清了。

達堅和我一樣，自從被刺了字以後就蔫了，時常痛哭起來。有一次他甚至問我，是不是簽字去臺灣算了。我對他說別朝這方面想，我們不能這麼容易就屈服了。

兩天以後，我和常明又在西北角上鐵絲網前碰了頭。他說，我們不用爲刺的字太過慮，在甄別的關頭一定要強硬地堅持遣返大陸。我問他：「你是從裴政委那裡得到的命令麼？」

「不是，我們還沒有和他接上頭呢。」

做主的原來是郝超林，我們師原來的炮兵主任，他現在領導著戰俘營裡的共產黨員。通過常明，超林向我們保證，刺青是可以去掉的。他還提供了實際例子：幾年前，山西的軍閥閻錫山，把他一個整師的人胸前都刺了反動口號，後來，很多人投誠到共產黨部隊裡，那裡的醫生替他們把那些字全都抹掉了。這個消息給了我一些安慰，給我堅持遣返回國又鼓了氣。回來後我興奮地把這話告訴達堅，可是他卻振作不起來。他只是說，不管我去哪裡，他都跟著我。這些天他正害痢疾，又拉血又拉膿的，可是他不肯住醫院，生怕自己會一個人死在那裡。我給他喝了大量白開水防止他脫水，他也吃了些朝鮮醫生開給他的藥。這些藥很見效，他拉肚子的次數已經少多了，不過身體恢復得很慢。

朝鮮的春天比中國內地要長一些，或者說，這裡的春季顯得更分明一些。天空閃現了春燕和海燕，風向也變了，多半是從太平洋上吹過來，白天裡暖洋洋的，不過夜裡仍然很冷。海上的漁船也多了起來，它們在雲水

之間顛簸，就像一群大鳥……有時候，我一連幾個小時看著那些漁船，彷彿我認識船上的什麼人，我甚至想像自己在大海裡靠打魚爲生——沒錯，我樂意以打魚爲生。我還年輕，可以重新開始我的生活。只要能出去，幹什麼我都願意！對自由生活的渴望漲滿了我的心。

四月八日早上，一輛美國人的廣播車開到我們聯隊門口，開始對我們廣播甄別政策，先用朝鮮語，再用中文，最後是英語。這個聲明重複播放很多遍，打動很多戰俘。中文部分，聽上去又安詳，又堅定，又清晰，一個親切的男聲宣佈：

……根據國際法，交戰雙方應該儘快交還被俘人員。有些戰俘被迫寫過供詞，或身上被刺了字，或做了一些在正常環境下不會做的事情，所有這些都不該影響他們遣返的意願。我們理解，他們是被迫做這些事情的。因此，我們保證決不追究他們的責任。我們誠心誠意地歡迎你們每一個人回到祖國的懷抱。弟兄們，同志們，你們的父母和親人在盼著你們。回家吧，與親人團聚，生活在和平的環境裡，參加我們偉大祖國的建設……

聲明之後，另外一個聲音用生硬的中文宣讀了聯合國對甄別工作的立場。這個聲音代表監獄當局，也敦促我們遣返：

聯合國司令部對拒絕返回你們自己國家的人不能提供任何保證。因此，在做出不能更改之拒絕遣返的決定以前，你們務必考慮你的決定對你家人的後果。如果你不返回祖國，你們的政府可能會追究你們家人的責任。更嚴重的是，你們可能永遠也見不到自己的家人了……

聽著這些話，很多戰俘都熱淚盈眶了。有人退回到自己的帳篷，把頭埋在毯子裡哭泣起來。王永一下子暴跳如雷，破口大罵：「操他媽的美國人！我要有顆手榴彈，先把廣播車炸了。」

擴音器裡還在繼續說：「請你們也考慮這種可能：如果你們拒絕回家，你們將被繼續關押在這裡至少幾個月。聯合國不能永遠爲你們提供食物，對你們的未來不會做出任何承諾，也不能保證把你們送到任何安全的地方……」

的確，這樣的廣播正破壞著親國民黨派苦心經營的一切，讓一些戰俘更想家了。有些人擔心自己的前景，就琢磨著改變主意，不去臺灣了。英文的廣播同樣是鼓勵戰俘回自己家去，強調聯合國只收留那些「強烈反對遣返」的人。看來，美國人對留住戰俘一點興趣也沒有。也許他們是不想讓中國和北朝鮮對太多的人拒絕遣返感到尷尬吧，那樣會使得戰俘交換工作複雜化，對他們要回自己的戰俘不利。另外，養活成千上萬的戰俘，對他們也是不小的負擔。

廣播車剛開走到另一個戰俘營去廣播，我們大隊就全體到自由大廳集合，由聯隊長韓述給我們訓話。韓述是個瘦瘦的人，聲音不大，怎麼看也像個文官，不像個武官。沒有劉太安的協助，韓述根本沒法控制戰俘營的局面。但不知怎麼，美國人就喜歡他，讓他當最大的頭兒。他倒背雙手，在臺上走來走去，好像一下子想不起來該說什麼。我們都一聲不響地看著他。好一會兒，他才仰起他那張顯得很聰明的臉，對我們開了口：「有一個問題我想了很久了。」他指著站在前排的達堅。「現在，那位兄弟，我請你幫我找出一個答案。對，就是你，到臺上來。不用緊張。」

達堅慢慢地登上了台。韓述繼續說：「其實，我的問題一點也不難。我們都在共軍裡幹過，心裡都知道答案。現在，我的朋友，你叫什麼名字？」

「白達堅。」

「告訴我，白老弟，共產黨軍隊裡的第七條軍規是什麼？」

達堅囁嚅地說：「決不投降，寧死不當俘虜。」

「對。請大聲一點再說一遍，讓大家都能聽見。」

達堅對著大家又說了一遍。

「很好，你現在可以回隊伍裡去了。」韓述轉向我們，「這就是我今天要說的。你們都知道共產黨的紀律，也明白作爲一個戰俘，回去後你會面臨什麼。如果你們還是要遣返，就得作好精神準備，一回到中國你們就會遭受批判、酷刑、關押、甚至處決。就算共產黨讓你們活下來，我也可以肯定，你們將終身成爲社會的渣滓。弟兄們，你們都明白我說的是實話，只是不敢面對實情罷了，所以我現在不得不替你們說出來。歷史已經證明，共產黨對敵人總是比對自己人要仁慈，只有成爲他們的大敵，你才能體面地活下來。我是你們這裡的長官，必須考慮你們的安全。一旦你踏進了這個戰俘營，就永遠也不能逃脫共產黨對你的譴責了，因爲他們認爲你給中國丟了臉。他們會無情地懲罰你，以維持自己隊伍中的紀律。你可以申辯，說『我一直是忠於祖國的！』他們會反問你，『那你爲什麼不自殺，保持氣節？』你還能說什麼？承認自己是個膽小鬼嗎？也許你想不承認都不行。如果你眞是個勇敢的人，你現在就可以死，就在這裡，在我們大家面前。他們聽說了你的英勇行爲，會發表你的動人事蹟，追認你爲革命烈士，把你變成個大英雄，去激勵他人。

「弟兄們，咱們都是人，用同樣的血、同樣的肉做成的人，所以咱們會怕痛，怕餓，怕死，常常會產生自衛的本能。我和你們每個人都一樣，也很想家，也常常夢見爹媽和兄弟姊妹，夜裡也會哭濕了枕頭。但是我不想任人宰、任人殺——那就和畜生沒什麼兩樣了。所以我決定投奔自由世界，去臺灣，今後一輩子做個異鄉人。我們的悲劇在於，祖國已經不再是個能讓人有尊嚴地活下去的地方了，那麼咱們幹嘛還要回去？就算你是個共產黨，在這裡表現得像一個共產黨，國內的同志們也不會再把你當成一個共產黨了。對他們來說，你們是一群懦夫和行屍走肉，根本就不應該活著。記住了：你們明天的決定將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好了，你們可以解散了。」

臺下的聽眾一動不動，都被驚呆了，誰都沒想到沉默寡言的韓述還能講出這麼一番大膽的話來。劉太安揮著棍子，對我們嚷道：「現在都回營房去！」

在回去的路上，我和達堅路都走不穩了，被這個時間不長的大會和韓述的話弄得心慌意亂，心裡像被錐子扎了一樣。我們小隊裡人人情緒低落，心裡明白韓長官的話很多都是實情。達堅和我都感到不知所措，不知如何掙脫國民黨的掌控，同時也很害怕大陸那邊將來會懲罰我們。至於那些共產黨員，也被韓述的話震動了，有些人長時間裡一聲不吭。

當天下午，大約五百名要求遣返的人在前院集合，四周站滿兩百多名警備隊員，每人手裡拎著一根像警棍一般粗、可有兩倍長的棍子。劉太安對我們說：「弟兄們，蔣委員長派來接我們去臺灣的船已經到了港口，你們在臺灣可以過上自由和幸福的日子。明天，你們每個人都必須決定何去何從。我迫切希望你們選擇正確的道路，永遠割斷你們與共黨的聯繫。」劉太安長得有稜有角，鑲著一顆大金牙。他說話時，左手插在皮帶裡，右手拿著一根棍子。

突然，一個聲音在我們中間響起來：「我們想回大陸。臺灣不是我們的家。」

「這是誰說的？站出來！」劉太安命令道。看到沒有人動，他又說：「有種的，就別怕站出來讓我見識見識。」

誰也沒有料到，一個剃了光頭的壯漢子，走上前去，鎮定地說：「是我說的，這是眞話。」

「林吾深，我日你祖宗！你再說一遍。」劉太安暴跳起來，一張方臉氣得漲成一個紫茄子。他好像早就認識這人了。他衝著林吾深的臉抓過去，恨不能把人家眼珠子都戳出來的架勢。

壯漢子一點也沒被嚇住，他說：「我家在大陸，我幹嘛要去臺灣？根據日內瓦公約，每個戰俘都有權利選擇自己的去向。我表達自己眞實的打算，這有什麼錯？咱們都是戰俘，誰也不應該干涉別人的決定。」

劉太安掀起他的嶄新外衣，讓大家看他穿的不是監獄發的那種獄服，口袋上和袖子上都沒有P和W字樣。他說：「我可不是像你一樣的戰廢品。我是一個自由人，被派來管理這個大隊的軍官。」

「沒錯，在舔完幾個美國屁股以後。」林吾深說罷，幾個人暗暗笑起來。

劉太安徹底被激怒了，他衝上前去，一把扯下了林吾深的左衣袖，露出他的胳臂。只見左臂上有一行刺青，畫著一個太陽發著一輪金光——那是國民黨的黨徽。劉太安喊道：「你這標記已經表明你反共的態度了！怎麼又改主意了？」

「這是你給我刺的，不代表我的眞實感情。我就是想回家。」

「你他媽的，你要是眞想回大陸，把這些刺的字先給我留下來！」

「可以，反正我要它也沒用。」

沒想到，劉太安一把抓住林吾深的胳臂，舉起他那把玉柄的匕首，說：「我最後再問一遍，你說你想去哪兒？」

「回大陸。」

劉太安手起刀落，兩下子就割下來林吾深帶著刺青的一塊肉。「哎喲！」吾深用手捂住傷口，咬緊嘴唇忍住了叫聲，兩眼紅得像一對火球，熱淚奔湧。鮮血滴在他褲子上，落在沙地上。人群騷動起來，幾個衛兵衝過來，抓住吾深的胳臂，把他拖走了。

「把他帶到教室裡去，」劉太安命令道，「我跟他還沒完呢。」

他們已經在教育中心鬧起了二十多人，都是被他們視爲死硬的共產黨、可能會破壞甄別、甚至會鼓動暴亂的人。其實，這些人裡有些根本不是共產黨，他們只是不惜代價、堅決要回家而已。

前排人群仍不能平靜。看到吾深的血，人們內心的憤怒爆發了，有些人豁出去準備拚了。劉太安一時有些著慌，但馬上又鎮定下來，對大家說：「林吾深就是你們的榜樣。如果有誰還想回大陸，就把那塊刺了我們字的皮留下來，咱們才叫兩清，誰也不欠誰，對不對？」

達堅和我都站在人群的前排。他渾身發抖，緊緊地閉著眼睛；眼淚順著他毫無血色的兩頰流下來。我也嚇呆了，好半天都說不出話來。我只能使勁地拉他的袖子，提醒他不要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來。站在他側面，我看見他頭髮裡有一隻很肥的蝨子。

「弟兄們，朋友們，」劉太安大聲說：「現在是你們拿定主意的關口了。今天晚上，你們都到大禮堂參加學習班，七點開始。完了你們就會清楚，明天甄別的時候該走哪條路。現在你們可以走了。」

晚飯前，達堅和我商議該怎麼辦，我們都知道，如果不按劉太安的意願做，他會殺人不眨眼的。我仍然決定回中國，達堅也說他跟定我了。但是我們兩人都很害怕，打算先盡量不暴露自己的打算。像共產黨員那樣，在拷打之下還堅貞不屈，我大概是做不到的。晚飯很不錯，大腸炒菠菜粉絲，第一次給了每人滿滿一碗米飯，

一大勺菜。有些打算去臺灣的人甚至還喝了清酒，可能是他們用毯子和靴子跟南朝鮮衛兵換來的，有人還打開了爲特殊時刻攢下來的唯一一罐火腿肉。他們好像在慶祝這新生活的前夜。相反，我們這些想遣返的人都感到很沉重，大家一聲不響。

晚飯以後，黃昏變得煙霧騰騰和喜氣洋洋，很多戰俘聚成小堆在聊天，從一個大帳篷裡傳出陣陣笛子聲。我們聚攏到戰俘營裡的「平民教育開發組織中心」（簡稱ＣＩＥ），中心由兩個巨大的教室和一個大禮堂組成，門前飄揚著美國國旗和聯合國的旗子。入口處，是史達林和毛澤東跪著的水泥雕像，聳肩彎腰，像一對罪犯，臉上頭上佈滿了粘痰和鼻涕。我們到會場那會兒，學習班已經開始了。門口的衛兵都是王永的人，卻沒有因爲我們來晚了而罵人，就放我們進去了。一進大禮堂就能感覺到氣氛緊張，所有的人都坐在髒兮兮的地上，正全神貫注，沒人留意我們進來。下午起就被關在教室裡的那些人都被拉上了不高的前臺。劉太安看上去比三個小時前底氣更足了，說話的樣子活像個眞正居高臨下的軍官。

「咱們長話短說，」他說：「跟著共產黨走的人決沒有好下場，因爲我們不會讓他們白白走掉的。」然後他轉向被五花大綁的林吾深：「我們就從你開始。現在，林吾深，最後一次，跟我說，你回哪裡去？」

魁梧的林吾深看也沒看他一眼，轉向我們大聲喊道：「我生在中國，我還能上哪裡去！」

一陣沉寂，空氣都凝固了。

劉太安咆哮起來：「好吧，你想回大陸，我現在就送你去。」他一手抓住林吾深的脖子，另一隻手揮著匕首，斷聲問道：「我再問你一遍，你去哪裡？」

林吾深無言地對他怒目而視，又轉向我們。突然，他拚盡全力高喊起來：「共產黨萬歲！祖國萬歲！」

劉太安一刀捅進他的胸膛，又一擰刀把，林吾深再也沒說出一個字來，倒在地上，雙腳還在掙扎，劉太安立即彎下身，剖開了他的肚子。林吾深的鮮血和腸子流了出來，前排的幾個人見狀都開始作嘔。劉太安又橫刺一刀，剖開了他的胸膛，挖出了他顫巍巍還冒著熱氣的心和肺。劉太安把那顆心切下來，挑在匕首上。他把心舉起來，揮著另一隻沾滿鮮血的手，對我們說：「看著，這就是我說的，不會讓你們白白走開的意思。如果還有什麼人想回中國，我就要先看看他的心到底是什麼顏色的。」說罷他轉身踢了林吾深一腳。

足有一分鐘，整個大廳裡沒有一點聲音，似乎空氣都被血腥味弄稠了。讓我震驚的不光是劉太安的殘忍，還有他殺人剖腹技術的純熟，好像屠宰人類就是他的日常營生一般。

「咱們接著來。下一個。」劉太安命令說，手裡仍然拿著挑在刀尖的那顆心。

他們下一個拉過來的人是我的一個熟人，叫楊歡，是個瘦骨嶙峋的人，一雙熱情的大眼睛，臉頰上有一塊很大的傷疤。他也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不過他比我早一年入校，又關在另一個中隊，所以自從我們碰上，還沒有機會從容細談過。我依稀記得，他在母校那會兒，很積極地領導過對國民黨的起義。也許他是一個共產黨員。

他們把楊歡拖到臺子中間。一個瘦高個走到他跟前，問他：「楊老弟，你還記得我嗎？」

「梅路福，你怎麼在這兒？」楊歡一臉迷惑。

「朋友，我是來幫你的。我們在黃埔，一個寢室裡一起住了三年，我忘不了你對我的好心和幫助，所以，現在輪到我了，我來把你拉出共產黨的泥坑。」

「我不需要你幫。」

「你我都是黃埔人，都是蔣委員長的學生，他對我們就像父親一樣。可我不明白，你爲什麼想回大陸去。是什麼讓你這麼效忠赤匪啊？」

我很困惑。梅路福說他是我們校友，可是我一點也不記得他。不過他們兩人是室友和好朋友是毫無疑問的。楊歡回答他：「中國有我的家，爲什麼我不能回去？」

「給他一個嘴巴！」劉太安命令道。

梅路福忠實地執行命令，給了過去的夥伴一記耳光。

「叛徒！」楊歡大罵道。「中國的渣滓，我們遲早會收拾你！」

「他媽的，你才是個叛徒！你背叛了蔣委員長的厚愛和期待。」梅路福開始大打出手。「嚐嚐這個吧。你敢管我叫叛徒？」

接著，一群衛兵向楊歡撲過來，楊歡不停地大喊：「革命萬歲！共產主義萬歲！」

木棍和鐵棒一起向他打下去，他還在掙扎著發聲：「萬歲……萬歲……」

不到一分鐘，他們就把他快打死了。一個膀大腰圓的傢伙用靴子後跟踩住楊歡的喉嚨，狠命地跺下去。楊歡掙扎了幾下，就不動了。我見狀戰慄不已，絕想不到，一個像梅路福這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會像劉太安一樣歹毒。同時，我也很驚訝，他們剛剛殺害的這兩個共產黨人完全不怕死。達堅和我一樣，也完全嚇呆了，手抓著我的肩膀上才不至於癱倒。

劉太安揮著血淋淋的心，對著臺上的二十多個人說：「算你們今天走運。我現在饒了你們，看你們明天的表現。」然後他又轉向我們：「今天就到這裡了，其實我還想取下幾塊皮呢。弟兄們，不要學林吾深和楊歡的壞榜樣。現在你們都可以走了。」

這樣，達堅和我都明白過來了：作爲黃埔軍校的畢業生，我們也一定是親國民黨的人注意的目標。他們會使用所有手段強迫我們去臺灣的。我們不像共產黨員，覺得自己不必爲堅持遣返而犧牲生命。回營房的路上，我們簡短地交談了一下，都覺得應該見機行事，不要公開拒絕去臺灣。最要緊的是，我們得活下去。只要活著，我們總會有機會回中國。

雖然很多戰俘都恨劉太安，一看見他，甚至一些堅定的共產黨員都不能不發抖，更不要說達堅和我這樣普通的人了；一些親國民黨的人卻喜歡他，尊敬他，有些人甚至把他當成英雄。就是這個劉太安，提出了口號：「我們一定要去臺灣！」就是這個兇狠的傢伙，咬破中指，把血滴到一大碗清酒裡，其他人也跟著做，都把血滴到酒裡，然後大家一塊兒把血酒喝下去，拜把子結成兄弟。公平地說，劉太安對親國民黨的戰俘很慷慨。作爲我們聯隊副頭目兼我們大隊長，他有權像韓述那樣吃小灶，可他並沒有那麼做，總是和其他戰俘吃一樣的飯。有一天，伙房不能按時開中飯，因爲要先給當官的做飯。劉太安走進來，打翻了煮粥的大鍋和裝著土豆燉蛤蜊的罐子。從那以後，就連那些吃特別伙食的當官的，在吃飯時間都避開他。還有一天，一個文盲戰俘該上識字班，卻逃了課，劉太安竟跪下來求他，要他珍惜這個可以學習認字寫字的機會。對於劉太安來說，好與壞的區別就像黑與白——他的頭腦裡不能容忍任何含含糊糊。儘管他只受過小學教育，滿腦子卻都被中國古典小說裡一些草莽英雄人物的形象佔據了，張飛啦，李逵啦，那些殺壞人毫不手軟、甚至吃他們的肉、喝他們的血的角色。親國民黨的人的確拿劉太安比過張飛、李逵，他自己對這種比法也十分自豪，這種對他能力的誇大，讓人敬畏，正是他想達到的效果。

回到帳篷以後，我們都禁不住咒罵劉太安。一個人說，共產黨早該把他幹掉。去年冬天有天夜裡，一群共產黨人把他狠揍了一頓，把他打得跪地求饒。有人後悔沒有組織起自己的武裝，現在，弄不到武器，大家就成了國民黨人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有人說，一旦他們回到中國，先把劉太安和他的狗腿子們全家都抓起來殺光。達堅告訴大家，梅路福的妹妹住在天津，在一家報社工作，有個人便說，總有一天要找她去算帳。我們正

談著，劉太安和王永帶著警備隊來了，命令我們立即都到帳篷外邊去。

等我們排好隊，立正站好以後，劉太安發話了：「身上刺了字的人都站出來。」

大約有三十來人往前跨出隊伍，達堅和我也跟著跨出去。劉太安開始向我們訓話：「別以爲我忘記這兒了。我跟你們說過，我要拿走那些字兒。你們吃了聯合國軍的飯，就應該在戰俘營裡留下點肉來。誰想回大陸，現在就告訴我，我們這就給他把刺的字拿下來。現在，臥倒。」

三十個人都趴在地上，兩手平伸出來。劉太安大叫著：「想回臺灣的抬起右腿來。」

猶豫了幾秒鐘以後，我抬起了腿。達堅也跟著抬起來了。但是還有一半的人沒有抬腿。劉太安指著第一個人，命令他的手下：「把那婊子養的揪起來。」

他們把那人揪起來，劉太安問他：「大陸還是臺灣？」他手裡一把特製的刀子在那人臉前一晃，那是一把牙刷，把上捆著一把刀片。

「大陸。」那人小聲說道。兩個人從兩邊抓住了他的胳臂。

「再說一遍。」

「大陸！」

「好，那我們就把字拿下來。」

「啊喲！」

劉太安從他的胸前割下了刺青。那人痛得叫起來，但還是很清楚地說：「好，給你爺爺把這鬼字割下去吧！」

我用眼睛的餘光看見一個警備隊員拿著一截鐵絲，那上邊已經串了十幾塊帶血的皮肉，每一塊都有一釐米多厚。很顯然，他們剛才在別的帳篷裡已經割了不少刺青下來。劉太安旁邊站著一個滿臉稚氣的衛兵，手裡拿著一個白瓷桶，裡邊也裝著幾塊帶刺青的肉。現在我明白了，我們這些被強迫刺了字的戰俘，全是受到親國民黨派注意的目標。他們把我們分爲兩類，一類是對他們有價值的，一類是被他們視爲死敵的。

劉太安晃著他剛從那人身上割下來的一片肉，另一隻手撥開他的保鏢舉著的一盞玻璃煤油燈。他把那片肉放到火苗上去烤，只聽得嘶嘶直響，幾秒鐘後那肉就烤焦了。他把焦肉放進自己嘴裡，狠命地大嚼起來。我看得目瞪口呆，腸胃都開始翻騰起來。他從牙縫裡擠出一句話：「就是把你們這些赤匪全殺光，把你們的心肝全吃掉，也難解我心頭之恨。」

一陣沉重的寂靜扣下來，達堅哭了起來。他們把那些不肯屈服的人一個一個地拉起來，強迫他們回答去哪裡的問題，隊伍裡響起越來越多的哭聲和叫痛聲。有幾個起先還沒有抬腿的人，現在也改了口，表示願意簽字去臺灣。我一直抬著腿，沒想到他們把我也拉起來了。我嚇得渾身發抖，幾乎說不出話來。一個滿臉疙瘩的傢伙，把帶血的刀子放在我肚子上，說：「我的大學者，現在告訴我你想去哪兒。」

「我跟著你們。」我含糊地說。

「大聲點說！」王永插進來。

「好吧，我去臺灣。」

達堅也被拉起來了，他也學著我的樣子說了。我們這一帳篷的人都過完之後，王永馬上把我們這些新的「歸變者」搬到一個大帳篷去了，那裡邊又寬敞又乾淨。我幾乎徹夜未眠，聽著小帳篷那邊的人們不停地叫的叫，罵的罵。我感到羞恥，連跟達堅都不想說話，他在那邊也翻來覆去地睡不著。他要跟著我，這讓我獨自承擔著良心譴責。內心深處，我恨不得也像一個眞正的共產黨人一樣勇敢，那樣狂熱且癡迷，視死如歸。

第十章　甄別

第二天，我們六點鐘吃早飯，然後收拾好全部行李背在身上，全體來到自由大廳外邊等候。我只有一個小掛包和一條毯子；有的人除了一身破爛衣服什麼也沒有，全都賭博輸光了。甄別八點開始。我們一組一組地被帶進大廳，等著被叫到名字，再一個一個地去見裁判官。我們都要從一個旁門出去，那裡有三個特別爲甄別紮起的白帳篷，每個人進其中的一個，在裡邊回答是否願意被遣返回國的問題。問完以後，我們會被分別送到去臺灣或回大陸的隊伍裡去。我們這一組走進大廳時，我禁不住煩躁不安，不知道該說去哪裡。在屋子裡的一個角落，昨天晚上被殺死的兩具屍體還在稻草底下埋著。藏在警備隊員袖子裡的鐵棒子讓我害怕極了，外邊響起一個聲音：「抓住他！敲碎他的腦袋！」我閉上眼睛，盡量不想下去。

一個聯合國官員走過來，拿著紀錄，核對我們的身分牌，然後讓我們在一個信封上簽字。十幾個空著手的聯合國軍衛兵也出現了，所以大廳安靜下來了一些。

站在我身後幾個人後邊的達堅，不停地看著我，用他一雙呆滯的眼睛詢問我該怎麼辦。我把臉轉開，不想面對他，因爲我自己也沒有主意。用眼角的餘光，我看見他對著我晃了幾次下巴，但我都沒有做出反應。另外，警備隊員也不許我們跟任何人交談，所以我不可能走過去告訴他，我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一塊小石頭打在我背上，這是告訴我，輪到我了。我邁著顫抖的步子，向旁門走過去。我走得很慢，爲的是看看外邊是個什麼情況，好估計一下形勢。只見幾個美國大兵站在白帳篷的入口處，鋼盔和藍臂章上都印著"MP"（軍警）的字樣。終於有了一個主意：如果裁判官強迫我去臺灣，我就衝出帳篷，請求美國大兵送我去回大陸的隊伍。我想，如果我用英語跟他們說話，他們可能會幫我的。

進了帳篷，我被命令坐在兩個美國軍官面前，中間放了個折疊桌子。兩人中一個是白人，高個子，一張長臉，穿了件豆綠色襯衫；另一個是個壯實的華裔。白人是個上尉，先開口跟我說了日內瓦公約的有關規定和我的決定會有什麼後果，我很驚訝他竟會說國語。那個華人是個中尉，一直心照不宣地微笑著，時不時地用廣東話說幾個字，可我完全聽不懂。

我一定露出一副心不在焉的神色，因爲那白人漸漸不耐煩了，對我說：「好了，現在告訴我吧，你想去臺灣還是中國大陸？」

「去大陸。」我堅定地回答。

他盯著我的臉看了好一會兒，好像難以置信。然後他遞給我一張卡片，說：「筆直走，去前門，把這張卡交給衛兵。」

我淚流滿面，向他們兩人鞠了一躬，說：「謝謝。」就趕快向前門跑去。我手裡的卡片有巴掌那麼大，寫著這樣幾個字：「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把卡片交給站在門中央、手持步槍的門衛。他看了一眼卡片，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推出了大門。離崗亭不遠，停著一輛卡車，車後蓋著帆布。一個美國兵招手，讓我從車後的梯子上車。我一邊爬上去，一邊轉回身去看白帳篷，希望看見達堅也跟著我出來。

「不要東張西望，你這渾蛋！」另一個美國兵大喊起來，把我推進了卡車。車上只有十幾個人，大多數我都不認識。我更著急了，要是我現在能給達堅使個眼色該多好啊！把他一個人留在困境之中，讓我覺得很難

過。

大約十分鐘以後，卡車向新的營地——六零二聯隊——開動了，所有將被遣返的人都去那裡集合。下午，我聽一個剛到的人說，達堅被送回我們原來的連隊以後，見人就問：「馮延呢？你看見他了嗎？」大家都對他搖頭，他一個人哭了好久。那天早上，在進帳篷受甄別之前，他被夾在兩個親國民黨派中間，他們告訴他，我已經做出了「聰明的選擇」，於是達堅對裁判官說，他也要去臺灣。

第十一章 第六零二聯隊

六零二聯隊離七十二聯隊只有幾分鐘的車程。車快開到時，我看見一根竹竿上有一片紅布在飄揚。走近些再一細看，我看出來那上面還有五顆金星，不知是誰自己製作的一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看到這面國旗，我們都激動起來，感覺到這裡一定是在共產黨的控制之下。

幾天以來這裡聚集了四千多人，都是決心返回祖國的。來到這裡，意味著又回到自己同志的隊伍裡來了。的確，這個地方與七十二聯隊大不一樣，所有的帳篷都是一樣大小，大夥兒吃的是同樣的伙食。大多數人都笑逐顏開、輕鬆隨意，樂於幫助別人。我後來聽說，這個地方被稱作「大陸營」，是通過艱苦鬥爭才建立起來的。很多人向戰俘營當局示威或寫信，強烈要求與拒絕遣返的那些人分開。他們派出代表，與戰俘營當局和親國民黨派的代表談判了三天，最後是紅十字會的兩個瑞士人介入，做出仲裁，去大陸和去臺灣的戰俘這才分了開來。

七十二聯隊的八千人中間，只有大約七百人最終來到六零二聯隊。其餘的人都留在原來的營房，迫不及待地等著臺灣那邊派船來接。其實，所謂「派船來接」，不過是個謠言，或者說是一個幻想。至今並沒有什麼船開來接他們。

到六零二聯隊的那天，我高興地碰見了常明，就是前些天隔著鐵絲網和我定期碰頭的師部通訊編輯。我們兩人擁抱在一起，激動得眼淚直流。他給了我一包朝鮮香菸，我看不懂那牌子，不過，那上面的紅字底下印著

兩隻海豚。他說，我們可能不會在這裡待很久；美國人甚至懶得費神給我們編隊，所有事情都由我們自己做主了。這種狀態表明，現在這個聯隊只是臨時性的。

「你從哪裡聽到的？」我問他，一邊猛抽幾口他給我的菸。

「只是我自己的觀察。」

「嘿，你挺厲害了。」

他似乎比以前更有經驗、也更堅強了，而他的厚嘴唇和明亮的眼睛依然顯出無限的天真和善良來。他還是像個編輯，胸兜上別著一枝粗桿鋼筆，我問他是怎麼把筆保存下來的，他咧嘴一笑，說其實那筆早沒水了，沒法用。他邀我住到他的帳篷裡去，說，趁現在還沒把大家分開，我們最好住在一起。我很樂意和他住一起，於是我們倆一起走到第一排營房的第三個帳篷，他們在透氣窗口下面給我鋪了一張席子。帳篷裡有一股青草的氣味，一定是剛搭起不久。我放下毯子，很喜歡這個新鋪位，因爲待在帳篷裡也可以享受到日光。我安置好以後，常明就出去開會了，他一定擔任了這裡的某種領導職務。

當天下午，我又碰見了郝超林，他對我並不顯得很熱情。他說，他一直忙著協助裴政委把這裡的同志們組織起來。也許因爲在原來師裡他的級別比我高多了，他不大願意和我太親近。不管怎麼樣，聽說裴政委也在這裡，而且擔任著領導，我很高興。眞奇怪，美國人怎麼放他到這裡來了，這不是放虎歸山嘛，眞是大錯特錯。

另一方面，讓人難過的是，我在這裡看到的傷員比在過去營房裡要多多了，少了一隻胳臂的，帶著遮光眼罩擋著空眼窩的，被汽油彈燒掉了頭髮、耳朵、鼻子的，被炮火震聾、只能靠手勢比畫的，沒有了腿、只能靠拐杖或木頭假肢走路的。我忽然覺得，沒有哪個國家願意接受這些戰爭的廢品，除了回中國，他們沒有別的選擇，在中國他們起碼還有家人，他們只能跟著共產黨回家。

晚飯是同樣的伙食，大麥粥和醬油湯，但在這裡，人人都是平等的，甚至是禮讓的。沒有人搶飯，當官的也不開小灶。那天晚上，我到聯隊總部的帳篷去看望裴政委。帳篷外邊草地上，很多人躺在地上，抽著菸，聊著天。他們看上去既輕鬆，又充滿希望，好像我們過不了幾天就可以出發回家。這也是我要見裴政委的一個原因，我很想知道我們什麼時候能回家。帳篷裡正開著會，入口處的衛兵把我攔住，不過他馬上進去替我通報了。

一分鐘以後，裴政委邁著軍人的步伐走了出來。「哈哈，俞元，咱們又見面了。」他說著伸出一隻手來，我兩隻手握了上去。他的手還是像過去那樣光滑、柔軟。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回家，裴政委？」我問。

「等不及啦？」他的眼睛裡顯出笑容。

「說實話，眞等不及了。要是我們能飛回去就好了！」

「我們可能還要被關一陣子。但是不必擔心，在自己的同志們中間，你不會再受七十二聯隊裡那些罪了。」

我掀起衣服，給他看那道刺青。「裴政委，您看我能把這個拿掉嗎？」

他看了看那行字母，說：「我聽說你被刺了字，可還不知道是用英文刺的。我認識『共產主義』，另外一個字是什麼意思？」

「是『操』的意思。」

他仰天大笑起來。「不要緊。也許你現在還不該拿掉它。我考慮考慮再說，好不好？」

「好吧。這東西實在讓我覺得彆扭。」

「我明白。不過它一時還影響不了你什麼。」

因爲正在開會，他不能和我久談，我就告辭了，說好還會再來看他。轉身離去之前，在他掀開帳篷進去那當口，我掃了一眼裡邊的情景。裡邊大多數的面孔都是熟悉的；他們一定都是原來我們師裡的共產黨員。很顯然，裴政委已經穩穩地控制了這裡的局面。對外，他在聯隊中什麼官銜也沒有，隊長是趙騰，一個很老相又很活躍的人物，過去是五四零團的一個連長；但是大家都清楚，趙騰後面的眞正指揮是裴政委。郝超林是聯隊的副隊長，實際上在很多事情上卻比趙騰更有發言權。也許因爲這個聯隊的臨時性質吧，美國人只是指定了幾個主要負責人，然後讓他們自己去組織這裡的戰俘。美國人似乎太缺人手，顧不上這一類事情。

不到兩天，遣返團就組織起來了，這裡的每個人都在其中。裴政委當了遣返團長，超林是一大隊隊長，其他兩個大隊的隊長，也都由我們原來一八零師的軍官擔任，其中一個是趙騰。在軍事單位之外，他們還設立了一個機要祕書組，負責保管祕密文件和密碼、對外聯絡事務（包括翻譯文字和充當口譯），以及宣傳、教育和娛樂等事務。常明和我都進了這個祕書組，組裡其他人也都是受過教育的，三分之一以上是大學畢業生。沒有費很大力氣，各級首長都確定，很快就開始各負其責了。現在我明白了，這是我們的人要求與親國民黨的人分開的又一個原因：共產黨人可以在新的編制中恢復自己的控制體系，特別是在排和班一級中間。一旦各級領導到了位，我們馬上就能形成一個有效率的集體。很顯然，敵人沒有看出這個隱藏的動機。

隨著軍事組織的重建，一個政治祕密團體也建立起來了，叫做「共產主義團結會」。我們這裡黨員並不多，共產黨需要攏住盡可能多的人，爲了吸引大夥兒，就建立起來這個團結會。我在祕書組裡工作，看到了團結會的章程。章程如下：

第一、總則

共產主義團結會是一個由聯合國軍戰俘營中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及革命戰士組成的祕密組織。鑒於我們特殊的環境，我們團結會特規定以下原則：

我們堅信共產主義。

我們將組織並領導戰俘爲捍衛共產黨和我們祖國的榮譽而戰。

我們的行動將配合我們國家的軍事鬥爭和板門店談判。

我們將向在押的戰俘揭露敵人的陰謀。

我們堅持返回中國的決心。

如果板門店談判破裂，我們將實施越獄，解放自己。

第二、組織

我們遵守中國共產黨章程制定的規章。團結會的每一級單位都必須保持革命的榮譽，勇敢戰鬥，但須以地下鬥爭的方式。我們決不暴露我們的組織結構，各級領導均保持低調，通過單線聯繫的方式進行成員之間的交流。團結會下的各營房不要互相聯繫，我們也不會召開全體大會。各級領導應該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但是由於我們的特殊情形，除了團結會的主席必須由各支部的書記選舉產生之外，團結會各級領導將由上一級領導任命。原則上說，新成員必須個人加入，而不是集體加入。

第三、成員

團結會的成員是我們與敵人做鬥爭的骨幹。任何承認中國共產黨章程、在戰俘營中歷史清白、並願意爲團

結會的原則而戰鬥的人，不論是不是共產黨員，都可以申請加入團結會。每個人的入會須有至少一名會員介紹，和基層委員會的批准。情況比較複雜的，應該由總委員會批准。每個成員都有義務參加團結會的定期活動，有權利批評和揭發上級領導的不當行爲，必須視革命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必須嚴守祕密，不怕關押、毒刑和死亡。

第四、紀律

我們的懲罰包括以下四種：勸說，警告，免除職務，和開除會籍。如果一個會員喪失革命意志，又屢教不改，其情節將呈報上一級，將其開除出會。但是，爲了避免意外事件，將指定另一個成員與被開除者保持聯繫。團結會不設立執行懲罰的機構，各種懲罰都交由各級保衛人員處理。

團結會一成立，就向全體戰俘提出了三項任務：緊密團結，對敵鬥爭，努力學習。這裡一多半人是文盲，沒有人會質疑這三大任務。大多數人馬上開始執行，這三項任務一下子成爲他們生活的全部意義了。實際上，大家害怕的就是缺乏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沒有這樣的領導，我們可能還會像在國民黨控制的聯隊裡那樣遭罪。另外，儘管板門店談判還在進行著，我們卻不能斷定談判會不會成功。大家深信，一旦談判破裂，美國人就會開始屠殺我們，或把我們送到阿拉斯加的銅礦和煤礦去做苦工，所以，那時我們唯一的生路就是越獄。根據我們得到的情報，金日成將軍已經發出祕密命令，所有朝鮮戰俘必須設法越獄，自己救自己。我們可能也需要像他們一樣，而這麼大的一個行動，沒有強有力的領導和行動計畫，是想都不要想的。這是人們願意加入共產主義團結會的一個主要原因。

我和大夥兒一樣，也申請入會。我願意遵守團結會的原則，因爲我相信社會主義，我覺得社會主義才是拯救中國的唯一道路。國民黨毀掉了我們國家，這我是親眼看見的。物價飛漲，腐敗，犯罪，貧窮，邪惡勢力在舊中國橫行霸道。我記得，一個遠房舅舅有一回用自行車馱著兩只麵口袋鈔票去買菜，把錢全花光了，只買回來不到四十斤紅薯。在這種政權之下，老百姓怎麼活得下去？相反，共產黨掌權沒過多久，貧苦的人們就得到了救濟，高利貸和投機倒把都遭到取締，犯罪團夥也一掃而光了。不管怎麼說，共產黨給中國帶來了秩序和希望。

有天下午，常明跟我說起我入會的申請，冒出了一句「他們可能不讓你入會」，讓我大吃一驚。這話的意思是，他們拒絕接受我。

「爲什麼？」我問他。

「可能因爲你幫伍德沃斯牧師翻譯過聖歌。還有人說，你經常一個人看《聖經》。」

「老天爺，你知道我那都是爲了學英語。我一發現伍德沃斯的眞面目，就馬上什麼也不給他幹了。」

「你別急，我也是這麼跟他們說的。先別想太多，他們來問你時，把所有事情解釋清楚就是了。我覺得他們還是會考慮你的。你看我差點忘了，裴政委今天晚上想跟你談談。」

「幾點？」

「八點，你到他住的地方去。」

晚上，前門關上以後，我一個人沿著鐵絲網朝裴政委的帳篷走去。大地已經化凍，到處冒出一片一片的新草。足有半年了，我從來沒有這麼自由過，可我心裡感到沉甸甸的。被自己的同志視爲異己！這個念頭折磨著我。遠處，一條小路蜿蜒伸向山丘，山下的小村裡仍然住著一些漁民。炊煙從茅草屋頂冒出來，活像一團大蘑

菇。村裡的日子似乎很安詳，偶爾傳來幾聲驢叫。房子後邊，遠遠可以看見藍色海灣的一角，灣裡的海水像凝固了一般紋絲不動。不知哪兒的一隻鳥在急速地尖叫，像個警報器。清涼的海風不時地吹來，送來略帶腥味的氣息。

我已經把自個兒的命運跟共產黨拴在一起了，可是他們信任我嗎？對他們來說，我是個歷史上不夠清白的人。那麼我在戰場上、在打游擊的日子裡的表現，還不能證明我是可以信賴的、還不夠體現我對祖國的忠心嗎？我沒有像大多數黃埔軍校畢業的人那樣拒絕遣返，而是他們中間少數跟著共產黨走、到這個聯隊來的人之一。他們還要檢驗什麼，才能相信我和其他戰俘一樣是可靠的？不錯，我幫伍德沃斯牧師翻譯過聖歌，但是我及時抽身了，沒有造成過什麼傷害。這裡不少人，在我已經不再去教堂以後還去聽星期天的佈道呢，他們怎麼就都沒事？

我明白了。對於共產黨來說，我和伍德沃斯牧師攪在一起，是某種故態復萌，暴露了我的「小資產階級的立場」，這是他們批評一個像我一樣有文化的人時，常常會用的一個詞兒。可是，我並沒有申請入黨啊，我只是申請參加一個外圍組織，他們沒有理由不要我。我把這事再考慮了一遍，又一轉念：我爲什麼這麼迫切地要獲得他們的批准呢？爲什麼對加不加入那個組織著這麼大急？也許我是害怕孤立吧，得靠著一個團體才覺得心裡踏實。我爲什麼不能獨往獨來，不跟隨其他任何人？一個人應該除了自己，不依賴任何人才對。如果達堅不是爲了要跟著我，他也不會選錯了道路，又被王永抓在手心裡了。我還是不要和別人搞在一起吧。

不。如果打算回國，我就得靠攏共產黨人參加活動；不然，我會給自己惹來更大的麻煩。不管我合不合群，他們都不會放過我的，所以我不能清高自傲。不是他們的朋友，就是他們的敵人，共產黨是不相信有任何中間道路的……

「你先出去吧。」裴政委一看見我進來，就對他的勤務兵說。然後，他微笑著，招手讓我過去，在他旁邊坐下。

「俞元哪，我考慮了你的肚子。」我一坐下，他就這麼開了口。

「我肚子？」

「是啊，我是說那刺青。」

「我該拿它怎麼辦呢？」

「不管它。」

「就讓它待在我肚子上？」

「沒錯。」

「我不明白。」

「這兒沒有醫生，所以沒人能給你拿掉它。」

「可是別的同志都把字改掉，或把圖案改成一朵花什麼的。」

「我知道，但你的情況比較特殊。」

「怎麼特殊？」他的話讓我有些不快。他們爲什麼總是對我另眼看待？

他臉上浮起一種神祕的表情，說：「你不是一個普通的戰俘。我們可能需要靠你和美國人打交道，你這刺青說不定會幫你忙，你說是不是？」他咧嘴一笑，左頰上出現一個拉長的酒渦，雖然他的臉很消瘦。

「我可拿不準。」

「聽我的沒錯，你那字別急著拿掉。」

「回到祖國以後，要是爲這個受到處分，我可怎麼辦？」

「我會向黨解釋的，我保證。這是我們鬥爭的需要。」

「要是那樣的話，我就先留著這個可惡的東西。不過，裴政委，我對您有個問題。」

「好，你只管說。」

「按您說的，黨是需要我的，那爲什麼不批准我加入共產主義團結會？好像我是個反動分子似的，那不只是個進步群眾的組織嗎？」

「我知道這事。說實話吧，是有些同志對你有保留，有看法。這也是我想跟你談的一個問題，我們很快要辦一個學習班，到時候你要在學習班裡做自我檢查。」

我一下子懵了，這就是說大家要批判我了。我費力地說：「我幹什麼了，要給我辦學習班？」

「別這麼性急。所有的同志都要做自我批評。」

「可我的情況比較特殊，是吧？」

「對，你可能比別人要多做些檢查。」

「因爲我幫過伍德沃斯牧師？」

「那只是問題的一部分。」

「您知道我並沒有信教。」

「可是你經常看《聖經》。」

「那只是因爲除了《聖經》我沒別的可看。相信我，要是有一本《資本論》，我會整天看《資本論》的。七十二聯隊的很多人成天賭博，您說，那比看《聖經》還好嗎？起碼我在提高英語，讓我自己有點用處。」

「我覺得還不光是要學英語吧。你一定感到孤獨，所以你想從基督上帝的話裡尋找庇護。」

他的敏銳讓我很震驚，也讓我意識到，自己內心中一定有著某種宗教渴望，在與伍德沃斯的交往中，這種渴望被喚醒了。沉默了好一陣，我承認說：「我讀《聖經》有時候心情會好一點，我也不知道是爲什麼。讀了《聖經》，無助的感覺就減輕了。」

「眞正的幫助來自同志們、來自黨，可不是來自上帝。任何上帝也沒法解救我們。你看，你的想法和大家不一樣，所以你就特殊了。」

「我從來沒說自己是個共產黨員，思想上就更不像個共產黨員了。可我相信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我願意跟著共產黨走。所以我才上這兒來了。」

「說得好。我很欣賞你的直爽。」

他的話壯了我的膽子，我越發說出了眞心話：「我承認共產黨員的熱情、奉獻精神和紀律，但我沒法接受你們工作方法的邏輯。」

「這話是什麼意思？」

「共產黨把每個人只當成一個數字，一加一等於二，一百個人聯合起來，就得到了一百人的力量，好像人和馬沒有區別。對我來說，事情可不是這麼簡單，我相信一定有一種力量比一個個人要大得多，就像一個乘數。一旦激發出那種力量，你就能夠成倍強大，一個可以變成一百或一千，就看那乘數是多少了。」

「你想得很有深度，俞元。這麼說，你發現上帝就是那個力量了？」

「還沒有發現，不過，一定有這麼個一個乘數爲人類而存在。」

「我已經找到了。」他堅定地說。

「是嗎？」

「對，那就是馬克思主義。」他說得十分誠摯。

我有好幾秒鐘不知說什麼好，然後喃喃地說：「所以您做什麼都是堅定不移的。」

「沒錯。」

「它還能幫您克服許多困難。」

「是啊。共產主義的理想使我們力量和勇氣倍增。」

我用完全折服的口氣說：「我要是能像您就好了。」

「你應該向這方面努力。明天，同志們批評你的時候，你要保持平靜和耐心。他們都是要幫助你，沒有惡意。」

「我記住了。」

那天晚上，躺在席子上，我把和裴政委的談話又想了一遍。他不是把馬克思主義當成一種理論，而是當成一種宗教，這讓我感到新奇。用宗教感情便可以解釋，爲什麼那麼多共產黨員，包括那些沒有受過教育、完全不能領會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人，都那麼狂熱、那麼奮不顧身地投入他們的事業了。在某種程度上，我很滿意和裴政委的談話，他似乎很理解我。

祕書組只有十二個人，我們便和炊事班編成一組，他們是專給隊部頭頭們做飯的。那天下午，全組二十五個人，坐在炊事班帳篷裡的泥地上，開始每個人的自我檢查。六七個人逐個談了自己在各個聯隊裡的表現，都說，他們都希望原來的聯隊裡多一些黨的領導，那樣，他們在同反動分子的鬥爭中，就可以更積極、目標更明確了。輪到我時，我檢討了翻譯聖歌的錯誤，和我的疏忽使得白達堅留在了原來的聯隊。我原以爲，自己的檢討可以減少一些批評，可他們卻沒有這麼輕易就放我過關。問題連珠炮似地向我發來。我怎麼得到《聖經》的？我爲什麼每天都要讀它？伍德沃斯牧師怎麼不找別人單找我給他翻譯聖歌？我還爲他幹了些什麼？他們的聲調越來越嚴厲，弄得我開始失去耐性了，便信口回答說，我讀《聖經》是因爲不想和他們一樣靠賭博消磨時間。

「可你爲什麼現在還在讀《聖經》呢？」一個人質問。

我想反駁，說我願意；可我沒有那麼說，想不出個合適的回答。

他們讓我覺得自己像個正在受審的叛徒。多麼荒唐啊，我不禁懷疑爲什麼要搞什麼自我檢查。要是敵人派我們做苦工，讓我們沒有這麼多精力辦這種毫無意義的學習班就好了。我突然之間失去了耐心，說：「聽著，雖然我不是黨員，可我是你們的同志。我受的罪不比你們誰少，我也從來沒有背叛過祖國。」我低下頭，讓他們看王永的手下在我頭上留下的傷。

祕書組的李滿銀舉手表示要發言。他的圓眼睛直盯著我，幾乎是開玩笑地問我：「聽說你在釜山那段日子，和一個美國女人來往密切。可以談談你們的特殊關係嗎？」

幾個人竊笑起來。我發火了，說：「那是保住了我一條腿的醫生。」

另一個人插進來：「你不是還把著她的手教她寫字的嗎？」

我大吃一驚，沒有回答，弄不清他們怎麼知道得這麼多。是我的朋友丁萬林出賣了我嗎？可能。不會，我和格琳醫生的關係中沒有什麼值得報告的。那麼他們是從哪裡得知的？

「俞元同志，請回答問題。」郝超林發話了。別看他不多說話，他卻是負責主持學習班的。他一定事先安排好了會上要向我提出這些問題。

「她是給我治腿的醫生。她從小在中國長大，所以對我們很好。其實她對所有的病人都很好。」

「可她是個美國人，對不對？」炊事班長問道。

「是，她是美國人。」

「你不是還教她寫古詩嗎？」另一個炊事員說。

「老天，這簡直像一場輪番了！你們覺得我們是情人嗎？太滑稽了，我只知道她的姓，連她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我教過她寫字，用古詩當課文，這裡邊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祕密。是裴政委叫我跟她保持密切來往的，好從她那裡得到外邊的消息。」

「多密切？」又有一個人問。

「就是，她給了你什麼？」第三個人插嘴。

「巧克力？」

「煉乳？」

幾個人吃吃笑起來。常明一臉嚴肅地插話了：「我們不應該在這些問題上花太多的時間。裴政委的確希望他和那個女人保持友好關係，俞元同志還從她那裡給裴政委弄到了信紙。」

幾個炊事員哄笑起來。不過常明的話救了我的駕，我忍不住感激地看他一眼。他雖然是個大學生，卻知道怎麼和這些人打交道，他們都喜歡他也尊重他，他這番話讓他們住了嘴。我發覺一道陰影從郝超林帶疤的臉上掠過，可他由著大家請下一個人發言了。

我們需要比別的組結束得早一點，因爲炊事員三點半要開始做飯。學習班結束之前，超林提出一個動議——我應該上繳《聖經》。動議被一致通過，我是唯一沒有舉手同意的人，但也只能服從。於是，我的《聖經》成了隊部的寫字紙。

我心裡非常憤怒。共產黨人就會惡待自己人和親近他們的人。他們的人在別的聯隊裡被人殺害了，這裡卻沒有人檢查一下自己在組織反甄別中的失誤。相反，他們卻開始處治起自己人來。我腦子裡回響起七十二聯隊隊長韓述的話來：「歷史已經證明，共產黨對敵人總是比對自己人要仁慈。只有成爲他們的大敵，你才能體面地活下來。」

第十二章　一齣戲的上演

儘管六零二聯隊的黨組織在戰俘中挺賣力地進行了動員，對團結會最初那股熱火勁兒還是很快就消退了，很多人又變得情緒不穩。很顯然，共產黨打輸了甄別這一仗，在兩萬多志願軍戰俘中，有一萬四千人拒絕遣返回大陸，其中大多數人是自願的——當然，不自願的也有一些。爲了重建大夥兒的信心，振作大夥兒的精神，這裡組織起一個劇團，創作了幾首歌曲，演了一些節目，還有作詩、繪畫、用土造的樂器演奏之類。接下來，有幾個人合寫了一個劇本，叫《華爾街之夢》。有三場、五幕，講的是美國資本家怎麼控制了白宮和國會，怎麼幕後挑起了朝鮮戰爭，打算在世界上稱王稱霸。看過劇本之後，聯隊的首長們打算把它搬上舞臺。眞要演出來，需要有一個戲臺，還得有道具和服裝。但是在這種地方，他們上哪兒去弄這些東西呢？

讓我吃驚的是，那些人眞的動手搭起露天劇場來了。戰俘營大門前是一片空場，有些鼓出來和窪下去的地方，空場的北頭，比其他地方高出來一兩尺。每個大隊派出六十多人來平整場地，又墊高起一塊來作舞臺，這樣所有坐在地上的觀眾也都可以看到表演。三天不到，一個大戲臺子就搭起來了。儘管材料五花八門，汽油桶，石塊，板條箱，帳篷柱子，水管子，帆布等等，這個「劇場」還眞挺像回事，國內的農民秋收大忙完了以後，都會搭起臨時戲臺，請來戲班子在上邊唱大戲，這裡這個戲臺子跟他們那些戲臺子簡直不相上下。我對劇本不太喜歡，覺得它不過是個宣傳用的活報劇，但我對大夥兒籌備上演中的獨創性十分佩服。他們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難，爲演出做好了所有佈景和道具。他們把麵口袋拆開、洗乾淨，用紅藥水或紫藥水染過，再把好多口袋布縫到一起，掛起來就成了大幕；還用綠軍毯做成西裝和美軍軍服。大隊派來些電工給安裝照明燈。爲了達到舞臺燈光需要的強度，他們用自製的一個電阻器——在一個廢舊的水池裡裝進鹽水，控制電流。大多數道具都是用木頭和麻袋做的，當什麼用就畫上什麼；鼓是用去了底的油罐做的，兩頭用雨布緊緊蒙住。兩把「小提琴」也是他們用竹子和木板自己鼓搗的，再拆幾根鞋帶，把裡邊結實的尼龍絲擰成「琴弦」。

這齣戲的導演是失去了右腳的孟飛寒。入伍前，他曾是香港的大學生，很有歌唱家的天分，還會作曲，現在由他教戰俘們演唱和識譜。他教起大家來，從來都是誨人不倦，有三個人正跟著他學作曲。別看他已經瘸了，他比所有人可都活躍得多。每次在舞臺上忙完，他總是滿身大汗。我估計他的傷還沒有完全復元。他排練起來非常嚴格，有一點沒做好，他就讓演員反覆重來，直到他覺得滿意才罷。他強調說，每一個人都要用心去體會自己的台詞，還要熟記。儘管他對大家很苛刻，人們對他卻很尊重。

經過一個星期的排練，這部戲就要上演了。常明扮演杜魯門的角色，他很會表演，在彩排時就常常贏得大家的喝采和大笑。由於大多數角色都是洋人，演員們需要靠化裝來改變亞洲人的外貌，可他們沒有眉筆、沒有油灰，常明便從王醫生那裡討來一些阿司匹林藥片，跟兩個南朝鮮衛兵去換化妝品。他們給了他染料粉、口香糖、雪花膏、石蠟，還有一枝眉筆。演員們把染料粉和醫生給的凡士林攪拌在一起，充當化妝油彩；又專門分派了兩個人負責嚼口香糖，再一塊一塊洗乾淨，然後用它來把演員的鼻子墊高，這玩意又柔韌又有粘性，比過去舞臺上化妝使用的油灰還強呢。

四月二十一號，《華爾街的夢》在六零二聯隊爲六千名戰俘觀眾演出了。在臺上出現的有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兩個參議員，和一個胖乎乎的華爾街銀行大亨。雖然有時候臺詞有些宣傳腔，整部戲還是蠻有趣的。音樂都是用自製的破樂器演奏的，效果不怎麼好，但還是給演出增色不少，尤

其是用臉盆充當的鑼，和用一大一小兩個鍋蓋充當的鈸。燈光也搞得挺是那麼回事，果然根據劇情一會兒轉亮一會兒轉暗。最好看的就是演員的天才表演了，特別是演杜魯門的常明，還有演那個胖銀行家的金尚。他們的表演和對話都很好笑，有時有點粗俗，然而總能抓住觀眾，令大家爆發出大笑。就連崗樓上的美國衛兵也都看入了神，其中幾位看樣子也樂不可支。

常明戴著副金邊眼鏡，他演杜魯門身量有點高了，所以他在整個表演中一直弓著兩條腿，兩隻腳擺成個八字，這姿勢讓他看上去滑稽極了。只聽他對胖銀行家說：「保羅，我們還需要十億美元。」

那個大資本家戴著大禮帽，穿著燕尾服，一手撫摩著大肚子，回答說：「總統先生，我們銀行裡錢也不多啦。去年不是給了你二十億了嘛。」他一邊說一邊把他的文明棍轉來轉去。

「不是讓你白給呀，那是貸款。」

「可我們早已經負擔過戰爭費用了，對不對？」

「好啦，我們現在說的是今年的事。你就不能再給我們一筆貸款嗎？」

「閣下，照這個樣子下去，這場戰爭要不了多少日子就會把我們搞破產啦。」

「得了吧！每次打仗你們都橫財發大了。」

「可我們總得留點本錢好生利呀。」

「豈有此理！我就是你們的本錢，我就是你們投的資，我是美利堅合眾國的總統！」

「可是十億美元我們哪兒受得了哇？」

「這錢當然不少，我們需要在朝鮮半島維持一個龐大的軍隊麼。」

他倆的對話被不期而至的兩位參議員打斷了，這兩人一個留著大鬍子，一個半禿頭。接著談話繼續進行，演著演著，突然一個美國大兵在崗樓上喊起來：「嗨，馮長官，你這可惡的小丑！不許拿我們總統開玩笑！」

經過又一輪的爭吵，億萬富翁讓了步，同意掏出一筆高利貸款。

我嚇了一大跳，以為他是衝我嚷嚷呢。然後我醒悟過來，他只知道常明的化名馮文，和我的化名同姓。另一個美國兵也大吼起來：「杜魯門，滾下臺去！」

第三個人用開玩笑語氣叫道：「嗨，杜魯門，你被開除啦！你要不下臺，我可要對你開火啦。」

不過，他們還算不錯，除了吼叫幾聲，並沒有干涉演出，喊完之後就接著好好看戲了。南朝鮮的衛兵比美國兵看得更認真，他們站在鐵絲網外邊，看得專心致志。大幕落下來時，有人甚至鼓起掌來。

隨後的幾天裡，幾個美國人跟我聊起了這場演出。他們對一群戰俘竟能表演這麼一齣大戲覺得難以置信，而且很驚訝我們到底從哪兒弄來這些道具和服裝。我告訴他們說，很多戰俘本來就是藝術人才，特別是導演孟飛寒，他就是搞表演藝術的。他們一聽就更佩服了，有一個說：「沒想到你們裡頭還有藝術家呢。」他們挺隨意地讓「藝術家」這個詞脫口而出，讓我倒有些驚奇。對中國人來說，只有藝術大師，才會被稱為「藝術家」。

美國人一直覺得我們是一支鄉巴佬的隊伍，更像一大群牲口。這齣戲似乎改變了一些他們對我們的印象。從這以後，我發現衛兵們對那幾位演員同對其他戰俘有點不一樣，對他們更恭敬一點，再也沒有斥罵過他們。這個發現讓我覺得很好玩，因為，在很多中國人眼裡，演員麼，不過是一個戲子，不管他造詣多深，他還是屬於下九流，他只是供人們取樂的，所以遠遠比不上一個軍官或官員威風體面。

第十三章　不尋常的請求

自打我們來到新聯隊，這裡的美國衛兵對我們和善了不少。這主要是因爲我們保持了帳篷的整潔，又不像朝鮮戰俘那麼好鬥。聯合國視察小組造訪過我們的營地，對這裡的秩序和衛生條件很滿意。戰俘們漸漸地跟美國衛兵混熟了，有些人常常溜達到大門口，跟美國兵討支香菸，或觀看他們從小屋後邊爐子上的大鍋裡往外舀咖啡。有幾個人問過我咖啡是個什麼味兒，我告訴他們：「苦味兒，不放糖沒法喝。」按規定，美國大兵是禁止和我們交談的，不過他們很多人並沒把這個規定當回事兒。

我常常去找他們聊天，這是分配給我的任務。在我們隊部裡可以看到美軍的報紙《星條報》，但常常不能按期收到，所以我們對戰俘營外邊發生了些什麼往往沒法及時掌握。我們有幾位夥伴負責打掃和維修美國人的辦公室，他們一有機會，就悄悄地把報紙帶回來。我的任務就是看報，把有用的消息給裴政委和其他首長翻譯出來。對於我來說，這是一件美差，有了這個翻譯任務，我便可以讀到很多新聞，而且讓我感覺到自己是一個挺重要的人物。通過這些報紙，我們得知了關於板門店和平談判的更多情況，交還戰俘的問題在談判中已經提出來了。有篇文章還報導說，中國現在已經有了自己的空軍，經常在北朝鮮與美國飛機交戰。雖說因爲我們的飛行員缺乏經驗，還不能對美軍構成很大威脅，可畢竟是從無到有，大約有十幾個空軍師了，全部配備米格十五式戰鬥機。不過，我們並不知道一個師有多少架飛機，大家常常爲這個數字到底是多少而爭個沒完，有人說是一百架，有人說是七十二架。我還看見報導說，美國士兵都急切地盼著回家，他們一般在朝鮮都不會久待，頂多過一個冬天，這裡冬天的嚴酷是他們受不了的。有篇文章透露，美國部隊中開小差的近幾個月來大量增加，有些美國兵甚至自己把自己弄傷，好逃離前線。

還有些新聞可能會動搖我們同志的軍心，我就沒有全都譯出來。比如，有報導說，北朝鮮和中國軍人在去往戰俘營的路上，曾打死過走不動路跟不上隊伍的戰俘。還有報導說，在志願軍裡正進行著一項祕密調查，目的是「揪出暗藏的反革命」，審查的首要目標，是那些政治背景不清白的新兵，還有從國民黨軍隊裡起義過來的——就像我這樣的。我沒跟任何人提及這個報導。但我告訴了裴政委，毛澤東的大兒子毛岸英，在一次美軍的空襲中犧牲了。裴政委十分震驚，好半天沒說出話來。

「這好像不是意外吧，」我大著膽子說：「美國人的炸彈怎麼扔得那麼準？空襲的當口他在山洞裡呢。」

「這消息別告訴任何人。」裴政委叮囑我。

「我不會的。」

「主席的二兒子有精神病。這消息對他老人家一定是個沉重打擊，他一定會更加痛恨美帝國主義。我看這仗一時半會兒結束不了了。」

我掌握消息來源的能力，使我在六零二聯隊裡地位甚高，坦白說吧，這種小權在握的感覺讓我很受用。不過，最讓我高興的，還是有機會提高我的英語，而且及時掌握從中文來源得不到的消息。每期報紙都足有二十多版，還有很多照片，我讀得很仔細，每個字都不放過。

很快地美國人就發現我們的人在偷他們報紙，就不再把報紙隨便亂丟了。這樣我們的《星條報》就來得更沒個準了，有時候同一期來了五六份，然後又一個星期連一份也看不到。

因此，我常被派去和衛兵聊天。我發現大多數美國兵都話多，無一例外地喜歡讓別人當聽眾，尤其喜歡讓

一個能聽得懂他們話的敵兵當聽眾。有時候，聊了好半天，他們不能不回崗哨了，可沒過多會兒又溜達回來，對著我開始新一輪長篇大論。他們好像也很寂寞，也非常痛恨這個地方。我常常只帶耳朵不張嘴巴，光聽他們說，從他們嘴裡獲得點有用的消息。

搜集情報的不光是我一個人，還有其他幾個消息渠道。掏糞隊幹得最有成效，偷偷往戰俘營裡運進不少報紙和雜誌；因爲他們一過來就臭氣熏天，所以美國衛兵都懶得搜查他們。很多時候，門衛一看見他們過來，憋著氣揮揮手就放他們過去了。每天早上都有十幾個戰俘負責打掃公共廁所，用扁擔把一桶桶糞便挑到海灘，倒到大海裡去。有個矮矮壯壯的淺皮膚黑人大兵，叫吉姆·貝克的，專管押送他們來來去去；他們叫他「中士」，其實他只是個二等兵。吉姆對大家很和氣，喜歡聽點恭維話，大家便一個勁給他灌迷湯，甚至說他是黑人裡長得最俊的，中國姑娘們見了他的微笑，都會爲之丟魂。就連他們管他叫「王八蛋」之類的，他也不以爲忤，總是露出一口白牙地笑著，其實他知道那些罵人話的意思，因爲他在跟掏糞隊裡的一個人學中國話。掏糞隊不光搜集情報，還在各聯隊之間給大家傳遞口信。

有個叫理查德的下士，一雙深陷的藍眼睛，高鼻子兩邊滿是雀斑，要是我沒記錯，大概是姓蘭戴爾還是蘭德爾，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早上值班站崗。他比別的美國兵顯得年紀大一些，家裡還有個女朋友。來朝鮮以前，他是底特律一家農具工廠的技術員。有一天，他給我講他和女朋友在湖邊野營的往事，他們怎麼點起篝火，怎麼把釣來的鱒魚用熏肉的油煎了吃。我再也控制不住感情，蹲了下去，用手蒙住臉。我沒有哭，只是覺得好生淒涼，又不想讓他看見我的一臉悲傷。

「不好受哇，夥計。我知道那不好受——」他帶了感情，一個勁地安慰著。

我不知道他和女朋友有多親密。他的話讓我想起菊蘭，她對我來說遠不止是未婚妻。部隊離開四川的兩天前，她非要和我一起睡覺，說想要一個我的孩子。我想，她大概害怕我一上戰場就永遠也回不來了，所以孩子可以當成我的一部分，永遠陪伴著她。那一整夜，我們近乎瘋狂地一遍又一遍幹那事兒，我彷彿要把自己的一切都傾洩給她，好讓我的一部分留在家裡。她接納著我，帶著極度的渴望，還有熱淚和無聲的激情。第二天早上，她掰斷了白玉簪，交給我一半，垂著眼睛對我說：「從今天起我就是你的妻子。記著，我就是死了，做鬼也跟著你。」我向她起誓，只要我活著，就一定會回到她身邊。從那天起，玉簪子就一直跟著我，每次搜查之前，我都把它藏在腰帶後或鞋子裡。我不知道菊蘭有沒有懷孕，我給她寫過一次信，含蓄地問到過這個問題。我不敢直接問她，因爲我敢肯定所有通信都是要檢查的。每個聯隊大門前都有一個信箱，我們把自己寫的信放進去，可是誰也沒有得到過從家裡來的隻言片語。

漸漸地，我和理查德越來越要好了。他給我香菸抽，還給我檸檬糖吃，若是手邊有報紙，他會從鐵絲網那邊給我塞過來。他似乎很聰明，常常掛著嘲諷的笑容。有天早上，他忽然問我：「馮延，可以幫我個忙嗎？」

「當然，能幫的我一定盡力。」我有些意外，想不出我一個戰俘，能對他有什麼用？

他微微咧嘴笑著，說：「要是這鬼仗又打起來了，我可能就要上前線了。你能幫我弄一張安全證書嗎？」

「那是什麼東西？」

「你不知道？」

「我眞沒聽說過。」

「我也從來沒見過。但是我聽說，安全證書上用中文和朝鮮文寫著『別殺此人，他是我們的朋友』之類的話。」

「幹嘛用呢？」

「你知道，中國人會殺俘虜的。我聽說你們有個當官的槍斃了四十多個美軍俘虜，因爲他一個團的人都在陣地上死光了。要是你能給我弄到這麼一張安全證書，萬一我被俘了，就給他們看看，也許他們就不會打死我了。」

我被他這麼直白的一番話驚呆了，可我什麼話也沒多說，只是答應了他一定幫忙。他這麼坦言道出自己的恐懼，一點兒也不帶羞愧和窘迫，在某種程度上，很令我欽佩，於是我從褲帶裡扯出衣襟，撩起來給他看了那一行刺青——「操共產主義」。他看了大笑起來，說：「夥計，這玩意兒你弄對了！」

他這麼一說，使我想到，我這行刺青，一旦需要時，倒眞可以當個「安全證書」用，就看我怎麼用它了。但我再一想，我已經身在戰俘營裡，生命似乎沒有危險了，可爲什麼裴政委還說這道刺青可能會幫助我呢？怎麼個幫法？我可實在想不出來。

當天下午，我就把理查德的請求匯報給了裴政委。那天晚上，隊部裡召開了緊急會議，我也參加了。幹部們決定，雖然大家都沒見過理查德說的那種「安全證書」，我們還是要製作一份。大夥兒派常明負責這件事。當天夜裡，常明就開始著手設計。他切出一張巴掌大的四方白紙，拿個鉛筆頭，在白紙最上邊畫了一個五角星，然後用正楷寫了以下的字句：

安全證書

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親愛的戰友們：

這名美國士兵自願投降，是我們的朋友，請優待他。

革命敬禮

巨濟島的同志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第二天，我把這張紙片交給理查德，他看也沒看一眼，就把它收進襯衣口袋裡了，收好以後，他舉起手，用拇指和食指捏出一個圓圈，我想那意思一定是說好、或好極了。他問都不問那上面都寫了些什麼，這讓我很驚訝。要是紙片落到他上級手裡怎麼辦？會把他送軍事法庭嗎？我敢肯定，要是一個中國士兵被發現帶著這麼個東西，他起碼得蹲監獄，沒準還要殺頭。

後來有天早上，理查德拉著一張長臉，好像剛剛哭過。我問他幹嘛這麼不高興，他說：「我收到家裡來的一個『親愛的約翰』。」

「那是什麼，一個禮物嗎？」

他臉一歪：「那是我女朋友的絕交信。」

「對不起。」

「一點先兆也沒有哇。」

「她變心愛上別人了？」

「誰知道？」

我嘆了一口氣：「當兵的生死沒個準，女人一般都想過一份安穩日子。」

「全是因爲這場鬼戰爭！」他搖著頭，鼻孔一張一張的。

「沒錯。」

「我不明白爲什麼上這兒來，爲什麼而戰？」

我想說，我知道爲什麼自己會站在朝鮮的土地上——爲了保衛我的祖國。可我沒說。他這麼心煩意亂，我們那天也沒法再聊下去了。

還有一個從美國路易斯安那州來的黑人二等兵，叫弗蘭克·霍爾曼，是個高個子，頭髮硬得像鐵絲，靦腆又溫厚，常常鼻音很重地傻笑，因爲吸食大麻而目光呆滯，像他這樣吸大麻的美國兵很多。大麻這東西在朝鮮和中國東北都瘋長。中國人和朝鮮人都不喜歡吸大麻，我們比較喜歡菸葉，大麻則主要用來做繩子。我跟弗蘭克聊過幾次，他完全不把我當個戰俘，對我的話有問必答。有一回我談起《湯姆叔叔的小屋》，他搖著頭說：「從來沒聽說過。我是不看書的。」

這話讓我很驚訝。我想問問他，當奴隸的是不是眞的都能吃上火雞、火腿肉、餅乾之類的，於是我說：「書裡說，黑奴們吃的是雞翅膀、雞腿、和鹹肉。南方黑人都吃這麼好的東西嗎？」

「當然。」

「你要是想吃，你每天都能吃雞嗎？」

「你知道，雞在我們那邊是很便宜的，大家差不多都吃得起。」

「那吃的東西裡什麼才貴呢？」

「牛排。有錢人到餐館吃牛排。海鮮也貴。」

「你是說蝦嗎？」

「是啊，還有三文魚，小龍蝦，牡蠣，龍蝦。媽呀，我都流口水了。」

我不知道「龍蝦」什麼樣，既然叫「龍」，那這蝦一定個頭不小。可是他說牡蠣是很貴的，這讓我有點意外，因爲我在中國沿海城市裡看見街頭小販賣去殼牡蠣，才一毛多錢一斤。我不喜歡牡蠣，就是白送我也不沾它。我告訴弗蘭克，在中國人眼裡，雞肉是最好的肉，在南方各省，比如廣東和福建，就連雞爪子也是餐館裡一道有滋有味的小菜。他吹了一聲口哨，說：「哥兒們，要不是打仗，我就去做雞肉買賣了，從你們中國佬手裡賺大把票子。」

「當黑人裡第一個百萬富翁，對不對？」

「幹嘛不呢？」

我倆都笑起來。

我還跟他說起我在中國看過的控訴奴隸制的電影《一船奴隸》，可他又沒聽說過。他對書和電影一無所知，但不影響我們聊別的東西。他常給我口香糖，可我能給他的像樣東西什麼也沒有。有一回，他給我一支大麻菸捲，我吸了卻不喜歡。後來他讓我也幫他弄一張理查德那樣的安全證書，兩天之內我就給了他一張，讓他好高興。

因爲紙張短缺，不是誰來要安全證書我們都能拿得出的。要是實在沒有紙，我們就給來要的人一顆紅五星，那是我們的舊帽徽，多少也可以幫上他們點忙。在整個被關押期間，包括後來在濟州島的日子，我們一共給美國兵發出過一百多張安全證書。沒有一個南朝鮮士兵跟我們要過這玩意兒。

第十四章　一次考驗

暮春的一天傍晚，我們被派去卸船。通常我們都不到碼頭上去幹活。七零聯隊的人，綽號「勞工幫」的，才被派去卸貨船，還把卸下來的貨運到倉庫去。勞工幫的人還被派去修路，伐木，採石頭，裝鐵絲網，挖地基，砌磚等等。今天卻有些例外，因爲活兒很急，大船明天一早就要起錨了。去碼頭的路上，我們唱起了「游擊隊歌」，衛兵們一個字也聽不懂，也就沒阻止我們。

碼頭上有很多崗哨。一對探照燈的交叉光柱不停地在天上地下掃來掃去，一排大燈把整個作業區照得雪亮。那天晚上很暖和，暖得人像打了麻藥一樣昏昏欲睡。我們分成四個小組，三個組卸大船，一個組在岸上卸貨。我的腿還不利索，上不了顫顫抖抖的「過山跳」（通向大船甲板的木板），所以跟著第四組卸貨。我們不時要在貨捆或貨箱上戳個洞，看看裡邊裝的是什麼——玉米，大米，花生，香菸，草紙，還有藥品。貨物中間也有水泥和舊衣服包。

我們正幹著，從北邊傳來女人唱小調的歌聲，那聲音多情又快活。我們聽說過，這一帶有不少餐館和妓院，大家都忍不住不時地往歌聲的方向看幾眼。女人的歌聲刺激了我，受傷以來，我第一次感覺到一股強烈的性衝動，連我吸入的空氣似乎都使我的鼻子變得更加靈敏，隔著二三百米，我好像都能聞得到女人身上的肉味香氣。我的脈搏加快，太陽穴突突直跳。在微微的眩暈中，我感覺到渾身血液的奔湧，這讓我非常高興，因爲這意味著我的元氣又恢復了。眞想不到，在食物並不充足的條件下，我竟奇蹟般地復元了。我還年輕，還富有生命力。

船艙裡，甲板上，岸上的貨包中間，戰俘們在不停地搬運著各種包裹、箱子和麻袋。人人幹得汗流浹背，氣喘吁吁。那個紅臉膛的美國衛兵一個勁地衝我們喝：“Pahly, pahly!”那是朝鮮話，意思是「快點！」

一個高個子戰俘把扛著的一個大衣服包往貨堆上一丟，小聲罵了一句「狗娘養的！」說完人就不見了，可能要去歇口氣。

我很好奇，就繞過貨堆，想看看他在幹什麼。只見他扯開褲門兒，對著一捆帆布撒起尿來，小便澆在那上面，發出悶悶的動靜。他剛尿完，就見一個美國軍官從北邊四五十米遠的黑暗裡冒出來，哼著從朝鮮歌妓那裡學來的曲子。看樣子他喝醉了，根本沒看見我們，向水塔底下一排房子那邊趔趔趄趄地走過去，腰裡別著一把手槍。我驚訝地看到，高個子戰俘繞過貨堆，跟著那傢伙去了，和他保持著不到一百米的距離。我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幹嘛，他想幹掉那個軍官嗎？還是想要逃跑？

我不敢久待，又回去幹活了，盡量揀輕一點的東西扛。一邊忙著，一邊忍不住亂猜那高個子在幹啥。常明要是在這裡就好了，我就可以問他。接著我看見超林和一起幹活的另外兩個人嘀嘀咕咕，他是這裡兩百人的頭兒，他們三人正在堆一捆一捆的鐵絲網。和我一樣，他也是巴不得一有機會就走出營房，總在說：「我得出去溜溜腿。」他和我從來沒有親近過，我也就沒有主動上前向他報告，剛才那個戰俘不見了。

大約二十分鐘以後，高個子氣喘吁吁地回來了，兩眼放著光。他對超林說，那個美國軍官沒鎖門就倒頭睡了，他屋裡有把手槍。「我再去把槍拿來吧？」他請示超林。

「你剛才幹嘛不拿來？」旁邊一個人插嘴。

「我拿不準該不該幹，所以先回來請示一下。」

超林說：「我們一定得把槍拿過來，不過，你不要一個人去。俞元，你和他一起去。」

「我？」我嚇了一跳，好幾雙眼睛都轉向了我。

「對，你和他一起去。他在外邊放哨，你進屋去拿槍。」

「要是那傢伙醒了可怎麼辦？」我不懂他爲什麼讓我去幹。

「就用這個幹掉他！」另一個人說著遞給我一根一尺多長的鐵條。

我明白了，超林是要考驗我一下。我別無選擇，只能接受，也就答應了。不過我們還不能馬上行動，因爲碼頭上的崗哨盯得正緊。我們只好先繼續幹活。

十點半以後，哨兵開始打呵欠了，可是戰俘們卻更精神了，圍著哨兵問這問那，要不就抱怨說已經餓得幹不動了。有幾個戰俘想吃點兒花生，但是當班的中士不許任何人拆包。在他們跟中士軟磨硬泡的當口，我和高個子——現在我知道他叫王亞兵——趁亂悄悄溜開了。我們摸到貨堆後邊，避開碼頭上的探照燈，撒腿就跑。我的心怦怦亂跳得像揣著個兔子，步子都邁不穩了。不到五分鐘，我們來到一座小矮房前，房子像是一間民房，陶瓦屋頂。那門確實沒鎖，輕輕一推就開了，接著就聽見那軍官輕微的鼾聲。謝天謝地，他睡得很死。

「你進去吧。」王亞兵悄聲對我說。「要是有人來，我就學貓叫春。」

我夾著鐵條，躡手躡腳地進了屋。桌上的檯燈沒關，上邊罩著一圈兒黃紙。睡著的那傢伙是個小個子，鬍子灰乎乎的，連衣服也沒脫，毛森森的臉衝著黑洞洞的天花板。他微微動了動，磨起牙來，好像在嚼著什麼。突然，他吃吃笑起來，說：「天哪，瞧這亂七八糟的。凱西，能不能給他換副叉子？」我死死定住，不敢再動一步。沒過多會兒，他又打起鼾來。他枕頭邊上，躺著一把滿是污垢的克爾特手槍，還有一支黑色手電筒。我渾身顫抖著拿起手槍，朝門口退去。就在我轉身的當口，夾在胳肢窩裡的鐵條一下子掉在石頭台階上了，王嗆一聲巨響，我顧不得撿它，飛快地逃進黑暗之中。

王亞兵好一會兒才趕上我。他抓住我的肩膀狠命一搖：「怎麼回事？」

「我不知道。」我滿臉是汗，舌頭都木了。

「怎麼好像後邊有鬼追你似的！」

我還在拚命喘氣。他又問：「拿來了嗎？」

「拿來了。」我把槍拿給他看。

「太棒了！」他把槍拿過去，對著天空比畫了幾下射擊。然後我們一起往回走。

我們回來時大家正埋頭幹活，超林看見手槍也樂壞了，他把手槍別在腰帶底下，聽我匯報偷槍的經過。我說我把鐵條掉在門口了，可誰也沒當回事，我也就不多想了。接著，我沒有想過的一個問題來了：我們怎麼把槍帶進戰俘營裡呢？超林簡短地和王亞兵商量了一下，決定讓我帶著它過門衛，因爲我和大半衛兵都很熟。

我卸下槍裡的五發子彈，讓別的人一人拿一顆帶過去。藏一顆子彈並不難，他們可以在通過崗哨那會兒把子彈含在嘴裡。我用一根長鞋帶把手槍捆在我那條好腿的大腿根上，鞋帶另一頭繫在我內褲的腰上。衛兵搜查時一般都不碰我大腿的。

回營房的路上，手槍把我的大腿根磨破了皮，我忍著不動聲色，可走著走著，我不知不覺地還是彎起腿來。有幾個戰俘笑話我的狼狽相，甚至學我走路的樣子。超林瞪了他們幾眼，用眼睛告訴他們不要惹得衛兵注意。幸虧我有條傷腿，平時走路本來也有點兒跛，衛兵就不太注意我的姿勢有什麼不一樣。

大門開了，兩個哨兵開始對每個人搜身。輪到我的時候，我一邊跨步向前，一邊假裝打了個呵欠。哨兵從上到下摸了我的前胸和後背，卻沒碰我身體其他部位。我通過了門衛，大步朝超林走過去，他已經先進去了，

在營裡邊等著我呢。一走進最近的一個帳篷，我趕快解下手槍交給了他。

我的大腿和陰囊都磨破了，可是醫生已經睡覺了，我只好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能上藥。因爲一路這麼彎著腿走回來，我的肌肉也扭傷了。但我心裡很高興，不一會兒就倒頭大睡了。在半睡半醒之中，我看見自己又站在那個美國軍官的床頭，卻怎麼找也看不見那手槍。他突然大叫：「不許拿我的槍！」我嚇醒了，心頭狂跳不止，汗衫前襟讓汗打得濕透。儘管又疼又怕，我還是很高興自己像個戰士一樣經受了考驗，當然，心裡免不了有些疑慮的陰影。不知道這一次考驗，是超林臨時決定的，還是黨組織有計畫的安排？後來我問了常明，他私下告訴我，一個星期前，黨組織的確決定過，一旦碰上機會，就要考驗一下我的忠誠。

第二天早上，一個連的美國兵開進我們聯隊，命令所有戰俘都到帳篷外邊來。他們把整個兵營搜了個底朝天，用刺刀到處亂捅一氣，把所有床墊子都翻了個兒，所有臨時家具都拆了，可什麼也沒找到。實際上，他們是不可能發現那支手槍的，它已經被掏糞隊的人一大早帶出營房，藏到海灘上的岩石縫中去了。美國人搞不清楚昨天晚上出去幹活的都有誰，只抓住了超林，超林卻說人那麼多，他也不能都記住。於是美國兵命令站在人群前排的一些人站出來。大家沒想到會有這麼道命令，都照做了。我在人群後排，心驚肉跳地看著他們。站出去的那些人都是無辜的，很多人昨天晚上並沒有出去幹活。在搜查了他們全身之後，領頭的那個兩個胸兜上一邊掛了一顆手雷的高個子軍官，抓出來四個人，要把他們押往營房門外的卡車。其中的一個人頓時面無血色，大喊起來：「我什麼壞事也沒幹！憑什麼抓我呀？」美國兵聽不懂他的話，只管一個勁拖著他走。

我嚇壞了，不清楚這四個人知不知道手槍的事。那軍官居然沒把超林也拉走。也許他覺得超林是個死硬的共產黨，從他嘴裡橫豎也得不到任何東西。我還擔心，美國人一定拿到我掉下的那根鐵條了，那就是證據，上邊有我的指紋。我急得一脖子、一腦門的汗，也不敢抬手擦一把，生怕引起注意。常明站到前排去，給大家當翻譯，我則站在人群裡一聲不出。

這時候，美國軍官查不出名堂，又氣又惱，開始對我們破口大罵，說要是沒人交代都是誰參與了偷槍，他就要單獨監禁幾個人。「我會一個挨一個地審問，聽明白沒有？」他喊著。「你們這一群賊！沒人像個男人站出來！」

常明根本不翻譯這些話。整群人沒人開口，彷彿誰也不明白他在說些什麼。很多人看著他，一臉不攙假的糊塗。半個小時以後，美國人只好走了。但走前，那當官的警告我們，這次只是調查的開始。

下午，又來了兩個班的美國兵，扛著鐵鍬鐵鎬，還把抓走的人放回來了。四個人都挨了揍，鼻子裡塞著止血棉球，臉腫得像麵包，有一個還青腫著一隻眼。他們都給嚇壞了，以致說不出話來，大家問他們話，也只會點頭和搖頭。我覺得有些過意不去。不過，要是他們知道我是那個盜槍的，一定會告發我的。

我們這邊忙著照應放回來的人，美國兵那邊又在到處亂挖亂刨。一邊幹，一邊把能用上的髒話都用上了，大罵我們把他們累成這樣兒，可戰俘們對著他們吹口哨、揮帽子，越發把他們氣得夠嗆。

他們沒有找到任何武器，連五顆子彈都一顆也沒發現，但是他們搜走了兩把鉗子，給我們造成了點兒小損失。當天晚上，我得到通知，這裡的黨組織對我的勇敢行爲予以表彰，給我記了三等功。我很高興，希望從此後他們不會再對我進行考驗了，讓我的日子好過一些。

在日後的鬥爭中，那把手槍從來沒有派上過用場。槍後來轉到北朝鮮戰俘的手裡，他們已經擁有一些武器了。

共產黨人總是要考驗他們不大信得過的人，戰俘營裡我知道的就有過好幾次這樣的考驗。有個人被指派去火燒戰俘供應倉庫，在黑夜的掩護下，他放的這把火不僅燒毀了整個倉庫，還波及了附近的兩個木料庫。火燄

升空四五十米，四輛消防車不停地從海上抽水滅火，但誰都看得出來大火根本沒法撲滅。這人後來被黨組織記了特等功。算他走運，美國人審問了很多人，沒有查出誰放的火。還有一個人被指派夜裡到倉庫去偷一箱肉罐頭，但是沒有成功，在他從鐵絲網的一個洞裡往回爬的關頭，被探照燈光柱罩住了，他就這樣被崗哨開槍打死。衛兵一定以爲，他不是正在用鉗子剪開鐵絲網，就是打算用一箱炸藥炸開鐵絲網——肉罐頭箱和炸藥箱看上去差不多。我們的確一直計畫破壞鐵絲網，戰俘營裡藏著十幾把大小鉗子，都是戰俘偷拿進來的。敵人也知道這個，經常來查抄這些工具。如果到了不得不越獄的關頭，這些工具是少不了的，所以，黨組織想考驗誰了，就常常命令他去偷工具。

第十五章　會見朴先生

我們和朝鮮共產黨控制的戰俘營之間經常有聯繫。裴政委戴的那塊鋼帶瑞士錶，就是朝鮮同志送的。四月三十日，我們接到他們傳來的祕密口信，要我們派兩個代表，去參加一次重要會議。裴政委派超林和我兩人去。剛開始，我對這個任務感到很興奮，覺得這準是因爲我偷了槍以後黨開始信任我了；可是再一想，我又明白了，能和超林一起去，是因爲我會說英語。我們誰也不會說朝鮮話，裴政委又不想讓朝鮮同志覺得我們都是老粗，一門外語也不懂，所以他派我去掙臉面。

朝鮮戰俘在這裡關得比我們久一些，也掌握更多的資源。人民軍戰俘比老百姓供應都好，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比缺醫少食的南朝鮮部隊過得還要好些。北朝鮮的同志總可以用衣服跟村民換泡菜和豆瓣醬吃，他們的地下管道還使他們與國家領導人保持著聯繫。

作爲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凡是要開跨聯隊的會，各聯隊的代表就會裝病，好獲得許可到第六十四野戰醫院去，會議通常就在那兒舉行。醫院裡有很多朝鮮醫護人員，共產黨控制了醫院裡很大一部分機構。五月一日，我們隊的王醫生給超林和我開了就診單，衛兵便放我們出門。超林對戰俘營很熟悉，因爲他經常走出營房，去跟戰俘營管理當局打交道。他看上去身材矮小，活像隻瘦雞，卻具有鋼鐵般的意志，爲六零二聯隊六千人說話，常常和美國人爭執不下。超林是副聯隊長，可正聯隊長趙騰不善言辭，而他卻善於演講，很能抓住聽眾。我對他的口才和經驗十分敬重，可是我跟他在一塊兒就心裡發毛，說話、做事處處多帶上幾分小心。

醫院設在戰俘營內，是專門給戰俘看病的，共有八個帳篷、兩座小住房和三個工棚。兩個朝鮮同志在一個小房子後面迎接我們，他們都三十歲出頭的模樣，其中一個臉頰豐滿，這在朝鮮人中間並不多見，另一個人比較秀氣和柔弱。我們在後院裡坐下，只見垂柳之間伸出來的鐵絲上晾著洗乾淨的被單，把院子遮得嚴嚴實實。一架秋千在微風中輕輕搖擺著，好像房子裡住著孩子。超林以前見過他們，向我介紹說這是李同志和崔同志，都是朝鮮人民軍的校官。那個臉頰豐滿的崔中校，恰好也上過大學，是歷史專業的，會說一點兒英語和俄語。李少校沒上過大學，但他在東北的抗日游擊隊裡打了十多年仗，中文說得很漂亮。他們都比別的戰俘看上去要氣色好些，顯得很放鬆。進來的當口，我注意到有兩個年輕的朝鮮女護士在前廳辦公室裡疊消毒繃帶；實際上，她們是給我們放哨的。她們不時地哼起一首歌，笑聲也顯得無憂無慮，她們令人愉快的聲音時常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會議時間不長，在後院待久了並不安全。然而朝鮮同志告訴我們的計畫，讓我們十分震驚：他們打算綁架美軍在巨濟島的指揮官貝爾將軍，希望中國同志予以配合。這眞是個大膽的計畫！

「我們怎麼協助你們呢？」

他們希望，我們先要求貝爾到我們聯隊來對話——他來談時，一定要麻痺他，不能讓他起疑心；這樣，到他們再要求跟他對話時，貝爾將軍就會放鬆警惕了。超林提議說，如果貝爾將軍眞的到我們聯隊裡來對話，乾脆就由我們把他扣住。可李少校說，他們那邊已經安排好了，而且他們的「武裝」比我們的更強大。他解釋說：「要是美國人報復的話，不應該再由你們首當其衝了，你們已經做出很大的犧牲。」他一定是指我們從中國開赴朝鮮來作戰。超林便沒再堅持，答應配合他們的行動。

談完以後，他們把我們帶到廂房裡，給我們引見了朴先生——朝鮮戰俘的最高首長。朴先生坐在光滑的地板上，是一個個子不高、卻很壯實的人，穿著粗花呢上衣。臉色蒼白，卻有一雙銳利明亮的眼睛。幾個軍官坐在他周圍。他與超林和我握了手，遞給每人一支香菸，我們貪婪地吸起來。他竟然有美國的「好運」牌香菸，這讓我暗自稱奇。他跟我們說話時，李少校給我們當翻譯。他首先感謝我們送給他們的手槍，就是我偷來的那支。然後他說：「我們從心底感謝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志願軍。你們是最親密的戰友，爲我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爲我們受了苦。我們向你們致敬。」

超林回答說，我們面對的是共同的敵人美帝國主義，我們到朝鮮來，實際上也是爲了保衛自己祖國而戰。我很佩服他此時此刻的神態自如，好像我們的級別並不比主人低。接著朴先生談到扣押貝爾將軍的意義——這起事件必將震驚世界。他說，金日成將軍命令他們開闢戰俘營中的「第二戰場」，我們此舉一定會讓敵人狼狽不堪的，同時也將揭穿他們所謂人道對待戰俘的謊言。而且，這一行動的成功，還會給我們在板門店的談判增加籌碼。超林答應他，一定向我們總部匯報他們的計畫，而且我們會盡一切可能配合他們。告辭時，朴先生與我們緊緊擁抱，說我們一定很快就會再見面。

送我們出來時，崔中校用英語對我說，朴先生在莫斯科留過學，曾是朝鮮黃海北道的委員長。在戰俘營裡，他是總指揮。我們問崔中校，他這麼高級別的首長，怎麼會被俘呢？崔中校沒有解釋，只是神祕地微笑。朴先生在這裡仍然像一道之長一樣，發號施令，威風不減，受到嚴密的保護，這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神態中有一種平靜的自信，彷彿是他自己，而不是美國人，才是戰俘營的主管。

那天晚上，在裴政委的主持下，我們在隊部召開一次會議。裴政委坐在用一條毯子蓋在八個紙板箱上拼成的「桌子」前，時不時朝一個破舊瓷碗裡磕一磕菸灰，手背上暴著青筋，拇指根上有一道傷疤。他對朝鮮同志的計畫似乎並不熱心，眉頭緊鎖，顯得心事重重。他那雙褐色眼睛一盯上我，我就有被他看穿的感覺。他並

沒有明確表態，可是在開會前，他曾對我和超林提及此事，說朝鮮同志「太魯莽了，但願他們知道怎麼應付這個行動的後果」。我聽不明白，卻不敢問他這話裡有什麼深意。

大家聽了我們的匯報，都爲朝鮮同志的計畫興奮不已。裴政委指示我們，明天就舉行示威，然後就開始絕食抗議。同時，祕書組一定要收集戰俘營方面虐待戰俘的證據，這樣，貝爾一落到朝鮮同志手裡，我們就能夠控訴他的罪行。會後，常明起草了兩封信，一封是給板門店談判中我方代表的，另一封是給國際紅十字會的，控訴戰俘們所受到的虐待，要求美國人歸還所有死在戰場上的志願軍戰士遺體，停止對戰俘營中親國民黨勢力的暗中支援，採取措施制止暴力行爲並嚴懲兇手。歸還遺體的要求出乎我的意外，因爲我記得，自從一九五一年春天開赴前線，我們師戰死的同志都是就地掩埋，在空襲中遇難的同志都被留在荒郊野外了，肯定沒有一具遺體被送回了中國。

常明和我都是戰俘營裡的翻譯。我的口語好一些，所以和美國人打交道時都是我出面。他是黨員，可以出席黨的祕密會議，而我卻沒那個資格。我們兩個很合得來，經常一起互相打氣，所以我對黨內的情況也知道不少。

第十六章　貝爾將軍

第二天下午，我們鄭重其事地去找負責看守我們聯隊的伊斯特中尉，交給他一封信，要求改善戰俘營的生活條件，並要求同貝爾將軍當面對話。我花了整整一上午把這封信翻譯成英語。常明這傢伙神通廣大，用一件美軍大衣，跟南朝鮮衛兵換來了一本英日詞典，反正我們能夠猜出日本字的意思，這本詞典就派上了大用場，要沒它，我還眞沒辦法把任何正經八百的公文，準確地翻譯成英文呢。

我們交上去的信沒有得到答覆，於是從第二天起，示威開始了。示威的隊伍每隊六百人，三隊人馬輪班來，在戰俘營南角一片空地上高喊口號，手裡舉著的標語牌上用中文和英文寫著：「維護日內瓦公約！」「反對虐待！」「停止暴力！」「嚴懲兇手！」等等。衛兵們如臨大敵，但也有幾個嘲笑我們的行動，還對我們豎起中指，表示侮辱和蔑視，有一個甚至喊道：「好啊，想叫我們對你們好點兒，先讓你們的毛主席簽署日內瓦公約吧！」

我沒有給我們的同志翻譯這些話。以前我從《星條報》上讀到過，中國和北朝鮮都沒在日內瓦公約上簽字，美國倒是簽了，可國會還沒批准，對於美國軍隊是否應該受公約限制，國會裡是有爭議的。中國戰俘都不了解眞相，對他們很難解釋得通；再說，首長也不想讓大家知道這些事兒，認爲最好啥都不知，才能啥都不顧，豁出命跟美國佬鬥。

下午快三點時，一個矮個子的軍官來了，旁邊跟著瘦高的伊斯特中尉。矮個子自我介紹說，他是利奇少

校，「我代表貝爾將軍，有什麼話你們可以跟我說，將軍這會兒正忙。」不知怎麼，他的細長臉讓我想起耗子來。

「我們只和貝爾將軍當面談。」第三隊的隊長丹偉把他頂了回去。

我向利奇少校翻譯了丹偉的話，然後他再說什麼我們都不再理他了。六百人站在一起，兩手交叉抱在胸前，任憑少校連哄帶嚇唬，就是不爲所動。半個鐘頭後，利奇無奈，氣鼓鼓地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們的絕食抗議開始了，大家不再到院子裡示威了，只有二十幾個人站在大門口警戒。我們把飯盒、飯碗都掛在鐵絲網上，來表示我們不再進食的決心。上午，送糧的卡車開來了，裝著一大車大麥和菠菜蘿蔔，但是被門口擔任警戒的戰士給攔住了，所有糧食蔬菜只好都卸在大門外邊。超林和我找到伊斯特中尉，要求他通知貝爾將軍，除非他親自會見我們的代表，我們的絕食不會停止。我們只相信貝爾將軍本人，因爲只有他，才能確保我們的安全。

伊斯特中尉吐出一口唾沫，說：「你們不吃嚇唬得了他媽的誰？愛餓到什麼時候餓到什麼時候。我才不給你們傳話呢。」

他的強硬態度讓我們擔起心來，可裴政委卻叫我們耐心一點，他說，伊斯特中尉嘴上這麼說，其實諒他不敢不把我們的要求向貝爾匯報。常明和我都很著急，兩人私下裡悄悄議論，朝鮮同志幹嘛不自己直接實施這個計畫呢？幹嘛要兜這麼個大圈子、拉扯上我們呢？他們自己要求貝爾將軍到他們聯隊去，然後扣起他來，不就完了嗎？他們大概是底氣不足，就把我們也拉上，好壯大聲勢吧。那爲什麼他們不採取風險小點兒的行動呢？像抗議啊、示威啊，這回他們弄不好會吃不完兜著走了。

正如裴政委預料的，第二天上午，一輛吉普車開到大門口，裡邊坐著貝爾將軍和利奇少校，後邊跟著一輛十輪卡車，裡邊有二十來個美國兵。我被叫到隊部等著，常明則被派去跟美國人接洽，請將軍到祕書處的帳篷裡來說話。沒過幾分鐘常明回來了，帶來伊斯特中尉的口信，他一定要我們出去，就在大門口跟將軍談。這樣，超林、我，還有其他六個人只好一塊兒來到大門口，衛兵令我們在門裡邊站住。

伊斯特中尉到吉普車跟前向貝爾將軍通報。貝爾長得挺結實，紅光滿面，四十多歲，足蹬一雙鋥亮馬靴，戴著一枚鑽石戒指，看上去好生文雅。從他帽簷兒下面，可以看見幾絲白髮。他爲這次會見似乎還認眞打扮了一番，連帽徽都閃閃發亮。矮個子少校跟在他後邊，胳臂底下夾著個公事包，手裡拿著一本老厚的書。卡車上的美國兵也全都跳下車來，手持M1加蘭德半自動步槍，兩面閃開，排成扇形。超林對我說：「你看，他們眞怕咱們會傷害貝爾呢。」我們走近前去，與貝爾等人相見。

隔著鐵絲網，超林發了話：「歡迎你，貝爾將軍。謝謝你抽時間親自前來見我們。」

我翻譯了他的話。貝爾點點頭，有些自得地笑著說：「我對你們中國軍人是很尊重的，你們這裡又是守紀律、講衛生的模範聯隊。現在你可以說說你們的不滿了。」

超林也笑笑說：「我們想請你來看看這裡普遍存在的營養不良情況。很多不能下床的傷員都需要醫療和照顧，可我們這裡卻缺醫少藥。吃不到足夠的蔬菜，很多人得了夜盲症、牙床潰爛、腳氣、皮膚病等等。我們希望你們遵守日內瓦公約，人道地對待我們。」他對戰俘們身體狀況的這番話基本上說的是實情，很多人一到晚上就什麼也看不見，只看見眼前一道黑牆，有些人的傷一直就沒好，又流血又流膿的。

將軍清了清喉嚨，說：「我們一向遵守日內瓦公約，雖然我手頭的人力和物力都不足，我們還是盡了最大可能遵行所有條款。現在，我先讓部下把公約有關條款給你們念幾段，好給你們提個醒。」

利奇少校鄭重其事地打開了手裡的綠皮厚書，用他的男低音讀了起來。我不必翻譯，因爲超林對已經譯成

中文的有關條款很熟悉。在利奇少校念的過程中，貝爾將軍顯得心不在焉，不停地換腿，然後，讓我目瞪口呆的是，他居然從口袋裡掏出一把指甲刀，摩摩擦擦地銼起指甲來，手背上盡是棕色汗毛。

這些條款我們早都爛熟於心了，所以誰也沒去聽少校念些什麼。美國人早已把國際法的有關條款用中文和韓文貼在每個戰俘營了，他們還給每個小隊都發了一本手冊，也是這些內容。沒看到小冊子之前，我們聽說過日內瓦公約，但那公約裡的內容，我們是不知道的，所以說，美國人這一點還是值得稱讚的，等於給我們送來了「彈藥」。經過逐條研究，我們首長發現，美國人觸犯了第一一八條款。這一條款說得清清楚楚：「一旦戰事停止，所有戰俘應儘快被釋放和遣返。」不過，這條規定是三年前起草的，當時世界形勢哪有今天這麼複雜，沒有一個交戰國能夠想像我們今天的局面——三分之二以上的戰俘不願返回祖國。儘管如此，我們還是一有機會就照樣援引第一一八條款來對抗美國人，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都能佔上風。

除了遣返，我們首長還在其他一些問題上譴責美國人違反公約。說公道話，我並沒覺得美國人對我們有多不好，至少我們有帳篷住、有飯吃，大多數傷員也得到醫治，雖然條件有待改善。六千人擠在一個並沒多大的營地裡，卻沒有流行疾病，就多虧衛生措施得力。有些戰俘甚至臉色紅潤，尤其是當炊事員的，眼見著還長胖了一點。我們常常開玩笑說，戰俘營的廁所比我們在中國軍營裡的都高級，裡邊安了抽水馬桶，當中還有洗手設施——水泥的圓臺子上裝了自來水龍頭和金屬水池。總的來說，我不能不承認美國人是很慷慨的，至少在物質上是大方的。除了食品，每個戰俘一個星期至少可以得到一包香菸，有時候還可以得兩包。在釜山戰俘醫院裡，美國醫護人員怎麼給傷員治療，我是親眼看見的。在這邊的每個戰俘營裡，聯合國都實施了大眾教育計畫，給戰俘提供圖書，開設了教技術、科學、基督教的課程，還常常放電影。可惜我們聯隊由於在共產黨控制之下，無福享受這樣的教育計畫。任何時候你報告說丟了毯子或床墊，都可以再給你補發，因爲本營地裡就儲存了備用的，有時候還發軍服。這麼個補給法，在我們自己的部隊裡是想都不敢想的，你丟了東西，你就要受處分。在中國的時候，我從來沒聽過哪個當兵的丟了背包行李的。

超林的嘴是不饒人的。少校剛一念完，他就開口了：「很顯然我們的待遇達不到公約規定的標準。例如，我們中國人是不吃大麥的，在我們家鄉，那都是餵雞鴨的，可你們把大麥給我們當主食，而且常常分量不夠，一人一天才兩碗，根本不夠人身體每天需要的卡路里。還有更糟的——我們幾乎吃不到蔬菜，肉就更別提了。要是你們國家有困難，請你們通報給我們國家，我敢保證我們國家會給我們送來幾船大米白麵，魚蝦肉蛋，而決不會讓我們挨餓的。」

他說大麥的那幾句話完全是瞎話，中國人才不會給家畜吃大麥呢，大麥雖然比大米差點，可總比苞米高粱味道強多了，北方農村裡人們的主食就是苞米高粱。貝爾將軍聽完我的翻譯，漲紫了臉說：「我會考慮中國人通常的伙食習慣，爭取解決這個問題。要是你們總覺得吃不飽，我建議你們現在就停止絕食，絕食只會增加你們的飢餓，而且還浪費糧食。至於醫療條件，我會想想能怎麼辦。」

超林回答說：「那太感謝了。若是你同意著手改善我們的生活條件，我們很樂意結束絕食。」

貝爾將軍站直了身子，滿口答應：「我保證，說到做到。」

超林和另外幾個同志交換眼神，然後說：「我們樂意相信你的誠意，將軍。你親自前來，我們眞心地感謝您。」

「這意思是說，你們會宣佈停止絕食了嗎？」

「對，我們今天就宣佈。」

「好極了，很高興見到你們並和你們對話。」

「謝謝，將軍。」

貝爾滿意地點頭微笑，告別離去。只見他坐進吉普車，揚長而去，路坑裡的泥水被車輪濺起老高。

離大門不遠的地方，一個穿著白縐紗裙的中年女人蹲在一個垃圾堆旁邊，用一個二尺來長的小鋤頭在挖著什麼。她是個瞎子，可她天天上這兒來，東刨西找，尋摸能吃的東西。她脖子上有一道很深的傷疤，身邊放著一個葫蘆瓢，還跟著一個四五歲的小姑娘。小女孩的頭髮給剪得只齊耳梢，舉著一根狗尾巴草，上邊穿著一串螞蚱。一時間，我恍惚回到了自己的童年，那時候我和幾個小夥伴一起，常常到野地裡捉蟲子，還把牠們燒了吃，知了和螞蚱是我的最愛。女人呼喚女兒的聲音一下子打斷了我的白日夢，只見她問孩子，手裡抓到的是什麼。孩子告訴她，是一塊蘿蔔皮。女人又把東西舉到鼻子底下聞了聞，慘淡地微微一笑，把那東西放進葫蘆瓢裡。

不管我們的境況多麼糟糕，世上總有比我們還慘的人。這個瞎眼女人的影子，過了很多很多年以後，還是會出現在我的眼前。在我失去勇氣的關頭，我會想起那個飽受戰亂摧殘的女人，和她對著一塊蘿蔔皮那苦澀的微笑。這時，我的胸間就會重新燃起活下去的渴望。

「喂，咱們走吧。」超林的話，把我的思緒又拉回戰俘營。我們一起返回指揮部，向首長報告談判的經過。聽完我們的陳述，人人都很興奮，有人還覺得貝爾將軍簡直就是頭蠢驢。可我卻覺得他似乎是一個可敬的人，也許，有點兒天真吧，他是不可能看穿我們詭計的。我還覺得十分悲哀，因爲貝爾將軍許諾要改善我們生活條件，可在他被綁架以後，那就全等於零了。

常明用一張橫格紙，把我們與貝爾將軍會面的情況寫了一個簡短的介紹，尤其是將軍當時的態度和戒備的程度。這份情報當天晚上就給送到朝鮮同志那裡去了。

第十七章　扣押貝爾將軍

五月七日晚上，利奇少校坐著吉普車來了。他要我們馬上派兩個負責的跟他走，去關押朝鮮戰俘的七十六聯隊。

「幹什麼去？」我們問他。

他說，貝爾將軍要召集一個會，從各聯隊邀請代表參加。超林心照不宣地朝我咧嘴一笑，露出他潰爛的牙床。我們估計一定出大事了，趕快回到指揮部，向裴政委報告新進展。裴政委派超林和我跟利奇少校去，因爲我們兩人既見過朝鮮同志，又見過貝爾。我們帶上了頭天晚上寫好的抗議信，和列舉美國人罪行的備忘錄，常明還允許我帶上那本英日詞典，就出來與利奇少校會齊。就在要動身那一刻，裴政委的勤務員跑出來，揮手叫住了我們，他跑過來遞給我們兩人每人一枚勛章，我們一邊別上，吉普車一邊開上了路。

天正颳著小風，北邊天空中的陰雲你追我趕，好像在跟著我們。煙霧濛濛的黃昏裡，成團的小蚊子不停地往我臉上撲。一群海燕尖聲啼叫著在狂吞蚊子和小咬，一下飛高又一下飛低，活像一群在空中作戰的微型飛機。路兩邊，各種顏色的金達萊（在中國，我們叫它杜鵑花）一叢一叢地開得正旺，黃連花星星點點撒滿稻田，不過，一半的土地無人耕種，野草叢生。吉普車剛剛從一個牲口飲用的池塘旁邊駛過，我們就看見各戰俘營裡的朝鮮戰俘大群大群地聚集，他們手挽手站在一起，有節奏地搖晃著，唱著戰歌。一看見吉普車，有些人還揮起了旗子，多數旗子不過是一件沒了形狀的舊衣服。人群高喊著口號，好像知道有什麼不尋常的事情發生

了。

快到七十六聯隊時，吉普車速度放慢了一點，路上排滿了美軍的坦克和裝甲車，車頂上都架著機槍，周圍站滿荷槍實彈的軍警和數百名海軍陸戰隊員。在一輛輕型卡車前面，一個報話員正對著報話機大喊大叫，報話機架在車頭上，天線在他頭頂顫顫搖搖。當我們的車從他們身邊馳過去時，我覺得我們簡直像貴賓一般——所有的朝鮮人和美國人都目不轉睛地看著我們。快到七十六聯隊大門時，坦克和士兵更多了，崗樓上打出來的探照燈光柱，在海軍陸戰隊員的鋼盔上晃來晃去。沿著鐵絲網還放了一串可攜式泛光燈，還有一臺發電機在不知什麼地方正轟轟地響著。聯隊大門旁邊掛著一塊巨大的白布——看樣子是把多條單子拼縫到一起來的，有近兩米寬，九米多長，上面用蹩腳的英文字寫著：「我們俘虜了貝爾。只要我們的要求能夠滿足，他的安全就有保障。如果出現任何野蠻行動，比如開槍和轟炸，他的性命不保！」那個驚嘆號，足有字母的兩倍大。這個條幅肯定花了他們大量勞動，對朝鮮同志準備工作之充分，我眞是佩服極了。

吉普車在戰俘營門口停下來，我和超林走進戰俘營，利奇少校則留在了車裡。只見裡邊到處燈火通明，一百多名身穿寬鬆軍服的朝鮮戰俘兩旁列隊，鼓掌迎接我們，有幾個人揮著手中紙紮的小小的中國國旗和朝鮮國旗。我們一直往裡走去，只聽眾人用生硬的中文喊起口號來：「朝鮮，中國！」「金首相，毛主席！」「中國同志，熱烈歡迎！」

我們不會朝鮮話，但我們太激動了，也喊起來：「向朝鮮同志們致敬！」「團結起來像兄弟！」「打倒美帝國主義！」我們身後傳來美軍的斥罵聲，提醒了我現在所有的槍口都對著我們呢。

我們被帶到爲各聯隊的代表準備的帳篷裡，我們很意外地看到，還有三位年輕的女代表。我們和大家一一握手，還和一些同志像久別重逢的老朋友那樣熱烈擁抱。整個帳篷裡朝鮮話、中國話響成一片，這聲音讓我微微暈眩。在周圍歡樂氣氛的感染下，我也非常激動。所有的人都眉開眼笑，親切得不得了。接著，崔中校給大家詳細描述了他們活捉貝爾的經過。

到五月七日爲止，七十六聯隊的示威活動已經進行了兩天，要求與貝爾當面對話。下午一點半，在一個排衛兵的護衛下，還是由利奇少校陪同，貝爾將軍終於來了。他們一起來到戰俘營大門口，準備在那裡與朝鮮同志對話。他們朝門口走來時，美國兵全都在後邊跟著。朝鮮同志指著那一個排全副武裝的衛兵質問貝爾：「這是幹嘛？我們不明白，爲什麼你一個堂堂美國將軍，會害怕我們這些沒槍沒炮的戰俘？」貝爾看了衛兵好一陣，又轉身看了看營地裡邊，便示意美國兵後退，和大門保持一定距離。跟在他身邊的只有利奇一個人。

朝鮮同志列舉了戰俘營當局一系列違反日內瓦公約的行爲，接著他們要求貝爾認罪。剛開始時，貝爾很當眞，先讓利奇少校給朝鮮同志念幾段日內瓦公約的相關條款，又試圖反駁朝鮮同志的譴責。但是隨著朝鮮同志沒完沒了的指責，他開始煩躁起來，於是站到一邊，讓利奇替他回答問題。他點了一支香菸，心不在焉地只管抽菸；時不時喪氣地搖搖頭。漸漸地，四五十米開外的美國兵放鬆了戒備，開始交頭接耳起來，隊伍也有些亂了。

這時，掏糞清潔隊的人從聯隊裡邊出來，向大門走過來，每人挑著兩大桶糞便。大門爲他們打開了，美國兵都捂著鼻子站到一邊去。就在最後一桶剛出大門，這些由戰俘突擊隊員化裝的清潔工突然把擔子一扔，一擁而上，抓住貝爾和利奇就往戰俘營裡拖。利奇對美國衛兵大喊救命，兩手死命抓住了大門上的一根斜木不放，朝鮮人只好鬆手把他放了。可貝爾的手腳沒有利奇那麼利索，就被拉進戰俘營去了。戰俘們立刻閂上了大門。

整個過程發生得如此突然，美國兵一時都沒回過神來。等他們終於反應過來這是綁架，一起向門口衝過來

時，已經遲了一步，只看見身強力壯的四條大漢拖著貝爾朝附近一個帳篷去了。貝爾扭頭對衛兵大叫：「快來救我！媽的，快來呀！」

「站住！站住！」利奇對著那四個人大喊。衛兵都舉起了槍。

兩個朝鮮人跑過來，展開寫著英文字的大條幅。接著，一個大隊的戰俘，足有七百多人，衝到院子裡，都舉著自製的武器，準備和美軍對抗。利奇少校趕快命令美軍不要莽撞開火，否則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長官消失不見了。在帳篷的門口，貝爾連吼帶罵，就是不肯進去，四條漢子只好把他抬進去，他的兩腿離地，還在亂踢亂蹬。

警報一聲接一聲地響起來。半小時不到，海軍陸戰隊的坦克和裝甲車就包圍了戰俘營，一架飛機在戰俘營上空盤旋。美軍命令戰俘們立即釋放貝爾將軍。敵人此時一片慌亂，不知道怎麼應付這樣的局面，好像難以決定是和綁架的人談判呢，還是按兵不動，靜觀其變。

一個小時以後，一名戰俘來到大門前，向一名美國軍官遞交由貝爾簽了字的一封信，信顯然是朝鮮人寫的，內容如下：

我命令你們決不要對朝鮮戰俘開槍，這樣我們就能避免危機擴大，也保證我的安全。我同意舉行一次各戰俘營代表參加的會議。我還同意討論所有可能性，尋求問題的解決辦法。請軍隊離開七十六聯隊。請務必撤走！

馬修・貝爾將軍

但是所有坦克和美國兵都留在原地，沒有挪窩兒。又過了四十分鐘，第二封信又送出來了，這次是貝爾親筆寫的了。他命令外邊的部下給七十六聯隊營內接一根電話線，從現在起，要嚴格按著他的指示行事。另外他還列了一個單子，上面要的幾樣東西要立即送來，其中有毯子、罐頭肉、大米白麵、鉛筆、鋼筆、拍紙簿、香菸、折疊桌、折疊椅，還有幾樣他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代理指揮官富爾頓將軍，是緊急趕來暫時替代貝爾的，他是貝爾的朋友，兩人都是維吉尼亞軍事學院的畢業生，此時他完全遵照貝爾的要求，要什麼給什麼。幾輛吉普車分頭出發，到各個聯隊去接戰俘代表。接著一輛卡車給貝爾運來了私人用品，甚至還送來了礦泉水和一座簡易廁所。傍晚時分，更大的卡車開來了，運來了開大會需要的東西。

在一排營房後邊，專門給貝爾搭起了一個帳篷。門前插著八面自己做的紅旗，在微風中輕輕飄拂，旗上都是白色圓圈裡面有一個紅五星的圖案。帳篷周圍佈置了十幾個崗哨，手裡提著棍子，削尖的竹竿，長把鋤頭，或鏟子。其中一個顯然是頭領，腰裡別著一把閃亮的鐮刀。朝鮮同志讓超林和我進帳篷裡去看看，門口的衛兵替我們掀開了門簾。老天哪！裡面佈置堂皇，讓我大吃一驚，不僅全套家具應有盡有，還分成四五個隔間；整個地面都鋪上美國軍毯，就連牆上都用軍毯遮起來了，不然夜間帳篷裡會太涼。帳篷最裡邊一塊地方拉起一道白布簾，裡邊是盥洗室。最外邊的一塊地方，當中放了一張挺光滑的辦公桌和四把椅子；桌面上擺了個啤酒瓶，裡邊插著一把野百合花，紅白相間，像是剛從地裡摘來的，新鮮得有些花骨朵兒還沒開呢。帶屏風的另一角，放了一張帆布床和一個床頭櫃，櫃上放著將軍的眼鏡和軍帽。布簾沒有拉上，我們可以看見貝爾閉著眼睛躺在床上，臉拉長了，也更鬆弛了，好像一下子老了不少。我們倆沒有驚動他，但我敢肯定他知道有人進來了。

和朝鮮軍人在一起時，我發現他們做事比我們講究。比方說，軍官中的等級差別，從他們肩章上的槓和星，就一目了然。就連士兵之間的等級，也可以從袖子上的條紋識別出來。朝鮮人民軍軍官的軍服也比我們的要體面得多——帶帽徽的大蓋帽，大肩章、黃銅釦的制服，長筒皮靴，褲子有綠色或藍色，沿褲縫是一道紅條紋，亦步亦趨地模仿蘇聯軍隊。我們卻相反，當官的不佩帶任何標誌，官兵從服裝上幾乎看不出區別。頂多首長的衣服褲子是毛料的，有些人穿皮鞋。至於士兵和下級軍官，一律是棉布軍服，帶護耳的繫帶棉帽，帆布膠鞋，看上去土氣得很，所以前線的美國兵管我們叫「洗衣工」。一穿上冬衣，我們看上去倒是沒什麼人顯得太瘦了。

貝爾將軍對他「牢房」的條件也感到意外，第二天早上，在和富爾頓通電話時，貝爾將軍告訴他：「我在這裡過得像個皇帝。」的確，他的住處簡直像個蒙古王公的蒙古包，也許比那還豪華。還有，他的廚子一天三次往這裡給他送飯，每天早上，兩個美國勤務兵可以進來伺候他，打掃衛生。貝爾簡直像是到這裡來度假，在湖邊或山裡野營的，只不過他的臉板得死死的。

正當我倆沒拿定主意是應該上前、還是退出去的當口，貝爾睜開了眼睛。但他並沒有起身，好像在想什麼想得出了神，然後他又把眼睛閉上了。我們朝他走近一些，只見他的大塊頭身軀把小床快壓到地上了。他軍服最上邊的兩個釦子不見了，帶一顆星的右肩章被撕得鬆掉了，只剩下幾根線與肩膀勉強連著。眼前的這個人，和幾天前那個來跟我們對話的體面將軍簡直判若兩人。

「咱們應該跟他說幾句話。」超林小聲對我說。

我們上前幾步，將軍卻動也不動。我拚命在猜他幹嘛這副樣子，氣壞了？耍傲慢？更可能是出於對形勢的無法掌握吧。他和守在戰俘營外邊的部下一樣，對這次綁架一定也是毫無對策。超林和我又互相看了看。他笑了笑，伸出舌頭，把頭一歪，示意我該開口了。我彎下點腰去，說：「你好，貝爾將軍，我們看你來了。」

「噢，謝謝，謝謝你們。」他睜開眼，只見一雙眼睛佈滿血絲。他坐起來，用手指梳了梳自己稀疏的頭髮，又把兩腿放到地上，好站起來。

「不用站起來了，」我對他說：「我們是中國戰俘營的代表，四天前咱們見過面。」

「是嗎？哦，對，我還答應給你們解決一些問題的。」

他竟然沒有認出我們來，這讓我很吃驚。通過我的翻譯，超林對他說：「現在我們想看看你的行動。不要到頭來，你的人往我們營房裡扔毒氣彈、還開槍打人，問題根本沒得到解決。我們不想再看到那樣的結果了。」

「那種事在這裡從來沒發生過。」貝爾說得不錯——那種暴力在朝鮮半島上發生過，但在這個島上卻從來沒有。

「但是你的人經常毆打戰俘。」超林搶白說。

「如果有那樣的事，我要加強軍隊裡的紀律。」

「我們給你這樣的待遇，你有什麼可說的嗎？」

將軍一臉迷惑，沒有想到朝鮮人也代表我們中國戰俘。我對於超林把志願軍戰俘也包括進去的這個「我們」，也覺得有點吃驚。貝爾很快明白了這問題的意思，囁嚅地說：「是，我可以說共產黨對我很優待。」

「我們很高興你明白這一點。要是能給李奇微將軍也上這麼一課就好了。」

「我可以向他轉達這個意思，並且——」他忽然住了嘴，顯出尷尬的神色。

「我們在明天的大會上再詳談對戰俘的待遇問題。你別太緊張，好好休息吧。」

「我會的。」

「那再見了。」

「再見。」他站起身，手動了一下，卻沒伸出來。

我們一出帳篷，超林就放聲大笑起來，兩手抱著肚子。我也跟著笑了。一直守在門口的一個朝鮮軍官用英語說：「美國將軍也不過那麼回事，史達林說得好，都是紙老虎。」

我不知道史達林在哪兒說過這話，覺得有趣，就翻譯給超林聽，超林聽了，又是一番大笑。朝鮮同志馬上把我們領到戰俘營後邊的一個帳篷去，我們要在那裡會見他們的首長。

朴先生一看見我們，就從草席上站起身來和我們擁抱。他用讓人幾乎聽不懂的中文說：「啊，朋友，歡迎！」

他示意我們在草席上坐下。我發現他和別人不一樣，是坐在一塊羊皮上的，白色的羊毛間有黑色斑塊。我們輕鬆地進入話題。瘦瘦的李少校坐在朴先生邊上，給他當翻譯，這樣我就可以放鬆了。朴先生非常關注我們的生活條件，又問我們六零二聯隊組織得如何。超林向他簡要地介紹了新近成立的共產主義團結會的情況。朴先生很欣賞團結會的目的，就是盡可能吸收群眾，同時又保持黨的領導和原則。他說：「我一直欽佩中國共產黨。你們有更多的經驗，更多的策略。很抱歉在你們的鬥爭中，我們沒能給予足夠的支援。」

超林很感動，回答說：「在您的領導下，朝鮮同志抓獲了貝爾將軍，這可是戰爭史上了不起的大事，給了我們共同的敵人一個沉重打擊，極大鼓舞了我們的士氣。我們一定要學習朝鮮同志的勇氣和膽量。」

「可是，沒有你們的幫助，這件事我們根本辦不成，」朴先生微笑著說：「所以，勝利的一半屬於你們。中國同志給我們做了樣子，怎樣進行絕食、怎樣引誘貝爾到我們聯隊來，不然，我們也不能成功。這個勝利只是我們兩國人民共同鬥爭的一小部分。」

他轉向一邊，和一個助手耳語了幾句。李少校朝我們眨了眨眼，說：「朴先生想請你們吃晚飯。」

「別把我們當客人。」我說。

「你們是我們的貴客。」李少校回答說，一邊意味深長地微笑著。他站起身來走出去，一定是安排晚飯去了。

我很想知道朴先生在這種地方能拿出什麼好東西給我們吃。可能是一碗白米飯加些泡菜，最多加上幾片魚乾，或是烤魷魚吧。我的思緒被超林和主人的開懷大笑打斷，讓我想起來要給他們當翻譯。朴先生問候了裴政委，請超林代爲向他致意，超林表示一定轉達。我強迫自己不要去想晚飯的事，安心和他們交談。

這時，一個年輕人走進來，端著一個裝滿白麵蒸餃的大鍋蓋。我們都看傻了——餃子可是主人款待中國客人最好的飯食了！他們從哪兒弄來材料包餃子啊？

朴先生微笑了，幾乎是淘氣地伸開雙臂，說：「請用餐。」

「咱們一起吃吧。」超林說，招呼大家都坐過來。

「不了，我們吃過了。」

「這樣我們怎麼感謝你們呢？」

「別說了，快吃吧。你們不必謝我們，東西都是美國佬送來的。要是他們沒送麵粉和肉來，我們也不知道能拿出什麼來招待你們。好好吃吧，我就不陪你們了。」朴先生站起身，走到屋角，和幾個軍官商議什麼去了。

我們倆拿起筷子開始吃起來。餃子餡是用罐頭碎牛肉和嫩白菜做的，肉餡很足，一咬一冒油。我盡量吃得

斯文些，超林卻笑話我，甩開腮幫子大嚼大嚥，一邊吃一邊說：「等咱們回國了，我就叫老婆每個星期都包餃子。」

「自從跨過鴨綠江，這是我吃到的最好的一頓飯了。」我說得喉嚨都哽咽了。

「沒錯。嗨，得啦。俞元，別太動感情，讓人家看見。」

我忍回眼淚。就是在吃好東西的時候，我也沒法眞正地開心。此時我是悲喜交集，都因爲超林提起了他老婆，讓我想起出發前一天，母親和菊蘭給我做的蟹肉餛飩。可我煞住回憶，強迫自己笑起來，不在這種情況下去想家人。讓私人感情干擾工作，是件不光彩的事。從現在開始，我一定要鎖住內心，把所有個人想法啊感情啊都深深地埋藏起來，不讓它們在不該出來時冒出來。

晚飯以後的事就更讓人驚訝了，我們被領到帳篷後部一個隱蔽的地下室裡。到這裡就像進了地堡，不過這裡的照明很充分。在一個土臺子上，硬紙板子蓋著一部收音機——外殼是光滑的條紋橡木，約莫兩尺長，一尺高。李少校告訴我，這玩意兒是他們用罐頭和軍毯跟一個賣瓜果的換來、又悄悄運進營地的。我正想問問他們是不是就用它與北方聯絡，朴先生把手搭在我和超林的肩膀上說：「我親愛的同志，因爲我們抓了貝爾將軍，才能夠請你們到這裡來。我們沒法給你們什麼娛樂，所以我想你們大概願意聽聽北京的聲音。」

老天，他們能聽到中國的廣播！足有一年多，我們沒有聽到祖國的任何聲音了。我們趕快伏下身去，打開了收音機。刺耳的噪音後面，漸漸傳來一個女聲，脆生生的，又暖烘烘的：

……最近又收到了更多的捐款。為聲援我們在朝鮮前線的志願軍，共有兩百五十萬民眾參加了上個星期在首都舉行的各種集會，譴責美帝國主義對朝鮮的侵略，支援反帝鬥爭事業。豫劇表演藝術家常香玉，捐出了一架飛機。畫家黃染，捐出了自己的五幅作品。一批著名作家義賣了他們的手稿。所有收益都將捐獻給我們在朝鮮的部隊……

這條新聞是如此的遙遠，遙遠得像是來自另一個星球；同時，它又是這樣的貼近，近得拉緊了我的頭皮，壓迫了我的胸腔，震撼了我的心靈。淚水衝出我和超林的眼眶，在我們臉上流淌。好久好久，沒有一個人出聲。我們任眼淚無聲地落在這潮濕、灰黃的外國土地上。一旁的李少校也流下了眼淚。

當晚，在朝鮮戰俘的指揮部裡，召開了一次只有主要領導參加的預備會議。超林留下來參加，我就沒事了。我一個人走出帳篷，巨大的情感波瀾仍然在我胸中奔湧。微腥的海風吹在我淚水未乾的臉上，隱約有些刺痛，我心裡充滿了鄉思和愛情。要是我們明天就能回家該多好！月亮要是個發報機就好了，那我一定要給母親和菊蘭發一封電報去！我控制了自己的胡思亂想，慢慢走著，小心翼翼地不離鐵絲網太近，因爲那邊有一群美國兵。他們在那邊抽菸閒聊，手裡的步槍發出點點幽光，頭上的鋼盔被那層線網遮蔽了光芒。

不知怎的，我腦海裡湧現出蘇聯革命小說家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一段話：「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給予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不會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碌碌無爲而羞愧。這樣，在臨終的時候他就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爲人類的解放而鬥爭。」和很多人一樣，長篇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這段話，我早背得爛熟了，但是此刻，它在我腦海裡產生了更多的共鳴。我第一次覺得，自己是一個有用的人，我的生命最終是爲了一個目標而塑造的。個人是多麼渺小，只有投身到比個人更偉大的事業中去，你個人的角色才能夠被一個「乘數」放

大。此刻，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或許就是我在尋找的那個「乘數」吧。儘管我在這次會議上算是一個角色，可我終究只是一個翻譯，連超林的副手都算不上。我的信心膨脹起來，甚至在想，要再次申請加入共產主義團結會。

我在帳篷裡找到一塊給代表準備的地方，倒頭就睡了。明天的工作會很艱巨，現在我得好好休息。

給代表準備的早飯是「珠殼」（jook），朝鮮的一種飯食，有點兒像大米粥，不過裡邊還加了肉和蘿蔔丁。jook這個詞，我覺得一定是從中文的「粥」字來的。我們每人領到一滿碗，每張桌上還有一盤泡菜大家一起吃。朝鮮人本來離了泡菜就沒法活，可在這裡，泡菜一定是稀罕物了。我們吃得近乎鄭重其事；所有的人似乎都吃得盡可能地慢。超林和我並不特別喜歡泡菜；對我們來說，泡菜太辣了。可我喜歡鮮白菜的氣味，吃了辣汁裡泡著的幾瓣大蒜。米粥熬得爛爛糊糊，吃起來很香，裡邊的肉是罐頭牛肉。我再次驚嘆朝鮮同志的神通。

大會上午九點在一個大帳篷裡開始。會場當中，把八個長桌子拼起來，上面蓋了毯子；又在大桌子四周擺上一圈椅子。靠近門口一端的桌前，是被告席，對面一端是大會主席的位子。主席後邊的牆上掛著中國國旗和朝鮮國旗。頭天晚上的預備會議，選出崔中校爲大會委員會主席，郝超林和另一個同志爲副主席。於是崔中校就坐桌子上首的主席位，超林和我一起坐在他左邊，我旁邊是三個朝鮮婦女。一共有來自十七個戰俘營的四十二位代表和證人，出席了會議。

大家就座後，我們開始討論大會的議程，議程一致通過。接著，我們叫人把貝爾帶來。

貝爾邁著笨重的步伐走進來，在被告席上坐下。崔中校宣佈大會開始，議程的第一項，是讓貝爾聽取代表們的指控和譴責。崔中校用英語對貝爾說：「你可以爲自己辯護，但首先必須尊重事實。」

隨後，代表們開始發言。朝鮮同志做的準備可眞夠詳盡，對他們遭受的虐待和暴力侵犯，對有些同志甚至被逼著加入南朝鮮軍隊，端出大量證據。他們控訴說，只是因爲想返回北朝鮮，他們的同志便遭到毒打，甚至被殺害。還有不少人失蹤，沒人知道他們的下落。他們是被美軍運到什麼地方，成了化學武器試驗的犧牲品了嗎？貝爾將軍坐在那裡神態茫然，也許，雖然有兩個翻譯一起努力，對於大夥兒都說些什麼，他仍沒有搞明白多少——兩個翻譯都像是初學者，英語說得語調生硬，重音錯位。

一個高個子站起來，用沙啞的嗓音開了口。一句話還沒說完，他已淚流滿面。他用手戳點著貝爾，整個發言都是在斷喊。他左臉上有一片燒傷後留下的疤痕，他說，那是被烙鐵燙的，因爲他不肯出賣同志。他又拉起衣襟，露出胸前傷痕，他拍打著這些傷痕告訴大家，這都是被南朝鮮和美國衛兵打的。他肚子上還有很深的一道馬蹄形刀疤，看上去至少癒合十年了。他說，因爲他不肯錄音，他便得不到醫治。朝鮮翻譯把他這段控訴翻譯得斷斷續續，讓人很難完全聽得明白，可大意還算清楚。

他說完後，輪到一個敦實漢子發言。他說，有個美國兵給了他一根鋼條，命令他把朴先生幹掉。他不肯去，他們就把他吊在刑訊室裡的橫樑上，打得半死。一個南朝鮮中士甚至揚言要挖下他的屁眼餵狗。他講完後，一個大約十八歲的長著一副細柳腰的男孩子站起來，用微弱的聲音說道，在營房大門口，有個美國衛兵經常摸索他的褲襠。

隨著控訴繼續下去，很多代表火氣越來越往上竄，忍不住對著貝爾將軍大聲怒斥，嚇得貝爾不敢看大家噴火的面孔。一旦覺得貝爾走神，崔中校便命令他：「注意聽！」

三個女代表中間，有一個叫順姬的，會說英語。她顴骨很高，大約二十五歲，過去一定長得很結實，可現

在卻光剩下一副大骨架，一張臉曬得黑黑的。她站起來，很激動地發言。雖然帶點兒口音影響了咬字，但她的聲音很清晰。她說，很多女戰俘都受到衛兵的虐待，被他們任意打罵。南朝鮮衛兵甚至用香菸燙她們的臉和胸部，即使當著美國人的面，美國人也睜隻眼閉隻眼，放任這樣的虐待侮辱行爲。順姬把腳抬起來放到桌上，撩起肥大的褲腿，露出她的整條腿，那腿瘦弱得與她的身軀不相稱，上面確實有十幾處芸豆大小的被燙出的褐色圓點。她還說，她們聯隊裡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在來戰俘營的路上被四名美國兵強姦了，後來生下一個白皮膚藍眼睛的男嬰。這個營養不良的母親後來死於心臟病，那孩子現在還在她們戰俘營裡，成爲年紀最小的囚犯。

她一邊講著，坐在我身旁的小個子婦女開始哭起來。順姬指著她又說：「她和三十多個姊妹一起，在漢城的大街上被遊了兩天街。美帝國主義和他們的南朝鮮走狗坐在吉普車裡，或騎在大馬上，用鞭子抽她們，逼她們脫光衣服，在過路人面前赤身裸體。他們管她們叫『婊子』，往她們身上吐唾沫，還有人朝她們扔石頭，用藤條和棍子打她們。有個姊妹已經懷了五個月的身孕，可不管她怎麼哀求，他們還是不停地打她，逼著她脫掉褲子，背上A字架，好讓所有的過路人嘲笑她。我這位同志，就是你們犯罪的活證據。你們看她的後背！」順姬把這個圓臉的小女子扶著站起來，讓她轉過身，給大家掀開她的後衣襟，只見那後背上一片斑斑點點，佈滿了傷疤和血痂。

「請看她的臉。」順姬又指著座位上另一位女伴。大家的目光都轉過去，只見她臉上盡是傷疤。她很年輕，還不到二十歲，脖子上的皮膚又柔嫩又光潔，那張臉以前一定是非常漂亮的。她也站起來控訴，由順姬給她翻譯。她曾經是一名游擊隊員，被美軍俘虜，然後同其他二十名同志一道，被移交給了南朝鮮警察。他們毆打她，把幾位男游擊隊員斬首示眾，還強迫她提著自己哥哥被砍下的頭顱，由他們拍照。直到今天，她還被噩夢纏繞著，夜裡經常在床上驚叫、輾轉，與鬼魂摔跤。爲什麼那幫警察對人還不如對畜生？爲什麼美國人鼓勵和縱容他們？爲什麼美國人跨過太平洋到這裡來讓生靈塗炭？她的聲音越來越高亢，人也越來越激動，漸漸地話不成句，語無倫次，讓順姬很難繼續翻譯。終於，她在一句話中間停了下來，三個女人抱在一起嚎啕大哭。

有個人跳起來衝向貝爾將軍，瘋了一般地大喊，兩條胳膊狂舞著；但被兩個代表抱住了。他說，在他和同志們被俘時，美國人也命令他們脫光衣服。美國兵用槍托猛打他們的屁股，用槍管狠戳他們的胯部，害得一個同志至今精中帶血。

我和大家一樣，想起了那些遭到親國民黨的人拷打折磨的同志，心裡也騰起了一團火。崔中校提醒大家保持冷靜，貝爾只是一個執行命令的軍官，眞正的罪犯，是給他下命令的人——美國政府和華爾街的寡頭。

我看見貝爾那雙毛茸茸和青筋直暴的雙手開始微微發抖，他抓住桌沿，好讓手不要抖得太厲害，眼睛死死盯住眼前的一個茶杯，時不時咬一咬下嘴唇。

下午，控訴和譴責繼續進行。一個失去左臂的朝鮮軍官指控說，醫務人員在被告的指令下，截掉了他健康的手臂。他衝向貝爾將軍，用不清楚的英語喊道：「是不是這樣的？」他用僅有的那個拳頭捶著桌子，但沒碰貝爾將軍，因爲已有命令，大夥兒都不能碰他。

將軍站起身來，說：「我不能確定。在你們所提到的可怕事情中，我知道有一些確曾發生過，但還有一些我覺得不是眞的。但不管怎樣，我會統統調查。」

那個軍官回到自己座位上以後，貝爾將軍還站著不動。崔中校讓他坐下，並說：「我們是共產黨人，不會像你的人對待我們那樣對待你。我們尊重你的個人尊嚴，不會侮辱你和虐待你。但是，作爲一個美國將軍，你必須拿出勇氣面對事實。」

貝爾點點頭，汗珠冒了一腦門子。

下午會間休息時，超林和我討論了一下我們的講稿。明天才輪到我們發言。我們倆都覺得，雖然已經有了文字稿，我們還應該提出一些證據。還有，我一個人，是不可能一個晚上就把我們這篇長文全部翻譯成英文的；得有人幫我幹。於是超林去找了李少校，晚飯後坐吉普車返回六零二聯隊，推說去接證人來。其實他是想回去一下，向裴政委匯報目前這裡的局面。昨天夜裡的預備會上，討論起一旦敵人用武力營救貝爾將軍，我們應該怎麼辦，代表們有過激烈爭辯。一些朝鮮同志堅持說，他們將不惜一切進行武裝抵抗，如果有必要，就處決貝爾，然後就推說他是在混戰中被美國人自己打死的。有些人卻反對，說這個建議是冒險主義。超林發言說，在整個事件中，我們都應該保護貝爾。如果敵人向我們進攻，我們就設法把貝爾送到別的聯隊去——朝鮮戰俘在衛兵中有內應，有這樣的地下通路。只要貝爾在我們手裡，我們對敵人就有主動權。朴先生對超林的主意表示贊許，可大家仍然拿不準貝爾會不會跟我們合作。要是他堅決不肯簽署任何協議怎麼辦？這個問題至今沒有答案。超林很想回去請示裴政委，他經驗多，可以給我們拿個主意。

一個小時過後，超林帶著常明和另一個叫吳高臣的同志一起回來了。吳高臣是上個月在釜山第三收容中心的「甄別」過程中流血事件的證人。那天晚上，我和常明一起修改了第二天的發言稿；然後我倆又把整個發言稿、以及吳高臣證詞的要點，都翻譯成英語。

我們兩人一邊忙，我一邊告訴他，昨天晚上我們吃上了餃子。他一捶我的肩膀說：「媽的，我該先跟超林來的，讓你享了我的口福。」

「沒準明天他們還會給我們點好吃的。」我說。

「但願吧。」他扭頭查英文詞典去了。其實，餃子以後，我們就再也沒吃過跟別的代表兩樣的飯了。

第二天上午又繼續控訴。我們的同志吳高臣站起來發言。我們已經把他發言的英文稿交給了貝爾，所以現

場就不必我口譯了。李少校拿到了我們的中文稿，高臣一邊說著，他就按著稿子一邊翻譯給朝鮮代表聽。高臣頭天晚上已經把發言練習過兩遍，現在他用憤怒的語調，描述了在第三收容中心發生的流血暴力事件：

「四月十四日晚上，兩個營的美國兵包圍了我們聯隊，還開來六輛坦克。他們用大喇叭命令我們五分鐘之內走出帳篷，到聯隊外邊參加甄別。五分鐘過去，沒有一個人出去。大喇叭再一次命令我們出來，說再給我們五分鐘。時間過去了，還是沒有人出去。他們又把命令重複好幾遍。一個小時以後，他們動手了。兩輛坦克開進戰俘營，後邊跟著一個排的美國兵。他們進來推我們出去，我們用手邊能拿到的所有東西拚命抵抗。混戰中我們打了幾個美國兵，從他們手裡搶到兩支步槍。因爲反抗的戰俘比他們預料的要多，美國兵害怕了，趕快撤出了戰俘營，坦克也撤了。他們的長官氣急了，二十分鐘以後又下令發動第二次進攻，他們拿機關槍衝著我們掃射，還衝我們扔手榴彈。三十四個同志被打死，五十多人受傷。我們赤手空拳，沒辦法抵抗，有兩百人只好去參加甄別。很多人生著病，又挨著餓，我們也反抗不得。他們的毒氣彈害得我們噁心、嘔吐，睜不開眼，沒法呼吸。美國人把我們趕到一起，押到進行甄別的地方。

「我表弟和我都在那兩百人裡。這次屠殺之前，我們倆還商量過，要是被強迫甄別該怎麼辦，我倆打算不論花什麼代價，我們都要回家。現在大家排好隊了，可是每次只能一個人上前回答問題。輪到我了，那個美國軍官問我：『你想去自由中國嗎？』我問他：『那是哪兒？』我實在不知道那指的是哪兒。那人告訴我：『臺灣。』我說：『不，我要回大陸。』他給了一個卡片，說：『上那邊去，跟那些人一起去吧。』給我指了一道門。我這才沒去了臺灣。可後來我滿院子找不著我表弟了，有人告訴我說他背叛祖國了。那是不可能的！我們發過誓，要一起回家。我急得哭起來，他準是把『自由中國』當成大陸了，所以他才回答『去』的。我們那一起的還有四個人，都是因爲這個誤會，結果都被送到敵人手裡去了。

「現在，貝爾將軍，你回答我，爲什麼你們美國軍隊強迫我們參加甄別？爲什麼你們在甄別的時候又故意設下圈套？那四個人裡頭有兩個是忠誠的共產黨員，根本不可能願意上國民黨軍隊裡去，可他們被騙到魔窟裡去啦。我到朝鮮來之前，向我舅舅、舅媽保證過，要照顧好我的小表弟，現在他不見了，我怎麼跟他的爹媽交代？」高臣大聲哭號起來，泣不成聲，一位朝鮮同志遞給他一條毛巾。

他的控訴似乎打動了貝爾將軍，他嘆起氣來，手支著下巴，胳臂肘撐在桌上。「戰爭中發生過很多罪行，可我不能對所有罪行負責。」他低聲說。

其實，高臣並沒有講出大屠殺的全部實情，他沒說出事件發生的直接原因：中國戰俘計畫在那天夜裡舉行暴動，衝出戰俘營，攻擊附近的一個美軍連，搶奪一些武器，然後逃到山裡打游擊去。可是他們中間出了一個告密者，偷偷跑去報告衛兵，美軍這才開來部隊和坦克，對戰俘進行鎮壓。當然，我們在準備控訴書時，事件的起因就被抹去了，貝爾將軍和朝鮮同志都不可能知道這事全部的來龍去脈。

該我發言了。我用英語描述了七十二聯隊裡的迫害行爲——劉太安怎樣挖林吾深的心，我的黃埔校友楊歡怎樣被亂棍毒打、又被掐死，親國民黨的人怎樣把他們強行刺在戰俘身上的字連肉挖下來。說到這裡，我拉起衣服，給大家看了我肚子上的刺青。讓我吃驚的是，貝爾將軍竟然笑起來。不過他馬上就強忍住了，可他的大鼻子還在往外發送笑聲。我用拳頭往桌上猛地一捶，大喝道：「你覺得這挺好笑是不是？你他媽的！」

「不，我不是那麼想的。」他說。「我只是對他們搞這種惡作劇感到難以置信。」

「惡作劇？」我吼起來。「身上帶著這些字，我怎麼能在自己國家裡過正常生活？」

他的臉上泛起紅潮。「我倒沒往那上面想。」他低下頭，咬住了嘴唇。

「這是犯罪，是不是？」我質問他。

「是，當然是。」

「這一切發生在你管轄下的戰俘營裡。你能說你對這些沒有責任？」

「也許我有部分責任。」他小聲說。

「那些戰俘營負責人都是在日本和臺灣受的訓，然後被你們政府送回來，幫你管理戰俘營。他們隨意殺害和毆打我們的同志。美國政府對他們的罪行難道沒有責任嗎？」

「如果你說的都是實情，那我們政府沒有很好地履行職責。老實說，我都不知道誰培訓了他們。」

他模稜兩可的回答把我激怒了。我失去控制，歇斯底里地對他大喊起來：「少跟我耍滑頭！你覺得你是乾淨的？我告訴你，你也是雙手沾滿中國人和朝鮮人鮮血的劊子手。你以爲你可以假裝不知道你手下人犯的罪行？你以爲你可以改變我們的意願、強迫我們背叛祖國？你知道中國人的眞正精神是什麼？我告訴你，活著我們是中國人；死了我們是中國鬼。你們豢養的雜種，別想用挖心剖腹讓我們屈服。我把話給你撂在這兒——」

常明抓住了我的肩膀，把我拖出帳篷，讓我冷靜下來。「乖乖，我從來沒想到你會這麼激動。」我對自己的失態也很出乎意外，冷靜下來以後，便覺得挺難爲情的。

我們抽了支菸，又返回會場，正聽見崔中校莊嚴地問道：「貝爾將軍，你對你手下的人所犯下的罪行有沒有責任？」

「也許對其中某些我負有責任。」

「你認罪不認罪？」

過了好一陣，貝爾才回答：「也許認一部分罪。」

超林站起來，以權威的口氣開始發言。這時我已經平靜下來，便將他的意思大致上翻譯出來。

超林說：「我們知道，作爲一名軍官，你必須服從你們政府的命令。但是，你們所做的，是在人民中間埋下了仇恨的種子。我們相信，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朝鮮人民一樣，是愛好和平、厭惡戰爭的。我們希望你能切切實實做出些事情來，對你們的罪行做出一些補救。」

貝爾點頭稱是：「謝謝閣下這些教誨。相信我，我不會忘記這次經歷、這次教訓的。我將盡全力糾正我們的錯誤。」他的聲音中有些猶豫的顫抖。

下午，我們動手起草兩份文件。第一份文件，是「朝中戰俘控訴書」，上面列舉了戰俘營管理衛兵犯下的主要罪行，並向全世界公佈——貝爾將軍的被扣已經引起了國際關注，很多記者已經匯集到巨濟島來了。第二份文件，是「美方戰俘管理當局保證書」，這是要讓貝爾簽字的，上面保證我們會得到良好的對待，和生活條件的改善。

我們開了一個簡短的會議，一致通過了釋放貝爾的四項先決條件：第一，戰俘營管理人員必須停止對戰俘的野蠻暴行；第二，戰俘營當局必須放棄所謂「自願遣返」政策；第三，必須停止針對朝鮮戰俘和中國戰俘的「甄別」；第四，必須承認朝中戰俘代表團的合法性，並給予活動的便利。

現在，一切都取決於貝爾將軍是否接受這些條件了。如果他接受，他就可以得到釋放，勝利就是我們的了。我們不知道敵人對我們的要求會怎麼答覆。戰俘營新任總管斯馬特將軍，昨天晚上已經到職，接替富爾頓掌管戰俘營，他已經發出了六道最後通牒，命令我們無條件釋放貝爾將軍，我們根本不理會。我們這裡正在討論，電話鈴響了，李少校拿起聽筒，遞給一位朝鮮翻譯同志，我坐得不遠，可以聽到電話對方的談話。是富爾頓將軍打來的，想和貝爾將軍說話。

一個勤務兵被派去叫將軍，兩分鐘後，貝爾走進來。崔中校指著電話告訴他：「富爾頓將軍找你說話。」

「你好，我是馬修。」貝爾對著話筒說。

「馬修，你好吧？」對方問候道。我伸長了脖子，好能聽清雙方的對話。

「還行，查理。」

「告訴你，南茜從東京趕來了，我剛去看了她。她哭得很兇，也眞難爲她了。她太激動了，弄得我沒法告訴她我們可以和你電話聯繫。不過，她很快會跟你通話的。」

貝爾皺起眉頭。「請你務必告訴她，我很好，不必擔心。」

「馬修，告訴我，他們侮辱過你沒有？拷打你沒有？我們很擔心吶。」

「聽我的，我沒事。」貝爾瞟了一眼崔中校，繼續說：「其實他們挺有禮貌。」

「謝天謝地！你知道他們會扣你多久嗎？我這邊能做什麼你只管說。」

「我也不知道，可能要到他們開完代表會。別催他們，讓他們把會開完。」

「好的，我就守在這兒。你隨時給我來電話。」

「謝謝你，查理，你這眞是幫大忙了。但願我們可以很快見面。」

「是呀，我盼著呢，馬修。再見。」

「再見。」

他們的對話出乎我的預料，沒想到，在這麼重大的危機當中，美國將軍之間還用這麼親切家常的口氣交談。他們把對方當成朋友，而不是當成擁有共同理想、爲共同事業而奮鬥的同志。他們沒有提任何意識形態的話題，這和中國軍官多麼不同！中國軍官要是處在同樣的情況下，肯定會用革命的語調交談，其中一方，必定會代表黨。

晚飯後，超林和我去看貝爾將軍。頭天晚上，裴政委已經指示超林，要充當朝鮮人和美國人的中間人，並確保貝爾簽署保證書。政委還說，他將在六零二聯隊組織示威活動，來聲援我們，我們務必要保持冷靜的頭腦和通情達理的態度，因爲只有經過周密的計畫和耐心的談判，才可能獲得勝利。我們的朝鮮同志往往過於血氣方剛，甚至把自己稱爲「史達林元帥的戰士」，誓與美帝國主義不共戴天。他們很多人動不動就衝動。

貝爾將軍看上去很疲憊，但見到我們，似乎挺高興。我們一坐下，超林就通過我告訴他：「將軍，我們很願意讓你安全地回到家人身邊，所以我們來和你談談。」

「謝謝你們，我感激你們的好意。」貝爾說。

「我們知道你夫人來了，你的孩子們也一定在爲你擔心。所以，請你明天一定要在協議書上簽字。如果你不簽，恐怕我們的朝鮮同志會失去耐心。跟你說實話，我們一直在設法穩住他們，要他們別翻臉。」

「可是，我總得看看那上面寫的都是什麼，才談得上簽字。」

「這我們明白。如果你不能接受其中某些條款，可以跟他們談，別斷然地全盤拒絕。我會努力說服他們修改。總之，不要失去這個和平解決的機會。」

「我會記住的。」

「那就好。今晚先好好休息吧。」

「晚安。」

我們走出他的帳篷，覺得一陣輕鬆。今晚是個陰天，無聲的閃電撕扯著北邊的天空，露出遠方山脊的輪廓。我倆分了手，因爲我得和常明一道去準備明天需要的文件。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向斯馬特將軍遞交放人的先決條件。等他答覆的時候，我們舉行了簽字儀式。帳篷外邊，七千多名戰俘把一片場地坐得橫平豎直，儘管有些人手裡拿著五花八門的自製武器，影響了隊列的整齊，他們在等著我們三天鬥爭的最後結果。帳篷裡邊，空氣嚴肅而緊張。崔中校宣佈，這是我們代表大會的最後一項議程，現在我們要考驗一下貝爾將軍認罪態度的誠意。他手一揮，示意一位翻譯給我們的俘虜念一念那份協議草稿：

我答應立即停止我們的野蠻行為，停止我們對朝鮮戰俘和中國戰俘的侮辱和折磨，例如，強迫他們寫反動血書，威脅實施單獨關押，大屠殺，步槍機槍掃射，使用毒氣和細菌武器，用戰俘做原子彈試驗。

我還答應遵守日內瓦公約，人道對待我的犯人——向偉大的史達林元帥的勇敢戰士們，提供良好醫療服務，人吃的食物，新衣服，和文具。我將遵照國際法，保證所有戰俘安全回到自己的祖國。

我還答應，停止「自願遣返」和對戰俘實施甄別，嚴懲打罵戰俘的我方士兵。

陸軍准將　馬修・貝爾

聽著聽著，我覺得自己後脖頸子汗毛直豎，腦袋裡面嗡嗡作響。昨天下午我們討論過這個文件應該包括的內容，沒人提到什麼文具、新衣服，還有什麼「原子彈」！朝鮮同志怎麼弄出這麼不像話的一段來了？翻譯走到貝爾跟前，把那張紙雙手遞給他。貝爾戴上眼鏡，從頭到尾看了一邊。然後平靜地說：「我沒法簽這份東西。」

「什麼？」崔中校吃了一驚，小眼睛瞪成了三角形。

「文字不適當，而且，有些要求也不是我有權回答的。」

超林插了進來：「你希望修改一下嗎？」

貝爾想了一會兒，搖了搖頭：「改是沒法改的，必須重寫。」

一經朝鮮翻譯把他的話翻過去，所有的眼睛都對著貝爾瞪起來了。貝爾嚇得一縮，但還是說：「我要是簽了這個字，就等於叛國。我是一個正直的人，不會對自己國家犯下這種罪行的。」

一個朝鮮軍官一巴掌拍在桌上，對著貝爾大吼起來，會說英語的順姬把他的話翻譯給貝爾：「不簽字，你就別想回去！」

超林急中生智，對將軍說：「你看這樣好不好——你自己寫個東西，把我們要求的主要精神包括進去，又讓你自己也可以接受。」

「這個……」貝爾捋捋小鬍子，似乎不大情願。然後說：「好吧，我試試看。」

他拿起一枝圓珠筆，在一張黃便條紙上寫起來：

根據你們的要求，我承認巨濟島戰俘營內發生過虐待和流血的情況，有些戰俘被其他囚犯虐殺，有些戰俘被聯合國軍的衛兵打傷。作爲戰俘營的總管，我對那些失去的生命負有部分責任。我可以向你們保證，今後這裡的戰俘會依照國際法受到人道的對待。我會盡自己最大力量防止暴力流血和肉刑體罰。如果這類事件再發生，我將負有責任。

他仔細看了一遍自己的聲明，在一個地方停頓了很久，拿起了筆，卻又放下了，然後把紙條交給我們。

我大致地給超林把內容翻譯了一下。他低下頭，對著那張紙沉思了幾秒鐘，然後問我：「我們可以接受這個，你覺得呢？」

「依我看，寫得不錯。」我回答。

我們把這張聲明交給了朝鮮翻譯。他把內容翻譯給大家聽，有人聽罷非常憤怒，一邊搖頭一邊大喊。超林趕緊過去和崔中校商議，他覺得，雖然朝鮮同志提到的很多細節貝爾都沒提，可這份聲明大體上還是傳達了我們要求的基本精神，特別是貝爾提到他對所有罪行負有部分責任。至於對戰俘甄別的問題，貝爾的確可能無權答覆。崔中校和李少校都點頭表示同意；也許他們也明白，沒有其他辦法可以打破目前的僵局了。

於是我們告訴貝爾，我們認可他寫的這份東西。他很痛快地就簽了字，然後摘掉眼鏡，一隻胳臂搭在椅子背上，幾乎不帶情感地盯著我們；隨後又閤上眼睛，汗珠又冒了一腦門子。

帳篷裡邊所有的人都站起來鼓掌。貝爾也站起來，輕輕鼓掌。超林和我向他走過去，第一次和他握了手，他的手掌又沉重又潮濕。

接著，巨大的歡呼聲從外邊傳來。歡呼聲把我們勝利的消息從七十六聯隊傳到其他聯隊，到處都開始慶祝起來。與此同時，幾個戰俘從貝爾將軍的保證中摘引出來兩條來，刷到大白單子上，在大門旁邊掛起來，給美國人看：「我們不再屠殺了！」「我們將人道地對待戰俘！」

午飯以後，新的總管斯馬特將軍出現在大門口，來迎接貝爾將軍。他是被派來處理危機的，因爲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將軍，對富爾頓將軍應付這一事件的方式十分不滿，尤其是他竟允許我們召開代表大會。我們把貝爾帶到大門口，還準備了一張收條，交給斯馬特將軍簽字。斯馬特是個壯實漢子，挺著個大肚子，肌肉發達的臉上一雙眼睛粘乎乎的。看得出來他憎惡我們，而且反感那張收條：

現在我從第七十六戰俘營無畏的朝鮮軍人手中接收了美國陸軍准將馬修・貝爾。經過仔細檢查，貝爾各方面狀況良好，無任何受到侮辱和身體傷害之痕跡。特此證明。

巨濟島美軍最高指揮官

（簽字）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一日

斯馬特將軍哼了一聲，簽了字，然後我們又和貝爾將軍握了握手。他坐進一輛藍色轎車，我們很多人衝他揮手再見。儘管斯馬特將軍黑著張臉，汽車開走時，貝爾還是衝我們摘了摘帽子。

下午兩點，七十六聯隊裡開始了慶祝活動。崔中校對著七千戰俘，對這一事件以及它的重要意義進行了總結，超林也發表了講話，祝賀朝鮮戰友取得的偉大勝利，他們英勇精神值得我們中國軍人學習。最後，他鏗鏘有力地表示：「中國人民將永遠記住這一偉大歷史功績。」

我深受感動，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我對這個勝利也做出了一點小小的貢獻。加入到偉大的鬥爭中去，使我感到自己的生命彷彿終於獲得了一點意義。

在熱烈的掌聲中，常明走上前去，用朝鮮語放聲唱起了〈長白山游擊隊之歌〉，這是他剛剛從朝鮮女游擊隊員那裡學來的。他唱得太精采了，大家都讓他再來一個，他就又唱了中國歌劇《白毛女》選段。他唱完了，三個女代表給大家表演了舞蹈，又演唱了〈春之歌〉。最後，幾個戰俘表演了幽默短劇《活捉貝爾將軍》。

除了七十六聯隊的人們，附近其他聯隊的戰俘也隔著馬路觀看了表演，觀眾多達一萬三千多人。連美國憲兵和南朝鮮衛兵都忍不住一個勁往我們這邊看。

第十八章　勝利之後

正當我們熱烈歡慶勝利之際，數百美國兵封鎖了七十六聯隊。除了那三個婦女，其餘所有代表一個也不許返回自己的聯隊，所以我們四個中國人就陷在這裡了。同一天，斯馬特將軍撕毀了貝爾簽字的協議，宣佈那是在被迫情況下簽署的，不合法。他宣稱，將採取所有必要手段，包括使用武力，來恢復戰俘營的秩序。不久我們得到消息，貝爾和富爾頓雙雙被降級，調離了巨濟島。從收音機裡，我們聽到平壤和北京都大力宣揚了我們的勝利，這一勝利，給我方的宣傳工作提供了彈藥，爲我方在板門店的談判提供了籌碼。可是我開始對這次勝利感到不安，勝利使我們困在這裡，還可能給朝鮮戰俘帶來更多的麻煩。

從五月中旬起，美國軍隊開始騷擾戰俘。他們動不動就向戰俘營裡開槍，扔催淚彈，還把坦克開近戰俘營，用火焰噴射器燒毀戰俘們懸掛的標語和史達林、毛澤東、金日成的畫像。七十六聯隊每天都發生衛兵向戰俘開槍的情形，三個星期裡，就有二十多人被他們打傷。很顯然，敵人是企圖激怒我們，爲懲罰我們製造藉口。

七十六聯隊的首長們召開幾次會議，超林和常明都應邀參加了，大家達成共識：敵人一定在策畫報復，所以我們必須做好準備。此外，斯馬特將軍心裡可能另有目的：朝鮮共產黨領導下的六個戰俘營，曾經多次拒絕讓聯合國軍的人員「甄別」，他很可能打算一併解決這個問題。敵人對七十六聯隊的攻擊，可能意在殺一儆百，迫使其他戰俘營不敢再不聽話。於是，七十六聯隊的首長決定，首先組織自衛，準備好抵抗即將到來的暴

力攻擊；同時，所以我們應該避免魯莽行動，有理有利有節，一定不給敵人任何發動大規模攻擊的口實。戰俘們積極響應首長的號召，按不同的分工，組織成各種小組。有一組人馬是突擊隊，所有隊員都準備了自製的武器——棍棒、汽油瓶、用汽油桶上割下的鐵皮，再綁在架帳篷用的杆子上製成的長矛。他們還在各個帳篷裡面挖了隱蔽壕。我們四個中國人，也和他們一起行動起來。

六月十二日一清早，大約四十輛坦克、裝甲車和一千二百名美國兵包圍了七十六聯隊。我們被隆隆作響的坦克驚醒，趕快爬起來從帳篷裡往外看。斯馬特將軍親自在那兒督戰，戴著鋼盔，腰裡別著手槍，脖子上掛著望遠鏡。我們看見所有的炮口槍口都對著戰俘營內的帳篷，整整一個營的美國兵，都戴著鬼頭一樣的防毒面具，個個刺刀出鞘，準備發動進攻。

戰俘營內，大家都進了隱蔽壕，準備自衛。

八點，一聲淒厲的槍聲打破了寂靜。霎時間，兩列裝甲車和坦克猛然起動，撞倒了營房大門，衝進戰俘營。戴著面具的步兵跟在後邊，七八個人一組，也蜂擁進來。火焰噴射器立即向帳篷噴出火舌；步槍機關槍一起猛烈掃射；手榴彈、毒氣彈到處爆炸。隨著爆炸聲，綠色毒氣瀰漫在營地。

朝方首長不許我們中國人參加戰鬥，派了十個人來專門保護我們。我正著急他們怎麼可能拚得過這麼強大的火力，只見突擊隊員們從隱蔽壕裡一躍而起，揮著長矛和棍棒，向敵人撲過去，一路高喊著「滿賽」（朝鮮話「萬歲」的意思）。機關槍朝他們瘋狂掃射，只有幾個人撲到美軍跟前，與敵人肉搏，但大多數人都在離敵人很遠的地方就被射倒了。他們扔出去的燃燒瓶有幾個擊中目標，幾輛裝甲車和坦克燃燒起火，不過這點小火造成不了太大的損失。與此同時，所有戰俘高唱起〈國際歌〉：「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我們幾個也跟大家唱起來。說來也怪，這給我感覺像是在示威，而不是在作戰。

一些朝鮮同志，高唱著部隊戰歌，端著刺刀衝上來，甚至近距離與朝他們開槍的美國兵搏鬥。很多人用英語喊道：「殺死美國兵！」「打倒杜魯門！」不到五分鐘，突擊隊全體隊員全部在黑煙和毒氣中倒了下去。吳高臣氣得發狂，也要跳出去參加搏鬥，但被兩個朝鮮同志硬按了下去，說他要是有三長兩短，他們都要受處分的。

大約二十分鐘後，槍聲平息，美國兵開始圍捕我們。他們闖進帳篷，揪著領子把我們拖出隱蔽壕，強迫我們到空場上集合。我們被押到外邊時，大多數帳篷都燒毀了；只有兩個還在，但也已經著了火。地面上到處是彈殼，炮彈片，竹竿，玻璃碎片，死傷的戰俘，鮮血從他們身體往外湧流。空氣中濃烈的毒氣、煙霧和柴油的氣味嗆得我們喘不過氣來，不住地咳嗽。有幾個人想去照看受傷的同志，卻被美國兵攔住。突擊隊有四百來人，都是身強力壯的漢子；現在他們全都躺在地上，像一堆堆破布，有的身上還在冒煙。至少一半人已經斷氣了，還有幾個像孩子找媽媽一樣哭叫求救。有個人掙扎著要站起來；看樣子他腦袋裡邊受了傷——眼睛、耳朵、鼻子都在流血。他無聲地四周圍亂抓，可能眼睛瞎了。

這時，一隊戴著紅十字臂章的醫護人員正忙著救治受傷的美國兵，用擔架把他們抬走，或就地包紮。直到把全部美軍傷兵都安置完，他們才去處理朝鮮戰俘中的傷員。

在一個朝鮮戰俘的指點下，美國人把我們幾個中國人挑出來，帶到一個角落，這裡有三十來個朝鮮代表和軍官蹲在地上。美國兵要我們也照樣坐下。近中午時，他們命令我們排好隊，兩手放在腦後，把我們押上一輛卡車，送往巨濟島上的「最高監獄」。他們宣稱，我們已經成了「戰犯」。去監獄的路上，我看見北邊山包上的一個小村子冒煙起火了。原來，敵人發現那裡有村民暗通戰俘營，就派了一支南朝鮮部隊去洗劫村子。隨風傳來婦女和兒童的尖聲哭叫，時不時還傳出一聲槍響。士兵們拉走牛和羊，鬧得雞飛狗跳。後來我聽說，很多

村民都被趕到釜山去了。

關押我們的「最高監獄」是一個標準的監獄，四面都是石頭高牆，牆頂上有鐵絲網。監牢裡又黑又冷又潮濕，哨兵二十四小時站崗。新來的都被單人監禁。白天不許我們站起來或躺下，我們只能在草席子上一坐一整天。草席子一米多寬，兩米多點長，整間牢房比這個也大不了多少。他們給了我條破毯子，白天我就把它包在腿上。整天無事可做，我只能不時地按摩腿上的傷處，幫助血液循環。

在這麼又潮又冷的地方我怕會得關節炎，就常常蹲在地上。衛兵看到我這個姿勢就會朝我吼叫，命令我直接坐在席子上。趁他們不在的時候，我才能蹲一會兒。

儘管我們現在是「高級戰犯」了，吃的東西還是一樣——一天兩碗大麥飯，一勺醬油湯，有時候湯裡有幾片白菜或芥菜葉。牢房的一個角落裡放著一個帶蓋的馬桶；每天早上，一個朝鮮人來給倒馬桶。屋裡只有一個小窗戶，沒有燈，天一黑，我就只能睡覺了，沒有枕頭，只能枕著一雙鞋。這裡跳蚤多極了，前半夜總是把我咬得闔不了眼，到了後半夜，它們才老實一些，我估計那時候它們都吸飽了血，爬不動了。不過，我漸漸地習慣了它們的存在，一倒頭就很快入睡了。

我對集體鬥爭的熱情開始消退。內心裡，我開始懷疑扣押貝爾將軍是否明智。不錯，我們製造出了一條國際新聞，給北朝鮮政府和中國政府提供了彈藥，可是代價是什麼呢？我們的生存條件肯定更惡化了，七十六聯隊的幾百個弟兄非死即傷。我們爲什麼不事先考慮一下後果？什麼樣的新聞值得拿這麼多生命去換呢？這個「勝利」讓誰得到了好處？當然是共產黨的首長們了，決不是那些長眠地下的戰士。敵人當然兇殘，但我們是可以避免被他們打死的啊。首長們的眞正任務，應該是確保戰俘毫髮無損地活下來。除此之外的任何行動，必定有難以告人的目的。在寂寞和悲哀之中，我覺得自己也被利用了，當然，比起死去的和受傷的，我還算是幸運的。

在這所監獄裡，打犯人是家常便飯。我經常聽見犯人被美國兵用棍子和皮帶毆打時的慘叫聲。我挨打不算多，因爲我從來不跟他們頂嘴。有天上午，我被帶出去提審，美國人問我，我們是怎麼和朝鮮人通信的，我不開口，他們便把我帶進一間沒窗戶的房間。兩個大塊頭美國兵來了，一個提著步槍，一個拖著消防水龍頭。拿著水龍頭的那傢伙獰笑著說：「今天咱們要好好打掃打掃衛生。」說完就打開水龍頭。一股強烈的水柱猛地沖到我身上，打得我連連後退，頭一下子撞到牆上，我當場暈了過去。

等我醒過來，水柱還在對著我噴射。我抱著膝蓋衝著牆縮成一個球，水柱猛擊我的後背和屁股，把褲子都撕裂了。他們狂笑起來，又衝我屁股狠踢了幾腳，才住了手。

「起來！亞洲佬。」一個傢伙喝道。

我渾身顫抖，胸口和頭都在劇痛。掙扎著翻過身來，卻怎麼也站不起來。

兩個傢伙把我拉起來，拖出屋子，把我扔在小院子裡曬乾。我坐在暖騰騰的太陽底下，還沒緩過氣來，看著白雲下盤旋飛翔的海鷗，只覺得滿臉腫脹，兩眼刺痛。我很想哭，但忍住了，覺得有幾雙眼睛在看著我。東邊遠處的海灘上，傳來一陣鐘聲，一群人用中文在唱著勞動號子。我把臉側過去想聽個仔細，卻看見了朴先生，他正從他牢房的鐵窗後面看著我呢。他朝我揮手致意，又豎起大拇指，兩手緊抱著，祝賀我挫敗了敵人的企圖，敵人從我嘴裡什麼也沒得到。另一間牢房的一個朝鮮軍官甚至向我敬禮。我也朝他們揮手致意，勉強讓自己笑一笑。

那天傍晚，那個獨眼朝鮮人來發飯，從牢門的鐵欄外給我遞進來一碗大麥飯。我勉強吃一些，卻意外地發現，在粗粗拉拉的大麥粒底下，埋了十幾個豬肉洋蔥做的小丸子。我趕快轉過身去，免得讓衛兵看見我在吃什

麼。這說明，監獄裡的朝鮮雜役中間一定有共產黨的內線，朴先生說不定經常有這種肉吃呢。我雖然很感激他派人悄悄送來肉丸慰勞我，卻也受不了這種事實：都到「戰犯」的監獄裡了，他還是可以像個最高首長一樣享有特權。美國人想完全控制這裡，簡直沒戲。

有天早上，一個高個子美國軍官走過我的牢房，我一下子認出他來——是伊斯特中尉，當初六零二聯隊的總管。我曾經通過他，提出我們要當面與貝爾將軍對話的要求。他在這裡好像什麼也不是了。他從走廊另一頭折回來的當口，我掷到牢門前。他穿得邋里邋遢——釦子有一半沒扣，鞋也有一隻沒繫鞋帶——在走廊裡慢吞吞地踱步，好像心事重重。

「伊斯特中尉。」我叫他。

「誰呀？」他停下來。

「你不記得我啦？」

他搖搖頭，一雙灰眼睛緊盯著我的臉。看了一陣，他認出我了。「記得，你是六零二聯隊赤匪的發言人。」

「不是發言人，只是個翻譯。你怎麼到這兒來了？」

「你管得著嗎？你們這些該死的赤匪，幹嘛要幫狗娘養的朝鮮人綁架貝爾將軍？害得我也跟著倒了大楣。」

「我不是說了，我只是翻譯，不是主事的。我一個當兵的能幹什麼？都是奉命行事。」

「我告訴你，」他一下子翻了臉，手指頭直朝我臉上戳來，「貝爾將軍是個好人，他和我們一起打棒球，是最棒的投球手。我們都捨不得他。他對你們赤匪多好，對不對？你們想對話，他就來見你們了。你們抱怨什麼大麥不好吃啦，夜盲症啦，第二天他就到處張羅給你們弄大米，弄蔬菜。你們是怎麼回報他的？你們跟朝鮮人合謀，還扣押了他。你們把他毀了！人家本來又有老婆又有孩子，幹得好好的，現在臉全丟光了，給擼成上校啦。你們這些赤匪幹嘛要對他耍這種詭計？」

沒想到這個瘦臉漢子這樣替他上司叫屈，還有，他用棒球打得好不好來評判將軍的好壞，也實在讓我納悶。貝爾是不是好人，和打球怎麼扯得上？眼前這傢伙還沒長大呢，跟個孩子似的。不過，我還是被他的話打動了，喃喃地說：「我爲他難過，也爲死在七十六聯隊的幾百個朝鮮人難過，還有，那些家園被燒掉的村民。」

他瞪著我，好像很吃驚。足有半分鐘，我倆你看著我，我看著你，誰也沒說話。直到我掉過臉去，他也走開了。

伊斯特中尉的話讓我掃興。最讓我吃驚的是他看待這次事件的角度。他不是站在一個軍人的角度，而是站在他個人的角度，他把貝爾將軍當成一個個人。這使我對伊斯特中尉另眼看待，儘管他依然把我看做一個赤匪。他的話，讓我一下子醒悟過來。在這之前，我只是感覺著有疑慮，我們這樣用雞蛋碰石頭是不是明智，在我潛意識中的某些想法一直模糊不清。現在，這些想法驀然清晰起來。在戰爭中，爲了行使職責，一個軍官就得把他的士兵當成一個抽象的群體，他才能毫不猶豫、毫無顧忌地使用他們、犧牲他們。在面對一個陣營、一支隊伍的關頭，也會產生這樣的抽象化——對於我們來說，所有的美國兵一定都是魔鬼，對於他們來說，我們每個人也都一定是個赤匪。不然，一個人殺起對方來，怎麼能夠毫不留情？當一個將軍評估一場戰鬥的結果時，他想的是數字——敵人有多少傷亡，自己部隊又有多少損失。勝利越大，被變成數字的人就越多。這就是戰爭的罪惡：它把有血有肉的人，都簡化成了抽象的數字。這就是爲什麼，自從格琳醫生給我治好了傷以來，我就希望自己能成爲一個像她那樣的醫生，因爲醫生們在戰爭中面對的，是作爲一個人的傷員，他們的勝利不是別的，而是成功地救下一條腿，甚至一條命。

沒過多久，吳高臣和我就被送回了六零二聯隊。我覺得很幸運，因爲我倆是在同一天歸隊的。要是我單獨一個人離開最高監獄，同志們說不定會懷疑我和敵人作過什麼交易，或者向敵人招供了呢。我倆在六月二十六日被放回來，不約而同地對裴政委講了同樣的話：敵人放我們出來，是因爲覺得我們不像別的「戰犯」那麼重要。伊斯特中尉跟我說過，單人牢房要騰出來關眞正的要犯。經過六個星期的分離，我眞高興又回到自己的夥伴們中間來了。

第十九章 裴政委被捕

有消息說，六零二聯隊全體戰俘將被轉移到三百多里以外的濟州島去。這個消息在戰俘中引起了不安，我可以覺察到籠罩著大夥兒的恐懼和疑慮。有傳言說，臺灣來的國民黨軍隊已經在濟州島集結，在朝鮮受訓之後，將登陸加入聯合國軍——這個傳言後來證明並不確實——於是大多數人都不願意轉移，生怕一去又會落到國民黨人的手裡。

晚上，我去看裴政委。他看見我回來十分高興，向我詢問超林和常明的下落，他說，他們不在身邊，他就像缺隻胳臂少條腿似的。然後他談了他對轉移濟州島這件事兒的分析。他覺得敵人是打算一箭雙鵰：第一，把我們與朝鮮戰俘隔離，第二，動搖我們返回大陸的決心。「不過，我們還沒有做出抵制的計畫。敵人剛摧毀七十六聯隊，隨時可以摧毀我們聯隊，所以我們不該給他們任何動武的藉口。」他的臉色疲憊，頭髮多了幾分灰白，但他粗糙的臉上仍然顯示出堅定的決心。

他的話給我壯了膽，我就向他匯報七十六聯隊那天遭美軍攻擊和摧毀的經過。我說著說著竟忘了分寸：「我不知道爲什麼要扣押貝爾，犧牲那麼多朝鮮戰士的生命不值得。他們整個突擊隊都被美國兵幹掉了，死傷至少四百人。」

「幹革命就意味著犧牲嘛。」他嚴肅地說。「當然，這個勝利的代價是高了些，但我們達到了讓敵人在國際上丟臉的目的，他們說我們全都不願意返回自己祖國，我們這麼一做，就揭露了他們的謊言。」

我馬上意識到自己說得太多了，可又剎不住，還是不由自主地說下去：「我只是爲那些朝鮮戰友難過，他們全都很英勇，舉著竹竿子朝坦克衝。」

「朝鮮人急起來可以不要命的。」他一笑，舉起綠茶缸，喝了一大口熱水。

我又談了對朴先生的印象，還有朝鮮共產黨的力量已經如何滲透到「戰犯」的監獄裡去，還講了很多我們滯留七十六聯隊以後的情況。他對我們所受到的禮遇感到有趣，聽到牛肉餡餃子一節，他下意識地舔了舔上嘴唇。

第二天一大早，一輛吉普車頂著高音大喇叭停在戰俘營大門前。有人用中文大喊：「裴山，你要是有種，就給我爬出來，要不然讓你們所有赤匪沒有好下場。」

我鬧不懂這些傢伙幹嘛不進來抓裴政委，也許他們不知道他現在變成什麼模樣了吧？儘管他們手裡有照片，可能還是會認不出他來，他的相貌變了；留了鬍子，又比幾個月前瘦了很多。旁邊有人告訴我，快一個星期了，吉普車每天早上都來這麼喊一通。

大喇叭又叫起來了，這次用英語：「裴山，你馬上給我出來，要是等我們進來抓你，可就沒這麼客氣了。」

我們隊部這邊沒有反應，裴政委坐在屋裡一邊抽菸一邊在跟別人說話。三天前，他召集了一次會議，討論了怎麼應付敵人的要求。他甚至說，爲了整個聯隊免於毀滅，如果共產主義團結會認爲他應該向敵人自首，他願意執行集體的決定，自個兒站出去讓敵人抓走。當然，沒有一個人同意讓他站出去。大家決定不理會敵人的恐嚇。聽敵人叫喚的口氣，一時半會兒大概還不敢闖進來搜查。七十六聯隊的大屠殺剛剛引起國際輿論的譴責，一群歐洲觀察員已經來看過被燒毀的營房，拍了照片，甚至採訪了朝鮮戰俘。所以，敵人現在可能有幾分收斂。另一方面，我們也擔心，要是裴政委落到敵人手裡，他們就會把他留在巨濟島，很可能給關到戰犯監獄去，這樣，在我們被轉移到濟州島時，就群龍無首了。也就是說，敵人可能正在有計畫地把我們的領頭人與我們隔離。

裴政委也意識到這種可能性。他又準備了兩套領導班子，以應付敵人可能把幹部抓走，或把我們打散關押。他還把黨員組織成小組，以保證基層領導。這樣，即使頭頭們都被抓走了，黨的領導仍然存在。最高負責人的安排是這樣的：如果裴政委不在了，就由趙騰代替，趙騰是個急脾氣的武夫，長了一張平臉。如果趙騰也不在了，就由張萬仁接替，他這人雖然反應慢一些，但人很靠得住。現在我可理解裴政委是多麼需要超林和常明了；他們倆比別人都能幹。

再過三天就是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一周年的日子，領導決定要慶祝一下，搞一次對敵示威，不必太大，只是個象徵性的行動，要向敵人表明我們的力量，也向大家表明黨的存在。裴政委讓我在牌子上用英文寫幾條標語：「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一定要回家，建設祖國！」「打倒美帝國主義！」「永遠跟著共產黨！」等等。

可是，六月二十九日傍晚，示威活動正在計畫中，斯馬特將軍突然來了。吉普車一到大門口停下，他就用擴音器大聲宣佈：「六零二聯隊的全體戰俘請注意，我命令你們明天一早離開這裡，分乘兩條船到濟州島去。你們在那邊將住進新營房。如果有人抗拒，我們將強行轉移你們。」一個中年翻譯把他的話翻譯給大夥兒聽，大夥兒聽後都不吭聲。

斯馬特走後，隊部裡馬上召開了緊急會議，我負責記錄。沒有白紙，我只能在我那本《聖經》的空白處簡單記幾個字，好記得誰說了什麼。大家在商議應不應該和平地轉移濟州島。裴政委說：「也許這次我們不應該對抗，好爲今後的鬥爭保存力量。」

有人不同意，覺得要是我們屈服於敵人，就是丟祖國的臉——朝鮮同志剛剛獲得一次巨大勝利，正看著我們呢。他們主張集體抗爭，或者至少給美國人製造點麻煩。

「我覺得你們說的有道理，」政委說：「但是我們對濟州島的形勢一無所知。誰看守我們？美國人，南朝鮮人，還是從臺灣來的國民黨部隊？轉移過去的只有我們嗎？島上還有其他軍隊嗎？有這麼多未知數，我們現在應該對一切行動採取謹慎態度，不能消耗太多。」

「我擔心敵人另有企圖。」說話的是一口金牙的趙騰，我們名義上的聯隊長。

「沒錯。」另一個人附和著說。

「要是上船以前，他們把首長都帶走怎麼辦？」第三個人問。

裴政委眼睛一亮。「我也想到了，那是很可能的。現在咱們商量一下這件事。」

「我覺得咱們非抵制不可。」趙騰說。「首先，我們應該向敵人顯示抗爭的決心，這樣，他們來抓你時就會明白，即使他們把你找到了，也別想輕而易舉把你帶走。」

「我不想讓咱們的人冒險。」裴政委微微漲紅了臉。我這還是第一次看到他的臉變了色。

「這我們都知道，但這是不可避免的。」

一個光頭漢子插進嘴來：「這也是一次機會，給美國人製造點醜聞。要是他們膽敢開槍和燒帳篷，他們就會遭到全世界的譴責。」

更多的人主張抗爭。裴政委似乎很難說服大家，因爲這裡邊還有個大家對他個人安全的考慮。他現在遠不如過去那麼斬釘截鐵了，又經過一個鐘頭的商議，他最終讓了步，不過他提出了條件：「明天早上我們不走，除非他們進來強迫我們走。但是我們一定要保證無人死傷，不要流血。我們只需要消磨美國人的耐心，讓他們自己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會議之後，我仔細把裴政委的話想了又想。他制定的折衷計畫讓我感動。他從來不曾如此謹慎、不想讓手下的戰士冒險。忽然，我心裡冒出一個念頭：他提出和平轉移，可能打的是個人的小算盤？硬抗，會使他陷於不利境地，一旦他落到美國人手裡，他們會因爲他策畫了抗爭而對他懲罰更重；他們一氣之下，打傷他甚至打死他都是可能的，然後推說是個意外就是了。換句話說，他一定心懸到了半空，擔心著自己的人身安全，他知道，他若是沒有幾千人在他周圍，他就得聽憑敵人擺佈。想到這裡，我對他決策的感受就複雜起來，一方面，我完全贊成他說的，不要和敵人硬抗；而另一方面，我覺得裴政委骨子裡並不是一個反對武力抗爭的人，他只是太擔心後果了，才主張採取相對低調一些的抗爭。

第二天早上八點，滿滿六卡車美國兵開到我們聯隊。領頭的人生著一張刀削臉，大聲命令我們拿上行李出來，到院子裡排隊，但沒有一個人動。美國兵在外邊等著，整個戰俘營安靜得出奇，好像所有的人都睡死了。當官的把命令又喊了一遍，還是沒有一個人動彈。營地裡靜得可以聽見擴音器裡傳來的吱吱嘎嘎的靜電脈衝，和一群小鳥在歪脖子柳樹頂上的嘰喳叫聲。

美國人等了大約半個小時。然後，大門被打開，他們衝進來了，一邊朝帳篷裡扔催淚瓦斯罐，一邊往裡闖。整個營地立刻毒煙瀰漫，大家大咳特咳起來。

「都他媽的給我滾出來！」那當官的大喊。

這時候，幾團黑煙從西邊的兩個帳篷上升起來。肯定是我們的人自己放火燒的，要讓人看著像是美國人幹的。幾分鐘以後，我們都走出帳篷，人人拿著自己的行李，很多人用濕毛巾捂著鼻子。在一個連的美軍包圍下，我們在院子裡排好隊。那當官的命令三百名戰俘去救火，還吼著：「媽的，我會一個一個地審問你們，不

把縱火犯審出來不算完！」

兩輛救火車開來，沒費事兒就把火撲滅了。

一個班的美國兵把我們帶出戰俘營，隊伍兩邊都有衛兵押著。一走出院門，一百來個親國民黨的戰俘出現在大門外。他們揮舞著手裡的棒子，還朝我們扔石頭，用各種髒話罵我們，有的甚至高喊：「把他們餵鯊魚去！」「把他們塞到煤窯裡，一直幹到死！」「把他們扔到海裡去！」「共黨，你們的末日到了！」

我以前從來沒見過這些人，不知他們是從哪個聯隊來的。突然，他們隊伍裡的一個年輕孩子跳出來，直朝著我們跑過來，一邊高喊著：「我想回家，讓我跟他們一塊兒走！」我們都嚇了一跳，停下來看，見那孩子頂多十四五歲，我覺得好奇怪，他以爲我們這是要回中國呢。一個壯實的傢伙在後邊追他，揮著一把自製的砍刀，咆哮著：「小兔崽子，看我不剁了你！」那孩子還是豁出命地朝我們這邊跑。

一群美國兵又是叫又是吹口哨，那個跟我有過交情的下士理查德正好站在旁邊，只是好玩地看著。我叫起來：「理查德，快救他！」

他跨步向前，用步槍對著那追過來的人，喝令：「站住！」

那傢伙一下子站住了，然後大聲抗議起來：「那小雜種是個共黨。我得讓他嚐嚐這個。」他把砍刀在空中一劈，還直跺腳。

理查德不管他說些什麼，只用步槍指著他胸脯，說：「你回去。」他把下巴朝他們那夥人那邊一揚。

那人洩了氣，只好返回自己隊伍。那孩子跑到我們隊伍裡，不停地哭，臉都扭歪了。理查德食指和中指並攏，向我敬了個禮，我也還了他一個禮。

我們長長的隊伍一直蜿蜒到海岸邊。幾個腿瘸了的人走不快，被同志們架著走。我走在裴政委身邊，他看上去很虛弱，厚厚的嘴唇全都乾裂了。他說，昨天晚上他一夜沒睡好，弄得偏頭疼。海風勻勻、暖暖地吹著，微微帶著腥味，吹來村子裡燒木柴的氣味。微黃色的海水出現在眼前，水面上有幾隻灰色的船帆。山坡上的柳樹林和柏木叢，像是被鹹澀的海風吹得長不動了。左邊的岩石峭壁濕乎乎的，被升起的太陽照得錚亮，露珠在懸崖上的小樹上閃閃爍爍。路邊草地上到處是蜘蛛網，看上去就像一朵朵飄著的小海蜇。隊伍中湧動著明顯的不安，因爲有傳言說部分戰俘會被送到加拿大去，像小白鼠一樣充當化學武器的試驗品，還有些戰俘會被送到一個日本孤島上的金礦去做苦工。人一上船，天曉得敵人會把我們送到哪兒去，他們說轉移到濟州島，沒準兒從一開始就是在騙我們。

在一個山坡的松樹林邊，幾個光著腳的男孩子，穿著鬆垮垮的短褲，拎著彈弓在打鳥。有個孩子拿著根柳條，上面串著十幾隻死鳥。林子裡還有很多山雀、麻雀之類的小鳥在歡叫。年齡最小的一個孩子，舉著一根樹枝子，枝子頭上綁著一個鐵絲圈，上面裹了好多層蜘蛛網，他用這傢伙粘蜻蜓，好拿回家餵雞鴨。我一直看著這群孩子們，直到他們消失在樹林裡。

走過了山坡，海灘就出現在我們面前，長長的一條，像沒下種的稻田，海灘的北端，挨著碼頭的地方，停著兩艘巨大的黑船，兩側的船幫上刷著白色的朝鮮字，我們誰也看不懂是什麼意思。兩艘都是貨船，噸位一定超過三千噸，一對高高的大煙囪噴著黑煙。海灘上，幾百名美國兵持槍列隊；斯馬特將軍戴著鋼盔，也在那裡等著我們，他身邊跟著幾個下級軍官，還有二十來個中國人，穿著印有「戰俘」字樣的軍服。

我們按命令在海灘上站成十八行，每個軍官帶著一個中國人來到每一行的前頭，開始對我們挨個兒辨認。「叛徒！」有人開口罵那個走過來的中國人。他們一定是在找裴政委，他就站在我旁邊。這些中國人都是我們師的，以前都見過裴政委；也許他們怎麼都認得出他來，裴政委的臉讓人很難忘記，一雙明亮的眼睛，肥厚的

鼻子和大耳朵。要是他們認出他來，我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

眼看辨認我們這一行的兩個人越走越近。我盯著他們，盡量讓自己不顯出憂慮。他們走過了我，那個獐頭鼠目的中國人舉起手一指裴政委。美國軍官轉頭大喊：「找到他了！」

十幾個美國兵衝過來。裴政委跨步出列，轉身朝我們揮揮手，沒吭一聲就跟他們走了。整個拘捕過程這麼順當，簡直讓人難以置信。要是敵人拘捕到的是朴先生，朝鮮人肯定都會發起狂來，一齊撲上去跟美國兵拚命的。

「怎麼樣啊，裴先生，我們終於見面了。」斯馬特將軍冷笑道，上嘴唇撇得老高。

裴政委沒有說話，側臉對著我們，好像要使我們沒法看到他整個表情。有人在後邊戳了一下我的背，我轉身一看，是趙騰。他悄聲對我說：「過去，跟他們說，裴政委不跟我們走，我們就不上船。」

我不敢，怕美國兵不讓我上前面去。趙騰推了我一把：「快去呀！」

我跨出隊列，朝裴政委走過去。「站住！」一個美國中士對我吼起來。

「我有件急事要報告斯馬特將軍。」我邊說邊高高舉起了雙手。中士走過來，在我腰間搜摸一番；然後站開，讓我過去了。

我走近大塊頭的將軍，說：「我奉命來報告您，裴政委不跟我們走，這些人一個也不上船。」

他轉身看了看這群滿臉灰塵、憔悴消瘦的戰俘，我也看著我的同志們。我可以清楚地感覺到大家的恐懼和憤怒。他們屏神斂息，所有的目光都緊盯著我們。我又說了一遍：「斯馬特將軍，要是你把裴先生帶走，大家就全都不上船。」

「你是誰？」

「我只是一個普通士兵，碰巧會說英語，一個傳話的。」

「跟他們說，可別嚇唬我！」

突然，一個聲音暴叫起來，「我們不上船！」那是趙騰。

六千人幾乎都跟著他一齊喊起來。美國兵被這巨大的音量嚇了一大跳，我也吃了一驚。這才意識到，我的同志們有多麼的擔心，多麼的需要裴政委做大家的主心骨。對於他們來說，裴政委是唯一有能力領導和組織他們的人，要是沒有他，他們就完了。他就是黨的化身。

「把裴政委還給我們！」一個聲音吼起來。大家又一次跟著一齊喊。

斯馬特將軍乾笑一聲，但他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雖然沒有武裝，我們的人數卻十五倍於美國兵。要是動起武來，對雙方都將是大災難。斯馬特將軍只好傳令先叫一個攝影師來，給裴政委拍照，又轉身對一個副官模樣的軍官交代了幾句。與此同時，戰俘們還在繼續高喊著。

攝影師來了，裴政委示意我走過去，他想和我一起照這張相。斯馬特將軍皺了皺眉頭，卻也沒有阻止。於是我走到裴政委旁邊，和他一起照了相。

照完之後，斯馬特將軍站直身子，對裴政委說：「好吧，我們從來沒打算傷害你，你可以和他們一起去濟州島。但是從現在起，我們要把你和別的犯人分開。」

我把他的話翻譯給裴政委聽，裴政委點點頭，顯得很滿意。

這樣，他被帶上了第二條船，我則回到了隊伍裡。我們看著他走進靠船尾的一間小船艙。其實我心裡有點懷疑，美國人到底有沒有打算過把裴政委扣在巨濟島？但不管怎樣，這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勝利。趙騰拍著我的肩膀說：「俞元，幹得好！」

然後我們就開始登船了。

第二十章　到達濟州島

我們進入船艙以後，大船又過了兩個小時才起錨。我們這個艙裡擠了五百來人，有人能坐著，有的人只能站著。每一點空間都擠得滿滿，誰也不可能躺下。沿牆玻璃底下的一排燈發出暗淡的光線，照在戰俘們的臉上，使他們的臉色更加灰黃。還好我正好抵著牆，想辦法在一個角落裡安頓下來。地面上的灰至少有半寸厚，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濃烈的家畜糞便味兒——這船以前一定是運肥料或鳥糞的。離我十米開外，一個傷了腿的人在哀號，但是這裡沒有衛生員，誰也幫不了他。有兩個人站得累了撐不住，竟坐在他那條好腿上，不過，大家一斥責，他們就趕快站起來了。我對美國人這麼對待我們非常憤怒，他們爲什麼不多弄幾條船，或者讓我們分批走？

很快，船艙裡就變得臭氣熏天了。四周一片咒罵聲，都蓋過輪機的吼聲了。站著的那些人支撐不住，變得越來越暴躁起來，用胳臂肘互相推搡。船艙裡的後牆邊放著一排油桶，都鋸成兩半，我們管那個叫「蜜桶」，在戰俘營裡那是用來當尿盆的。航行開始時，人們只是往那裡邊嘔吐，但很快，大家就開始往裡邊拉屎撒尿了。大船一搖晃，這幾個油桶就四處亂滑，甚至歪斜。其中兩個油桶後來翻倒了，尿水流了一地，可是誰也沒辦法，只能待在原地，有些人的鋪蓋捲兒就浸泡在屎尿水裡了。不到實在憋不住，沒人會一路搏鬥，上油桶那邊去大小便的，倒不是因爲眾目睽睽之下臉上掛不住，而是因爲只要一走開，原來的地方就沒有了，這樣就只能一直夾在人群中硬站著了。

我定在角落裡不動地方，闔上眼睛不看這地獄般的一幕。我半醒半迷糊，時不時地睡過去一陣子。不知迷糊了多久，頭頂上一聲金屬的巨響把我驚醒了。甲板上的艙門被打開，一陣風撲了進來。哈！新鮮空氣！我貪婪地大口吸起來。接著，一條麻繩拴著一只鐵桶降下來，裡面裝滿了冷米飯。艙門附近的人立刻開始爭搶起來，周圍則罵聲四起。在他們又推又擠時，頂上又降下幾桶來，但大多數人根本就擠不過去；結果，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搶到了飯，吃上了幾口。我離飯桶太遠，索性也就不費那個勁兒了。

米飯之後又放下了五桶水，一大半都澆在艙門底下的人身上了。這米飯和水就是我們的晚飯，吃不著喝不著的就餓著。其實，就算我搆得著飯桶和水桶，我也得想想要不要吃喝？因爲害怕回頭要撒、要拉啊。

我盡量不看眼前的恐怖景象，便去回想白天在海灘上發生的事情。我們上船之前，趁美國兵的注意力被兩個故意打架的戰俘分散開時，趙騰和張萬仁兩位領導悄悄走到我旁邊。他們表揚了我「與斯馬特的談判」，說這是個「重大勝利」。我覺得他們說得太樂觀了，便把斯馬特當時對裴政委說的告訴了他們：「你可以和他們一起去濟州島。但是從現在起，我們要把你和別的犯人分開。」他二人聽罷都有些不解。我們翻過來倒過去，絞盡了腦汁琢磨，想弄清斯馬特這話的眞正含義。他似乎是說，裴政委和我們都會待在濟州島，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個好消息，因爲這表明濟州島上的確有個戰俘營。斯馬特的話還意味著，美國人不會中途把我們弄到什麼地方幹掉。這樣我們便覺得稍微放心些了。

大船顚簸起來，旁邊有人又嘔又吐。我閉上眼睛，繼續想心事。裴政委在海灘上爲什麼拉我和他一塊兒照相呢？我弄不懂。我敢肯定他並不是出於好心，或是感謝我幫了他，但是我又猜不出他的動機。也許他是出於習慣，憑直覺見機行事？這樣一想，我就漸漸開了點竅：照片上有我，至少可以看出來是在哪天，在什麼情況下照的，敵人要想爲了宣傳而造謠就不那麼容易，這樣，裴政委的上級就不能懷疑他跟敵人合作過。多聰明的

人！我不得不佩服，雖然我對被人這麼利用一把，心裡頭有點疙瘩。

想得累了，我就努力打瞌睡。偶爾我腦子裡也會升起一團陰雲，不知我們這是往哪兒去。我周圍的人在議論，美國人會不會逼我們像苦力一樣幹活，或送我們上戰場，所以我忍不住猜測各種可能。比起那些需要搶地方的人，我算運氣好的，坐在角落裡很安生，還睡了幾個小時，直到大船終於停下來。

天快亮時，我們在濟州島北面的一個碼頭上靠了岸。我們被帶出船艙，登上岸。有四個人腿傷得厲害，動彈不了，被留在船上，只有一個通訊員守著他們。當時我們誰也顧不上想他們，人人都急於出艙去呼吸新鮮空氣、伸伸胳臂和腿。我們在岸上舒展夠了，才有人回去把那幾個傷員抬下船。海灘是一片沙地，海水也不再那麼黃，幾乎是碧綠的了。大家把傷員一個個放在沙灘上。「水，誰有水？」有個人把手在嘴邊圈成喇叭，大聲地喊著。沒多會兒，盛著半壺水的一個水壺傳過來了，給那四個躺著呻吟的傷員喝。

半小時後，一輛救護車開來，把他們送到醫院去了。海岸上的晨霧還沒有散去。一條碎石小路沿著白色的海灘延伸，消失在白茫茫的霧幔裡。透過薄霧，我們可以看見幾輛推土機停在附近的建築工地，一動不動，像黑色的暗礁。這時候，裴政委才從另一條船上下來，但旁邊跟著兩個美國兵。我們都在沙灘上集合以後，太陽終於出來了，驅散了東南邊的晨霧，我看清幾公里以外有幾座高高低低的小山。我們前方，在一個平緩的山坡上，第八戰俘營的輪廓越來越清晰了。這是一個巨大的營地，圈著三道鐵絲網。我們得知，這地方是專門給我們這些要遣返的人建的。營地裡邊，有很多用鐵絲網圈起來的石頭房子，那就是戰俘的住處了。沿著戰俘營的外牆，立著幾個崗樓，下邊的木樁由房樑一樣粗的斜木頭撐著，每個崗樓的欄杆上都有一對探照燈。營地的另一端，靠近大門的地方，有一座磚房，是衛兵室。這裡和巨濟島不同，衛兵室的位置在營地裡邊。美國人在這裡的管理方法似乎不大一樣。

理查德救下來的瘦弱男孩沒待在我們船艙裡，但在沙灘上他看見了我。他無聲地走過來，好像來認一種特殊的關係。他的眼睛在長睫毛下熱切地盯著我，我拍拍他的肩膀，問他：「你叫什麼名字？」

「山民。」他的聲音很清脆。

「他們給你分班了嗎？」

他搖搖頭。我說：「那就跟著我吧。」

他急忙點點頭。

我們的隊伍沿著圍牆走了好半天，才來到大門口。進了營地，我才看清楚爲什麼有這麼多道鐵絲網。整個營地裡邊有十個營場，每一個都圍著四五米高的鐵絲網，裡邊各有八九個房子。這十個營場，分成東西兩大區，分別由美軍在門口把守，兩區之間，是很大的開闊地，西區有四個營場，從這一個到那一個中間，隔著近一百米，東區有六個，每兩個之間的間隔略小，有八十來米。這樣一種格局，便使得各個營場之間無法自由來往和聯絡。另外，海邊上的一座石頭建築裡還有一個小型監獄，距戰俘營北牆三百多米遠。從扣押貝爾將軍事件中，敵人似乎得到了教訓，看到了把戰俘領袖打散的重要性，所以從現在起，他們有意把我們分而治之。

我們被分成十個大隊，每隊大約六百人。山民跟我被分到六隊，這裡的條件不像我擔心的那麼差，設施是新的，總的來說挺過得去。六隊的營房在戰俘營的東北角，裡邊八座房子並列，都是火山岩石牆，油毛氈屋頂。伙房在東南角上，房頂上有個矮煙囪；西南角上是廁所，跟住房形狀相似，只是小一些。不尋常的是，這裡的小便池設在外邊，是一個水泥長槽，與牆成十五度角。伙房和廁所之間是個操場，有四個籃球場加起來那麼大。其他的九個營場，格局基本上也是一樣的。

雖然每間房裡都住七十多人，卻不像在巨濟島戰俘營的帳篷裡那麼擠。沿牆擺開了兩排鋪板；每一排都可

以睡下四十人。這就很不錯了。山民和我被分到一號房，就在伙房旁邊。我剛在床鋪上打開鋪蓋捲兒，就聽見外邊傳來一陣騷動，我出去一看，竟然是裴政委走進我們六隊來了，微笑著衝周圍人揮手。人們立刻高喊起來：「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誓與美帝血戰到底！」喊這些口號，是他們表達狂喜的方式。外邊空地上，還有兩千來人等著分派進營去；他們都看見了裴政委，也歡呼起來。裴政委立刻示意大家要安靜，別引來敵人的注意。衛兵一定是忘了斯馬特將軍的指示，要不然他們怎麼能讓裴政委就這麼回來，還不跟我們隔離？一個美國兵走過來，從鐵絲網外邊遞進來兩個肉罐頭，交給我們隊裡一個戰俘，說：「那邊的人讓我把這個給你們這邊那當官的。」「當官的」，指的是裴政委；「那邊的人」，指的是正在七隊營場外邊等著進入住處的戰俘們。裴政委的出現鼓舞了大夥兒的士氣，很多人甚至流下眼淚，好像一個神，或一個天使，突然降臨在我們中間。他們把裴政委看作是共產黨在這裡的化身。那些人沒有神可以頂禮膜拜，只能把自己的一腔虔誠傾注到某個首長、某個眞人身上，集中到裴政委身上。他能回到我們身邊，可能是一種僥倖，連裴政委自己都對我說：「我也搞不清美國人爲什麼又讓我回來了。」

安置好以後，裴政委在我旁邊坐下，把他的大手放在我膝頭，讚揚我昨天與斯馬特將軍的對話。「俞元，你是個勇敢的人。」一隻蒼蠅落到他臉上，他舉手一拍。「昨天如果不是你站出來，他們一定會把我扣在巨濟島的，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是趙騰讓我去說的。」我實話實說。

「可你對斯馬特說得很好，我對你的沉著鎮靜很讚賞。你讓我意識到我們黨需要更多像你這樣的知識分子。你現在是一個堅強的戰士了，你自己不覺得嗎？」說著，他仰天大笑起來。

「也許吧。我覺得是進步了一點兒。」

「可不止一點兒。惡劣環境使你堅強了很多，再明顯不過了。實話跟你說，我以前覺得知識分子靠不住，是你讓我改變了看法。」

他的話讓我心裡美孜孜的，可不知該怎麼回答。接著，他告訴我，黨又給我記了一功，這次是一等功！上次偷槍已經給我記過一次功了，我感到挺自豪。實際上我也看得出來，大夥兒對我比以前更尊敬了。在戰俘營關了不到一年，我的確變得更堅強了，雖然有時候我還是會感到孤單和軟弱。

下午，一個班的美國兵進來，把裴政委押走，帶到海灘上的小監獄去了，那兒才是美國人原來打算關押他的地方。那是濟州島的最高監獄，裴政委從此就被關在那裡了。

第二十一章　通訊與掃盲

七月中旬，崗樓上的一個美國兵腦袋上挨了一記「消息石」，那是我們隊裡一名戰俘掄出去的。美國兵馬上開槍還擊，但扔石頭的人逃進了附近一間營房，沒給打中。這塊石頭上綁著一份情報，是發給七隊的。七隊離我們六隊有七八十米遠，因爲距離遠，要想扔得到地方，就要在石頭上拴根繩子，先把石頭掄起來轉幾圈，再甩出去。有時候，石頭免不了給甩到別處去了。自從我們到了濟州島，這種「投石傳信法」，就成了各大隊之間主要的通訊渠道。

現在，我們的一份情報落到敵人手裡，首長們都怕敵人會破譯我們自製的密碼。還好，我們編密碼的同志，遵循密碼每月一換的規則，一個星期前剛剛又改了密碼，用字母取代了三個數字。用字母當密碼不太有規律，破譯起來也就比較費勁。衛兵沒看清扔石頭的是誰，就把我們隊長張萬仁帶走了，審問了他一整天，但張萬仁一個勁兒裝傻，一口咬定他根本不知道任何與別隊聯絡的事。敵人把石頭上的情報拿給他看，他光搖頭，說他看不懂那上面說些什麼。最後，美國人跟他說，從現在起，他們將把扔石頭視爲挑釁行爲，並將開槍還擊。所以我們只能放棄投石傳信法，單靠旗語發信號了。

每個大隊都有兩三個會打旗語的信號兵，所以在整個戰俘營裡，我們相互之間可以保持聯絡。最近，我們又發明一套「手勢旗語」，用手的各種姿勢代表不同數字：右手放在胸前代表一，左手放胸前代表二，兩手放胸前代表三，右手叉腰代表四，左手叉腰代表五，雙手叉腰代表六，右手摸耳代表七，左手摸耳代表八，雙手摸耳代表九，雙手遮臉代表零。一組數字發送完畢，就把雙手放下來，稍作停頓；如果發錯了，就搖搖右腳，表示要重新發。四個數字爲一組，代表一個字，在密碼本上可以查到代表什麼字。

儘管手勢旗語設計得挺不錯，可是一旦收發比較長的消息，還是顯得太慢、太費事了。而且，如果雙方隔著東西營區之間的開闊地，距離太遠，信號兵看不清對方的動作，手勢旗語就不好使了。很快，我們又發明了另外一套旗語，叫「大手勢電報」，這套旗語需要四肢更大的動作，更容易引起敵人哨兵的警覺，所以只用在東西兩大營區之間的聯絡上。

需要送比較長的情報時，就要靠掏糞隊了。掏糞工只能在一定時間內，大夥兒一塊兒，才可以出營房、去海灘，但每個隊的掏糞工都會在相同的地點把糞倒進大海。倒糞的路上，他們會在小樹林歇歇氣，就可以把給其他隊的信壓在某一塊石頭，或者別的什麼東西底下。這個放信的祕密地點，是事先和其他聯隊用手勢旗語定好的，所以大多數情況下，消息都可以被順利取走。

儘管各大隊之間經常保持聯絡，我們還是找不到與裴政委聯繫的有效方法。關押他的監獄並不遠，就在海灘那邊，他下午出來放風，活動活動或曬曬太陽的當口，我們都可以看見他。他一般會在監獄外邊停留二十分鐘，散步走過一個長沙堤，沙堤對面有一個小房子，是幾個中國人的住處。那些中國人也是戰俘，但他們願意與美國人合作，所以被派到這兒來看管監獄，監視特殊囚犯。那裡除了關押「戰犯」，還關押「搗亂分子」。時不時地，裴政委可以對我們揮手致意，但距離太遠聽不見聲音。要是我們能跟他說上話就好了。

跟裴政委聯絡不上，意味著整個戰俘營失去一個眾望所歸的領導人。趙騰是早已定好的接班人，可他眼下在五大隊，住在戰俘營的西南角，離東區這邊的人就太遠了。由於沒有黨的集中領導，也沒有任何敵對的親國民黨勢力，戰俘營內幾個星期都相安無事，只是，很多人越來越不知所措了，彷彿失去了方向。

趙騰是個老粗，勇猛有餘，但智謀不足，只是命令我們繼續執行三個月前巨濟島六零二聯隊制訂的三大任務：團結，鬥爭，和學習。現在，每個隊之間相對隔絕，第一項任務已經談不上了。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個「鬥爭」法，因爲這裡又沒有國民黨。所以，唯一可行的任務就是「學習」了，戰俘們就認眞地投入了學習。大隊裡提倡起這樣一個口號：「提高自己，貢獻革命。」

八月初，郝超林和常明不知什麼緣故也給送到濟州島第八戰俘營來了。聽說他們到了，我眞高興。常明我沒見到，超林分到我們旁邊的七隊，我們有時看見對方，就互相揮手致意。他寫了一封短信來，沒用密碼，是掏糞工悄悄帶進來的。從他的信上我得知，常明在西區的四隊。戰俘營裡有他們兩人，領導力量就重新發揮作用了，他們比我們所有人都有能力得多。由於趙騰很難和東區的六個大隊保持聯絡，超林就負起東區的領導責任，趙騰則負責西區的四個大隊。他們兩位首長先互相聯絡，然後，如果有必要，他們再各自聯絡本區的各大隊。超林全力支援學習運動，他知道我們可能還得在這兒待很長一段時間。

我們隊裡一大半人都是文盲，幾個受過教育的人，還有我，就開始教大家認字寫字。沒有紙，但這個困難不難解決。戰俘營外邊還在進行施工，不管什麼時候出去幹活，我們就把廢棄的水泥袋子撿回來上課用。筆比較難弄，有人就用罐頭盒的廢鐵皮做成筆尖，用煙油或草汁當墨水。雨衣釘在牆上就成了黑板，牙刷蘸著牙粉水就是粉筆。紙不夠用，有人就在紙板上鋪一層沙子練習寫字。我們當教員的給大家定下一個基本目標：每個文盲，要在三個月內掌握五百個生字。這個目標乍聽上去挺高，但讓我們驚訝的是，他們大多數人腦袋瓜都挺好使，勁頭也非常高。他們都明白，有了文化，會給他們的人生帶來益處，所以大家都用功得很。我們聯隊裡有一本晏陽初先生寫的《平民千字課》，是當初在巨濟島上，從聯合國設的國民資訊和教育中心領到的。這個中文初級課本很實用，成了我們掃盲的基礎課本。晏陽初是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的留學生，是中國鼎鼎大名的平民教育專家，他在一九二〇年代，在歐洲從事過爲中國勞工掃盲的事業，毛澤東早年在長沙時，還爲他的掃盲運動當過義務教員呢，他的平民教育計畫，獲得過聯合國的資助。但是共產黨掌權之後，晏陽初就禁止回國了。除了文化課，我們還開了算術、地理、歷史、書法，還有常識課。

對那些有文化的戰俘，教員們講課的內容主要是講英雄故事和講解古詩。故事班多半開在中午十二點到兩點，這是敵人衛兵放鬆和打盹的時候。我不常參加故事班，但對我們戰俘中間藏龍臥虎的人才印象深刻。有個叫易文的，完全憑記憶，可以把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還有《聯共黨史》都一章一章地複述出來；還有閔深，可以把一本《唐詩三百首》背個八九不離十；還有一個夥伴，現在我記不得名字了，會唱幾十首民歌，一一教給大家唱；還有一個瞎掉一隻眼睛的，原來是機槍連的指導員，竟寫出了一本中共黨史的小冊子。最讓我吃驚的，還得數我那小朋友山民。

山民才十六歲，被俘前曾是炮兵營的炮火觀察員。別看他大字不識一個，學東西卻極快，而且視力過人，所以他們營便派他觀察敵人位置。他經常一個人爬到山頂上，拿著一個十二倍的望遠鏡，一支手槍，肩背一臺重二十六斤的兩瓦無線電話機。有一回，美軍二十五師一個當官的對部下說，誰能活捉一個敵人士兵，就獎賞誰一個星期的假，於是很多美國兵都出動，到處抓我軍的通訊員或者掉隊的中國士兵。他們切斷電話線，然後等著來修的人露頭，再把他活捉回去。他們還伏擊給前線送飯送水的炊事員。那次山民正在山頂上向指揮所報告敵情，被一個黑人美國兵盯上了。那黑人從後面一下子把山民打昏，然後把他扛上肩，運下山去領獎賞的假期。由於那個美國兵沒拿山民的手槍和電話機，他的上司一開始不相信這個十五歲的孩子是當兵的，可是山民身上帶坐標軸和數字的望遠鏡暴露了他的身分。山民嚇呆了，他們沒打他，但是把他綁在坦克炮塔上運往後方基地。等到了地方，他已經被凍得半死，說不出話了。

被關押一年以後，山民比以前更瘦了，就像一把柴火，可他長高了，差不多有一百六十二公分。看上去並不像十六歲，也就是十二三歲吧，一張蒼白的臉，一雙機靈的大眼睛。由於營養不良，他總是疲乏無力的樣子，手枕在腦袋底下躺著。走起路來，好像腳都抬不動似的。不過，自從學習運動開始，他勁頭就來了。他人很聰明，學起認字來毫不惜力氣，特別喜歡故事班，對講故事的教員簡直就是五體投地。我喜歡看他動人的笑容，那麼天眞、那麼由衷，露出滿口白牙。從住進來的第一天起，他看見我讀《星條報》，就被迷住了。有一回他問我：「學美國字難不難？」

「不難，中國字才更難呢。」我說。

「你學外國話多少年了？」

「十年不止了。」

「哈，要是我也有這麼大本事就好了。」

「你當然能了。我也沒你想的那麼有學問。」

「回國以後，我要去上學。」

他的話讓我難過。這麼稚嫩的年齡，他實在不應該在這裡。他爹媽都是河南的莊稼人，沒錢送他進學校，於是他就當了兵，來到朝鮮。他跟我說過，家裡還有三個弟弟，一個姊姊，姊弟幾個沒有一個人念過書。

山民從來沒讓我教過他什麼，好像這樣的請求會冒犯我，或有損他對我的尊敬。七月底的一天，我提出要給他一對一上課，他高興得不知怎麼好，還說願意一輩子當我的學生。從那天起，我每天教他十個字，還教他組詞和造句。他的記憶力眞厲害，學過的東西從來不會忘。雖然他很少表現出來，我還是很快就注意到，他的求知欲大到一種貪婪的地步。有天夜裡，我聽見他小聲在念叨「燃燒」和「要素」，都是我下午才教給他的。

隨著對他了解的加深，我開始每天再教他兩三個成語，還有乘除法。他當過炮火觀察員，所以有一點算術的基礎，不過不夠系統。只用了兩天工夫，他就會背九九乘法表了，這本事讓我吃驚不小，心想，若是他有機會上中學、大學，他會有多大的出息啊。我又讓他開始記日記，他就一天不落地記起來，有時候三四句話，有時候可以寫一段。我定期檢查，糾正寫錯的地方。同時，我還教他打算盤，我們的算盤珠是用線串起來的豆子做成的，再用一根劈開的筷子把豆粒上下分開。

他也隨時爲我服務，給我刷鞋，洗衣服，給我杯子裡倒熱水，毫不掩飾對我的尊敬和喜愛。他還跟一個當過鞋匠的戰友學了一套手藝，找來四塊從舊輪胎上割下來的膠皮，給我釘鞋底。我教他教得很愉快，很有成就感，這讓我覺得自己還是個別人需要的人。

別的戰俘也都喜歡山民，把他當個小弟弟。這並不是說所有的戰俘心眼兒都好。不是的，很多人因爲苦難和變故而變得冷酷了，對任何情義都已經格格不入。有幾個傢伙簡直就是惡棍，我對他們總是盡量躲著走。山民的性格討人喜歡，誰都忍不住把他當弟弟。他人小，衣服到他身上長得都快到膝蓋了，活像件小大衣，睡在他另一邊的那個大鬍子，就用剃刀幫他把衣服切掉一圈，又幫他鎖好邊。圓腦袋的廣東人韋明，有一次給美國兵打掃營房時，撿到一個用了一半的筆記本，揣回來送給了山民，還在首頁上寫上：「小兄弟，願智慧永遠伴隨著你！」還有個人送給山民一截鉛筆，把那孩子喜歡得整天揣在口袋裡像寶貝似的。等到鉛筆用到只剩寸把長時，又有人用罐頭盒的鐵皮給他做了個筆帽，山民把小筆頭插進筆帽，就又可以用下去了。在濟州島的戰俘生涯裡，山民因爲學習上的進步得到過兩塊「獎章」：一對用鐵片做的刷了紅漆的五角星。

有一天，我偶然發現他在抽菸。他站在伙房外邊，乾裂的嘴唇間叼著根菸捲，一副剛嘗試抽菸、憋住氣不往裡吸的傻樣兒，兩縷青煙正在他皺起的鼻子底下飄蕩。他跟大家一樣，每個星期也分到一盒香菸。我上前喝

道：「掐了！小小年紀，怎麼也抽菸！」

他聽話地趕快抬腳，把菸頭在鞋跟上掐滅，但他一臉委屈，眼睛也濕了。我緩和了口氣又說：「山民，不是我不讓你抽。菸會傷你的肺，你那肺還嫩呢。等你過了十八歲，你看我還管不管了。」

「我懂。」

「你不想得肺癆，對不對？」

「不想。」

「你還想跟我上課嗎？」

「我想。」

「那你現在不能抽菸。」

「我再也不抽了。」

他果然說話算話。從那次起，他一分到菸，就拿了跟別人換吃的或文具。所有戰俘抽的都是沒有商標的同一種菸，白盒子一側印著幾個紅字：自由，公正，和平；另外一側是月亮半遮在雲後面。香菸是戰俘之間交換東西的一種貨幣。山民有時候會把菸送給大家，大家便更喜歡他了。

山民參加掃盲班的三個月之後，就能閱讀中文報紙上的文章了，我至今依然記得我當時驚訝的感覺。有一天，他撿到一張香港出的《大公報》，那一定是給戰俘營管理當局當翻譯的中國人訂的。山民往牆角一坐，就全神貫注地看起一篇賽龍舟的報導來。我時不時看一眼他那張專注的臉，他的嘴唇不停地動著，偶爾掠過一絲笑意。等他看完了，我問他：「有生字嗎？」

他滿臉放光地搖了搖頭。我想對他說兩句祝賀的話，但聲音哽住了。我太爲他高興了。

山民甚至寫了一篇關於南朝鮮總統李承晚的諷刺小品。別人幫他稍稍修改一下，還在我們隊裡上演了，反響挺熱烈。戰爭和關押確實毀了千百萬的生靈，但說毀了這個孩子，就不準確了，他是一個特例，他在戰俘營裡反倒因禍得福。生命是多麼神祕、頑強，又不可思議啊！如果山民待在河南老家，他也許沒有這樣的機會學認字、做算術，他也許只能下地幹活，幫著父母養活弟弟們，或到城裡去討飯……可是在這個戰俘營裡，他倒成長起來，甚至受到一些教育，讓他可能逐漸成爲一個有能力的人。

多年以後，他給我寫過一封信，說他當村裡的會計了，村裡除了他，沒有人會打算盤。他感謝我教給他那麼多東西，又自豪地告訴我，他直到現在都沒有抽菸。他的那筆字，又乾淨，又帥氣。

第二十二章　裴氏密碼

第八戰俘營總管凱利上校通知我們，要我們找兩個人去給裴政委做伴，一個是炊事員，另一個是翻譯，都跟裴政委住同一間牢房。炊事員倒還好找，好幾個人自願要去，因爲當炊事員可以吃得好一點。一個叫海林的被選中了。但是選翻譯就難點兒了，懂英語的人是有一些，每個大隊至少有一個翻譯，不過，爲裴政委當這個翻譯，還另有一項使命，就是要在特別監獄與聯隊之間當一個交通員。我的英語比其他人都好一些，所以我是候選人之一，可是我並不特別熱心去幹這個，因爲當這個翻譯是要被關在牢房裡的，行動更不自由。常明的英語只比我差那麼一點兒，也是一個被考慮的人選。經過各大隊幾個領導之間，主要是趙騰和超林兩人之間的一番商量，常明被派去了。讓他去比較合適，因爲他比我點子多，又是黨員，除了翻譯，他還可以在其他任務，尤其是黨的祕密任務上協助裴政委。

張萬仁隊長很高興我能繼續留在六隊，說他眞少不了我。張隊長是個光頭，一口蟲牙，經常跟我談大隊裡的各種事兒，還徵求我的看法，所以我對戰俘營內首長們的工作方式才知道那麼多，這裡大多數戰俘，對那些事兒完全蒙在鼓裡，嚴格奉行「不該問的不問，不該聽的不聽」的命令。我估計，裴政委和超林一定在萬仁面前稱讚過我，他對我的態度，就好像我也是個領導，把我留在隊部。有一回他甚至問我想不想加入共產主義團結會，來濟州島以後，團結會又開始吸收新會員了。我跟他說，裴政委覺得應該對我多考驗一段日子。他沒法找裴政委核實，也就沒再多勸我。其實，自從四個月前我的申請被拒絕以後，我就發誓再也不申請了，除非裴政委本人親自要求我申請。這是保護自己，不要再丟一次臉的辦法。另外，我也並不相信共產主義。我幹嘛要改變自己，去適應他們的要求？我起碼應該忠於自己的心吧。

海灘上的特別監獄只有兩間牢房，大小都差不多，三四米寬，近五米長，一間關搗亂分子，一間關戰犯；兩間牢房被石牆隔開。有幾個人被當成搗亂分子關進去過，一般一次關個兩星期，從他們嘴裡，我們得知牢房裡的內部格局。常明到那裡去，擔負了一個重要任務：在兩座牢房之間的牆上挖出一個洞來，這活兒他整整幹了一個星期。在南牆比較高的一處，他發現一塊鬆動的石頭，在裴政委和炊事員的幫助下，他把石頭撬了下來，然後三人輪流往裡挖，終於挖出一個窟窿來，這個洞就成了傳遞消息的管道。我們什麼時候需要得到裴政委的指示，就找個信得過的同志，找磋兒和別人幹一架，或找衛兵去挑釁，比方罵衛兵，或朝他們打侮辱手勢之類，這樣他準會被關進那間牢房，就可以通過牆上的窟窿請示裴政委了。等把他放回來時，他再把口信帶回大隊。不過，這種傳遞消息的辦法實在太慢，又不一定可靠，還很不方便，搗亂分子通常最少要關五天，有時候一關就是三個星期，往往等口信帶回來時，戰俘營裡的情況又變了，那命令便已經用不上了。不過，一直到九月初，這個慢辦法仍是唯一的方式。

「裴氏密碼」不是按計畫設計出來的，完全是運氣所至。八月底的一天，我被關到那牢房去了，因爲有個衛兵在我口袋裡發現一張紙片，上面寫著「三大任務之歌」，是另一個大隊的同志們作的曲，趙騰讓我把它交給我們隊長。凱利上校審問了我半個小時，但我一口咬定，我是聽了南牆外邊修路的戰俘們唱了以後，自己記錄下來的。那些戰俘多是九隊的人，都會唱這首歌。上校不信我的話，說我企圖傳遞祕密消息，就把我關到特殊監獄裡去了。這反倒正合我意，因爲我總算能直接與裴政委和常明聯絡了。

我被推進去時，牢裡已經關著兩個人。一個是過去我們部隊的報務員，叫穆樹；另一個是小侯，我們的密

碼員。穆樹是在十隊打旗語的當下給抓住的，小侯因爲在帽子裡藏了兩發子彈，被我們營房門口的衛兵發現。他們對他連踢帶打，又把他拖走，審訊了一晚上。他說，我們手裡又沒有槍——這是眞話，留著子彈是因爲沒準兒哪天用得著。但敵人不信他的話，第二天早上就把他送到這裡來了。他是我們隊裡唯一的密碼員，他人不在了，還眞給我們帶來些損失——暫時讀不了任何旗語了。

小侯和穆樹看到我都很高興，都說關在這黑屋裡實在太無聊了。牢房地面是泥土的，牆是火山岩，一扇小窗戶對著北邊的大海。屋裡潮得很，因爲不到後半晌，屋裡曬不到一丁點陽光。

我被關進來的第一天裡，爲了打發時間，我們就說笑話，講故事，可是沒多久就都煩了，開始打瞌睡。下午兩三點，有人命令我們出去放風，總算可以散散步，上上廁所，呼吸呼吸新鮮空氣了。監獄後邊有一道沙壩，我沿著沙壩往前走，臉朝關著裴政委那間牢房的窗戶看去。我一下就看見常明正盯著我，從窗上鐵條後邊衝我招手呢。他鬍子拉碴、滿面灰土，卻是精神十足，兩眼放光。我們是不許接近那扇窗戶的，我只能點點頭，表示看見他了。附近有間小屋，住著管理監獄的中國戰俘，他們的任務之一，肯定是偷聽我們的談話，再向美國人報告。所以，在放風的路上，我閉口不跟穆樹和小侯談論要緊事。

放風回來後，穆樹依然坐不下來。屋裡太潮濕了，他不想馬上就坐到濕地上去。小侯和我擠在屋角坐下了，他卻還站著踱來踱去。外邊風大起來，漲潮了，白浪有節奏地拍擊著礁石。屋裡太小，穆樹只能走上六七步就得掉頭，這樣的散步讓他更焦躁。

站著走著實在累了，穆樹也坐下來。我們有一句沒一句地信口聊天、開開玩笑，但聊著聊著，就認起眞來了。我們說起應該做點什麼，不能就這麼「像幾根海參」（這是穆樹的原話）似地坐著浪費時間。大家一起動手，說不定能幹點什麼有用的事來。我們決定成立一個戰鬥小組，他們倆推舉我來當頭，因爲我好歹是個軍官，年齡又比他們大。我雖然有些發窘，還是認可了自己的領導角色。我們想到，戰俘營裡大夥兒最迫切的難題，就是怎麼和裴政委有效地聯絡，我們這個戰鬥組就不能出點什麼力嗎？穆樹和小侯都覺得我們能設計出一種新的聯絡方法。我對信號啊密碼啊都一竅不通，就聽他兩人邊爭邊議，我只是偶爾提出個問題。

我們一連談了三個鐘頭，也沒談出個名堂。晚飯是高粱米粥加幾片醃蘿蔔。晚飯後，門開了，落日的餘暉傾洩進來，映紅了他倆的臉。兩腮凹陷的看守走了進來，這人以前是我們部隊的人，現在成了叛徒，穆樹一看見他就罵起來。雖然他跟敵人合作，但他很可能是因爲受不住刑，只好屈服，穆樹這麼仇恨他，讓我覺得有點過分。那人給我丟下一條毯子，又把一個空馬桶放到屋角，拿走了原來的馬桶。小侯和穆樹對他怒目而視，他卻不敢看我們一眼，只是低著頭。

門又關上了，屋裡又安靜下來。穆樹忍不住又踱起步來，小侯和我閉眼養神，打算睡覺，可是我還一點也不睏。

夜幕降臨了。被切割成窗戶形狀的月光投射到牆上，中間還有四條平行的黑條。我沒心思聊天，也不想動腦子，很快就開始迷糊了。突然，什麼東西從另一側敲在牆上，我們三人都聽見了，那響聲間隔均勻，我們立刻都坐起來；穆樹的大眼睛在黑暗裡直閃，小侯把耳朵貼到了牆上。接著又是四聲，間隔一樣。這回沒錯了！小侯也把牆敲了三下，作爲回答，我們都屏住呼吸，靜靜地聽著。

南牆角的上方，離天篷不遠的地方，傳來一陣沙沙的響動。我們站起來，循著聲音往上看，只見牆頂上慢慢突出一塊什麼東西來。我們站在地上伸長了胳膊也都搆不著，穆樹就蹲下來，讓我踩上他的肩膀，小侯在旁邊扶著我的腿，幫我站穩。我伸手從天篷和牆之間的裂縫中把那東西拉過來，是一個包裹，外邊包著一層防水油布。我們趕快把它打開，只見裡邊是一團熟米飯，和六根四寸來長的烤魷魚。還有一張裴政委用鉛筆寫的便

條：「堅持戰鬥，保重身體，保持警惕，我們很快會見面的。」我們把米飯和魷魚一掃而光，戰犯的伙食比我們戰俘的伙食可口多了。我們都被紙條上的話所感動，三人傳著看了好幾遍，激動得一連幾個小時不能入睡，商議著我們究竟能幹點什麼。對於我們來說，裴政委就像一座燈塔，給迷航的船指明回家的路途。

小侯說：「我們就用關在這兒的工夫設計一套特別的密碼吧，好打通裴政委和戰俘營之間的聯絡通道。」

「我們要能幹成那就太棒了！」穆樹說。

「可我對編碼一竅不通，」我插嘴說：「靠我們三人能搞出來嗎？」

「也許他行。」穆樹指指小侯，小侯正打著嗝，起勁地嚼著什麼。穆樹又說：「別忘了，各隊之間聯絡用的密碼差不多都是這傢伙搞出來的。」

小侯則對我說起穆樹：「他是十隊的信號員，他可以幫我。」

我們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他，然後緊緊擁抱。我告訴他兩人，別看我是組長，我一定服從他們倆的調遣，他們聽了都大笑起來。我知道應該給他們打氣，但我真的想像不來，他們怎麼可能打通這個聯絡通道？等我們一分頭去做事，就碰上了沒想到的困難。要設計密碼，我們卻連紙和筆沒有。在這個鬼地方，我們上哪兒去弄那些東西？小侯悔沒帶上自己的鉛筆頭。我說：「得了吧，就算你帶上它，衛兵也早給你搜走了。」

穆樹用胳臂肘捅捅我：「你看！」他指指窗臺，那上邊有一團白東西。我撲過去抓起那東西——哈！一捲手紙！「美國人想得可真周到！」穆樹大笑：「我在國內可從來沒用這麼講究的擦屁股紙。同志們，我想你們也都沒用過吧。」

「我沒用過。」小侯搖著腦袋，一臉誠意。

我們都咧嘴笑了，當然都是壓低了聲音的。這樣我們就解決了紙的問題，但是哪兒弄鉛筆去？我們都沒轍了，商議好明天早上問問隔壁。

後半夜我睡得很好，他倆卻一夜沒能安睡。六個小時以後我醒來時，他們說我打鼾打得像頭豬。天亮以前，在星星消失、晨霧從海上升起之際，我們開始敲牆。另一邊馬上有了回音。我踩著穆樹的肩膀，對著牆頂的窟窿跟常明說話。我悄聲說：「我是俞元。」

「哎，昨天看見你我好高興。」那邊他的聲音很輕快，但盡量壓低。

「裴政委好嗎？你好嗎？」

「我們都好。」

「告訴你，我們打算爲你們和戰俘營的聯絡設計一套密碼。但我們想先得到裴政委的批准，你幫我們問問他？」我們應該事先通告給首長，萬一已經有別人在做了呢？

「沒問題。」常明回答。

我倆先下來讓底下被踩的人歇口氣。兩分鐘後，我又站上穆樹的肩頭，常明告訴我：「裴政委很高興，說謝謝你們主動想到這麼做，還說他等著你們成功的消息。要我們幫什麼忙嗎？」

「我們需要一枝鉛筆，你們有沒有？」

「我們有一枝短的。等一下，我塞過去。」

我看見穆樹背上濕了一片，趕緊問他要不要我先下來，讓他歇一下。

「不用，我沒事。」他拍拍我的腿。小侯在他旁邊蹲下來，讓我把右腳放他肩膀上去，但穆樹把他推開了。他們聽說有鉛筆了，都十分高興。

沒多會兒，從牆洞裡又塞過來一個包裹，這回裝的是米飯和鉛筆。小侯一把抓走那枝三寸來長的小筆頭，

條：「堅持戰鬥，保重身體，保持警惕，我們很快會見面的。」我們把米飯和魷魚一掃而光，戰犯的伙食比我們戰俘的伙食可口多了。我們都被紙條上的話所感動，三人傳著看了好幾遍，激動得一連幾個小時不能入睡，商議著我們究竟能幹點什麼。對於我們來說，裴政委就像一座燈塔，給迷航的船指明回家的路途。

小侯說：「我們就用關在這兒的工夫設計一套特別的密碼吧，好打通裴政委和戰俘營之間的聯絡通道。」

「我們要能幹成那就太棒了！」穆樹說。

「可我對編碼一竅不通，」我插嘴說：「靠我們三人能搞出來嗎？」

「也許他行。」穆樹指指小侯，小侯正打著嗝，起勁地嚼著什麼。穆樹又說：「別忘了，各隊之間聯絡用的密碼差不多都是這傢伙搞出來的。」

小侯則對我說起穆樹：「他是十隊的信號員，他可以幫我。」

我們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他，然後緊緊擁抱。我告訴他兩人，別看我是組長，我一定服從他們倆的調遣，他們聽了都大笑起來。我知道應該給他們打氣，但我眞的想像不來，他們怎麼可能打通這個聯絡通道？等我們一分頭去做事，就碰上了沒想到的困難。要設計密碼，我們卻連紙和筆沒有。在這個鬼地方，我們上哪兒去弄那些東西？小侯悔沒帶上自己的鉛筆頭。我說：「得了吧，就算你帶上它，衛兵也早給你搜走了。」

穆樹用胳臂肘捅捅我：「你看！」他指指窗臺，那上邊有一團白東西。我撲過去抓起那東西——哈！一捲手紙！「美國人想得可眞周到！」穆樹大笑：「我在國內可從來沒用這麼講究的擦屁股紙。同志們，我想你們也都沒用過吧。」

「我沒用過。」小侯搖著腦袋，一臉誠意。

我們都咧嘴笑了，當然都是壓低了聲音的。這樣我們就解決了紙的問題，但是哪兒弄鉛筆去？我們都沒轍了，商議好明天早上問問隔壁。

後半夜我睡得很好，他倆卻一夜沒能安睡。六個小時以後我醒來時，他們說我打鼾打得像頭豬。天亮以前，在星星消失、晨霧從海上升起之際，我們開始敲牆。另一邊馬上有了回音。我踩著穆樹的肩膀，對著牆頂的窟窿跟常明說話。我悄聲說：「我是俞元。」

「哎，昨天看見你我好高興。」那邊他的聲音很輕快，但盡量壓低。

「裴政委好嗎？你好嗎？」

「我們都好。」

「告訴你，我們打算爲你們和戰俘營的聯絡設計一套密碼。但我們想先得到裴政委的批准，你幫我們問問他？」我們應該事先通告給首長，萬一已經有別人在做了呢？

「沒問題。」常明回答。

我倆先下來讓底下被踩的人歇口氣。兩分鐘後，我又站上穆樹的肩頭，常明告訴我：「裴政委很高興，說謝謝你們主動想到這麼做，還說他等著你們成功的消息。要我們幫什麼忙嗎？」

「我們需要一枝鉛筆，你們有沒有？」

「我們有一枝短的。等一下，我塞過去。」

我看見穆樹背上濕了一片，趕緊問他要不要我先下來，讓他歇一下。

「不用，我沒事。」他拍拍我的腿。小侯在他旁邊蹲下來，讓我把右腳放他肩膀上去，但穆樹把他推開了。他們聽說有鉛筆了，都十分高興。

沒多會兒，從牆洞裡又塞過來一個包裹，這回裝的是米飯和鉛筆。小侯一把抓走那枝三寸來長的小筆頭，

樂得直親它，又把它按在胸前。

我們一刻不耽誤地開始工作。這個工作分兩部分，首先，是編密碼，第二，是發明發送的方法，也就是送出和接收「電報」的方式。據小侯說，密碼並不難編，他已經開始在做了。穆樹和我都完全不懂密碼是怎麼個編法，所以我們倆就只管考慮發送方法，這才是困難的部分，全部要靠我們自己來發明。唉，其實我一點忙也幫不上。要是「電報」發送不當，那麼密碼設計得再好也沒用，可是穆樹能想出來的方法全都不可行。比如，我們各聯隊之間用的手勢旗語，在三百米以外是看不清動作的。打燈光呢？也不可行，首先，我們沒有手電，就算我們有手電，也太危險了，燈光敵人也看得見，可能會對著發信號的人開槍。

我們還能怎麼做？我和小侯苦思苦想這會兒，穆樹又開始滿屋裡踱步了。儘管我是外行，我還是跟他們說，一時半會兒不會找到適當方式，所以先集中精神搞密碼，至於發送方式嘛，什麼時候能想就再想。整整一天，我幾乎一直站在窗前，監視著衛兵和看守。我們小心翼翼地幹著編碼的活兒，小侯把寫好密碼的手紙一直都藏在衣服底下。三人在安全措施上分了工，要是美國兵或看守進來了，我就迎上去說話，擋住他的路，穆樹則脫褲子去蹲馬桶，讓進來的人待不住，免得他搜房間，小侯則趕快把寫密碼的紙塞進嘴裡。

我們一天又一天地絞盡腦汁，仍想不出一個行得通的發送方式。小侯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大半時間裡都在編密碼。吃飯或休息時，他也會出個主意，但也沒有可行的。有天早上，他忽然靈機一動：盡可能把「摩斯密碼」簡化，讓一個點或一個畫都代表一個數字，這樣不僅會加快發送速度，而且能減少混淆。根據這個思路，他和穆樹創造出了「跨步電報法」：發報員站在戰犯監獄牢房的窗前，向左跨，就代表一點；向右跨，則表示一畫；坐下去不見了，就表示開始一組新號碼。點和畫又表示什麼呢？——只是一點，代表一，一點一畫，代表二，兩點一畫代表三，兩點代表四，三點代表五，三畫代表六，兩畫一點代表七，一畫一點代表八，兩畫代表九，一畫代表零。按照慣例，還是每四個數字代表一個漢字。收報員記錄下數字，再交給讀密碼的人，到小侯寫好的密碼本上一查對，就知道發報員說的是什麼了？戰犯牢房的窗戶正對著六隊，裴政委他們在屋裡就可以收發「電報」了。這個方法肯定能解決發送的難題，讓我們高興得發狂，直想大喊大叫！可是我們不敢，我們只是把小侯扛在肩膀上，在牢房裡轉了好幾圈。然後他就又去編密碼了。

鉛筆用禿了，穆樹就用牙咬，把它再弄尖。小侯是編碼主力，睡眠不足，滿眼血絲，我們都爲他擔心，又幫不上什麼忙。沒有字典，基本用字我們想不全，但我們使勁兒想出了八百多個常用字來，這也差不多足夠了，密碼電報不能內容太多，不然就太難掌握，所以我們原本就打算不超過一千字的。誰要想起一個常用字，就趕快告訴小侯。鉛筆寫的那捲手紙，在我看來又複雜又難懂，可小侯要在上邊查來找去，避免重複。我們就這樣一連幹了五天。

一本密碼手冊——用鞋帶捆著的一捲手紙——終於完成了，上面有九百來個常用字的號碼，和「跨步電報法」的指令。在封面上，我們給它取了名字：裴氏密碼。

大功告成了，我們向隔壁作了匯報，裴政委的祝賀馬上就來了，他寫道：「親愛的同志們，你們創下了非凡的成績，表現出了你們的革命責任感和驚人天才！這份密碼，在我們未來的鬥爭中將作出何等貢獻是難以估量的。我在此通告，黨給你們每人記一等功。我代表黨，向你們表示衷心的感謝和致以崇高的敬意！」他的字跡都不像通常那麼端端正正了，從奔放的筆跡中，我看得出他很激動。他居然還有鉛筆用。

我們又一次互相擁抱，爲我們的成果自豪。

接著，卻又冒出一個我們都沒顧慮到的難題：怎麼把密碼帶回戰俘營去呢？密碼的原件得交給裴政委；我們再抄一份倒不難，可我們誰也沒辦法把這麼個東西偷帶回去，在回到戰俘營之前，我們必須過至少兩道檢查

關口呢。我們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看得直撓頭皮，卻一籌莫展，滿屋死靜。

過了好一會兒，小侯冒出一句：「我把密碼背下來。他們總不能搜我腦子，對吧？」

他比我和穆樹在這兒都關得久，也許會比我們先被放回去。我說：「那上面有九百多個字呢，你又興許在這裡待不了幾天了，眞能把所有密碼都背下來嗎？」

儘管有疑慮，可我知道除了這麼做，也沒有別的辦法。穆樹拍著小侯的肩膀說：「乖乖，要是你能把整本密碼背下來，我那個一等功也給你了。」

我們都笑起來。小侯立刻開始背密碼，在兩天時間裡，他什麼也不幹，專心記憶。他必須抓緊每一分鐘，因爲隨時可能被放回去，除了吃和睡，他都坐在角落裡，看一陣手紙捲，閉一陣眼睛，嘴裡不停地念念有詞。

隨著時間過去，他翻看手冊的間隔越來越長了。到第三天晚上，他告訴我們：「我都背下來了，你們可以考我。」

天已經黑下來了，我們都挪到窗前，開始考他。開頭他回答得比較慢，但是很準確。我們越考，他答得越快。沒錯，他全背下來了，連一處都沒錯，眞讓我們吃驚！

穆樹對小侯說：「我過去總覺得你太浮，現在我可懂了，人不可貌相啊。」

我們把小侯高高舉起來，學著美國人和朝鮮人的樣子，大喊著：哈瑞！滿賽！回頭剛把他放下，他立刻就睡得不省人事了。

小侯被放回去之前，我們把密碼交給了裴政委，從那時起，常明在戰犯監牢裡就既是信號員、又是密碼員了。

後來，穆樹常給其他戰俘講我們發明裴氏密碼的故事，小侯也常拿這個來吹一吹。他憑著記憶，用牛皮紙又寫下一份密碼，全戰俘營裡只有他一人會用。不過，他不喜歡穆樹老是說「跨步電報法」是他穆樹一個人想出來的；小侯常常指責穆樹偷了他的「專利」。不管怎麼說，我們的成功成了一個傳奇，成了戰俘故事裡一個經典節目。

密碼的效果很好。現在，我們六隊成了戰俘營的聯絡中心了，因爲戰犯監獄的窗戶正對著我們隊，給那邊發送消息只能通過我們，所有給各隊隊長的指令也都要經過我們傳遞。我可以舉個例子，來展示裴氏密碼的功效。有一回，八隊一個在碼頭上幹活的戰俘，偶然看到一張《解放日報》，那是上海發行的一份大報。那上面有一篇小報導，說中國人民志願軍如何在朝鮮幫助老百姓耕田種地，重建家園，修復被炸毀的堤壩，和挖灌溉渠等等，文章有一百二十字那麼長的篇幅。一天之內，整篇文章就用「跨步電報法」給發到監獄中去了，只省略了七個密碼裡沒有的字。

有了裴氏密碼，裴政委就能夠重新指揮戰俘營中的六千戰俘了。各隊之間的行動又協調起來，在我們跟敵人的周旋中，心裡更有底，目標也更明確了。

美國人一直試圖斬斷我們的通信管道。我從一個南朝鮮軍官那裡聽說，他們曾經請一個密碼破譯專家從夏威夷飛來，那人自稱，只需看三份「電報」，他就可以破譯我們的「叢林碼」。敵人已經截獲了我們不少「電報」，但那個美國專家把所有的紙片反覆看了半天，絞盡腦汁，想解破密碼的邏輯，最終也沒成功。我們用的是兩套密碼：一套是戰俘營內彼此聯絡時使用的密碼，還有一套是「裴氏密碼」，可他連這個都沒猜透。他一個勁說：「什麼亂七八糟的玩意兒，完全不合規範。」確實，我們的密碼非常不合規範，完全根據密碼員的一時興致，所以敵人始終沒能破譯。

第二十三章　一個年輕女人的來訪

穆樹被放回十隊去以後，這間牢房裡只剩下我一個人了。兩天後的一個晚上，外邊下著毛毛雨，大海消失在一層灰色的薄霧裡。我手裡擺弄著一枝鉛筆頭，其實不打算寫任何東西，省得浪費鉛筆。房子後邊，傳來一陣引擎的響聲。

我把鉛筆放進褲兜，起身去看外邊怎麼回事。只見一個美國軍官開輛吉普車，旁邊竟然坐著一個年輕女子，在監獄跟前煞了車。常明和炊事員站在海灘上，讓我心中納悶，怎麼他們又能出去放風了？兩個鐘頭之前他們才放過風啊？

那女子和鷹鉤鼻子的美國軍官下了車。他對她耳語了幾句，又拍拍她肩膀，她便一個人向戰犯牢房的門口走去。她看上去不滿三十歲，長長的頭髮鬆鬆地束著，大眼睛，一張瓜子臉。一開始我還以爲她是朝鮮人，但等她走近些時，我看出來她是個中國人，儘管肯定不是從大陸來的，人長得很嬌小，細細的小蠻腰，穿著一條橙色絲裙，奶油色的上衣，右手拎著一個棕色小皮包，鼓鼓囊囊的。隨著她的腳步，她後背的上衣微微顫抖著，把一波一波的漣漪送到腰間，腳上的高跟鞋不時揚起些白沙。她轉向屋角時，從側面可以看到她胸部臀部的優美曲線。她人並不漂亮，卻挺有風情。

眼盯著她，我感到脖子發硬、太陽穴突突直跳。我足有半年沒看見年輕女人了，這種激動讓我心跳加速。

她來看裴政委幹嘛？看來衛兵是有意安排常明和炊事員離開的，好讓她單獨見裴政委。

我趕快轉到牆南角，把一個空桶倒扣在地上站上去，好離天蓬上那道豁口近點，聽他們說些什麼。海潮已退了，又沒有風，一開始還是聽不清他們的全部對話。我把耳朵貼上去，平下心來，一點一點地開始聽到了。

「啊呀，您在補衣服啊！」她一口悅耳的普通話，輕聲慢語的。

「一個軍人要自己動手做很多事。」裴政委淡淡地回答。「其實，我這是幫炊事員補的。」

「太不容易了，是不是？這類針線活兒不適合您這樣的男人，這是女人的活兒。我來幫您補吧？」

「不用，你是客人，不能讓你碰這些髒衣服，上面有蝨子。你跑這麼遠來看我，已經很感激了。」

「我早就想來看您了。」

「很抱歉，我這裡連個坐的地方也沒有，只能讓你站著。」

「沒關係。我能給您照張相嗎？」

「不要，別浪費你的膠捲。不要不要，要是你照，我只能拿這件衣服蓋上臉了。」

「好吧，那我就不照了。」

「說吧，你爲什麼想見我？我們從來沒見過面啊。」

「沒什麼特別的事，我只想看看您過得怎麼樣。您想家嗎？」

「當然想。我那幾千名戰士同樣想家。」

「您想回中國去？」

「對。」

「您就不能去別的地方嗎？」

「別的什麼地方？」

「自由世界啊。」

「那是哪兒？」

「臺灣哪，美國啊，歐洲啊。這樣好不好？我們到自由世界去，我是說您，您和我一起。」

「這話是什麼意思？」

「只要您不回共產黨中國，您去哪兒我都陪您去。」

「可我本人就是個共產黨！不去中國，我還該去哪兒？」

「您隨時都可以改變。」

「你的意思是叛黨叛國？」

「是啊。」

「那我爹媽可就不認我這個兒子了，連孩子們都不會再叫我爸爸，」他笑了起來，繼續說：「我知道，你不是爲你自己來的，你代表的是美國人和蔣介石。請你回去告訴他們，我已經是朽木不可雕也，勸他們省省事，最好別再爲我費神了。」

「裴先生，您心胸太小。」

「此話怎講？」

「世界這麼大，您可以去任何地方。我就不在乎將來埋在哪兒，只要我在世上活得快活。一個眞正的男人，應該四海爲家。」

「那這樣好不好，你跟我回中國去？」

「不行！您怎麼能這麼說？」

「好女人就該跟著心上人上刀山、下火海。」他說罷開懷大笑。

「我不想與共產黨爲伍，絕對不想。」

「你說你喜歡我。」

「只要您答應去自由世界。」

「行啦，讓我告訴你我怎麼看你吧。」他的聲音變得嚴肅起來，「你是一個海外華僑，似乎是個通情達理的人，爲什麼用這種方式爲美帝國主義服務呢？要不你就是臺灣的國民黨派來的。不管是誰派來的，對一個老頭子施這些詭計，他們付你多少錢？你難道不比那錢值得更多一點嗎？」

「閉嘴！省下這堆廢話跟你們共匪自己說去吧，別跟你姑奶奶嚼這個！」

「喲，沒想到你臉翻得這麼快。」

「你就在死牢裡待著去吧！」

「別忘了拿上你的禮物。」

門砰地一聲被摔上了。我趕快從桶上下來，衝到窗前。那女人怒氣沖沖地從那邊拐過來。一個鐵盒砰地一聲落在她身後，她也不去理會，只顧往車邊走，擺手對美國軍官嚷道：「不行！那傢伙又臭又硬。」

美國軍官伸長了脖子，對著戰犯牢房喊道：「你他媽的，看我遲早不收拾你！」

他們坐進吉普車，在黑暗、潮濕的暮色中，沿著海岸朝東邊的南朝鮮部隊訓練中心開去了。

我想著扔在外邊的那橘色的鐵盒，裡邊裝的一定是糖果或果仁。一個看守大步走過來，把它拾起來打開

了，從裡邊拿出一塊點心，咬了一大口。「嘿，豆沙芝麻月餅！」他衝著在海灘上挖蛤蜊的同伴叫著，邊叫邊舉著盒子向他跑了過去。

一定是快到或剛過中秋節了。這裡看不到陰曆，所以我不知道今年的中秋節是哪一天？

第二天上午，我被送回了六隊。不少人看見吉普車載著那女人去戰犯監獄了，就問我她來幹什麼。我給他們描述了裴政委和她的對話，大家對政委的機智、在女人誘惑面前坐懷不亂，都伸大拇指。這個故事在戰俘營裡很快有了好幾種版本，有的說法誇大得離譜，竟說那女人張開胳臂要摟政委，政委卻從耳朵後面抓出一個大肥蝨子，把她嚇退了。我發現，大家一談到裴政委與那女人的這次會面，總是會取笑一番所有女人，以顯得自己更像個男子漢，在把首長奉爲楷模時，總忍不住吹捧自己。

其實，不論是誰處在裴政委的位置，也不敢接受那女人的許諾。他的炊事員和翻譯就在門外，我就在牆這邊，我們幾個人都有可能聽得見他倆的談話；還有，看守們也都豎著耳朵呢，只有傻瓜才會在那樣的場合下跟她勾搭。我不敢對眾人這麼說，大家似乎都渴望創造出一個英雄來，好讓他們去崇拜。

說實話，自從見過那女人後，我想了她好幾天。她是個什麼樣的人，這麼大膽地來獻身？不管她的動機是什麼，來幹這個也是需要不小的勇氣。她願意給一個她在內心裡鄙視的陌生人當親密朋友，這太讓人心裡不舒服了。她這麼做只是爲了錢嗎？也許是。來引誘一個裴政委這樣的鐵桿共產黨，她的任務該多麼艱巨。實際上，我心裡有點失望，因爲她看上去挺體面的，並不像個賤貨。

另一方面，她對自己的奉獻也許根本沒當眞。要是裴政委眞的肯和她一起去自由世界，還沒到地方她就可能已經把他甩了，裴政委或許早已看穿了這套把戲；要不然，他未必會對她那麼不客氣。他很可能是做給常明、炊事員和我看的，這樣我們可以在其他同志面前，給他當個見證人。

第二十四章　升起國旗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下午，戰犯監獄那邊傳來一份命令：「十月一日，每大隊都要升國旗，以顯示鬥志與決心。」

十個大隊的負責人向下傳達了命令。大多數同志都很興奮。大家正無聊又焦躁，都巴不得在國慶節那天做點什麼。最緊迫的困難是怎麼做旗子和長旗杆，還有如何升旗，如何保護國旗不被敵人破壞。我們六隊的同志都在琢磨上哪兒去弄塊布來，但誰也想不出個好主意。那天晚上，隊長的通訊員文福，一個瘦瘦高高，老是睡眼惺忪的夥計，突然有了個主意。「我們能不能用雨布？」

「你是說，把帶膠的一面刮掉？」一個中隊長問他。

「沒錯。」文福瞇起了眼睛，好像心裡有數該怎麼做。

美國人發給我們每人一塊防水雨布，我們常披在身上當雨衣。雨布的一面是白色尼龍布，另一面是橡膠。第二天上午，文福在伙房後面燒熱了一個油桶，又把雨布貼在上面，沒費多大事，就把那層橡膠剝下來了，令大家好佩服。接下來，我們需要把布染成紅色，可上哪兒去找染料或顏料？有個人用別針刺破手指，把血擠到白布上，可沒過多會兒，血就變成咖啡色的了，所以用血不行。我們想起了紅藥水，趕快派人找大夫去討了些來，這東西效果好多了，我們便決定用它當紅旗的主色。紅色解決了，我們又得設法弄出五顆金星來。有人提議用罐頭盒上剪鐵皮來做，馬上有幾個人就去動手了。這邊有人把那塊尼龍布剪成一個長方形，把四邊

縫好。一大四小的五顆星做好了，我們把五個星都釘到旗子上。大家七手八腳，不到一小時，國旗就做好了。

做好的國旗看了很讓人激動。下面的問題就是旗杆了，這旗杆需要八米高才夠。結果竟然也沒怎麼費事兒：我們隊裡碰巧有兩副擔架，有一回兩個人生病，抬病人用過之後，美國人沒把擔架收走。我們就把擔架拆了，把四根槓子一根一根接起來，就成了旗杆。繩子不缺，但旗杆頂上需要一個小滑輪才好升旗，這東西是不可能弄到的，我們就用一個自製的鐵環代替了。所有準備工作奇蹟般地在一天之內就全部完成了。

雖然我參加了國旗的製作，但從一開始，就預感到將有可怕的事情發生。我太了解裴政委了，除了粉碎敵人「中國戰俘都不願意返回大陸」的說法，他號召升國旗一定另有目的，只是我一時猜不出來目的是什麼。不知怎的，我老是在想，我們那五顆金星的國旗，其實才誕生不久，一共還不到三年呢，同志們對它，是不大可能產生出很堅定的歸屬感的，更別提深切的愛了。那麼爲什麼，他們一下子都變得不惜任何代價也一定要升起它來？

大多數人對執行這一計畫已陷入癡狂。很多人要求參加突擊隊和護旗隊；有人還寫下血書；有位魯莽的同志太激烈，竟當眾折斷自己的小指，表示對升旗戰役的決心。與此同時，我們大家都互相交換了國內家裡的地址，準備著十月一日一旦犧牲，好託別人給家裡捎個信兒。表面上看，我們人人鬥志昂揚，但實際上，我們的英勇裡邊混合著絕望。

竟然當了戰俘，這一直讓每個人感到奇恥大辱，因爲我們應該去死，而不是被敵人活捉。很多人覺得，自己陷入敵手，玷污了國家的形象，我不止一次地聽到有人說，自己「給毛主席臉上抹了黑」。這種負罪感沉重地壓在大夥們的心頭。正因爲如此，自從我們來到濟州島，戰俘營內黨組織就提出這樣的口號，作爲我們行動的原則：「用鬥爭洗刷恥辱，用鬥爭贏回光榮！」這兩句話，在很多戰俘內心裡激起共鳴。現在，裴政委的命令給大家一個機會來發洩自己壓抑的情緒，很多人恨不能立即開始一場血戰。他們甚至覺得，與其像牲口一樣被這麼關著，不如英勇地戰死沙場。於是，突然之間，整個戰俘營進入一種緊張和忙碌——大家都忙著準備和敵人拚殺一番。他們把石頭撿到一起堆起來，把尿灌滿一個個瓶子，收集起所有木棍木棒，從油桶上切割下鋼片做成尖刀，鍛造和打磨匕首。伙房有一些做飯用的煤油，他們把煤油倒進九個空罐頭盒，插進一小節鞋帶當捻子，再用肥皂封上口，用時點燃捻子甩出去，就成了燃燒彈。

大家似乎都自殺式地閉眼不去看敵人的裝備。我很心焦，但什麼也不敢說，怕被指責爲怕死鬼。

九月二十七日，裴政委又發佈了一道命令，要我們「對敵人出擊」，尤其要殺死一兩個美國最高軍官。各隊隊長交換一番看法之後決定，各大隊都做好準備，一有機會就幹掉戰俘營總管凱利上校；如果可能，把戰俘營執行長官麥克唐納少校也幹掉。我們緊鄰的七隊比我們更熱火，我在這邊可以聽到他們伙房內外錘子打鐵的聲音沒有停過。他們一共造出一百多把匕首和砍刀。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各小隊還練習了整整一下午。可是那天晚上，有個叛徒溜出營房，向美軍報告了他們的計畫。

第二天一大早，棕頭髮、大塊頭的麥克唐納少校率領兩個連和三輛輕型坦克開到戰俘營，把七隊的六百戰俘全部強行趕入東西兩區之間的開闊地，挨個接受搜查。從誰身上一發現匕首，就是一頓拳打腳踢槍托揍。最後總共收繳了近二十把刀子和七十把匕首。在整個搜查過程中，麥克唐納少校提著手槍，站得遠遠的，以防戰俘中有人行刺。

七隊遭了大難，我們還按原計畫行事嗎？有幾個領導開始動搖了，擔心敵人也會到自己大隊來搜查武器。就在我們不知該怎麼辦時，裴政委發出了最後一項命令：「明天按計畫升旗。不服從命令者，按臨陣脫逃論處。」這封電報讓我看後感到很不安，因爲它似乎流露出一種絕望。

我們立即將命令向各隊傳達下去，當天晚上，全體戰俘都接到了命令。大家做好行動準備，摩拳擦掌，戰俘營內的空氣越來越緊張。在我們六隊，除了突擊隊和護旗隊之外，還組織了一個救護隊和後勤隊。七隊的同志們剛剛損失了很多武器，所以有些擔憂，怕敵人會再次搜查，因爲他們已經成了十個大隊裡力量最弱的一個了。但他們還是決定要戰鬥一場，組織了一個八十人的龐大突擊隊，又由十五名最優秀的戰士組成了護旗隊，任務是決不讓敵人奪走國旗，如果突擊隊抵抗不過美國兵，護旗的十五人就降下國旗，把它燒掉。我們六隊的護旗隊人數比他們多，有四十人，但我們的突擊隊只有三十人，這表明萬仁隊長可能不想讓我們隊經歷一場血戰。

在夜色的掩護下，我們把三個油桶推到院子當中，在裡面填滿了土，然後把旗杆插進三個油桶中間的空隙裡，再向空隙裡灌滿砂礫。準備妥當之後，我們又溜回房間。我又焦慮又害怕，忍不住地琢磨裴政委的用心。也許他想把北京的注意力吸引到遠離中國的小小濟州島來。的確，自從我們到了這裡，就與外部世界失去了聯繫。戰俘營裡南朝鮮兵不多，所以我們也找不到可以與北朝鮮同志聯繫的人。就連經常造訪各戰俘營的伍德沃斯牧師，也一次都沒來這兒傳過道。裴政委一定感到與世隔絕得太久了，急於造出些事端，好引起外部的注意，向他的上級提醒我們的存在。其實，就連美國兵也很難忍受這裡的隔絕，儘管他們經常在飯廳裡看電影，總是有書、有報紙和雜誌可讀，他們還是感覺無聊和煩躁。有天夜裡，我送一個患急性闌尾炎的病人去醫院回來的路上，看見三個美國軍官站在小溪邊，對著一輪滿月在放槍。我問押運我的衛兵：「他們幹什麼呢？」

「找點樂子唄。」衛兵說。眞沒想到他們竟能隨意浪費子彈。

現在，我可以肯定自己已經猜到了裴政委的動機，他的動機也暴露出他的弱點。他似乎已經失去了一貫的鎮定和耐心，再也等不下去了，想讓板門店談判的代表儘快考慮到我們的存在。他的焦慮中還有一個因素，不大容易看清，這就是，和其他戰俘一樣，他也不知道該做些什麼。其他戰俘都仰望著他，指望著他指明方向，都把他當主心骨；他們卻不知道，政委自己也需要一個主心骨。換句話說，裴政委一定很巴望從他的上級那裡得到指示和肯定。我越琢磨他的動機，就越可憐明天將要頑強拚殺的戰士們。他們都被利用了，儘管是出於自願。

關於裴政委的擔心，我又冒出一個想法。他準是害怕被俘的事實有損自己在黨眼中的形象，也許他需要發動一場戰鬥，獲得些戰果，好改變黨對他的看法。儘快戰鬥一場，無論從哪方面看，對他個人來說都是有利的。我不知道在做這一決定時，常明扮演什麼角色。他是個明白人，肯定能夠看穿裴政委的意圖。

第二天早上六點整，東邊的天空剛見亮，我們就都到後院集合了。其他大隊的人也都出來了。我們隊長張萬仁登上油桶，開始講話：「同志們，」萬仁的小眼睛閃著光亮，「今天，是我們的國慶節，全中國都在慶祝這個莊嚴的日子，我們要和全國人民一道，慶祝我們國慶三周年，同時，也向敵人顯示我們不屈不撓的精神。不論發生什麼情況，我們的國旗一定要在戰俘營上空飄揚，我們將戰鬥到最後一口氣來保衛國旗。記住，紅旗是用革命先烈的熱血染紅的，我們要保住紅旗的純潔，不能讓它在我們手裡褪色……」

他激動得哽咽了，說不下去，便從油桶上跳下來。我們安靜地等著其他大隊結束他們的戰前動員。我聽見超林在對七隊進行動員，他的聲音很有勁兒，但是這邊聽不清他說些什麼，只見他的手在空中有力地揮著，最後聽見他喊道：「用鮮血和生命保衛國旗！」全隊的人跟著他一起高喊。接著他又舉起拳頭高喊：「一定要完成我們的光榮任務！」大家又異口同聲地跟著他喊。後邊這一句話，有可能指的是執行裴政委命令裡的另一項指示——找到機會，就殺死凱利上校和麥克唐納少校。

已經六點半了，我們隊開始唱起〈國際歌〉，在歌聲中，我們把國旗慢慢升起來。我看看四周，只見很多

戰友激動得熱淚盈眶。紅旗在其他營地也陸續升起來了，所有大隊都在此起彼伏地唱著同一首歌。

〈國際歌〉之後，我們又唱起自己的國歌。這時候，戰俘營大門口已經集合了幾百名美國兵。我們看見一隊坦克車從西北角轉過來，衝著我們來了，崗樓上的機槍對著我們瞄準，上邊的美國兵慌亂地叫著，或對著電話機狂喊。接著，凱利上校的聲音從擴音器裡傳出來，命令我們降下國旗，立即回營房裡去，宣稱：「如不服從，我們將強制你們服從。」

我們的回答是高喊口號：「打倒美帝國主義！」「祖國萬歲！」「不達勝利，決不罷休！」「用生命捍衛榮譽！」「送我們回家！」「遵守日內瓦公約！」

八輛M—二四輕型坦克全都開到大門口了，門口的五百多名美國兵，擺開了衝進戰俘營的陣勢。幾分鐘後，兩名衛兵打開了大門，坦克逕直開進東西區域之間的開闊地，後邊跟著頭戴鋼盔的美國兵，有些還戴著防毒面具。他們都端著上了刺刀的步槍，身上別著手榴彈和催淚彈，有十幾人還背著三筒式火燄噴射器。凱利上校派出兩個連和四輛坦克去西區，剩下的部隊大部分去對付七隊，同時，在東區其他各隊的門口也佈置了裝甲車，上面架著零點五零口徑機槍。美軍全部就位後，大腹便便的凱利上校發出了最後通牒，命令我們立即降下國旗，他喊道：「我警告你們，你們過線了。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你們不聽警告，不立即扯下這些破布，我可就不客氣了。」

我們還是不理會他。那些紅旗，雖然時不時飄揚一下，但金屬的五星太重了，多半時候只是在潮乎乎的天空中耷拉著。

凱利上校用手提擴音器命令七隊門口的美軍：「按計畫推進！」山民和我從營房的窗戶往外看著他們，看得我心頭怦怦亂跳。我希望我們的首長去和敵人對話，儘管不一定能解決危機，至少減弱一點敵人的勢頭，讓暴力降到最低限度。只見八十來名美國兵衝進七隊，端著步槍小心翼翼地向幾排營房逼近。整個營地安靜得像個無人區，我忽然看見房子後邊的壕溝裡有人蹲伏著。老天哪，他們竟打算伏擊全副武裝的美國兵！這簡直是自殺。超林他們幾個隊裡的指揮員，爲什麼要讓自己的戰士去送死啊？

在我驚愕之間，美國兵已經離營房不到二十米了。突然，七號營場的突擊隊躍出戰壕，高喊著：「殺呀！」用石頭、棍棒、煤油炸彈、加了漂白劑的熱水瓶子向敵人發動攻擊。同時，後備隊的戰士們喊著口號，把能拿到手裡的東西——破靴子、土塊、石頭、碎磚頭，一起向美國兵扔去。敵人一下子懵了，一時陣腳大亂，有人停下了腳步。一瓶子尿水飛來，砸到一個美國兵的鋼盔上，嚇得那當兵的哇哇大叫——他一定是把那臊水當成什麼酸了。還有幾個人被滾熱的漂白水燙著了，號叫著喊救命，多半是被嚇的，以爲那溶液是某種化學武器。於是他們立刻後撤，但同時對著衝上前來的戰俘不停地開槍，打倒了二十多人，有人當即倒地不動，也有人受傷，伸胳臂蹬腿地慘叫起來。美國兵中間有兩三人受傷，一個排長被石頭打到臉上；他摘下鋼盔，用一捲繃帶去擦他流血的鼻子，醫生給他包紮時，他不住地跺腳大罵。

戰俘們剛把死傷的戰友拖回營房，美國兵就又發動了進攻。這一次，他們先扔出去三十多顆催淚彈和震盪手雷，接著，四個火燄噴射器向營房接連噴火，一下子把屋頂打得燃起火苗，迫使裡邊的戰俘四散奔逃。機槍步槍一起開火，正準備再次出擊的突擊隊，立刻由進攻轉爲防禦。第二梯隊已經完全暴露，失去了所有屏障，也被捲進了戰鬥。一波又一波的戰士衝向美國兵，但全被打倒在地，戰俘營內屍橫遍地，血流成窪，黑煙滾滾，向海上飄去。屋後的國旗幾乎動也不動，彷彿凍僵了。

我敢肯定，裴政委和常明從牢房裡一直看著這邊的衝突。如果超林想讓同志們進行這樣一場惡戰，他爲什麼不在營房裡深挖戰壕呢，就像巨濟島上的朝鮮戰俘那樣？我認爲，就算整個戰役是裴政委發起的，超林也應

該對這麼慘重的傷亡負有責任。

突然，十五名戰俘從最後一個營房裡衝出來，撲向旗杆；他們當中只有一個人手裡有一把短鐵鍬。幾個美國兵也正向那旗子撲過去；他們覺得衝過來的戰俘是來攻擊他們的，就開了火。幾個戰俘被打倒了，但是他們一個人也不肯後退，有個人被打中了大腿，仍然一瘸一拐地往旗杆那邊撲去。我一個一個地數著，在他們撲到油桶跟前時，已經倒下了七個人。幸好敵人停止了射擊，剩下的幾個人飛快地降下國旗，把它點著了。火舌立刻吞噬了尼龍布，國旗變黑、縮小、最後燒光了。

敵軍指揮官把他們燒旗看作是服輸投降的姿態，於是把他的人馬撤出戰俘營。很快，美軍的救護隊趕來了，來救治傷員。有幾個傷員大聲號叫著，向走近的人揮著手。可醫生護士先不管他們，先去查看那些已經不動彈的人。一個美國兵躺在一處營房側牆不遠的地方，身上壓著好幾個戰俘的屍體，他們都是被震盪手雷炸倒的。

七隊這邊激戰的同時，五隊那邊也發生了武裝衝突，只是我們離得遠，看不見發生了什麼，只看見西南邊濃煙衝天，還聽見零星的槍聲。其他八個營場裡的同志乾著急，幫不了七隊和五隊，只有拚命高呼口號，向美國兵亂扔東西，但是他們理也不理。

下午三點多，我們得到了傷亡報告。七隊有五十三人被打死，還有六人死在醫院，一百零九人重傷，被救護車拉走了。五隊死了四個人，二十一人受傷。趙騰也犧牲了，他的死讓我悲哀，他是一個好人，脾氣雖急，卻很正直。去年，在他原來的部隊裡，他槍斃過一個排長，因爲那排長強姦了一個朝鮮姑娘。我和他從來沒有親近過，但我敬重他，作爲幹部，他要求部下做到什麼，都會首先帶頭自己做到。他手下的戰士都愛戴他。

那天下午，我們接到從七隊發來的信兒，說他們取得了「重大的勝利」。超林何必說這種蠢話？我覺得實在不能忍受。很顯然，他並沒有把這麼重大的傷亡當回事。他是個什麼領導啊？在正常情況下，他是應該受到譴責、甚至處分的。我感到沮喪，但又不敢對任何人流露自己的想法，就連對好夥伴山民也不敢。

更讓人驚訝的是，傍晚時分，我們接到了裴政委的祝賀。我看見常明在牢房窗前，不停地向左向右跨步發「電報」，他看上去腰都彎了，不時地捂著嘴咳嗽。除了祝賀我們「光榮的勝利」，裴政委還宣佈，今天所有犧牲的同志都被命名爲「英勇鬥士」，七隊全體官兵榮獲集體二等功，突擊隊全體戰士都記特等功，七隊和五隊每個受傷的同志都被授予一等功。裴政委還號召我們向七隊的戰士致敬，以他們的英勇精神爲榜樣，繼續與敵人鬥爭。

我現在對「記功」之說越來越懷疑了。的確，像裴政委這麼高級別的首長，是有權偶爾頒佈幾道嘉獎令的，但肯定不能發這麼多。他怎麼弄得好像所有嘉獎都在他口袋裡，想往外掏多少就掏多少？我一個人就給記過三次功了，可我從來也沒看見一枚勛章，讓我不能不懷疑這個幾等功的價值。按說，得了大功——比如一等功和特等功，立功的人應該得到提級和提薪，可我們立了一堆功，卻不見誰提到這些。這些嘉獎很可能不過是嘴上說說而已；我覺得裴政委自己大概也沒記下來這幾百個功都是記給誰的。有誰聽說過一個大隊的全體人員都記二等功的？這種濫發的嘉獎已經近乎兒戲，偏偏大家還對此堅信不疑呢，他們把那些口頭嘉獎都當成上級對自己忠於祖國、忠於革命的一種重新肯定，似乎那些嘉獎可以洗刷一些自己的污點。我們隊裡甚至還有人嫉妒七隊，可以立下這些大功呢。

第二天，郝超林代表戰俘營全體戰俘，向美軍提交了一份書面抗議。我們在信中要求凱利上校，讓我們派代表參加板門店停戰談判。凱利上校認爲我們在胡說八道，用他的話說，我們是「一群瘋子」，拒絕了我們的要求，說這可不是他能做主的事。裴政委在他的窗外掛出了一個長長的條幅，那是一條白布單，上面用英語寫

著：「停止屠殺我的同志！」一個班的美國兵趕去，把布單扯了下來，還用槍托狠打牢房裡的三個人。

直到六天以後，我們才獲准爲死難者召開追悼會，但只能在各自營場裡進行。我們一起站在營房前，表達我們的哀思。死者都給埋在山坡上當地人的一個墓地裡了。經過一番討價還價，美國人允許我們每個大隊派五名代表，到死難者墓前獻花圈。我記得有個花圈在用白紙做的輓聯上，寫著這樣兩行詩：

青山處處埋忠骨，
何須馬革裹屍還。

第二十五章 又一個犧牲的性命

我漸漸地明白過來，爲什麼犧牲了那麼多人，首長們仍然認爲升旗這一仗是一個勝利。傷亡他們是不計的，他們只關心事件的新聞價值。死的人數越多，事件就越轟動，勝利就越有影響力。

對裴政委來說，升國旗遭屠殺事件理想的結果，是中國政府和板門店談判我方代表能夠對此作出強烈反應。他一定覺得，中國政府必會藉此事件，展開一個新的宣傳攻勢，讓美國臉面無光。我也感到，六十三個戰俘的死，是會引起國際回響的。

我們等了又等，卻什麼動靜也沒有。沒有記者來訪，美國人也一如既往，沒有任何大變化，這個孤島，彷彿成了被世界遺忘的角落。這種被隔絕的感覺，一定讓裴政委感到越來越難以忍受。而對大多數戰俘來說卻相反，大夥兒似乎一點也不覺得孤立；他們用一種植物式的耐心，繼續過著這種單調的戰俘生活。只要首長和大家在一起，他們就覺得安心——裴政委是眾人的精神支柱。他們一點也不知道，裴政委和大家一樣，他的處境可能比大家還要嚴峻，他也同樣感到擔憂，因爲他是沒有上級可以依靠的。另一方面，裴政委也明白，對很多人來說，他就是黨的化身，所以他不能不顯出堅決和果斷的樣子來。

十月中旬的一天，一個美國兵向一個挑糞工開了槍，因爲那人不小心絆了一下，把一桶大糞濺到美國兵開著的吉普車上了。救護車還沒到，那人就失血過多死了。可是，這樣無理的行兇，卻沒有激起戰俘營內一點騷動，裴政委好像陷入了深深的疲憊之中。

這種局面讓我感到焦慮。表面上，我平靜如常，像一個見多識廣的軍官，但在內心裡，我很害怕我們的國家把我們拋棄了，我也害怕政委又要發起一場戰鬥，好造成又一次新聞事件。我曾經在《星條報》上讀到過，美國在板門店的談判代表把戰俘當作最優先的問題，而北朝鮮和中國的代表卻拒絕首先討論這個問題——他們把精力集中在領土之爭上。我沒有把這條消息告訴任何人，連我們的隊長張萬仁，我也沒告訴。

後來，在我們返回中國若干年以後，我碰巧看到一篇文章，上邊說，板門店停戰談判的北朝鮮首席代表南日將軍，曾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四日，向美方的威廉·哈里森將軍提出抗議，抗議美軍在我們戰俘營內的屠殺，而中國方面對此卻保持沉默。很顯然，戰俘問題不是我們代表團日程上的緊迫議題。當然，我們的代表照常提出了將全體戰俘——包括拒絕回國的人——統統遣返回國的要求。

榆樹和橡樹都開始落葉了，綠草漸漸轉黃。早上起來，大地上常常鋪了一層白霜，號稱韓國最高峰、海拔近兩千米的漢拏山南麓，已經失去了綠色的覆蓋；山上的岩石都裸露出來了。濟州城在我們東邊，在戰亂之中倒還無恙。那裡有一些兩層的樓房和幾百所民宅，屋脊聳立，窗戶上沒有玻璃，只糊著白紙，從遠處看去，就像一堆堆乾草垛子。我曾經和別人一起，坐卡車路過一次濟州城。島上這些民房，和朝鮮本土的房子不同，都是用石頭砌的，屋頂上的茅草都用麻繩均勻地交叉拴緊，以防被海風吹走。從近處看，那些房頂活像些凸起的烏龜殼，一個個小方格子整整齊齊。因爲當翻譯，我偶爾能有機會走出戰俘營。有一天，我站在東面一座小山頂上往城裡看，沉浸在陽光裡的那種寧靜把我深深感動了。一條細細的小溪，那一頭是稻田，讓我想起了長江邊上的農村，我爺爺奶奶的家鄉。雖然到處都是岩石，卻有萱草和野菊點綴其間，這片土地仍是美麗、安寧的。到處都是蒲葦，開出的花長長的，好像毛絨絨的兔子尾巴，在微風中輕輕搖晃。要不是被關押著，我一點不介意在這樣的地方住上一年兩年，遠離世界上的塵囂。若是我沒有和菊蘭訂婚，若是我家裡沒有個老母親，我完全可能娶一個朝鮮姑娘，一輩子就在這裡安家了，就和那些戰爭爆發前就來到朝鮮定居的中國人一樣。島上的那些女人，個個看上去都樂樂呵呵、勤快麻利，挺疼男人；我聽說，她們個個都是爲侍奉丈夫奉獻一生的好媳婦。一個像我這樣的普通男人，除了一個暖烘烘的家，跟一個好女人生上幾個孩子，這輩子還圖什麼呢？更何況這島上氣候溫和，四季分明，雖然常常颳風和下暴雨，卻沒有北方冬天的刺骨寒風和暴風雪。

我心裡怎麼冒出這種想法，這都是我以前從來不敢想的呀。我意識到，自己現在越來越能夠忍耐寂寞了。的確，我成了一個安靜的人，不論什麼時候，我都寧願一個人獨自待著。

我們可以肯定島上有游擊隊活動，因爲好幾次聽到從南邊山上傳來槍聲，那邊山裡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軍隊留下來的碉堡和地道。可是朝鮮同志從沒有與我們聯繫過。我們確實像一群孤魂，外部世界似乎再也不理會我們的命運了。「這比流放到西伯利亞還可怕，那裡至少還會有人去探望。」我常常自言自語。要是能知道等著我們的是什麼該多好，要是有臺收音機，能聽聽新聞該多好。

升旗事件以來，美國人加強了對戰俘營的警衛，他們常常進營場搜查，還在營房周圍巡邏，我們都明白，他們想找到我們藏起來的自製武器。十月下旬的一個下午，一個連的美國兵突然開進來，命令我們從屋裡出去，把全隊人都趕到鐵絲網外邊的枯草地上，每個人把自己所有口袋都翻出來，裡邊所有東西都放到自己跟前的草地上。衛兵逐個檢查我們東西時，我們忍不住偷看那些美國兵在幹嘛：他們拿著鐵鍬、鎬頭、叉子，在我們營房周圍又戳又挖。按規定，他們不得帶槍進營場，除非他們的生命受到威脅，所以，只有在鐵絲網外邊搜查我們的衛兵帶著槍。領人在營房裡搜查的，是我們營場的衛兵頭目拉爾森上尉，他指揮著美國兵對我們的住房和廚房徹底搜查。拉爾森上尉是個魁梧的人，身高超過一米八，略有些髯子，他對著一個中士喊了一嗓子：「嗨，沃爾特，別讓他們跟你耍滑頭。」

「不會的，長官。」中士也回吼道，他正在聽一個戰俘叫屈。

突然，一個大兵從隊部衝出來，大聲喊道：「找到了！」他手裡抓著我們的國旗，我們一直把它藏在一面牆裡。美國人找到了旗子高興萬分，有人竟吹起口哨。有個傢伙披著旗子跳起舞來，其他人則仰天狂笑。拉爾森上尉拿過旗子，把它舉過頭頂，朝著我們揮舞，然後開始敲起腳跟來。

雖然又氣又急，我們卻不知該怎麼辦。大多數人認爲，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他們拿走紅旗，大家還記得五隊七隊那些犧牲的同志，所以摩拳擦掌地要跟美國兵拚命。幾個中隊長悄悄走到萬仁旁邊，幾個人一起商議一個行動計畫。交談之後，他們決定，讓結實的二中隊隊長沈寧，率領一隊人把國旗奪回來。沈寧立即回到自己中隊，吩咐手下的同志如何行動。

美國人搜查完畢，我們排隊返回營房。鐵絲網外邊的衛兵看上去毫無提防，營場裡邊他們的戰利品都還擺在那裡——除了紅旗，還有匕首、長矛、鉗子、手電筒。拉爾森上尉衝我們嘲弄地笑著，大牙根都露出來了。我慢慢朝大門挪過去，對將要爆發的格鬥焦慮萬分。我可以感覺到空氣中的緊張，很多雙眼睛都盯在上尉手裡的紅旗上，他卻對襲擊的臨近毫無感覺。就在沈寧他們走近大門的當口，另一組由小侯帶領的戰俘也出現了，看那架勢，他們也是來對付拉爾森上尉的。沈寧略爲遲疑了一下，不明白小侯他們怎麼也過來了，小侯作爲我們的密碼員，是受特殊保護的，不應該參加這樣的行動。沈寧詢問地看著小侯，小侯沒說一個字，只是對他點了點頭。這時，更多人進了大門。走過拉爾森上尉身邊時，沈寧大叫：「搶過來！」十幾個人一下子圍住了拉爾森上尉，有人抓住他手裡的旗子，拚命往外拽。可拉爾森兩隻手抓住旗子另一頭，就是不鬆手，一邊衝著自己人高喊：「快來幫我！」一時間兩邊拔起河來，把我們嚇得要死——要是外邊的美國兵拿著武器衝進來，我們可就沒法繼續搏鬥了。小侯彎下身，在拉爾森上尉手背上狠狠咬了一口。「哎喲！」拉爾森痛叫一聲，鬆開了手。國旗到了沈寧手裡，他一個箭步跑開了，可是，他一時不知該往哪裡跑，只是一個勁往前衝。一個美國兵抄起一把鏟子，跟在沈寧後面追，沈寧慌不擇路，沿著鐵絲網狂奔。

「放下，你這狗娘養的！」美國兵大吼。沈寧只顧一個勁跑，我們全都嚇呆了！鐵絲網目外邊帶槍的美國兵隨時可能對他開火，不過謝天謝地，他們竟沒有開槍，相反，他們站著看熱鬧，有人還哈哈大笑。

漸漸地，那個美國兵快追上沈寧了，沈寧把國旗團成一團，扔給了瘦小的通訊員文福，文福又把紅旗扔進了伙房正開著的窗子；裡面一個炊事員當即挪開一口大鍋，把旗子放到爐子上，爐中的火燄立刻吞沒了這塊尼龍布。那個美國兵掄起鏟子痛打沈寧，沈寧滿地打滾，卻一聲也不叫。

「狠揍他一頓，讓他好好嚐嚐滋味！」拉爾森上尉叫著，雙手插在腰上。

我們都對那美國兵喊起來，可他還不肯住手。又一鏟子打到沈寧臉上，沈寧立刻不再動彈了。同時，拉爾森上尉命令手下的人，把參與搶旗的人都集中到一起。小侯、文福、炊事員，還有其他被找出來的人，都被強令兩手抱頭，給帶走了。美國兵一路用刺刀頂著他們，把他們押上前門外邊停著的卡車，都帶到戰俘營西邊油庫後面一個大坑去了。當天晚上，沈寧也從醫院裡直接被押到那裡。一共抓走了十八個人。

張隊長很焦急，最主要是擔心小侯的安全，沒有小侯，我們隊和裴政委的聯絡就會中斷了。怎麼才能把他弄回來呢？他們拚命想主意，一時卻想不出辦法來。

從下午到晚上，敵人還不放人。十八個人沒吃沒喝，凍得發抖，只好在坑裡擠在一起。他們頭頂上站著十幾個荷槍實彈的美國兵，一對探照燈從油庫頂上打出兩道強光，通宵照著整個坑內。被押的人很快就困倦不堪，就那麼睡了。天快亮那會兒，美國兵開始往坑裡扔石頭，幾個正睡著的人被打中，受了傷。一大塊水泥打中炊事員前額，切出一道兩寸長的口子，血流如注。但是大夥兒明白，敵人是在找藉口好向他們開槍，所以他

們咬著牙不理睬敵人的挑釁。即使如此，半小時以後，敵人還是用機槍朝著他們開了火。一顆子彈打中了文福的頭部，他當場就死了，其他人舉起他被血浸透的上衣，敵人才停止了射擊。

領頭的中尉帶著五名美國兵走過來，看到了通訊員的屍體。「媽的，這麼準。」他嘀咕了一聲，轉身去叫救護車。

救護車二十分鐘以後開來，拉走了文福的屍體，還拉走四名傷員。其餘的十幾個人，到那天夜裡才給放回來。他們餓了三十多個小時，伙房趕快給他們煮粥吃，因爲人都餓成這樣了，馬上吃乾的，就可能把人吃壞。

老一套又來了：裴政委發來慰問信和嘉獎令——文福被追認爲革命烈士，追記一等功，沈寧、小侯和炊事員黃建，也獲得一等功。現在，隊長的通訊員沒有了，就任命山民接任。我告訴我的小朋友，從現在起，他的香菸應該都給萬仁，因爲萬仁可以保護他。張萬仁是個正派人，從來不多佔自己份額之外的東西，他對這些額外香菸一定會領情的。

我對奪回紅旗這個舉動，心裡頭來回直打架。一方面，我對同志們表現出來的勇氣肅然起敬，我得承認我自個兒就缺乏這樣的熱情和勇敢。可另一方面，我心裡嘀咕，爲奪回一面旗子，值不值得讓人送命？那旗子，雖說是一個象徵，卻不過是一塊尼龍布啊。我發現，在一些戰俘身上有著宗教式的獻身狂熱，他們可以爲了一個教義而捨棄自己的生命——不管那教義可能多麼愚蠢，他們自我犧牲的精神卻使他們卓越不凡。他們很多人都可能成爲英雄。

第二十六章 殺！

我們隊裡人人都對拉爾森上尉憋著一肚子怒火，覺得他對文福的死，對那四位同志的受傷，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每天傍晚，值班的中士會在前院把大夥兒集合起來清點人數，有時候拉爾森會親自到場。我不知道這件事怎麼開始的：十一月初的一天傍晚，拉爾森上尉又來了，他點完人數，剛說出「解散」，突然十幾名戰俘用漢語猛喝一聲：「殺！」

拉爾森懵了，弄不清楚怎麼回事，他四下看看，一把抓住了沒來得及走開的山民，問他大夥兒喊什麼呢。山民用我教過他的幾個英文字，對著拉爾森上尉的臉說：「殺——壞——蛋。」

拉爾森立刻氣得臉都大了，鼻孔也張開了。他伸開雙臂，猛地朝胸前一摟，彷彿能把整個前院都抱進來似地。他提高了聲音，命令大家：「站住！都給我回來，重新站隊！」

大家不情願地又都站到他面前。他說：「我們再做一遍。我要你們解散時，一聲也不出，聽見沒有？」

我翻譯了他的命令，但誰也不作聲，四周一片沉寂，從東南邊山坡上一間稻草房裡，傳來兩條狗的狂吠，接著是鐵絲網外邊野橘林裡一對喜鵲沒精打采的叫聲。南邊天上，半輪月亮被雲彩遮得幾乎看不見。拉爾森一擰脖子，叫道：「現在，解散。」

「殺！」幾乎全體戰俘一起吼了一聲，然後大家各自轉身打算回自己的營房。

「媽的！」拉爾森火了，兩隻大手一舉，「你們統統給我回來，重新站隊！」他氣得直跺腳，可他身後的

美國兵卻挺開心地笑了，好像這熱鬧挺好看。

我們一言不發地又在他面前站好了隊，但所有的人都有幾分喜形於色。拉爾森氣焰高張地說：「我命令你們安安靜靜地解散。我叫你們走時，所有的人都不許張嘴。如果這一次還不按我的命令做，我就一個星期不發你們口糧。」

我把他的警告轉達給眾人，大家只是盯著他，沒有露出任何表情。這時，我看見一絲嘲弄掠過萬仁的臉；他看去挺得意，很想繼續和拉爾森這麼較勁下去。

「立正！」拉爾森喊道。

有些人一磕後腳跟。拉爾森咳嗽起來，咳完又叫道：「現在，解散。」

「殺！」所有的人齊聲大吼。

拉爾森轉身命令身後那一個班美軍：「去，抓幾個人帶到我辦公室。」

美國兵領命衝了過來，有的還揮著手槍，上來抓了三個人，就往外拖。我們都沒想到拉爾森不問青紅皂白就抓人，也沒想到美國兵衣服底下藏著手槍；要是他們沒有武器，我們還可能跟他們搏鬥一番，把三個人搶回來。不等我們回過神來，美國兵已經連推帶搡，把人拖出大門。戰俘們能做的只有破口大罵拉爾森，他卻聽不懂。

幾個中隊長立即在大隊部碰頭，商議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將採取什麼行動。我拿不準與敵人這麼對抗是否明智。那三個人肯定要爲我們大夥兒吃苦頭了，所以我們不應該讓事態升級，無論如何，不能讓拉爾森把他們整得太厲害。可是，光動嘴是不夠的，不行動，不施壓，沒法讓敵人軟下來。在他們爭論時，我坐在一個倒扣著的板條箱上聽著，沒有發表看法。剛接班的通訊員山民坐在我旁邊，可他只顧拿著自製的蒼蠅拍子——也就是一根竹棍上綁著一塊扎了眼兒的破皮子，在那兒一個勁打蒼蠅。他對打蒼蠅自有一套理論，他說，蒼蠅靜止不動的時候你打不著牠，所以你應該在蒼蠅正爬著、或刷腿的時候再打。這時，我看見一隻大黑蚊子正叮在他脖子上，大概是吸血吸得太歡了，看上去彷彿都倒立起來了。我一巴掌打上去，嚇了山民一大跳，看見我手上的血跡，才鬆了口氣。

隊長們很快達成共識：舉行絕食，並要求與凱利上校當面談判。這時天已經黑下來，與裴政委和其他營場聯絡不上了，他們決定：我們大隊明天自己開始行動。

伙房接到命令，明天早上不做飯，所以炊事員們第二天早上都可以睡大覺。天一亮，我們就把昨晚的決定通報給其他大隊，也向裴政委作了匯報。崗樓上的衛兵注意到沒有一個戰俘動窩，就來問我們，營場裡邊怎麼這麼安靜？一聽說我們在絕食，要求凱利上校親自來見，馬上就向拉爾森報告了，可拉爾森並不理會。

整個上午，我們大隊裡邊失去了往日的生氣；大多數人都躺在床上什麼也不幹。不到萬不得已，我們都不可以出房間。隊長囑咐了，不要發出任何聲音，因爲，我們要用沉默讓敵人就範。十點半，炊事員該準備午飯了，但是十個大隊沒有一個煙囪冒煙，所有的伙房都大門緊閉。拉爾森這下子慌了，他沒想到整個戰俘營都加入絕食了。兩個小時前，卡車送來三麻袋大麥，一大筐蘿蔔青菜，但炊事員拒絕接受，就堆在大門口了，拉爾森這時來到門口，站在這堆東西旁邊，一有戰俘路過，他就衝人家招手，那意思可能是想和他們談談，可是沒有一個人理他。他點了一支菸，和門口的衛兵聊了一陣，這時一個門衛遞給他一個擴音器，他拿著擴音器朝我們嚷起來：「我命令你們吃午飯。太陽都快把菜曬爛了，我不能容忍你們這種浪費。」

他的話把一些人逗樂了，大夥兒一邊大笑一邊說：「好像我們的嘴是他的。」

這是第八戰俘營第一次全體絕食。我們在巨濟島時，這種抗議是家常便飯，監獄當局知道怎麼對付，但在

這裡，凱利上校卻慌了手腳，立刻同意會見各隊隊長。我們對他的讓步感到振奮，雖然不能確定他是不是眞有誠意解決問題。

下午，萬仁和我代表我們大隊，來到衛兵總部。會見在凱利辦公室外邊的休息室裡舉行，從各大隊已經來了十幾個代表了，都坐在折疊椅上等著，凱利上校卻還沒露面。超林向我點點頭，我也朝他揮揮手，在他身後坐下。我們並不能自由交談，因爲彭翻譯就坐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背靠在窗臺上。彭翻譯是從臺灣來的，爲戰俘營當局工作。超林轉過頭對我說：「聽說你幫了大家不少忙，」他這是暗指我協助了張萬仁。

我說：「在這種鬼地方，大家應該互相幫忙。」我發現彭翻譯豎著耳朵在聽，就換了話題，問超林：「你們準備好了在這兒過冬嗎？」

「當然，每人又發了一條毯子。」

這對我可是個新聞。我們隊還沒有發過冬的衣服。我心頭掠過一陣絕望，可我還是控制著，看見他上邊門牙缺了一顆，便又問他：「你的牙怎麼了？」

「上個月被美國兵打掉了。」

「這會兒還疼嗎？」

「早沒事了。」

也就是說，升旗那次他丟了一顆門牙，可他對此一點也不在乎。

拉爾森上尉走到前邊，大聲拍了幾下巴掌，打斷了我們的談話。他說：「凱利上校進門時，大家都要起立，聽見沒有？」

沒人吭聲。我坐在萬仁旁邊，被走廊另一頭傳來有節奏的打字聲音吸引了。休息室對面的角落裡，一個陶瓷臉地站了起來，可其餘的人誰也沒動。拉爾森臉都氣歪了。

凱利走到我們面前，銅扣皮帶上，別著把手槍，還掛著個啤酒肚。他呶起嘴唇，對我們說：「我只有十二分鐘，你們只需告訴我，爲什麼要絕食？」

我們預先想好幾項要求，超林就開始向他宣佈。我是翻譯，不知道是不是應該站起來，但我看到超林坐著沒動，我也就沒站起來。凱利上校示意我不必開口，他要彭翻譯來做，這正合我意，我樂得不用費神。

超林說，我們有兩個要求：第一，拉爾森必須馬上放人；第二，戰俘營當局必須對文福被害展開調查，嚴懲兇手。讓我們意外的是，凱利微笑著說：「那三個人我們沒有理由扣著，馬上就送回去。其實他們可能已經在回營房的路上了。」他瞪了拉爾森一眼，好像很不高興他在應付我們方面這麼無能。接著他又說：「調查死亡原因卻要花點時間，在整個調查過程完畢之前，我們不能下任何結論，所以我不能承諾嚴懲還是不嚴懲。」

「那你同意不同意展開調查？」超林毫不放鬆。

「當然同意。就這個案子，我必須給上級寫份報告，所以我會了解此事的。」

「你會把調查結果告訴我們嗎？」

「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討論。」

「我們要求嚴懲兇手。」

「咱們做到哪兒先說到哪兒好不好？你現在該做的是停止絕食。」

「可是我們要求你答應調查這樁謀殺案，嚴懲罪犯。」

「我不是說了麼，我會了解此事的，要是有人故意殺人，我們會依法處理。現在，你們必須開始吃飯。」

訂裡栽著一叢矮竹，旁邊的鐵桌子上放著一個咖啡壺，在咕咕作響。門開了，凱利上校走進來，拉爾森和彭翻譯膽地站了起來，可其餘的人誰也沒動。拉爾森臉都氣歪了。

凱利走到我們面前，銅扣皮帶上，別著把手槍，還掛著個啤酒肚。他呶起嘴唇，對我們說：「我只有十二分鐘，你們只需告訴我，爲什麼要絕食？」

我們預先想好幾項要求，超林就開始向他宣佈。我是翻譯，不知道是不是應該站起來，但我看到超林坐著沒動，我也就沒站起來。凱利上校示意我不必開口，他要彭翻譯來做，這正合我意，我樂得不用費神。

超林說，我們有兩個要求：第一，拉爾森必須馬上放人；第二，戰俘營當局必須對文福被害展開調查，嚴懲兇手。讓我們意外的是，凱利微笑著說：「那三個人我們沒有理由扣著，馬上就送回去。其實他們可能已經在回營房的路上了。」他瞪了拉爾森一眼，好像很不高興他在應付我們方面這麼無能。接著他又說：「調查死亡原因卻要花點時間，在整個調查過程完畢之前，我們不能下任何結論，所以我不能承諾嚴懲還是不嚴懲。」

「那你同意不同意展開調查？」超林毫不放鬆。

「當然同意。就這個案子，我必須給上級寫份報告，所以我會了解此事的。」

「你會把調查結果告訴我們嗎？」

「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討論。」

「我們要求嚴懲兇手。」

「咱們做到哪兒先說到哪兒好不好？你現在該做的是停止絕食。」

「可是我們要求你答應調查這樁謀殺案，嚴懲罪犯。」

「我不是說了麼，我會了解此事的，要是有人故意殺人，我們會依法處理。現在，你們必須開始吃飯。」

「你會不會把調查結果向我們通報？」

「你們先停止絕食，我才會。」

「你說話算話嗎？」

「算。」

「要是算話，我們就開始照常吃飯。」

「什麼時候？」

「今天。」

「好，我很高興聽到你這麼說。」

我沒想到這次對話這麼心平氣和。不知怎地，超林和各隊隊長都沒有提出更多問題。他們本應該問問凱利，他完成全部調查過程大概需要多長時間，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得到他的回音，就像凱利盯著問我們什麼時候結束絕食那樣。我沒有提醒他們這個疏忽，因爲我希望這場危機儘快結束。

我們離開時，上校甚至還和超林握起手，好像他們是多年的老熟人似的。他這個舉動熱烈得讓我吃驚，也讓超林非常不自在，朝著我們直咧嘴。

我們去談判的工夫，三個被扣押的人已經給放回來了，一個手給打傷了，另外兩個腫著臉。雖然我們答應當天晚飯就停止絕食，但在結束晚點名時，拉爾森一說解散，我們仍然喊了一聲「殺！」拉爾森紫漲了臉，一把揪住張萬仁，說：「停止這個無聊把戲行不行？」我把他的話翻譯給萬仁聽。

我們隊長回答說：「你打了我們的人，咱們得扯平。」

拉爾森作無辜狀，說：「我碰都沒碰他們，我發誓。是總部那些人幹的，我已經向他們提出抗議了，我說他們這樣讓我的工作更難幹。你能不能讓你的人別再喊那個鬼字兒了？」

萬仁似乎相信了拉爾森的解釋，因爲那三個受傷的人已經告訴他了，他們是被幾個沒見過的美國人打的。他這人嘴拙話來得慢，他沒說，不是你拉爾森下的命令，那三個人才被抓走的嗎？他只說：「我們有言論自由，對不對？我們怎麼不能喊那個字？」

我翻譯時糾正了他一點點，我說：「上尉，你用不著冒火。我們部隊裡經常用『殺』字當感嘆字，就跟你們那『哈雷』、『烏匹』一樣。你不至於叫我們都不說自己的話吧？」

「我不是那個意思。」

「你們尊重言論自由，是不是？」

「當然。」

「那不就了結了。」

他嘆了口氣，搖搖大腦袋。從那以後，凡是拉爾森點名，我們就都喊「殺！」他也就裝聾作啞了。

凱利上校沒有遵守諾言，我們從沒有聽到他提起調查結果，也許根本就沒有過調查，我們只知道，沒有任何人爲文福的死受到處分。文福在戰俘營裡沒有一個特別親近的夥伴，所以再也沒人提到他了。

第二十七章　與拉爾森面談

十二月初的一天早上，張萬仁從衛兵隊部回來，抱著一個紙袋子，裡邊裝著十幾個香腸罐頭。一看見罐頭，隊部裡所有的人都興奮起來。萬仁說：「是拉爾森給的。」

「他今天怎麼這麼大方？」我問。

「我也不知道。他讓我到他辦公室去，然後讓我拿回來這些罐頭。」

這可奇怪了。「他沒讓你幹別的？」

「就簽了一個字。」

「簽字幹嘛？」

「領了罐頭呀。」

他這回答有點不對勁，可我沒再問下去。隊長並沒有打開一罐來讓大家嚐嚐，屋裡的人都有點失望。不但沒開罐頭，萬仁還宣佈，他要把罐頭都給還沒復元的傷員們。大家全走了之後，我才對他說：「隊長，我有個問題，你聽了也許不高興。」

「只管說，你知道我不喜歡有話悶著藏著的人。」

「那好，拉爾森給你簽字的是張什麼樣的紙？」

「拍紙簿那種紙。」

「是空白的嗎？」

「不是，上邊有些字。」

「是些什麼字？」

「我可不知道，也許是分食品的紀錄。」

「你肯定嗎？」

「不肯定，也可能是一張收條。」

「你覺不覺得他可能讓你簽了一份重要文件？」

他臉紅了，嘴唇顫抖起來。「這個嘛，他一直笑著，非常友好。說實話，我根本想都沒想簽的是什麼這麼個問題。」

「他也許讓你簽了什麼對我們不利的東西。」

「倒不像有那麼嚴重。那是一張格子紙，字都是手寫的。」

「在美國人看來，上邊有你的簽字，在法律上就有效了。他們不像我們用圖章。」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他狼狽起來，直抽鼻子。

他是個腦子裡缺根筋的人，打仗在行，當領導卻不很出色。敵人怎麼這麼容易就把他騙了？我可以斷定，他簽的那東西肯定別有用途。拉爾森一定是感到萬仁好糊弄，才把他一個人叫去。不過，我仍然同情萬仁，明擺著的，他太想給傷員要到那些香腸了，弄得他沒有多想想就簽字。

整個下午我倆都在盤算該怎麼辦。和各中隊長一起商量商量？還是報告給裴政委，尋求他的指示？還是我們自己想辦法彌補？

萬仁一時沒了主張，或許應該馬上報告超林和裴政委。我覺得這主意不明智。「你看，他們聽了不會怪你嗎？還有，我們還沒弄清拉爾森到底耍什麼花招。」

「俞元，你說咱們該怎麼辦吧。」他一副灰心模樣，不停地用手搓著下巴。

我只是一個翻譯，大隊的傳話人，不應該在這種事上給他拿主意。但我相信，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要不然可能又會來一場戰鬥，又得死人。萬仁簽字的東西一定和上月的事件有關——很可能拉爾森上尉對通訊員文福的死感到不安，想撇清自己，把出了人命的責任推到我們頭上。眞是這麼回事，就表明凱利上校的確開始了調查——起碼是拉爾森感到凱利會採取行動，遵守他對我們的諾言，所以他搶先一步，給自己弄一張護身符。我對萬仁說：「我只能給你出些點子，但隊長是你，你得自己拿主張。」

「當然，讓我聽聽你的建議。」

「我覺得，這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我們應該自己悄悄地解決。」

「可是怎麼解決呢？」

「你看這樣好不好，明天，咱們去找拉爾森，請他來檢查我們隊的衛生條件。要是他來了，咱們就把他扣下來，要他把你簽的字退回來。」

「那咱們把這個計畫告訴大家嗎？」

我想了想，然後說：「別告訴了，只讓安全隊的人知道，讓他們做好扣押拉爾森的準備，就足夠了。另外，拉爾森可能不上這個套，要是咱們運氣不好，即使他來了，我們也不一定能扣住他。咱們得隨機應變。最要緊的是不能死一個人。」

「俞元，你眞是個人精。」

他叫我的眞名字讓我感到不自在。我們隊裡只有他一個人這麼叫，很顯然他是從裴政委那裡知道我名字的。我說：「別告訴別人我給你出主意，我應該只是給你當翻譯。」

「行，這事你知我知。」

第二天上午九點，他和我到衛兵室去見拉爾森，不用等候就讓我們進去了。拉爾森坐在一個鐵桌子後邊，正在抽著雪茄看雜誌，雜誌的封底，是一個穿著游泳衣和高跟鞋的年輕女郎。他身後的多功能架子上，竟然擺著一尊他自己的石膏半身像，大體上很像他本人——飽滿的前額，厚重的下巴，雙頰上窄下寬，垂視的眼睛，不過，有些地方卻很明顯地有蒙古人種的特徵——臉有點太圓，嘴唇有點太厚。我記得王醫生業餘很喜歡雕塑人像，一位衛生員曾經告訴我們，有個美國軍官請王醫生給他雕了個石膏像，想必那軍官就是拉爾森了。拉爾森看上去和大多數美國兵不一樣，文質彬彬的，嘴唇上常常帶著一絲嘲弄，但我卻沒想到他還這麼自負和自戀。再細看下去，我從這塑像又感到了更多東西，感到了某種幼稚，那是一個孩子的渴望，對成爲一個了不起的人、成爲一個英雄的渴望。這個發現讓我有幾分感動；我估摸著，在內心深處，拉爾森和我們很多戰士很相似，從心智上說，他們都還沒有長大呢。

萬仁鞠了一躬，感謝上尉昨天給的香腸，然後又請求他發一箱牛肉罐頭或別的肉罐頭。我把他的話翻譯了，拉爾森聽罷，難以置信地揚起眉毛。萬仁不管，接著說：「隊裡好多傷兵都營養不良，有人傷口都化膿了。你知道，人是鐵，飯是鋼嘛，光吃戰俘營裡的飯他們好不起來。你給我們的香腸就很好，可是不夠傷員分的，請你多發給我們一些吧。」

「那可不行，」拉爾森說：「昨天剛給你十幾個罐頭了。」

「上尉，」我幫腔說：「你想讓我們做什麼，我們都是盡力配合的。我們知道，你希望我們隊成爲全戰俘

營的模範，所以我們昨天把每個營房都打掃得乾乾淨淨，就是想表達對你的感激。」

「哦？有多乾淨？」他咧嘴一笑，嘴角翹了起來。「廁所裡沒蒼蠅了？」

「沒了。」

「衣服縫裡都沒有蝨子蟣子了？」

「當然沒了。上星期我們每個人都除了蝨。」

「你知道，我可不是傻瓜啊。」

「你現在就可以到我們營場裡去檢查。但有一個條件，要是你看了以後覺得滿意，你就得給我們一箱二十四個牛肉罐頭。」

「我不和我管押的戰俘談交易。」

「別這麼說，我們不是給自己要的，你可以去問問我們的傷員，看他們昨天是不是吃上香腸了。」

拉爾森的臉上浮起懷疑的壞笑。他眼睛眨了眨，褐色的瞳仁定了定神，又放鬆了。我可以想像，他把我們當成一群中飽私囊的蛀蟲了，就補充說：「用名譽擔保，我們沒碰一根香腸。要是你講公道，你就該去問問傷員。你懷疑我們的誠實，是對我們的侮辱。」

我覺得不能再多說了，因爲我不過是個翻譯，不該越權提出請求。萬仁卻似乎很滿意地讓我說下去，他自己不用作聲。讓我們鬆了一口氣的是，拉爾森站起身來，把雪茄在不鏽鋼菸灰缸裡按滅，然後把剩下的半支放回自己胸兜裡去。我們一起離開他的辦公室，可拉爾森朝另一個方向的軍隊小賣部去了，跟我們說，他一個小時左右後會到我們營房來，親自問問傷員們。

我倆立即回到營場，讓大家趕快打掃院子，又在傷員住的營房裡佈置好安全隊的人馬。十點過後，拉爾森來了，還帶著一個准尉，那准尉一個肩膀高，一個肩膀低。他倆跨進大門，都顯得興致勃勃，嚼著口香糖，互相打趣。幾個安排好的戰俘朝他們笑著打招呼。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有幾個人在周圍躺著曬太陽。我走上前去，對他倆說：「謝謝你們光臨檢查我們營場。你們想先看看傷員嗎？」

他們點點頭，跟我來到門上有紅十字標記那間房的隔壁。他們一跨進來，門就在他們身後關上了。拉爾森嚇了一跳，但不等他出聲，我們隊長大喊一聲：「抓住他們！」十多人撲過來，把他倆的胳臂扭到背後。

「嘿，嘿，這是幹什麼？」細高個的准尉叫起來。

「上帝！」拉爾森也喊起來：「我給你們五箱牛肉罐頭行不行？快放了我們！」

萬仁走上前，手要摀他耳光，被我從背後攔住，我悄聲說：「咱們不是爲了打他們才幹的。」萬仁這才冷靜下來。我轉向兩個美國人，說：「我們邀請你們來，是要跟你們嚴肅地談一談。昨天早上，拉爾森上尉騙了我們隊長，讓他在一張紙上簽了字。你欺負他看不懂英文，這麼做很不光明正大。現在我們要求你退回他簽的字，我們什麼時候拿到手，什麼時候就放你們。」

「我一點也不明白你說些什麼。」

「你當然明白。」

我們把他倆帶到裡屋，那是我們的辦公室。他們兩人都坐下了，嘴裡還在氣急敗壞地辯解。我們開始心平氣和地追問拉爾森。開頭，他迴避這個問題，說：「長官們，你們太過分了。快放我和查理出去，聽見沒有？」

「你還給我們那張簽字紙，我們再放你。」我只指著他一個人說，好把那個准尉查理跟他區分開。

「我早把紙條當垃圾扔了。」拉爾森說。

「那我們就沒法放你了。」

「你們也太貪心了。我眞不該給你們那些香腸。」

「這不是罐頭的事，上尉。我們要討回那張簽字的紙。」

「我把它丟了，聽見沒有？那紙條沒了。你們想讓我把外邊整個垃圾堆翻一遍嗎？要翻你們自己出去翻，我批准了。」

「那樣的話，你就別想回去了。」

「哎呀，我怎麼才能讓你們明白？你們該不是瘋了吧？」

這時候，門口的衛兵覺得裡邊不對勁了，打電話給他們總部，總部在二十分鐘之內派來了一個排。一下子，形勢變得比我們預期的險惡了，再瞞著大家已經不可能，我對萬仁說：「告訴同志們眞實情況，讓大夥兒都來幫忙。」

「早該這麼著了。」他馬上出去了，用沙啞的嗓門召集大家，命令他們擋住美國兵，不許敵人進來救被扣押的兩個人。萬仁對大家說，拉爾森偷走了我們的文件，我們一定要他還回來。頃刻間，大約二百來人湧向大門，去阻擋全副武裝的美國兵。

屋裡邊我對拉爾森說：「如果你的人向我們開火，我們可不能保證你倆的安全。」

拉爾森和准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兩張臉都歪了。我指著准尉，又對拉爾森說：「讓他出去，告訴他們立即後撤，我們好和平解決。」

「你害怕啦，馮長官，」他對我說：「我們的人可以衝進來，把這裡鏟平。」

「別忘了，我只是個傳話的，不是長官。但我坦白地告訴你，要是你們的人向我們發起攻擊，我們可不能保證你的生命安全。你不想第一個被打死，對吧？」

他垂下頭。我繼續說：「上尉，爲這點小事，我們不需要任何流血，只要讓查理出去，告訴他們撤退，讓我們從容談妥這件事。」

他想了一會兒，就讓准尉向外邊的美國兵傳口信。同時，我們大隊裡幾個中隊長也趕來了。他們還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所以萬仁一一告訴了他們。他指著上尉，一個勁兒說：「那個狗娘養的讓我上了當！」

我又對拉爾森說：「無論如何，我們要阻止流血。你對我們隊長要詭計，這是不公平的。請你把他的簽字還給我們。你越早還給我們，對我們雙方、對你的人身安全就越有好處。」

萬仁一拳擂在桌子上，對他叫起來：「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要是你不合作，我們可不會讓你囫圇個兒地出去。」

拉爾森感到了形勢之危急，沉思起來。過了一會兒，他對我們說：「好吧，我還給你們。但你們一定得保證，一拿到那張紙，就放了我們倆。」

「我們保證。」

查理准尉回來時，拉爾森遞給他一串鑰匙，用拇指和食指捏出其中一把小黃銅的，告訴他說：「到我辦公室去，打開我桌子的左邊抽屜，那裡邊有一疊拍紙本，把最上邊那張有中國字的撕下來，馬上把它拿來。」

「是，長官。」查理轉身又出去了。

等他回來的工夫，我對三個中隊長解釋了爲什麼要選擇這種激烈手段。我堅持說，我們還不知道拉爾森幹了什麼，只是要防患於未然。也許事情一點兒也不嚴重，所以沒必要搞得滿城風雨。他們大多半信半疑，有人埋怨說，應該事先跟他們打個招呼。萬仁紅了臉，無言以對，在角落裡一個勁抽菸，時不時慍怒地向我看一

眼。我對這時的被動也感到很尷尬。我們應該事先把所有可能性都考慮進去，想好各種應急方案。

十分鐘以後，准尉拿著紙條回來了。我看了一遍，欣慰地發現上面果然是一段假聲明，說「十一月二十二日，我隊裡有人沒有任何原因就攻擊衛兵，還咬了拉爾森上尉。結果，我們傷了幾個人，一人死亡。我，作爲六隊隊長，對整個事件負有責任。」下邊是萬仁的方方正正的簽字。幾個人讓我翻譯了聲明的內容，我不能不照辦。有人聽完倒吸一口涼氣，還有幾個向拉爾森走過去，要教訓教訓他。我攔住大家，轉向萬仁和幾個中隊長，說：「我們答應過，一拿回這張紙，就放了他倆，不傷害他們。我們要遵守諾言。」

他們都點了頭。兩個美國軍官被帶到大門口放了。當天下午，我們接到其他大隊發來的詢問，問我們這裡出了什麼事，我們只能向他們實話實說。晚飯後，隊長們在隊部開了一個會，大夥兒在會上溫和地批評了萬仁。我們自己和平地阻止了可能發生的麻煩，大家又都感到慶幸。因爲這次祕密行動已經暴露在全大隊面前了，萬仁似乎感到很丟臉和幾分惱怒。也許他擔心在部下面前暴露了自己的無能，或者擔心這件事的處理過程顯出了我比他更能幹。這事以後，他跟我說話就不像以前那麼隨便了。

一個星期以後，拉爾森上尉被降了級，調到別的戰俘營去了。根據裴政委的命令，我們六隊召開了隊長會議，由我們隊政治教導員滿蒲主持。萬仁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承認自己放鬆了警惕。他說他感謝所有同志，幫助他把那張簽了字的紙條奪回來了，要不然敵人肯定會利用那張紙來破壞我們保衛紅旗的成果。但他對我隻字不提，因爲裴政委又給我記了一個二等功，其實我對立這種功已經不在意了。相反，萬仁受到警告處分，不過他還是大隊長。

扣押拉爾森事件之後，萬仁和我再也不能親密相處了，不過，我們偶爾還會一起下下象棋。我的那棋子是水泥做的，每個棋子上面我們用手寫了馬、象、炮、車等等。他象棋下得很好，我是他不多的幾個不必讓車或讓炮的對手之一。儘管他在非得和美國人打交道時仍然離不了我，他卻再也不來找我討主意了。他是一個誠實的人，也許不會耍心眼，但我還是盡量留心，不給他留下任何對我不利的把柄。

第二十八章　娛樂和工作

這裡不像巨濟島上的六零二聯隊，任何大型文化節目，像一整齣戲啊，一場藝術演唱會啊，都是談不上的。歌手、演員、畫家、作曲家、書法家，都分散在各大隊，沒法把大家集中到一起。剛開始，這種隔絕的狀況給我們帶來不少麻煩，但很快地，每個大隊就組織起了自己的文化人才。結果，戰俘營裡一共出現了十個「藝術」組織，吸引了不少戰俘。

其中，第九大隊比其他各大隊水平都高，也最活躍。那個失去一隻腳的作曲家兼舞臺導演孟飛寒，就在九隊。除了他之外，他們隊長也愛好文藝，他曾經當過炮兵師文工團的團長。每天晚上，你都可以聽見音樂聲、歌聲從他們營房那邊飄過來。全戰俘營有很多人都參加了這類的文娛活動，我也參加過一段不長的日子。我曾想教大家識譜，可是我的五音不全，一唱譜子，就有人嘻嘻哈哈地笑，我只好不教了。

戰俘們還自製了一些樂器，像鼓、笛子、提琴和喇叭什麼的。第一隻軍號是用錫鐵皮做的，有個號手碰巧把他的號嘴兒帶進了戰俘營，後來誰自製管樂器，都以那個號嘴兒爲鉛鑄模子。相對來說，鼓是比較容易製作的，各種尺寸的都有，都是用鋸開的油桶、水桶、汽油罐之類做的，上面蒙上雨布，再用繩子綁緊。做弦樂器比做管樂器要難，而我的朋友韋明，那個對山民很偏愛的矮個兒廣東人，是個自製弦樂器的專家。他雖然是個樂盲，既不會識譜，也不會彈任何樂器，可他卻比別人心靈手巧。他能把一個罐頭盒做成二胡的共鳴箱；木板、竹筒、老鼠皮，等等，到了他手裡都能做成樂器。別看他本人對音樂一竅不通，他周圍有的是行家可以幫他調試，還有不少人排著隊要幫他呢——也難怪，這裡自製的每一件樂器，都是大家合作的結果。戰俘營裡製作樂器的小組有幾十個，有人甚至做了幾把三根或四根弦的吉他，還有人做出了各種提琴：松香是從松木屑泡出來的；琴弓多是用粗鐵絲做的；麻繩鬆了勁，泡在熱水裡梳理一番，挑出最結實的筋子，就能做出馬尾。「絲弦」多是從衣服鞋子上來的，而金屬弦就只有一個來源了——電線，這在建築工地上可以搞到。最難做的要算西洋小提琴，因爲這樣的小提琴需要四根不同粗細的金屬弦，很難搞到。還別說，有幾個人還眞把這麼難弄的琴弦鼓搗出來了，音調很接近G、D、A、E弦。做成一把西洋提琴，要反覆實驗好多次。

整整一夏天，我們大隊裡就像一個樂器工廠，很多營房裡都在忙著製造東西，戰俘們的認眞勁兒，就好像在上班。除了做樂器，好多人還組織起樂隊，開始學習起吹拉彈唱來。我常常納悶，他們幹嘛這麼認眞呢，大概是太無聊了，想找點樂子，打發手裡的大把光陰吧。但是我很快就意識到這麼想錯了，對他們來說，這是嚴肅的事情，他們靠這些活動，來支撐戰俘營的歲月。通常情況下，一把樂器是四五個人一塊兒做出來的，於是這件產品就體現了集體的智慧和努力。同樣，一個小隊、一個中隊裡的樂隊，就是「與敵人戰鬥的特殊武器」——這是首長常用的詞兒，可我卻不明白，一個樂隊，有必要捧得這麼高嗎？也許他們相信，音樂可以鼓舞同志們的鬥志，激起大家對敵人的仇恨、可以把戰士們變成更有效的戰鬥機器吧。

有時候，我們隊裡還有人表演快板，說幾個幽默段子，不過這些節目大同小異。有人嘗試寫一些短小的劇本，或譜一些歌曲，不過寫出來的東西，質量都不過關。有時候大家還畫些漫畫，來嘲笑美軍，畫上的人物都給安上了黃瓜一樣的大鼻子，或是胖著大肚子。隊裡的黑板報上經常登些笑話、繪畫和詩歌，但最受歡迎的娛樂形式，還是合唱。

一旦有人譜出了一首好歌，馬上就會在戰俘中間傳開，不出兩個星期，就可以傳遍十個大隊，在整個戰俘

營裡唱起來。九大隊的孟飛寒是我們的首席作曲家；他作的曲子一般都很莊嚴、熱烈和高昂。他手下兩個弟子，對民歌很拿手，他們把輕快的旋律摻進諷刺的曲調，非常膾炙人口，像〈大喇叭常撒謊，不聽它〉、〈老天爺，嚇死我了〉、〈杜魯門不中用〉等等。戰俘都喜歡這些詼諧的調子，即使單獨一個人時，他們也常常會哼起這些曲調，而嚴肅的歌曲，他們只和大家一起唱。我們的首長很會發揮音樂人才的本事，每次重要事件，他們都會作一首歌來作紀念。比如，爲了紀念升國旗的戰鬥，大屠殺一週之後，就誕生了這樣一首歌：

十月一日的紅旗高高飄揚，
共產黨人的鮮血寫下美帝的血腥罪狀。
敵人越殘暴，我們更堅強。
拳頭擋住刺刀，
石頭抵住機槍，
臂膀靠住臂膀，
胸膛築成鐵牆。
保住我們的國旗，
打擊敵人的瘋狂。
仇恨結成力量，血債要用血來償！
萬惡的美帝逃不脫世界人民的巨掌。
我們新中國的兒女，
捷報向五大洲傳揚。
十月一日的紅旗高高飄揚，
英勇的烈士們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上。

儘管有些盲目自誇的意味，這支歌還是被廣泛傳唱，成了戰俘營裡的戰歌。我不喜歡這首歌，從來沒學會唱它，可同志們對這首歌的巨大熱情，讓我驚訝。戰俘營裡每天歌聲不斷，有的歌唱得多了，連美國兵都聽會了。有個瘦瘦的長著連鬢紅鬍子的傢伙，一跟我們打招呼就唱「前進，前進，跟著毛澤東」。

我漸漸理解了，對於戰俘們來說，唱歌是一種宣洩。歌詞內容是什麼並不重要；只要大家能一齊唱點什麼，感覺就好得多。很多人在這裡感到沮喪和煩躁，一起唱歌就成了釋放悲痛和苦惱、恢復感情平衡的一劑良藥。我們苦苦地想念家鄉、想念過去的生活，這種精神狀態讓很多人變得脆弱不堪，我見過有人無緣無故地就突然哭起來，也許只是被一個愉快的念頭感動了，或被一陣自憐的狂潮席捲了。毫無疑問，一起唱歌緩解了大夥兒的悲苦，讓心裡頭快活了幾分，更重要的是，使眾人感情上互相親近，這樣就增加了大家的凝聚力，儘管湧起這種互相友愛的感覺可能只有短暫的瞬間。

唱歌還可以減弱大家對孤獨的極度恐懼。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戰俘們也是很依仗社交的，有人可以不怕監禁，卻沒法不怕孤獨。只要大家組織在一起，他們便覺得撐下去的可能大多了。唱歌給他們提供了一種社交機會，不僅撫慰他們傷痛的心靈，也讓他們暫時擺脫了孤單。坦白地說，有時候我希望自己更像他們，不管什麼歌湧到嘴邊，都能夠唱得全心投入……

還有一個問題不時地困擾著我。那些藝術小組的創作，眞是像他們所說的，是爲了藝術嗎？一開始，我非

常敬佩那些作曲家和畫家，我自己對任何樂器都是門外漢，不論是誰，只要他能在琴上拉出一段來，哪怕是比畫幾下，都能讓我五體投地。可是，過了不久，我就發現不論他們創作的是什麼，都很粗糙，他們腦子裡好像從來沒有對藝術精益求精的念頭。我敢說，他們對藝術的態度是功利主義的，所以才會有這種粗糙，他們的所有創作講求的僅僅是實用，藝術就像是一件武器：每個作品都是爲了達到喚醒人們、激發鬥志的目的。這些作品有一種即興的感覺，一種率性的衝動，卻又總是虎頭蛇尾。一支歌，一首詩，通常是一揮而就，作者甚至還說自己是一氣呵成，以「一個字也沒改」爲榮呢，彷彿在炫耀這作品純粹發自靈感，也就是說，自己多有天分。耐性和精緻嘛，他們是沒有的，他們認識不到，藝術不必講實用、不必爲了娛樂之外的目的服務。他們的作品可能震撼一時，卻無法美到傳之久遠。於是，我開始對他們的東西有了深深的保留，有時候還會覺得他們只是在浪費精力，浪費時間。不用說，那些年輕人是有天分、有創造力、有激情的，可是他們總停留在只靠聰明就能達到的程度，而無法使作品複雜和微妙，更不用說有深度了。結果，無論他們怎樣揮霍自己的才能，他們仍像一些精明的抄寫手，對自己的粗劣之處視而不見。我也沒法跟他們談這些想法，所以我就一聲不吭。

不到萬不得已，我從不跟大家一起唱歌。我的小朋友山民很喜歡唱歌，我從不攔著他。我把時間更多地花在讀英文報紙上了。因爲給領導收集情報是我的任務，所以我看報紙時也沒人打擾我。我常常對新聞文章感到厭倦，很渴望得到一本好書，一部長篇小說或傳記。這種精神上的匱乏，比飢餓更讓我感到痛苦難熬。有時候，我腿上放著一張過期的《星條報》，一個人呆坐沉思，沒去理會報上那些話的意思。在這種姿勢的掩護下，我可以讓自己的思想自由馳騁。我覺得，一個人獨處時頭腦會更清楚、更警覺。我不用和大家一起上早操，我就用這時間朗讀一小時英語，而提高英語會話能力，也是我的工作。

由於吃不飽肚子，我不能經常跑步鍛鍊，有時候我就在房裡做上幾十個下蹲起立，有意識地把重量放在受過傷的左腿上；偶爾我也沿著營場周邊的鐵絲網跑幾圈。要是給我飽飯吃，我會樂意每天像苦力一樣幹幹體力活，因爲我相信，體力勞動和新鮮空氣可以讓我不至於在監禁裡爛掉，而我多想精精神神、壯壯實實地回家。我還不滿二十五歲，往後還有很多年日子呢。

但是我的身體目前還幹不了重活兒。有一回，我和五十個人一起出營場，到南朝鮮軍隊的訓練營去挖壕溝，南朝鮮部隊的新兵在這個島上訓練完後，都被送到朝鮮半島去。挖溝的活兒很累人，不過，在野地裡，偶爾運氣好會挖到一個蘿蔔或紅薯。那一天，我們早上八點出門，整整幹了一天，中間只休息了半個鐘頭吃午飯。下午，下起了毛毛雨，帶雨布的人很少，到晚上回來時，大多數人都渾身淋得透濕。第二天早上我就爬不起來了，渾身痠疼，病了好幾天，醫生不讓我再去挖了。我這條傷腿還沒有完全復元，不能幹站立太久的活兒。沒想到的是，我這一病，倒讓我看清了，有些「藝術家」待在營場裡搞創作，也許是找個藉口逃避幹活受累，不然的話，只有當官的和傷號才可能免除出工。這個發現，讓我打心眼裡瞧不上那些身強力壯卻逃避勞動的人。

作爲翻譯，我被美國人和其他戰俘看作軍官，他們管我叫「翻譯官」，所以大夥兒並不喜歡我跟他們一起幹活，好像我礙他們的事。我的傷腿也使我搬不動很重的東西，他們卸船卸車時就不指望我。有人常常取笑我，雖然沒有惡意，說他們賣苦力時，旁邊不需要跟個大學者。可是我在他們眼裡也不是完全不中用，我們掰過好幾次腕子，不少人不是我的對手。

我最喜歡的活兒是鏟土，這活兒只增強我的肌肉，不會影響我的傷腿。剛開始，我幹一天之後會渾身大汗，背疼，雙手發燙紅腫，但漸漸地，我掌握了使用鐵的節奏，在鏟土、鏟沙子、鏟砂礫時，我可以像個熟練工人那樣，只運用上身的力量。每次有鏟土的活兒時，我都主動要求參加，不過他們有時候讓我去，有時候卻

不讓。比起來，濕泥要難鏟得多，但我們有的是人手，所以有辦法可想。我們三個人一組，在鏟子根兒上綁根繩子，然後一人鏟泥，另外兩個人一人拽著繩子一頭，一起使勁就提起一堆濕泥來了。要是三個人合得來，一起說笑著，這種有節奏的小組鏟泥勞動簡直可以成爲一種開心的事。

我們伙房後邊有一副石頭碾子，我們常用它碾碎穀物，我常常自告奮勇，抱根棍子去推那碾子。我很喜歡推磨，因爲這活兒可以鍛鍊雙腿，又是一個人幹，我可以從容幹來，不必趕急。很多人不想費力推碾子，還有人說這活兒是驢幹的，所以這活兒就常常落到我頭上了。每次推完磨，炊事員總會給我點東西吃，一碗豆湯啊，或是一塊魚乾啊，讓這活兒更值得幹了。漸漸地，我知道有人把我看成個怪人——他們想不通，一個軍官，一個大學畢業生，幹嘛要屈尊像他們一樣賣苦力。我從來不解釋，只說我喜歡推磨。

幹些體力活兒還有一個好處。一個像我這樣受過教育的人，很容易被人指責爲脫離群眾，要是我經常出工幹活，就沒人能說我端架子。隊裡的領導表揚我好幾次，說我能和戰士們打成一片，他們還以爲我自願參加勞動，是在響應黨對知識分子的號召，有意識地改造自己呢。

有一天，山民和韋明被派到美軍營房去種草。晚上回來時，很興奮地告訴我，他們今天在那裡吃了個飽，碰上了一個垃圾箱，裡邊扔著裝食品的紙盒，盒裡都是吃了一半的麵包、烤牛肉、胡蘿蔔、黃瓜片什麼的。韋明拿著一塊火柴盒大小淡黃色的東西問我：「你看看這是什麼？是豬油還是肥皂？」

「奶酪啊，」我說：「很有營養的東西，從牛奶裡提出來的。」

「哎呀，咱們眞該把剩下的都帶回來。」他懊惱地對山民說，邊拍著吃飽的肚子。只見他肚子上橫著一道大疤，活像隻巨大的蜈蚣，肚臍又大又深。

山民對我說：「那個垃圾箱裡有好多奶酪呢，我們不知道能吃不能吃。」

「我們嚐了嚐，」韋明接著說：「可是覺得嚥不下去，所以沒把剩下的都帶回來。」

「天啊，你們把最好的東西扔下了。」我直嚥口水。

韋明便把手裡那塊奶酪給我了。我放進嘴裡，雖然奶酪已經放陳了，我還是津津有味地嚼起來。他們倆看得目瞪口呆。「你眞長了個外交官的胃口呀，什麼都能吃。」韋明笑著，邊說邊搖著他那個圓滾滾的腦袋。

第二十九章　意外

一月裡的一天，我們大隊的兩百多人被派到碼頭上去卸貨船，我也跟大夥兒去了。我們把大包、大捆的貨扛到岸上，堆在一起，回頭好運往戰俘營附近的倉庫去。午飯給每人一個硬殼麵包和一個蘋果，所以大家都很高興去。那天沒有風，海面上風平浪靜，微微發白，浪花在陽光下閃爍。雖然是冬天，卻暖洋洋的。

從臺灣來的那個彭翻譯，隨著兩個班的美國兵負責看押我們。他是個寡言少語的人，不到非說話不可的關頭，他很少開口。他的英語一板一眼的，帶點英國口音。他似乎很寂寞，整整一天，一直在柳樹下看書，並不大和美國人待在一起。收工以後，我們排好隊讓他查點人數，他叫我們一次出列十個人，點完就站到一邊。最後十個人點完，他發現少了一個人，於是命令各小隊長各自點名，看看是誰不見了。

山民拽了拽我的袖子，悄聲說：「韋明沒在。」我吃了一驚。但我相信韋明絕不會一個人逃跑的，就向彭翻譯報告了。

美國衛兵領頭的哈里斯中士大爲惱火，我們也擔心起來，四處尋找韋明。這時，在近百米之外的樹叢間，我看見了他的背影。我聽說他這些天一直在拉肚子，就想到他可能是又去拉了，就把他在哪裡指給大家看。彭翻譯也看見了韋明，跟中士說：「他在那兒呢。」

「你他媽的！」哈里斯朝韋明大吼起來，「在那邊幹什麼呢？快他媽給我滾回來。」他一嘴狐臭般的氣味，雖然他不停地嚼著口香糖，還是很難聞。

韋明毫無反應，好像什麼也沒聽見。我插嘴說：「他最近拉痢疾。我去叫他回來吧。」不等他們答應，我就朝灌木叢大步走去。

中士跟著我走過來；彭翻譯也跟來了。我們走到灌木跟前時，韋明仍沒動窩，光著的屁股清晰可見。

「你聾啦？」哈里斯朝他喊道。

那邊仍沒有反應。中士走上去，從後邊揪著韋明的耳朵，可是蹲著的韋明一聲不吭，好像在專心幹自己的事。哈里斯又繞到他前邊，在他臉上擰了一把，韋明還是一聲不響，不過這次閃避了一下。中士抓住他的頭髮猛地一拉；韋明向前趔趄了幾步，露出了沙地上的兩坨黑糞。看見他拉的不是稀屎，哈里斯狂怒了，他抬腿向韋明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腳，踢得他站起身來。韋明擦也不擦，就提起褲子，接著，中士的槍托就打上來了。

「哎喲，哎喲！」韋明終於出聲了，「我肚子疼！」

彭翻譯告訴哈里斯：「他肚子不好。」

沒想到，哈里斯用刺刀挑起一坨大便，直往韋明嘴裡戳去，命令道：「嘴張開！」

韋明大驚失色，一時竟說不出一個字來。中士又對他喊了一遍：「吃下去！這東西可以治你腸胃的毛病。你要不吃，我就地崩了你。」

韋明看看我，又看看彭翻譯，但沒有張嘴。我忍不住了，說：「中士，請別這麼——」

「閉嘴！」他胳膊肘朝我胸前猛地一戳，「你他媽個騙子！你說他拉痢疾，看看他的屎，硬得像石頭。我告訴你，你再妨礙我的公務，我就叫你把另一塊吃下去。」說著他又狠踢韋明。

意外的是，彭翻譯用他那一板一眼的英語開口了，「中士，請你停止對他的虐待。他不過是進行了一下正常的生理活動，是人都會做的。」

他這些話似乎讓哈里斯吃了一驚，他看了翻譯好一陣，才反應過來：「你說什麼？」

「請不要再打他了。」

「你他媽算老幾呀？滾一邊去！」

彭翻譯雙唇顫抖，卻還是說：「凱利上校派我跟你來，所以我也有責任維持這裡的秩序。如果你不喜歡我的建議，可以向你的上級去申訴。」

「你這狗屁，你以爲你可以命令我？」

「你不講道理。」

「你是哪頭的，啊？」

「那和這事無關，你做錯了。誰能吃自己的大便？」

「操你媽的中國佬！你向著他們共黨。你以爲我看不出來呀？」

他們吵架的工夫，我趕快把韋明拖回戰俘隊伍。我很擔心哈里斯會動手打彭翻譯，還好，沒多大一會兒，他們兩人就過來了，但都黑著臉。回營房的路上，彭翻譯一路都不跟美國兵一起走，一個人恍恍惚惚地，只跟在我們後面。我不時轉頭看他一眼，不知他在想什麼，臉繃得越來越緊了。

回到營房裡，韋明對其他戰俘講了今天的事，大家聽了都覺得意外。我們對這裡的國民黨軍官一貫很看不起，覺得他們都只敢對美國人點頭哈腰，從來沒想到那翻譯官會替一名戰俘、一個他應該仇恨的敵人辯解。一個星期後，彭翻譯調離了戰俘營，聽說他被臺灣叫回去了，有人覺得他是自己申請調走的，也有人猜測他是被降職了。他到底出了什麼事？我問了幾個美國人，他們也不知道。

我常常想起這個乾瘦的人。多少年過去了，他那張光滑的面孔，那雙靠得很近的眼睛，在我記憶裡卻越來越清晰。

第三十章　最後的命令

濟州島上的冬天很短，但二月裡還是寒風刺骨的。自從上一年十一月以來，就沒有發生過任何重大的事件，島上平安無事，但是我們的首長卻受不了這種平靜。我們已經聽說，板門店停戰談判幾個月前就中斷了，至今還沒恢復。二月末的一天，我們接到凱利上校通知，點名讓四個人到釜山去重新登記，其中有超林和常明。我們都覺得他們會再次遭到審問，很可能在開始遣返我們回國之際，美國人有意把他們與大夥兒分開。常明還和裴政委一起在監獄裡關著，雖說「重新登記」聽上去兇多吉少，但是對他來說，或許反倒是好事，他可以離開那監獄一段日子了。我經常能看見他站在監獄窗前，走來走去地給我們發電報，動作慢慢騰騰，很遲鈍。聽說他得了關節炎，身體很糟糕，那牢房就在海灘邊上，漲潮的時候，海水都會淹到牆根，所以屋裡潮得太厲害了。

我們把重新登記的消息發給了裴政委，第二天下午，他的答覆到了：「馮文工作走不開，請馮延替他去一趟。你們四個人應與釜山地下黨取得聯繫，建立起交通的管道。」常明的化名是「馮文」，「馮延」就是我，我們倆用的是同一個姓，這一定是派我替常明的原因之一。在接到裴政委命令之前，一個剛從那邊監獄裡放回來的同志把常明的戰俘身分卡帶回來了，身分卡是一張十五公分長、七八公分寬的卡片，上邊寫著他的出生地點、出生年月、家庭成員、教育程度、軍階、入伍時間、和原部隊番號，卡片最上方是他的戰俘號碼：七二零一四三。很明顯，裴政委是想叫我拿上常明的身分卡，替他去重新登記。

看完裴政委發來的命令，我眞是又氣又怕，一句話也沒說就走出營房，一個人沿著圍起來的鐵絲網胡亂走著。院子裡到處泥濘，在我腳底下粘粘的，我也不管了，走哪兒算哪兒。我的臉發燙，像是人在發燒，一路上碰上什麼踢什麼，石頭、罐頭盒、瓶蓋子、樹枝子、牲口屎。沒多一會兒，我的靴子就糊滿了泥，沉了一倍。小風吹起幾片碎葉，上面的葉脈還沒腐爛，一會兒連連翻滾，一會兒躺在地上。戰俘營外，肥沃的大地上，小草已經開始冒芽，往東南邊看，肉豆蔻樹已經長出了小綠葉，粗壯的樹幹在最後的陽光下白得發亮。我對裴政委的命令感到氣憤，只覺得喉嚨生疼。沒錯，常明是他的翻譯、祕書、密碼員、發報員，可我完全可以頂替他，接續日常的工作和通訊，只要稍微點撥我一下，我就可以學會使用「裴氏密碼」，發送和接收資訊，最多兩天，我就可以熟練掌握這些技巧。爲什麼我非得替常明去不可？

於是我想到，要我替常明去，可能因爲我不是黨員；我和一個普通士兵一樣，是可有可無的。也許裴政委感到，遣返很快就要開始了，他就想保護自己人。他現在用夠我了？打算犧牲我了？常明對這個決定怎麼想？他和裴政委一塊兒出的主意嗎？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打算爲了保住自己而推我出去。

同時我也很清楚，自從我們來到濟州島這個相對安全的地方，就沒有人想獨自離開這裡了——至少目前不想。你越少單獨和敵人接觸，你的前景可能就越安全。等我們回中國後，每個人可能面臨一個得澄清自己的問題，只要你和同志們一直待在一起，就可以免受黨的懷疑，因爲有人能給你在戰俘營裡的表現作證。常明也許就是因爲這個，才寧可一直守著裴政委——他想在黨面前保持一份清白。

等我回到營房裡時，同志們都已經知道了裴政委的命令。我們隊長張萬仁走過來，誠心誠意地和我握了手。對於我去還是不去，他連問也沒問一句，知道我除了服從命令之外別無選擇。我把自己的身分卡交給他，他會轉交給常明的。我說：「我明天出發。」

山民一聽，頓時流下淚來，撲過來緊緊地抱住我：「大哥，我捨不得你！」

旁邊幾個人嘆起氣來。有人建議，今天晚上給我開個送行會。晚飯後，有三十來人來到隊部，大多是軍官，我的兩個朋友，還有室友。會上有攙了水的清酒，和半臉盆炒葵花子，也不知道他們從哪兒搞來的。我盡力保持平靜，少說話，不過會上的氣氛很沉悶，大家對我的樣子，好像是再也見不到我了似的。的確，這很可能是我們最後的聚會了。我基本上沒開口，只聽他們說；有人說，他們會永遠記得我，有人勸我不要灰心，不是有句話，「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嗎？最後，一個高個子唱起了蘇聯歌曲，〈共產主義青年團歌〉，大家都跟著他唱，我也忍不住一起唱了：「再見吧，媽媽！別難過，別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唱得大家都流下了眼淚。

我終於撐不住，把臉埋在手裡，狠命抽泣起來。山民遞給我一條毛巾，韋明伸直了脖子，大聲背起古詩來：「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他怒目大睜，像是發癲了，一雙圓眼睛冒著火苗。

韋明這麼一來，讓我冷靜了一些。他聲音裡憤慨的鋒芒使我有點吃驚，看樣子他明白我是被當成犧牲品了。這時，我們教導員滿蒲發話了，他說我不該這麼輕易地就失去信心，重新登記也許只是個例行公事，我肯定還會回來的。就算不再回來了，大家還可以回中國再見。「美國人怎麼分得清姓陸姓劉，還是姓蔣姓常？在他們看來，我們都是中國人，所以，馮延啊，不要杞人憂天。只要你保持頭腦清醒，你就知道怎麼安全過關。你一定要振作起來。」

有人在後邊笑起來。滿蒲的話讓大家都平靜下來了，可我還是感到，在敵人眼睛裡，這四個要重新登記的軍官，不是普通戰俘，而是戰犯。

九點時分大家散了，很多人臨走都抓了把葵花子。我和兩個朋友一塊兒回自己營房。

那天晚上，我把自己的工作移交給新任翻譯，那人會說一些英語，但不會讀，是當了戰俘以後才學的。我把英文剪報都交給他以後，就在床上躺下了，懷念起母親和未婚妻。我太想念她們了，天曉得我還能不能再見到她們。我翻身坐起來，從口袋裡摸出一截鉛筆，又撕了半張寫字紙，在正反兩面寫了兩封短信，一封給母親，另一封給未婚妻。我對菊蘭說：

親愛的菊蘭：

真抱歉，我無法返回家鄉和你結婚了。但我的死不是毫無意義的，我是為保衛祖國而戰，為世界和平而獻身的。忘了我吧，繼續你的人生。祝願你婚姻美滿。

愛你的元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又及：請有空時去看看我母親，我是她唯一的兒子，我怕她會寂寞。謝謝。

我把地址寫在短信下邊，然後把這張紙交給山民。我對他說：「如果你聽說我死了，等你回到中國以後，替我把這兩封信寄給我的家人。」

我把自己所有的東西都給他了——一疊牛皮紙，兩枝鉛筆頭，一雙毛手套，一件大衣，兩條毯子，除了掛在脖子上的半塊玉簪，什麼都沒留。山民對我說：「我都替你保存著，等你回來好接著再用。」

「別傻了。我們再見面的時候我就用不著這些了。」

那天夜裡我睡了一個好覺，山民則瞪著眼睛好幾個鐘頭聽我打鼾。在這一點上我倒是很有福氣的，不論感情上受到多大打擊，我夜裡都能睡個安穩覺。我打鼾還打得很響，常把同一屋的人吵醒。我這個特點，使大家

覺得我像個當兵的，而不像大學畢業生。他們甚至說，我睡得像個將軍。

第二天早上，我們四個軍官被帶上了輪船，關在甲板下邊的船艙裡，這樣，除了定時出去上廁所，我們就看不見外邊了。跟我們一起走的美國兵有十一個人，領頭的是個我從來沒見過的一臉雀斑的傢伙。用這麼多人押著我們，讓我感到不妙，因爲這似乎表明了我們相當重要。不過，從他們的聊天中，我很快就發現，他們中間不少人其實是去釜山看朋友和看演出的，有個從美國來的流行歌星要在那裡演唱。一路上，我們可以互相交談。超林坐在我對面的栗色皮椅子上，他比過去瘦了，臉上的鬍子不見了，牙齒都被煙熏黃了，但他的眼睛仍然炯炯有神，閃著精明的光芒，表明著他內心的鎮定和無畏。只要他朝我咧嘴一笑，我就用微笑作答。他現在好像隨和得多，我在他面前也不那麼侷促了，他是有經驗的領導，我若碰到困難，就可以向他討教。另一方面，在和超林的交往中，我得注意保護自己，他可是黨在我們中間的耳目。我想過把常明的身分卡扔到海裡去，那上面有他的指紋，到了釜山，可能會給我帶來麻煩，沒有了指紋，美國人可能就不容易發現我冒名頂替。只是我終究不敢把那張身分卡扔掉，怕被超林發現，會向裴政委報告。

另外兩個人，原來三十九軍的一位副營長，和炮兵八師的一個參謀，我只是見過。他們看上去都很沮喪，有一個還暈船，不停地嘔吐，說他把五臟六腑都快吐出來了，另一個則一路都在打盹。

第三十一章 重新登記

我們四人住進了釜山戰俘集中營裡的一個小帳篷，現在我們談話沒人監視了。我對重新登記很擔心，但超林說，這不會是什麼太嚴重的事情，要不然，敵人一定會把我們分開、在帳篷門口派更多的衛兵。的確，我們門口只有一個南朝鮮衛兵在把守。那兩個人也同意超林的話，都說，要是美國人想殺我們的話，他們會自己動手，不會讓南朝鮮衛兵介入。於是，一整個下午，他們都挺放鬆，互相聊天、打趣，只有我依然緊張，不知道要是假身分被發現了該怎麼辦。

我們帳篷離醫院的手術區不遠，那裡還亮著燈呢，我禁不住對它凝視起來。不知道格琳醫生還在不在那裡工作。有幾個女醫護人員出入那白樓的大門，但是都不像她。要是看見我現在走路的樣子，她不定會多高興、多爲她創造的奇蹟自豪呢。我看了半個鐘頭，也沒見到一個熟人，就走到南朝鮮衛兵跟前，向他打聽格琳醫生，可是他不懂英文，只是一個勁搖頭。

第二天早上，我們一個一個地被帶到管理中心去。超林第一個去的，我們三人就躺著抽菸、聊天，等著輪到自己。我們聊起朝鮮女人，都說她們大多數都不如中國女人好看，因爲她們都不化妝。「她們那臉都讓太陽曬得嚇人。」那位參謀說著，一邊皺起他的扁鼻子，好像在聞什麼東西。他頸子上有一大塊拔火罐留下的紫斑。

「她們的臉我看著倒還行，有漂亮的，」年近四十的副營長說：「可她們那羅圈腿，我可實在受不了。」

「你怎麼知道她們腿長得什麼樣？她們不是總穿著長裙或長褲嗎？」

「兩年前我們駐紮在一個小村旁邊，經常看見她們下河。」

「洗澡嗎？」

「對呀。」老軍官放聲大笑，喉嚨裡像是有什麼東西在冒泡，來回搖晃著半灰的鬍髭。「其實，你看看朝鮮男人的羅圈腿，就可以想像女人的腿長什麼樣了。」

「可能她們坐得太多了，」我插嘴說：「他們家裡都沒什麼家具，一天到晚老坐在炕上，可不是把腿都坐變形了嘛。」

「有道理。」參謀贊成我的話。

我又說：「還有，朝鮮女人的大筐、水罐都是用頭頂著的，脊椎太受壓了。」

「沒錯。」副營長也同意。

不過，我們都覺得朝鮮女人大體上都性格溫良，論做媳婦，可比中國老婆強。她們個子多半不高，估計都是因爲幹活太多，影響了發育。朝鮮男人似乎很少下地幹活，你常常看見老人趕牛車，看守果園，燒木炭，烤菸葉，在山裡種人參，但很少看見他們在田裡插秧或在菜園子裡除草。另外，大多數青年男子都被徵兵了，所以田裡的活兒都留給女人了，女孩子往往從十幾歲開始就要幹農活。不過，朝鮮人的牙齒大多結實潔白，很少例外，我因爲自己經常牙床發炎，所以就注意到他們的好牙齒。有位朝鮮醫生跟我說過，泡菜對牙齒是很有好處的。

超林一個小時後回來了。他興致很高昂，說現在他可以返回濟州島了，重新登記的確只是例行公事。他分析，美國人一定弄丟了一些檔案，所以現在要重新建立起來。除了我們四個人，還有從別的戰俘營來的好幾十人，也都需要重新登記。我還沒來得及仔細問他登記的過程，衛兵就叫到我了。

我把常明的身分卡塞到褲兜裡，就跟著衛兵走了。經過那個露天公共廁所的時候，我對衛兵說我得去小便。衛兵讓我進去了，我在裡邊把常明的身分卡撕碎，扔進了茅坑。

登記室設在一個大帳篷裡邊。在走進登記室之前，一個脖子和臉一樣粗的黑人祕書讓我把身分卡拿出來，我說：「我沒有啊。」

「怎麼會沒有？」他一臉的疑惑。

「我在濟州島戰俘營的時候弄丟了。我病了好長時間，照顧不了自己的東西。」

「好吧，那我給你打個指紋吧。」

我先伸出左手，一個指頭一個指頭地蘸上油墨，在一張印著五個方格子的卡片上，按下了五個指紋。左手按畢，又按了右手。然後他給我一張草紙，讓我把油墨擦乾淨，這才帶我走進裡間的登記室。登記室裡坐著一個美軍少尉和一個中國翻譯，別看他穿著便衣，戴著玳瑁眼鏡，我還是一眼就看出他是從臺灣來的。他們讓我在一個帶墊的椅子上坐下來。辦公室裡挺舒適；屋角裡有個白色書架，上面擺著幾十本書，讓我好眼饞，裡邊有小說、手冊、很新的《聖經》，這個少尉一定負責戰俘的教育計畫。

「姓名？」少尉問道。他和我年齡差不多，但已經開始禿頂了。我裝作不懂英文，等那翻譯給我翻成中文，這樣，在回答之前，我可以多一點考慮時間。

「馮文。」我說著，心裡噗通噗通直跳。

「年齡？」

「二十六。」常明比我大一歲。

「教育程度？」

「大學畢業。」

「哪個學校？」

「北京大學。」

忽然那個黑祕書走進來，把我的指紋卡放在少尉桌上，說：「萊特少尉，這個指紋和我們檔案裡的不符。」

壞了，他們有常明身分卡的紀錄！我一下子頭暈目眩，心頭狂跳，兩個軍官緊緊盯著我。除了禿頂，萊特少尉還算是個英俊的人，鼻樑很直，嘴唇很中看，一臉捲曲的小鬍子。他說：「現在，你必須對我說實話，很顯然你不是馮文。」

「我是馮文。」我是用英語回答的，忘了要等翻譯了。

他們倆互相看了看。少尉嚴厲地說：「那你解釋一下，爲什麼你的指紋和紀錄裡的不符？」

「我不知道，一定是搞錯了。是你們讓我來重新登記的。」

「你的英語說得不錯嘛。」翻譯說。

「我在大學裡修過幾門英語課。」

萊特少尉說：「馮先生，或別的什麼先生，如果你不能解釋清楚指紋的問題，我們就不能放你走，直到徹底搞清楚爲止。」

「放不放都一樣，反正我已經是戰俘了。」

「我卻覺得這並不是搞錯了——這裡邊有鬼，所以我們得弄清眞相。」

他說話的方式讓我印象深刻，顯然他受過良好的教育，可能是大學畢業生。儘管我努力想把話說清楚，卻是詞不達意，滿臉冒汗，只好手抹了一把。

萊特少尉打了個響指，命令衛兵，「把他關到四號牢房去。」

我想說點什麼，卻一個字也說不上來，只好一言不發地跟著衛兵出去了。

我被砰地一聲關進了一個單人牢房，牢房的窗戶上都安了鐵條。我開始考慮該怎麼辦，最要緊的問題，是要不要承認自己的眞實身分。這樣的坦白，在共產黨眼裡可就等於叛變，但如果我不肯坦白，他們是不會放了我的。那我坦白還是不坦白呢？要不，坦白一部分，而不全說出去？也許我該這麼做，可是坦白多少呢？那可要看他們對我知道多少了。要是他們發現了我隱瞞事實，我可就完了。

想來想去，我仍拿不定主意。越想自己的前景，就越恨裴政委把我送到這兒來。要是常明自己來，整個事情早完了，傷不著他一根毫毛。共產黨眞的不想犧牲掉自己的人。

因爲拿不準該怎麼辦，我打算從現在起走一步看一步。不管怎麼樣，我不必做傷害自己的事。只要我活著，就總有辦法回中國去。

第二天一大早，我又被帶到萊特少尉的辦公室。這一次，他桌上擺了一臺老大的錄音機。我提醒自己，說話一定要小心。我一坐下，萊特就遞給我一張照片，是我和裴政委在海灘上那張合影。我傻了，不敢抬頭看他。

「好啦，」他咧嘴一笑，「我們知道你是誰了，馮延。現在你必須告訴我們，你爲什麼要替馮文來登記？」

「『他們』是誰？」

「共產黨的頭頭們。」

「他們讓我來的，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我答道。

「你來的任務是什麼？」翻譯說。

「沒任務，就是犧牲自己吧。」

「你這話什麼意思？」少尉問道。

我對裴政委的詭計氣憤極了，就說：「馮文是裴政委的翻譯，他離不了他，所以裴政委就叫我來了，來送命的。」

「你的英文一定比馮文說得好，對不對？」又是那個翻譯問。

「可我不是黨員。」

「原來如此。」

萊特少尉說：「我再問你一個問題，你一定要老實回答，答完了我們再決定怎麼處理你。我想問：你恨共產黨嗎？」

我看了一眼錄音機，沒開著。「是。」我掙扎著說出來。

「你好像不太肯定。」

我一時衝動，撩起了衣襟，給他們看了我的肚皮——FUCK COMMUNISM。「看看吧。這個夠不夠肯定？」

他們倆都笑了。萊特少尉一揮手，說：「我不知道。我弄不清你們東方人的思維，太狡猾了。要是你像刺青上說的那麼恨共產黨，那你爲什麼要跟著他們去第八戰俘營呢？」

「我是士兵，要服從命令。」

「誰的命令？」

沒等我開口，那個翻譯奸笑著插話說：「我懷疑你沒說眞話。」

「你憑什麼不相信我呢？」

「那刺青一定是共產黨自己給你刺到肚子上去的。」

「他們幹嘛要刺這個？」

「好讓你給他們當間諜呀，苦肉計。」

「就是，沒錯。」萊特少尉的褐色眼睛一閃。

「荒唐，這兩個字是巨濟島七十二聯隊的人給我刺的，沒共產黨什麼事。你們可以打電話給巨濟島戰俘營，找三中隊隊長王永問問，是不是他的人去年春天給我刺的。」

這話讓他們沒話可說了。少尉又說：「好吧，我們和濟州島聯繫一下。今天就到這裡吧。」

「你們幹嘛不問巨濟島？」我不明白。

「他們都搬到濟州島去了。」

這可是個新聞，我從來不知道，濟州島上還有親國民黨的戰俘營呢。

離開之前，我又一次看了一眼那書架。萊特少尉看見了我羨慕的眼光，但什麼也沒說。我回到牢房裡，也不知道自己提到了七十二聯隊是不是夠聰明。很多親國民黨的人一定對我恨之入骨，很可能向美國人告密，好置我於死地。要是我沒提王永就好了。可是，我不提他，就沒法洗清自己。我很擔心下一次審訊，會怎麼樣呢？其實，我還眞的有幾分喜歡萊特少尉，他似乎是個正派人，謙和實在，措辭很愼重。讓我害怕的是那個翻譯。美國人通常直來直去，不善於隱瞞感情，所以，和他們打交道，你不必太小心提防。可是，有些中國人比起來就太深不可測了，不管腦子裡想的什麼，表面上卻不動聲色。我很怕那個翻譯會設圈套害我。

我的預感果然應驗了。第二天早上，我在他們兩人面前一坐下，萊特就對我說：「我們問過王永了，他記得他手下的人給你刺過字。」

「這下你們可以讓我回第八戰俘營了吧？」

那翻譯說：「你爲什麼這麼急於回到共產黨那邊去呢？」

「我跟你們說過，我不喜歡他們，可我想回家，我媽就我這麼一個孩子。」

「馮先生，你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是蔣委員長的學生，你幹嘛不去臺灣呢？我們遲早是要反攻大陸的，那只是時間問題。」

我低下頭，答不上話來，不知他葫蘆裡賣的什麼藥。

萊特說：「我們相信，事實勝於雄辯。如果你憎恨共產黨，你一定會離開他們。還是說實話吧，我不想再聽謊話了。」

「你看，馮先生，你必須選擇何去何從。」那翻譯也幫腔，把蹺著的二郎腿放了下來。很顯然，他們是不會讓我回第八戰俘營的了，所以，要想他們放我，唯一的出路就是去親國民黨的戰俘營了。我的頭又暈又疼，喘不上氣來，但我極力保持平靜，沉默了一陣之後，我說：「好吧，我去臺灣，不過有個條件。」

「只管說。」萊特急切地說。

「請你寫個信，就說我去臺灣是出於自願的。」

「這沒問題。」

「那你送我去哪兒都行。」

他拿起一枝鋼筆，在一張公文紙上寫起來。那翻譯往一個黑菸斗裡裝上菸絲，點上火吸起來，一股輕煙遮蔽了他略帶凹陷的臉。那菸絲甜得很好聞，有一種奶油糖的味道，一定是美國牌子的。

「我可以看看你的書嗎？」我指指書架，問萊特少尉。

「隨便看，不是我的書。」他頭也不抬地回答。

我走過去，一一瀏覽了一遍——有二十來本愛情小說，幾本軍事手冊，十多本《聖經》。

「寫好了。」萊特大聲說道，把信推到桌子邊上。

我回到自己的椅子上，拿起信來，萊特用一筆斜體字寫道：

敬啓者：

在重新登記的過程中我們鑑別出馮延，他的英語說得流利，不願意繼續留在以共產黨為主的戰俘營裡。他希望能去自由中國，因此，我們把他送到你們那裡。請對他多加關照。

誠摯的

提摩西．萊特少尉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日

我對這封信很滿意，特別是最後一句。我小心地把信折好，放進胸前口袋裡，一邊對萊特說：「眞是太謝謝你了。」

「我對這個結果也十分高興。」

翻譯插進來：「那你今天下午就回濟州島，我們都給你安排好了，有回去的船送你去。」

「我怎麼從來沒聽說過濟州島上另外還有一個中國戰俘營呢？」

「在島上最南邊，第十三戰俘營。」萊特告訴我。

這時我又冒出一個念頭，便對他說：「再提一個要求可以嗎？」

「行啊，只要是合理的。」

「可以給我一本《聖經》嗎？在共產黨戰俘營裡，他們不讓我看任何有關宗教的書，可是我很想讀《聖經》。」

他的大眼睛一亮，笑著對我說：「那就拿一本去吧。」

我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栗色皮封面的《聖經》，是中英文對照的版本，中間還有一條粉色緞帶做書籤。

我轉身把書放在桌上，「我拿這本行嗎？」

「歸你了。」他揚起下巴，開心地笑起來。翻譯也笑了。

「多謝了！」我說。

「沒問題。你現在可以走了。」

衛兵把我帶出管理中心時，我看見一個年輕女子正朝病房那邊走去。從後邊看，她好像很眼熟，紅褐色的頭髮像一支火炬，我腦子裡閃出格琳醫生來了。我向衛兵懇求說：「讓我對那個醫生去道個謝行不行？她救了我這條腿。」

他點頭說：「給你兩分鐘。」

我趕快去追那個女子，一邊大喊：「格琳醫生，格琳醫生！」她轉回頭來，讓我大失所望，不是格琳醫生，這個女子兩頰紅潤，有一雙大大的眼睛。

「我不是醫生，我是護士。」她很愉快地對我說。

我氣喘吁吁，說：「那你認識格琳醫生嗎？她給我的腿動過手術。」我把左腳伸出來，好像她知道我左腿有傷似的。

「聽說過，但是我來的時候她已經回美國了。醫生一般在這裡只待一年。」她微笑著，嘴角微微翹起。

「對不起，我把你當成她了。」

「沒關係。」

我很尷尬地走回來，一邊嘆氣一邊搖頭。衛兵把我帶到一個帳篷，裡邊有很多中國人、朝鮮人和美國人，在等卡車拉他們去碼頭或飛機場。負責戰俘的軍官看罷衛兵遞給他的一張紙，便對我說：「上躺著的那堆人那邊去，你和他們都是去十三戰俘營的。」

我走過去，揀了塊地方坐下來，靠在一個裝滿螺帽螺釘的木箱子上，就開始翻起《聖經》來。可是我沒法集中注意力，因爲一種痛楚不時地向我襲來。我可能再也回不了家了，再也不能照料母親、和我心愛的女人一起生活了，這樣一個前景怎不讓我傷心得要死？

第三十二章　回到濟州島

釜山是當時南朝鮮的臨時首都。儘管有柏油馬路和霓虹燈，這個城市卻又髒又擠；街上漫步的行人，和滿目的商品，都讓我更強烈地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戰俘。很多商店招牌上的中國字，喚起了我對祖國的回憶，從人家炒菜鍋裡飄過來的爆蔥花和豬肉的香味，讓我肚子裡咕咕直叫。一出城中心，就可以看到難民了，那麼多的難民，連灌木上和樹上都晾滿了洗過的衣服和尿布。到處都是一排排、一串串的帳篷、小屋、草棚子，就連附近的山上也不例外。很多老百姓身上穿的都是用美國軍毯做的衣服。朝鮮人給軍毯派上這麼多用場，讓我不能不驚嘆——隔房間，做床墊，拆成毛線織襪子、織圍巾、織毛衣、織手套、織小孩子衣服，等等。有些人乾脆裹著毯子走來走去，活像一些袖珍的移動帳篷。我聽說過，北朝鮮戰俘拿軍毯跟老百姓換魚乾、泡菜、酒和草藥，但我從來沒有想到，他們的交易量大到這種程度。

街上到處都是汽車，但是很多汽車都破破爛爛，尤其是朝鮮人開的那些車，多是用美國車和日本車的零件拼湊起來的。一棵槐樹下停著一輛吉普車，車蓋上坐著一個朝鮮小男孩，幾個美國大兵給他可樂喝，還教他用英語罵人，把孩子樂得嘎嘎大笑。這個地方臭氣熏天，充滿了腐爛和糞便的氣味，令人作嘔。

回濟州島的路上快活多了。大船一離開碼頭，空氣就變得新鮮清爽。沿著海岸，雲和煙霧慢悠悠地滑翔著，幾列貨車噴著黑煙，像大蟲子一般徐徐向前爬行。黃昏的大海是平靜的，快要落山的太陽向浩淼的碧波投來最後的光芒。我靠在船頭的欄杆上，看見了一群鯊魚，個個有五六尺長。幾個戰俘聞聲衝過來看，看到牠們一路鱗光閃爍地飛快游開，都又喊又叫。除了這一會兒，一路上我都是一個人待著，不想和別人在一起。我只是一直看著大海，看著海面上不時冒出的魚肚子。因爲我們都算是「反共人士」，衛兵對我們比以前要客氣很多。我們可以不受限制地待在甲板上，不過，到了夜裡，外邊太冷，就只能回艙裡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們到達濟州島西南不遠的一個岩石小島慕瑟浦。大船靠岸時，我看見幾個套著黑衣黑帽、戴著護鏡的女子，正在海灣裡潛水，往上撈蚌殼、海參、扇貝、鮑魚、海螺什麼的。水面上漂著十幾個大葫蘆，每個葫蘆上都拴著一個口袋，好放撈上來的海鮮。在這群幹活的人中間，我竟然沒有看見一個男人。那些女人個個興高采烈，不時對同伴揮手尖叫，有些女人已經不年輕，有四十來歲的光景了，她們從水底下上來換氣的當口，我看見她們下巴和脖子上已經有了皺紋。

「Haenyo。」我身後一個朝鮮人發話了。這個字的意思是「海女」，一定是從中文來的。這群女人安居樂業的情景令我深深感動，周圍的戰爭似乎沒有影響她們的生活。

二十七名中國戰俘被直接送到第十三戰俘營的第三大圍場。在大門前，我被震動了，這裡就好像一座巨大的紀念拱門，大門上方豎著一根旗杆，一面國民黨青天白日旗高高飄揚在旗杆頂上。四個用磚砌起來、刷成白色的門柱上，寫著斗大的黑字，裡邊兩個柱子上寫的是「誓滅共產黨」和「重建我中華」。每個門柱頂上都安了一個風向標，風向標小橫桿上一對小球懶洋洋地旋轉著。原來，這裡邊的十個大隊都做好了接待我們的準備，一些負責人站在門口迎接我們。美國衛兵馬馬虎虎給我們搜了身，我很慶幸他們沒發現我書包裡的《聖經》，當然我也知道，他們不見得會沒收這樣的書。

「呵呵呵，看看誰來了。」王永一看見我就喊起來。他走上前，伸出手來，友好地微笑著，半闔上眼睛，他身後站著兩個壯實的保鏢。

「你可好啊？王隊長。」我和他握手，並致問候。

「我很好。馮延，歡迎你歸隊。」

我一下子想到，他一定向他的上級要求了，把我分回到他的中隊去。這使我心裡不踏實，他這人翻臉無情，我最好小心一點，別惹毛了他，不然的話，他會給我罪受的。我從胸兜裡掏出萊特的信交給他，說：「這是釜山戰俘中心給我寫的介紹信。」

他掃了一眼那封信，說：「我不懂外國字，那上邊說了什麼，你說吧。」

「信是釜山中心負責登記的萊特少尉寫的。他告知你，我是因爲想去臺灣，而離開共產黨戰俘營的。他還請你關照我。」我強笑著，下巴頦都酸了。

「很好，你收好這封信，別弄丟了。」

聽他的保鏢現在叫他大隊長了，我恭賀他升遷，他說，什麼升遷，一個名義而已。後來我自己也看到了，他還是領導著原來那麼多人，他那大隊，基本上就是原來的中隊。我們一起走進第八大隊，整個大隊的三個中隊都歸王永管。

他沒讓我去任何一個中隊，而是把我留在了大隊部，和他的勤務兵、保鏢、祕書、傳令兵等人住在一起。這裡的院子、營房和廁所，到處都很乾淨，看不見一點垃圾；看得出來，戰俘們花了不少時間，來改善自己的生活環境。另外，他們吃得也比去年強多了。我起先猜測，是不是臺灣的國民黨給了他們伙食補貼，後來發現並沒有，是戰俘們自己種了些蔬菜、莊稼。我覺得和這些人爲伍挺可怕的，很多人穿戴著自己做的軍服和大簷帽，和國民黨兵的軍服很類似，每人的帽子上都是一個老大的青天白日帽徽。

當天晚上，我碰上了老朋友白達堅，當初，他是因爲誤會才留在這裡的。他比過去壯實了些，可眼睛裡充滿血絲。我們握了手，我甚至還流了幾滴眼淚，他見到我卻不特別激動，雖然他的眼睛也濕潤了。他說：「我聽說你今天會回來，你這一向過得怎麼樣？」

「還行。」我很想告訴他，共產黨如何把我送到釜山，去做他們自己人的替死鬼，可我把話又嚥回去了，不知道他如今變了多少。「他們對你好嗎？」我反過來問他。

「好，他們對我不錯。」

他的口氣裡有幾分冷淡。我看不出來，那是因爲去年甄別那天我把他拋下了而怨恨我呢，還是因爲我們分別太久變生分了，還是他和親國民黨的人混久了，已經接受了他們的理念？他似乎心智成熟了很多，變得更有保留、更獨立、更自信了。後來我得知，他常常充當大隊的翻譯，他的英語現在很不錯了；而我們分開那會兒，他還說不成整個句子呢。王永竟然找不到一個英語更好一點的人了。也許，白達堅擔心我的到來會危及他做翻譯的位子吧。

我仍然懼怕劉太安，巨濟島七十二聯隊那個剜過林吾深心臟的副大隊長。聽說他去年夏天已經離開了戰俘營，我才鬆了一口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現在落到共產黨手裡了，美國人派他去執行一項特殊使命，在東京接受三個月的訓練之後，他被空投到北朝鮮，僞裝成共產黨軍官，充當一名間諜，可是他一落地就被當地民兵捉住了，他們把他交給了志願軍總部，他們掌握著他的檔案呢，一審訊他就露餡了。他被押回中國，關在撫順城外。五年以後，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他因爲殺人、叛國、爲美國充當間諜等等罪名，被公開處決了。第三大圍場裡有人相信，是總隊長韓述把劉太安推上送死這條路的，因爲他們兩人合不來，而在親共產黨的人都給分出去以後，韓述也不再需要劉太安了。現在，戰俘營裡沒有劉太安，我就不那麼害怕了。只要我跟王永把關係處好，就可以平安無事。

這裡的日子比在共產黨那邊簡單。有時候，戰俘中間會打起來，通常都是爲了很小一點事，誰毛巾不見了，誰香菸少了，誰不小心撕壞了雜誌之類。我不跟一般戰俘住在一起，所以不必每天和他們打交道。王永給了我一個辦公桌，一把椅子，是大圍場裡木工房給做的，跟家具店裡買的一樣好。他還發給我一個臉盆，那是一個漆成米色的鐵盆，也是戰俘營裡造出來的，有了它很方便，這讓我感覺享受了特別待遇。我還可以使用大隊部的收音機，大多數戰俘晚上要聽《自由中國之聲》廣播，這個節目經常會評論朝鮮局勢，有幾次，是對我們戰俘直接講話的，勸告我們與聯合國軍合作，繼續忠於國民黨的事業。有一回我還聽到蔣介石發表的廣播講話，號召大陸的人民起來反抗共產黨政權。

這裡的很多戰俘一天到晚靠賭博、下象棋、玩撲克、打麻將度日，也有人閱讀國民資訊與教育中心、紅十字會發的小冊子。不像共產黨那邊，這裡除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書以外，你看什麼書都可以。我就把很多時間花在讀那本《聖經》的英語部分上，每一頁左邊的中文譯文，可以幫我推斷出英語生詞的意思。這樣的閱讀對我的英語提高很快，我很高興我再也不用從頭到尾地啃英文報紙，去搜集資訊了。在這裡，報紙是正常供應的，主要是過期的《星條報》，有時候，我還可以看到一份五六個星期前的《紐約時報》。我們還有幾份中文雜誌，大家很喜歡一本叫《美利堅》的刊物，它在營場裡流傳很廣。不過，最受歡迎的要屬蒙哥馬利·華德和西爾斯百貨公司的商品目錄了，從那上面琳琅滿目的商品廣告，可以看到美國人是怎麼生活的，而且，那上邊還有漂亮女郎們千姿百態、五彩繽紛的照片，這大概是眾人對它們著迷的主要原因。每個星期，大隊裡還會放一場電影，那是大家最高興的事情了，我看了《林肯在伊利諾州》、《飄》、《金剛》、《大地》等等著名的電影片子。

教育中心裡還有一本不外借的剪報集，上邊有數以百計的報紙、雜誌剪報。很多人從頭到尾地翻閱這本大

冊子，邊看邊議論著麥克阿瑟將軍和李奇微將軍。有人喜歡麥克阿瑟那張光溜溜的面孔，他走訪部隊時，常常身著便裝，戴著皮手套和墨鏡，甚至還圍一條毛圍脖兒；可也有人更喜歡李奇微，他無時無刻不是全身戎裝，左肩上掛著個急救包，右胸前別著顆手榴彈，皮帶上掛著手槍和望遠鏡。至於我自己，我討厭麥克阿瑟，他在每張照片上都笑得很得意，一副陶醉於戰爭的模樣，似乎一有仗打他就渾身舒坦——就好像他正坐在體育場的看臺上看一場精采球賽一樣。他身穿便裝，更像置身任何戰事之外的一個人，坐在高處俯視著他手下的人廝殺，自己卻不想沾一根指頭。他那樣子更像一個參議員，不像軍人。那些崇拜麥克阿瑟的戰俘會蔑視李奇微，說他一臉摺皺加上一雙睜不開的眼，活像個鄉巴佬。有一天我聽得實在不耐煩，就問他們：「我說，作爲一個軍人，你願意在誰的指揮下打仗呢？麥克阿瑟還是李奇微？」這時候他們可沒有一個選麥克阿瑟的。

雖然李奇微模樣像個農民，他更像個有同理心的人，更了解士兵的內心。他那身裝束就體現出巨大的關切、信心和責任感，他是在向部下表明，他是大家中的一分子，隨時準備衝上前線。胸前的手榴彈強調了他作爲一個軍人的戰鬥能力，左肩上的急救包表明他充分意識到戰場上的災難——部隊傷亡的問題他時刻掛在心上。這種對細節的關注，說明他是一個負責任的、盡職的指揮員。我沒有看見過一張照片上的李奇微是笑著的，他那張憂鬱的臉似乎流露出對戰爭的某種厭惡。

剪報集裡還有其他名人的照片，比如三十多歲的《紐約先鋒論壇報》戰地記者瑪格麗特·辛頓，高個子金髮女郎，長得像個二流女影星·靈活的大眼睛，窄窄的鼻子，一頭燙髮，潔白的牙齒。她總是穿著肥大的勞動布的衣服，戴著飛行員墨鏡，蹬一雙網球鞋，戴著超大的帽子。有張照片上，她和麥克阿瑟將軍很熟悉的樣子，將軍的手不經意地搭在她後腰上。文章裡說，她常能得到其他記者得不到的故事，她到前線去採訪，甚至和仁川登陸的部隊睡在一起。不論辛頓小姐在哪裡出現，都會引得美國大兵一片歡叫，大家多少個月沒見過金

髮女郎了，她的吉普車是部隊最搶眼的風景。她一定是個優秀記者，獲得過普立茲新聞報導獎。現在她早已返回美國，但已經患了支氣管炎、過敏性鼻竇炎，和周期性瘧疾、痢疾、黃疸，都是她在戰地報導的過程中傳染上的。在一次採訪中，她對記者宣稱，不找到「一個和戰爭一樣刺激的男人」，她就不結婚。看到這些話，我內心裡冒出一陣噁心——對她來說，戰爭是一種表演，一場好戲。應該給她一支步兵那樣去打仗，讓她親身體驗打仗的人遭的罪，還有被出賣、喪生、發狂等種種辛酸的滋味。有篇文章甚至下結論說：「朝鮮戰爭是她的戰爭。」誰能承受戰爭的分量？對目擊者來說，是要讓眞相公諸於眾，但我們得記住，大多數受難者是發不出自己的聲音的，爲他們的經歷作證，是肯定不適當的。

我們隊裡很少有人招惹我，因爲大家都知道王永是我的靠山。作爲回報，我就得對他有求必應，我甚至替他起草公文信。和共產黨那邊相比，國民黨這邊對禮節比較講究，所以一封正式公函一定要措辭得體、行文優雅。給上司寫信時，一定要寫出對方官銜的全稱；而他們彼此之間，則使用一些比較親熱的詞彙，比如稱對方爲「老兄」（哪怕收信人年輕了一輩），還有「尊兄」、「仁兄」什麼的。我不喜歡這類的虛禮，又封建又可笑，可我很熟悉這一套，用這些詞兒寫起信來毫不費力。還不止這些呢，現在我在這兒，王永見美國人時總帶著我，不再帶著白達堅了。偶爾他還會把我借給團部使用，特別是外國官員來視察監獄的時候。我不想傷達堅的感情，但又不能不服從王永調派。

儘管王永粗魯可怕，他卻崇拜知識，尤其是書本上的知識。只要一看見我讀《聖經》，他總是嘖嘖有聲地讚嘆，甚至給我搞來一本袖珍英漢辭典，對我閱讀幫助很大。我們誰都沒錢，所以買不了辭典，然而王永從一個給聯合國工作的國民黨軍官那裡給我搞來了一本。辭典是兩年前剛在臺灣出版的，幾乎還是新的呢。我在扉頁上寫上自己的名字，寶貝得不知怎樣才好。

我的閱讀速度跟上來了，現在我一小時可以讀完十頁，這個進步讓我大爲喜悅。我用鉛筆標出所有生詞，回頭再來複習。我直覺地感到，掌握英語會給我帶來好處，所以我學習得很來勁。

我們營房鐵絲網外西頭那邊，有幾棵櫻桃樹，正開著粉嘟嘟的一樹櫻桃花。更遠一點，是一個小橘樹林，樹上的果子已經越來越大了。有時候，從樹林深處，會傳來布穀鳥的叫聲，我常常順著聲音想看看那些鳥是什麼樣子，卻從來沒能看見過。我盯著橘樹林看的時候，有時可以看見幾匹花斑或栗色的蒙古馬，自由自在地吃著草，撒著歡，可能是一群野馬。

這裡的日子雖然相對安全一些，卻同樣沒法跟政治鬥爭絕緣。不時地總有一些意在強化我們仇恨共產赤匪的會議，來打破我們內心的平靜。學習小組要定期碰頭，我們人人要讀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和孫中山論述「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每星期裡有一天，我們要對紅色中國和蘇聯進行控訴。戰俘一排一排地坐下來，一個一個地聲討共產黨人犯下的罪行。有人說，他的叔叔僅僅因爲在街上賣了一點鴉片，就被處決了。還有人說，他父母的房產，一座石頭砌的大房子，被村政府沒收了，他們把房子拆掉，把石頭都拿去建水庫大壩了。一個嗜酒如命的人太誇張了些，竟說共產黨關閉了他家鄉所有的酒廠。我們大隊的祕書，說他父親只有十畝地，在他當紅軍那年月，被共產黨當成「地主」給槍斃了，他的上級把他父親被處死的消息瞞下來，甚至塗改了他姊姊來信的內容，一直把他蒙在鼓裡。

這樣的故事一個接一個，戰俘們確實有無盡的冤情。這些集會多是反共抗俄協會組織的，每個人在會上都多少要說點什麼來譴責赤匪。有一次有個人爭辯說，共產黨總的來說是邪惡的，不過他們總也做過幾件好事吧，像禁絕鴉片菸，控制物價，男女平等。有人聽罷氣壞了，說他同情共黨，到了夜裡，幾個人抓住他，把他臭揍了一頓。我覺得，那些人雖然反對共產黨，但是在共產黨隊伍裡受教育太深，所以行事起來和共產黨沒什

麼兩樣。他們聯合到一起，主要是出於對未來的恐懼，猜不出會有什麼結局。在反共的道路上，他們已經走得太遠，沒法回頭了。我看，國民黨政府也未必信賴他們，因爲他們跟著共產黨軍隊幹過，已經背叛過他們原來的國民黨主子了。

有天下午，在「伸冤」大會上，有位醫生講了一件讓人幾乎不敢相信的事情——當然，故事中肯定有一部分確有其事。他說：「元山一戰，我們原來那個師傷亡慘重，我們趕緊上去處理傷員。只見成百上千的傷員躺在山坡上。我當時不知深淺，聽見誰呼救，就趕快去給誰包紮。可是我們主任說，先翻開看看他們的外衣裡子，如果有鐮刀斧頭的標誌，就趕快給予急救醫療處理，運回後方，於是我們就按他說的做了。有那個祕密記號的人都是黨員。很多像我們一樣普通當兵的，就被拋下不管了。」

他講完後，聽眾沉默了足有一分鐘。我認識那醫生，我想他沒有瞎編。王永打破了沉默，說：「共黨那是把我們當炮彈用啊。看人家美國兵，上戰場都穿著防彈衣，美國政府多爲他們的生命著想。可我們呢？除了一件棉衣，我們還穿了什麼？要是我們也穿上美國兵那樣的東西，多少弟兄就不會死了？我最近剛看到一篇文章，那上邊說，李奇微將軍說，美國軍隊絕對可以把共產黨軍隊趕過鴨綠江，但是他不會那麼幹，因爲他不想犧牲幾萬士兵。想想吧：要是志願軍可以把美軍趕進太平洋，他們會怎麼做？毛澤東難道會在乎所有的志願軍都犧牲了，來達到那個目的嗎？他肯定不在乎的。他不是已經讓我們到這兒來白白送死，給朝鮮土地當肥料了嗎？」

「打倒共產主義！」有人高喊。

所有的人都舉起拳頭，齊聲喊起來。

「反攻大陸！」

幾百人再次一起怒吼。

王永把我們比作「肥料」的說法，把我思考過很久的念頭又勾起來了。沒錯，作爲中國人，我們切實地感到，自己的生命在這裡根本沒被當回事，隨便廢掉，但是，正像我以前說過的，不管我們的處境多麼不幸，這世上總有人連我們還比不上。現在我理解了，爲什麼有時候有些朝鮮老百姓對我們抱有敵意了，在他們看來，我們上這兒來，只是爲了保衛中國的利益——這麼做就不能不毀壞他們的家園、莊稼，還有生計。站在他們的立場，要是中國軍隊不打過鴨綠江，數以百萬計的老百姓和戰士的生命就不會失去了。當然，那樣的話，美國就會佔領整個朝鮮，迫使中國在東北建立防線，那比派兵到鄰國去作戰代價昂貴多了。像目前這樣，朝鮮就首當其衝，遭受了戰火的破壞，我們中國人到這裡來，主要是爲了讓戰火不至於燒到自己的國土上。或者說，我們是給蘇聯人當了炮灰，很多戰俘就是這麼認爲的。不錯，戰爭是朝鮮人自己挑起來的，可是像他們這樣的小國，最後只能淪爲各個大國的戰場，不管誰打贏了這場戰爭，朝鮮都輸定了。

我還認識到，爲什麼有些朝鮮人，尤其是居住在三八線以南的朝鮮人，似乎更喜歡美國軍隊而不喜歡我們。我們自己的糧食和物資不足嘛，只能逼著向他們要米要糧，能吃的都要，我們可能會偷他們屋簷下的魚乾和辣椒，從他們的地裡搶莊稼、從果園裡搶果子，甚至挖出他們種下的種子吃。相反，美國人什麼都有，不去找老百姓要這些生活必需品。往往是美軍一從駐地撤走，當地老百姓就蜂擁而來，撿他們丟棄的各種東西，電話線，炮彈箱，彈殼，吃了一半的麵包、罐頭，被水泡了的香菸，爆掉的輪胎，廢電池，等等。我們以爲自己大老遠地跑來是幫助朝鮮人的，其實我們也自覺不自覺地當了破壞者。

一個大骨架的人跳起來說：「我也有很多苦要訴。」大家都管他叫「資本家」，因爲他養了隻母雞。那是他用四包香菸，跟一個朝鮮小販換來的一隻小雞，他在營房屋後給牠搭了個窩，主要餵牠吃草。到了春天，母

雞開始下蛋了，可是沒有足夠的食物，牠只能隔一天下一個小小的蛋。「資本家」就拿這些雞蛋跟炊事員換吃的。

「你說吧。」王永命令他。

「在東北的時候，我們連被分派到車站幹活，往貨車上一麻包一麻包地扛黃豆和花生，整整幹了一個星期。我問我們連長：『這些糧食往哪兒運哪？』他說：『蘇聯。』我問：『爲什麼？他們給咱們什麼了嗎？』他說：『這是我們對蘇聯老大哥表示的一點心意。他們以後會送給我們很多機器的。』從那次算起，有差不多一年，我們時不時就去火車站裝車，卻從來沒看見蘇聯運什麼回來，連一個釘子也沒看見過，只是一個勁給他們送東西去。從這我就看出來了，共黨不折不扣就是一群賣國賊。」

他一說完，另一個人又開始講，他怎麼被騙參加了這一場戰爭。他聾聲聾氣地說：「我是個中國人，可我不志願。來朝鮮以前，我們領導跟我們說，美國兵是紙老虎，他們害怕夜戰，他們的武器雖然先進，可近戰肉搏他們一點也不會，和我們比，他們不過是一群手下敗將。所以我們都寫了決心書，有個夥計說，他保證消滅二十個美國兵；另一個說，他要活捉一個當官的、一個上校；我說，我要幹掉三輛坦克，因爲我會擺弄炸藥包和爆破筒。等我們到了朝鮮，上了戰場，所有寫了決心書的人都得衝鋒在前。我們連長跟我說：『范龍岩同志，來之前你說過要摧毀三輛美國坦克，現在是實現你諾言的時候了！』我除了衝鋒還能怎麼著？我就這麼丟了一條胳臂。」

「日他媽的赤匪，」王永說：「淨他媽吹牛。毛澤東說，美國第七艦隊是隻紙老虎，這話要是眞的，那赤匪爲什麼不敢打過臺灣海峽？所有的人都看見的，他們害怕那裡的航空母艦。」

「那些老掉牙的東西就跟他們老娘的內褲一樣要不得。」一個寬臉的傢伙說。

大家一陣哄笑。我也忍不住和他們一起笑了。

「沒錯，他們根本不可能打破美國海軍的封鎖。」一個黑臉膛的漢子接了話。

我在會上也說了在共產黨軍隊裡看到的慘事。我說得最多的，是共產黨覺得機器比人命寶貴得多。這類無止無休的譴責，和共產黨的政治教育相比，可就顯得很拙劣了，共產黨總是把每個人的苦難，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聯繫起來，這樣就增強了人們對那三座大山的仇恨。反而這裡大家一旦開始吐自己的苦水，就很難抑制情緒了，各種各樣的譴責全冒了出來，有些是眞的，有些卻毫無根據。按規定你一定要說點什麼，要不你就可能被懷疑是同情共產黨。

我很謹愼，錄音機開著的時候決不開口，因爲有些發言爲了作宣傳要錄下音來。內心深處，我覺得共產黨政府比舊制度要負責任一些，爲老百姓也幹過一些好事，使中國成爲一個比過去強大的國家。可是同時，我又怕共產黨，怕他們對人民生活、人民思想的控制。

這裡還有一種政治教育，更讓我感到爲難，叫做自我批評和互相批評。我們都必須承認，自己在某種程度上幫助過赤匪，還必須坦白自己幹過的壞事，不管是有意幹的，還是無意幹的。人人都在解放軍裡幹過，所以很多人都輕描淡寫地談了幾句就完了，並沒有人逼他們坦白。可是，我就比較特別了，因爲我在共產黨人的戰俘營裡待過將近一年。於是，有一天早上，六十多個人出席了在我們營部裡召開的會議，專門針對我一個人。各種問題向我提出來，你在第八戰俘營裡都幹了什麼？在去年十月的暴動中你扮演了什麼角色？你怎麼又轉變了，回到這裡來了？你怎麼向我們證明你的老實？一個接一個的問題，簡直像在開控訴會。

我完全無法招架，同時腦子裡也充滿我自己的想法。你們和共產黨有什麼兩樣？在這世界上我能與誰爲

伍、和誰是同志？爲什麼我總是合不了群？哪年哪月在哪裡我才能有回到自己家的感覺？

沒想到的是，白達堅站了起來，指著我的鼻子，語氣生硬地說：「弟兄們，我覺得這傢伙是赤匪派來的奸細。」

我驚恐地問：「達堅，你爲什麼這麼說？咱們是好朋友，對不對？」

「你再也不是我的朋友了，因爲你背叛了黨國的事業。」

「坦白！」一個聲音命令我。

「你是一個共黨，是不是？」另一個人說。

「放乾脆點，承認吧！」

「別裝聾作啞！」

王永站起來，走到前邊，站到我旁邊，開口說：「弟兄們，咱們別再互相殘殺了。我知道他是怎麼回來的，我看過釜山一個美國軍官給他寫的介紹信。馮延，那信還在嗎？」

「在，在我身上。」我從外衣內兜裡把信掏出來。

「給大家念念。」他說。

我用英語把信念了一邊，然後翻譯成中文。大家聽了都不作聲了。可達堅還不肯放過我，他向我走過來，說：「讓我看看這封信。」

我把信遞給他，他看了看，然後竟把信撕得粉碎，扔了一地。他咬牙切齒地說：「這是騙局，僞造的！」他的臉失去了血色，左手餘下的幾根指頭在顫抖。

我站在那裡說不出話來，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他幹嘛要對我懷有這麼大的仇恨？他曾是一個文靜的人哪，怎麼變成另外一個人了？他爲什麼這麼歇斯底里呀？準是我的離開，深深地傷害了他。這麼一想我就明白了，他也許依然是個依賴他人的人，他這麼惡毒，是因爲把我看成了和他爭寵的對手。

突然，王永咆哮起來：「我操你娘，白達堅！你敢毀壞上司下達的文件。馮延被送回來以前釜山戰俘中心的人跟我談過，人家說，馮延是自願回我們這兒來的。這一切都是有手續的，清楚得像禿子頭上的蝨子。你憑什麼說這信是僞造的？你鬼迷心竅了你？你給我到伙房去，幫廚一星期。」

大家都笑得前仰後合，有幾個人甚至鼓起掌來。王永走過來，拉起我前襟，露出我肚子上的刺青。「看看吧，弟兄們，」他大聲說：「我們給他的字全在這裡。不錯，馮延是犯了個大錯，上次甄別的時候跟共黨走了，可我們應該再給他一次機會，對不對？」

「對，這叫仁至義盡。」有個老兵插了一嘴。

「就是這話。」王隊長接著說。「我們和赤匪不一樣，我們要珍惜兄弟情，互相講義氣，才能同心同德地團結起來。弟兄們，你們都知道史達林幾個星期前突然死了，現在是幹一番大事業的時機了，我們的大事業，就是推翻共產主義。我們不能把眼光只放在自己一個小小的戰俘營裡，像瘋狗一樣互相亂咬。要把眼光放到千里之外去，好反攻大陸，直搗北京，直搗莫斯科！」

「好！」幾個人喝起采來。

老實說，我並不特別害怕這群人，因爲比起共產黨那幫人，他們比較簡單和弱小。他們更在乎私人關係，特別是兄弟關係和集體忠誠，沒有一個凝聚大家的理念，每個人的行爲也並不一致。我轉向眾人，說：「請弟兄們原諒。上次我離開你們，只是因爲我有個多病的老媽在大陸，老媽可不是別人哪，一輩子就這麼個老媽，要是能在她身邊伺候著給她養老送終，我就死而無憾！她就我這一個孩子，除了我沒有別人能照顧她了。現

在，因爲我在這裡，要去臺灣，我擔心赤匪會對她進行報復。我和你們大家一樣，再也不能對母親盡孝了。」

眾人聞言都不作聲了，有人嘆起氣來。這時有人高聲痛罵共產黨，別人也附和著罵起來。

我偷看了一眼達堅，他的臉白一陣紅一陣，又轉成茶色。我便給他解圍：「王隊長，這次別罰達堅幫廚了，他只是一時失控，過去一定受赤匪的害太深了。」

「他有毛病！要是他有意見，可以說出來，可以吵，又沒人堵他的嘴，可他把信撕碎了，像個大街上的潑婦。」

最後，達堅給免去了到廚房幫工。我很感激王永幫我解圍，但我也意識到，說到底，如果我去臺灣，我在共產黨戰俘營那一年，一輩子都將是我生涯中的一個暗礁，我是不可能永不受人懷疑的。任何人想整我，都可以翻出這筆陳年老帳。

第三十三章　疑惑

慕瑟浦島上共有三個大圍場，編爲第一、第二、第三聯隊，這就是第十三戰俘營。每個聯隊都有十個大隊，關押著大約四千七百名不願被遣返的戰俘，和東北五十來公里開外的第八戰俘營格局一樣。現在，每個聯隊裡的一個大隊還不到五百人，只相當於過去的一個中隊，也就是說，過去叫中隊的，現在都叫大隊了。這樣一來，雖然手下還是那幾百人，王永就成了大隊長。不過，同一聯隊的各大隊之間，門衛把守得並不嚴格，有時候我們可以溜到另一個大隊去，反正美國兵也記不住所有人的模樣。

美國兵對這裡的人要比對第八戰俘營的人溫和一些，還發了菜籽和肥料來，鼓勵戰俘自己種紅薯、捲心菜、茄子、西紅柿等等，戰俘們還可以到海灘上撿海帶、拾海鮮。所以，雖然主食還是大麥和玉米，這裡的伙食比共產黨戰俘營裡的可強多了，有人甚至體重還增加了。由於沒有了共產黨，看守所總的來說是風平浪靜的。這裡給不識字的戰俘開課，大家組織了二十多個俱樂部，比如像同鄉會、麻將班、體操隊，還有一個天主教兄弟會，一個書法繪畫社，一個司機協會。我們沒有汽車，但有一群過去的司機，給大家講授汽車原理和駕駛技術。對中國人來說，會開車是一門專業技術。在戰場上，我們部隊裡一個頭疼的事，就是看到美國人丟下的卡車，卻沒法開回自己營地去，因爲會開車的人簡直鳳毛麟角。我們只好命令被俘的美軍把車開回去，只不過他們大半也都說不會開卡車，其實他們是不想在半路上遭到自己人的飛機轟炸和掃射。

體育是大家都喜愛的，每個中隊都有自己的籃球和排球隊，每個大隊都有體操隊。我們還可以游泳，黑沙

海灘離營房只有幾步遠，我們游泳時，衛兵可以看得見和聽得見，每天午飯後，別人睡午覺那會兒，我就常常去游泳。

這裡的生活盡可能保持得平平常常。每個大團場都有自己的報紙，四個版，一本書大小，刻寫之後用油印機印出來的，一星期出一期，每期只印二十來份，上邊有四五篇小文章。第一聯隊的報紙叫《自由周報》，第二聯隊的叫《先鋒》，第三聯隊的叫《倖存》。他們約我寫稿，可我一篇東西也沒寫過。我們聯隊裡還有個劇場，當然，只是個大平臺，那兒定期上演各種地方戲和古典戲。大多數戲劇都是傳統戲，當然也有宣傳意味的戲。和第八戰俘營相比，雖然從各大隊匯集起這方面的人才來並不困難，但這邊的人對藝術創作的熱情可沒那麼高。

第一聯隊有個瘋子叫劉家福，我在巨濟島七十二聯隊時就認識他，不過那時候他很正常，還溫順。現在他每天早上都到鐵絲網跟前去哀號：「我想爹媽，別讓我死在這兒！」剛開始大家還笑話他，現在卻是誰一提他都嘆氣。一九五一年夏天，他們步兵團開上前線跟美軍作戰，他以前沒見過打仗，所以被嚇壞了。有一天，他們排長訓斥他不該漫不經心地摘掉僞裝帽——就是戴在頭上的草環，然後派他到山谷裡拾柴禾去。他在山谷裡撿到一張敵人飛機丟下的傳單，上邊寫著：「朋友們，弟兄們，請到我們這邊來吧。我們一定把你送到我們的後方，你在後方想休息多久就休息多久。我們保證你的生命安全，提供健康的食品和禦寒的衣服，與聯合國軍的士兵同等待遇。不要再替蘇聯和共產主義賣命了。別忘了，你的家人正焦急地盼著你安全回家呢。」

家福對著這些句子哭起來，接著就投降美國人，丟下他的雨衣和衝鋒槍。美國人在翻譯的幫助下審問他，但是從這個新兵身上問不到多少有用的情報。他對他們說的全是實話，還承認說，他來投降是因爲他怕死，而且渴望得到他們後方的舒適待遇。美國人對他說，那他得先幹活兒，要把他送到前線去，對中國陣地喊話，可他不肯，一個勁兒地說他怕聽見槍炮聲。於是美國人就直接把他送到釜山戰俘中心去了。

一到戰俘營，一看見監獄，他馬上咆哮起來，痛罵美國人不遵守諾言，不給他自由。當然沒人聽他的，不由分說就把他關進去了。後來在七十二聯隊，還是因爲怕被殺掉，他表示願意去臺灣，還刺了字。

我從來沒想到，家福在這裡會變成這副慘樣子。去年夏天，全體親國民黨的戰俘到了這裡，被命令自己建營房，他就開始瘋了。很顯然，當時美國人對待他們和對共產黨戰俘沒什麼不同，所以那些不肯遣返的，都害怕去不成臺灣了，甚至覺得自己一定會被送回大陸，因爲大陸並不遠，青島就在西邊四五百公里。他們甚至想像，美國人可能說送他們去臺灣，先把他們騙上船，然後就把他們送回大陸。他們的焦慮也不是毫無根據，誰知道板門店談判的形勢會怎麼發展？一旦覺得遣返他們更有利可圖，美國人隨時可能把他們交還給中國。一萬四千名戰俘被這樣的前景嚇壞了：因爲害怕共產黨的報復，有些人就商議好，如果強迫他們上船回大陸，大家就一起跳海自殺。還有人說，如果最壞的情況發生，他們就越獄，逃進漢拿山，打游擊去。很多人開始暗中準備長矛、刀子和棍棒。剛到這裡來的頭幾個月，的確是他們被囚生涯中最爲黑暗的一段時間。好幾個人企圖自殺——有個人一頭扎進茅坑想淹死自己，被同鄉給救下來了，同鄉都來照料他，半年以後他才從沮喪中恢復過來。就是在這一段時間裡，劉家福發了瘋，可他不像別人，從此再也沒有恢復正常。

有幾次，在經過第一聯隊時，我會停下來跟家福聊幾句。他那張臉上的神情一片茫然，肯定什麼也記不得了，可是他卻記得自己出生的地方和家人，呼喚著他父母，好像他們就在不遠的地方。他腦門上有一塊國民黨黨徽的刺青，像一朵黑色的葵花。什麼時候你問他去臺灣還是回大陸，他都搖著頭嘶啞著說：「送我回海城。」那是他在東北的老家。

我也很想家。自從被關進戰俘營，我只給未婚妻寫過一次信。聯隊大門旁邊不遠，柱子上掛著一個金屬信

箱。可是幾乎沒人往信箱裡投信，因爲大多數戰俘用的都是化名，而且大家知道，美國和中國當局都會檢查我們的信件。我們都害怕會連累家人，誰家的兒子待在國民黨人的戰俘營裡，還拒絕返回中國，那他的家人可就有罪受了。最好讓政府把我們算成「戰場失蹤人員」，那樣的話我們的家人還可以得到些益處——按規定，他們可以享受「烈士家屬」的待遇。在共產黨人的戰俘營裡，大家也不給家人寫信，主要是怕美國人會拆信，發現他們的眞實身分。這裡，偶爾有人塞一封信到信箱裡，但是信封上常常用小名，什麼二牛啦，小柱子啦，山娃啦，來避人耳目。我們自然誰也沒有收到過家裡的來信，也不知道我們的信家裡人收到沒有。在和美國人的接觸中，我們知道他們定期收到家信和包裹，我們多羨慕他們啊！

只要是單獨一個人待著時，我就盤算來盤算去怎麼才能回祖國。我不相信國民黨會打敗共產黨，重新統治大陸，我見過人民解放軍是怎麼打垮國民黨的。那時候，儘管國民黨有美式裝備，儘管他們人數要多得多，可他們還是打不過有民眾支援的共產黨。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紅旗會在臺灣上空飄揚呢。

我並沒有改變回家的主意，但我仍想不出個辦法來。整個春天和夏天，這裡的人都在談論臺灣，那塊地方他們沒有一個人去過，只是從雜誌上讀到過。大家想像著到了臺灣後他們會光顧的餐館和劇院。現在，戰爭的結束就在眼前了，我們都可以感覺到它了。四月以來，一批殘疾的戰俘已經被送回北朝鮮和中國大陸，報紙上也報導了，這很可能就是最後放回全部戰俘的先聲。

六月底，我們聽說，釜山那邊的南朝鮮衛兵釋放了兩萬七千名不願遣返的北朝鮮戰俘，一夜之間，所有戰俘就消失在老百姓中間，一個也不見了。中國和北朝鮮軍隊發怒了，向南朝鮮部隊的陣地發起了一場大規模進攻，摧毀了他們的防線。不過，那些戰俘的被釋，卻鼓舞了我們這裡的戰俘，大家開始要求像那些戰俘一樣地釋放我們，這樣我們就不必面臨遣返了。監獄當局對這樣的要求不予理睬，於是戰俘們就開始絕食。絕食並沒有持續很久，因爲常常到這裡來佈道的胡牧師爲聯合國充當調停人，向我們保證，決不會把我們交到共產黨手裡。他說，這個問題對美國人來說是個原則問題，他們尊重人權。即使如此，第二聯隊還是有三個人，因爲絕望，實在等不下去，上吊自殺了。我可以體會到那些人有多麼害怕等待著他們的報復，爲了避免回到中國去，他們什麼都可能做出來的。

快到七月底時，傳來消息說，在板門店簽訂了停火協議。戰爭終於結束了，這就是說，我們的囚禁生活很快就要到頭了。戰俘們再次陷入極大的騷動，擔心遭到遣返。我的緊張則另有原因：要是想不出來回中國的辦法，我可能就得和這些人一塊兒去臺灣了。

接著又聽說，所有戰俘都要被送回朝鮮本土，進行最後一次甄別，叫做「解說」。這消息嚇壞了很多人，他們都是無論如何不願意重新進入「鐵幕」的。很多人開始商量搞一次大示威，有幾個人提出當眾自殺，反正要是被送回紅色中國，他們也是要被殺頭的。又有人計畫，如果被逼上船回大陸，他們就跳海。

但是，沒等這些激烈行爲發生，我們就聽到了蔣介石的文告。他親自口述錄音，通過廣播電臺的播放，文告傳遍了戰俘營的所有角落。委員長用蒼老的聲音，力勸我們相信聯合國的安排，他本人保證將把我們安全接到臺灣。第二天，我們每個中隊領到一面國民黨黨旗，背面印著蔣介石文告的全文。他告誡我們：

爲了實現你們的自由，一定要在未來幾個月中保持忍耐，一定要配合聯合國當局。同時，你們在自由中國的同胞們將和你們一道，幫助你們實現最終的解放。我本人更將密切注視此事，敦促聯合國貫徹其尊重戰俘自由選擇的原則。我並且要求聯合國依照他們的公開諾言，不使你們被送到任何你們不願去的地方，使你們能夠回到臺灣，眞正的中國來……

這封公開信對戰俘們撫慰不小，卻也讓我更著急了，因爲我是想回家的。可是，回家的前景似乎也不妙——一旦回國，等著我的是什麼，我一點把握也沒有。要是有第三種選擇就好了，我就可以從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爭奪中掙脫出來了。

八月中，我們聽說第八戰俘營的很多戰俘已經離開濟州島，返回中國，這就意味著我們也快了。香港出版的《新世界》周刊最新一期上，登出了朝鮮女戰俘在回北朝鮮之前焚燒床墊和毯子的照片。這時，這裡的戰俘營當局通知我們，我們這些拒絕遣返的，將被送到開城附近，人稱「中立地帶」的一個地方，在那裡停留三個月，進行最後一次甄別。共產黨方面堅持認爲，我們這些人中間，有很多是被強迫選擇去臺灣的，他們要派出代表，向我們解釋清楚黨對遣返戰俘的政策。

儘管中立地帶是由中立的印度軍隊負責把守，這個消息在戰俘營內還是引起了騷動。戰俘們都知道，共產黨人是最善於攻心術的。光是在他們面前露臉，就足夠讓人恐慌的了，因爲他們會認出你來，那你在中國的家人和親戚就全都要跟著倒楣了，於是戰俘們中間一時人心惶惶。更糟的是，中立地帶離共產黨軍隊的駐地太近了，只有三公里，他們的部隊完全可以席捲戰俘營，把我們一掃而光。他們其實都不用把部隊開過來，只需用大炮一通轟擊，就可以解決我們。

還是在巨濟島時，那些親國民黨的戰俘就寫過血書堅決不回中國，我當時以爲，那不過是爲了一種戲劇效果；可現在我感到，很多人害怕共產黨眞的就是到了那個地步，在他們眼裡，共產黨就和野獸沒什麼兩樣。在各隊隊長的鼓動下，很多人紛紛表示，決不再踏上朝鮮本土的土地一步。幾千人用自己的鮮血簽名，把一封請願書送到了十三戰俘營主管威爾遜上校手上，說全體戰俘將拚死一戰，也決不乖乖地被送到朝鮮本土，去聽共

產黨的「解說」。美國人一見這種局面，驚慌失措，雙方一時僵持不下。

接著，兩名國民黨軍官從臺灣飛來，對戰俘營的隊長們祕密地進行了勸說，首先保證會把所有戰俘安全地送到臺灣，又表示他們一定會介入在開城的甄別。戰俘營的隊長們欣然聽命：這正是個取悅未來上司的機會麼。當他們告訴戰士們，朝鮮本土之行非去不可時，戰俘營裡頓時一片怨聲，不過誰也不敢再公開違抗命令。

爲了安撫人心，各隊隊長都想出了一些招術，來對付共產黨人挽救損失的最後企圖。這麼多人選擇去臺灣而不回大陸，無疑是打在中國政府臉上的一記耳光，所以，共產黨派來作解說工作的代表，一定會千方百計盡可能把戰俘勸回去。整整一個星期，我們聯隊對最後甄別的過程進行了模擬，有人假扮共產黨的代表，有人假扮美國觀察員，以及中立國家的仲裁人。進行這些排練，主要是爲了讓不認識字的戰俘，在甄別過程中不至於在不知不覺中鑄下大錯。模擬甄別演示了我們在甄別帳篷裡會坐在哪裡，共產黨的代表坐的地方離我們多遠，他們會問到哪些問題，我們應該怎麼回答，要是他們違反規定，我們應該怎麼向坐在不遠的仲裁人尋求幫助。大家一一通過模擬甄別以後，很多人就心安多了。可我卻比以前更不安了，一直苦思苦想著，怎麼才能從這種進退兩難中抽身。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回到母親和菊蘭身邊去。

模擬甄別逐漸發展成羞辱共產黨的訓練了。隊長們準備了一些口號，教我們去侮辱和痛罵共產黨的代表，他們還說，只要別動手打他們，我們怎麼盡情地臭罵他們都沒關係。我們大隊甚至還舉辦了幾次訓練班，教大夥兒怎麼弄出大口的粘痰、又怎麼準確地吐到共產黨代表的身上。除了這些排練，他們還設計出一個殘酷的策略，叫做「連環保」，實際上就是一種集體連坐的懲罰：所有戰俘被隊長分成了小組，每組三到四個人；要是組裡有一個人變卦，轉投了大陸，那麼這一個小組的所有人都要受到懲罰。這條措施只針對一般戰俘，不針對當官的，而且只有我們聯隊才有「連環保」。我作爲翻譯，不跟任何人「連環」，看來王永對我很信任。

八月底，幾個從臺灣來的官員來看望我們，但是沒獲批准進入我們的營地，於是只能在大門口見面。傍晚時分，他們在門前用擴音器對我們講話，提出建議，也提出警告。其中一位宣稱，共產黨已經處決了很多回去的戰俘，領頭的官員對我們說：

「我們今天的見面，使我看清楚了，你們都像奴隸一樣受到共產黨的壓迫。爲什麼我們今天不能握手擁抱？爲什麼我們不能進入你們的營地？爲什麼我們非得提高嗓音不可、中間隔著鐵絲網說話？這些都是因爲共產黨，他們要把你們永遠關在這裡。我們一定要記住這一切，早晚有一天要跟他們算帳……弟兄們，朋友們，蔣委員長深深地牽掛著你們，你們都是反共義士、黨國的柱石，所以他派我們到這裡來轉達他對你們最良好的祝願。他邀請你們到臺灣來，加入我們偉大的反共事業。到臺灣後，你們每個人都可以實現自己的願望——可以進大學，也可以繼續在軍中服役，或從事任何體面的職業。我向你們保證，我們將盡力而爲，爲你們的成功之路大開方便之門。」

他乾咳幾聲清清喉嚨，接著說：「過不久你們就要被送到中立地帶去，共產黨會玩弄各種花招，把你們騙回大陸。這將是你們人生中最爲關鍵的一步，所以請你們務必考慮清楚，不要同意返回大陸。說實話，如果你們屈服於赤匪，他們會對你們實行『三頭政策』。你們會問了，『三頭』是什麼？聽我來講給你們聽。首先，他們會對你點頭，笑容滿面；然後，你一離開中立地帶進入他們的地盤，他們就會讓你們低頭，坦白你們的『罪行』；最後，等你跨過鴨綠江，他們就會把你們砍頭了。這就是他們的『三頭政策』，他們已經開始執行了。弟兄們，朋友們，可不要上他們的當。到臺灣來，我們會永遠像親兄弟一樣對待你們。我們共同努力，一定可以取得勝利、奪回中國。」

他們還給我們帶了很多禮物來。每個人都得到一張蔣委員長的照片，一件胸前印著國民黨黨旗的T恤，一件呢料大衣，一個帆布掛包，一盒方糖，兩個罐頭——一個是豬肉罐頭，一個是糖水梨罐頭，還有包在塑膠袋裡的四兩茶葉。另外，還給每個聯隊發了籃球、足球、圖書、鋼筆、雜誌、鑼鼓、鐃鈸、軍號、喇叭，三四十很多戰俘被這一大堆禮物弄得眼花撩亂，有人在吃到糖果、喝到熱茶時甚至流下了眼淚，我們有兩年沒有嚐過糖果和茶葉的滋味了。有人表示，他們永遠也忘不了蔣委員長的慷慨和仁慈。和共產黨比，眞是有天壤之別啊，共產黨只會逼著你向敵人進攻，給你吃的卻是牛馬食。大家說了又說，每一個人都陶醉不已。接著，爲了更像個國民黨士兵，不少人給自己剃了光頭。不到一個星期，所有的人都把頭剃成了禿瓢。

我極力保持冷靜。雖然我也喜歡他們的禮物，但是我太了解國民黨了，他們其實兵源極度短缺，共產黨則有數百萬軍隊，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力儲備。所以他們兩邊對待戰俘的態度才會截然不同。我敢說，國民黨是因爲太缺人了，才不得不把戰俘當寶貝，而共產黨拉我們回大陸，只是爲了保住臉面。

要是我對甄別的過程知道得多些就好了，那我說不定可以想出個辦法來。雖然我很想回祖國，可共產黨會不會饒了我，我卻沒有把握。我怎麼跟他們解釋自己又回到國民黨人的戰俘營去了？我甚至不知道裴政委和常明是不是還活著，要是他們已經死了，我就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另一方面，如果我去臺灣，我同樣無法心安理得，我怎麼能在海外安安穩穩地生活，而讓母親和未婚妻替我受罪呢？我越想找出個妙計來，就越絕望，雖然表面上歡天喜地，內心裡卻一片亂糟糟。我用越來越多的時間去讀《聖經》，來控制我的焦慮。尤其是〈傳道書〉，我讀了很多遍，越發讓我贊同人類是多麼無能爲力。《聖經》讓我平靜下來，讓我明白，儘管我現在找不到解決方案，卻並不意味著沒有。我一定要耐心，學會讓自己等待。努力有時，休息有時；知之有時，無知有時。現在，我能做的就是，靠著警覺的頭腦，等著。

第三十四章　好夥伴

那年夏天我依戀上了小黑，那是一條狗，總在我們聯隊周圍轉悠。大家都覺得我是小黑的主人，但我幾乎沒辦法照顧牠。狗不像雞可以吃草，所以我沒東西餵牠，牠得自己去覓食，我頂多能拿塊碎瓦罐給牠點水喝。一有機會，牠就從伙房偷塊東西吃，炊事員們一看見牠就嚇唬牠，甚至拿掃帚把兒抽牠。

十三戰俘營裡有不少動物，伙房裡養了一頭豬，十幾隻雞。我們常聽見母雞咯咯叫，湯裡卻從來沒見過一星蛋花，很顯然，雞蛋都給隊長和炊事員吃了。有幾個戰俘養過一隻兩隻雞，不過雞蛋都拿去換東西了。有個人還養過一隻小母羊，當時羊太小了，還沒有奶呢，他沒能養太久——小羊有天跑出戰俘營，再也沒回來，我們估計，牠準是讓附近村民宰了，或給他們扣下來自己養了。小羊的主人急了好多天，天天等在大門口，眼巴巴地望著牠再回來，可是都白等。

小黑是去年冬天跑進我們圍場的，來了就不走了。牠在營地裡一定覺得挺安全，因爲牠長得不壯實，有些發育不良，打不過外邊沼澤地裡的野狗。另外，朝鮮人愛吃狗肉，要是看見一條沒家沒主的狗，他們想也不想就會逮住牠殺了吃了。戰俘們叫牠「小黑」，因爲牠一身黑皮。小黑個頭不大，除了星星點點幾處，全身幾乎沒毛，不過牠的尾巴可是毛茸茸的，一雙白眉毛像一對蛾子。有人說牠是一隻日本短毛獵犬，也有人說牠是一隻中國獵狗。我看不出牠是什麼，也許是條雜種狗吧。我經常拍拍小黑，牠很樂意讓人摸牠，你對牠表示的任何好感，都讓牠高興得不得了。有時候，我會求那個叫南山的年輕炊事員給牠一點剩東西吃——半塊紅薯，或餿了的大麥粥之類。小黑和戰俘們一樣，都營養不足，肋骨一根根地暴露出來，老是在挨餓的樣子，一到開飯時，就在伙房排隊的人周圍轉來轉去，舔地上滴下來的湯汁。

因爲我和牠在一起的時候比較多，牠似乎認可了我們倆之間的特殊關係，只要看見我，就會跟上我。牠會在我旁邊一路小跑，一副好了不得的樣子。我很高興有牠圍著我轉。在小黑之前，我從來沒有眞正喜歡過什麼動物，可現在，早上一醒來，想到的頭一樣東西就是牠。我不讓牠出戰俘營，怕牠會迷路找不回來了。每次游完泳回來，牠都歡跳著朝我撲過來，嘴裡叫得那麼快活，讓我好感動，忍不住要撫摸撫摸牠那垂著耳朵的小腦牠的肚皮。有時候，牠用小鼻頭來蹭我的臉，在我手上聞來聞去，好像想從我這裡弄點好吃的東西。小黑讓我感到，我們沒有誰能獲得牠這種天眞的快樂，也沒有誰能像牠這樣眞正地信任一個人。這使我對待牠更像對待一個喚起了我柔情的朋友，這種柔情我從來不敢用在周圍任何人身上，我怕那會換來尷尬和出賣。我感激小黑對我仁慈的感化，我心裡對牠保證，一旦我們恢復了自由，我一定要給牠很多、很多肉吃。

多數人用口哨召喚小黑，牠一聽到就會飛跑過來，拚命搖著尾巴。要是牠認識那人，就會跳起來，把爪子搭在那人身上，想讓人家拍拍牠。牠是條多麼友善的狗，似乎只知道人類好的一面。

八月初的一天夜裡，小黑悄悄鑽出鐵絲網，沒有回來。我在營場院子裡到處找牠，但全無蹤影。我怕是朝鮮人把牠扣下了，甚至已經把牠殺了。小黑現在是隻成年公狗了，可能正發情，據我所知，戰俘營周圍並沒有多別的狗。牠可能跑得很遠，到小湖那頭的漁村裡找母狗去了，要是讓那些漁民捉到牠，他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宰了牠的。那天夜裡，我等了又等，一直沒見牠回來。

有人說，我把小黑慣壞了，早該把牠閹了的。我跟自己說，要是牠回來了，我一定採取措施，讓牠別再去

追母狗了，不然總是麻煩無窮。

第二天一大早，我眼睛還沒睜開，就聽見狗叫聲。我跳下床，衝出屋去。是小黑，稀稀拉拉的毛都被露水打濕了，正圍著圓臉的炊事員南山撒歡呢，南山正踢著毽子，像個正在課間休息的男孩。我打了一聲口哨，小黑愣了一下，接著就一路向我飛奔過來，歡快地搖著尾巴，嘴裡還大聲回應著。牠跳起來，把爪子搭在我身上，一個勁舔我的手，表情豐富的眼睛裡閃著光。我馬上看到牠尾部有一道兩寸長的口子，血倒是止住了，可傷口很深，看樣子是挨了草叉子。我當即抱著牠去找衛生員，他用碘酒給傷口消了毒，又抹了消炎藥膏。

我當然沒有閹了小黑。有個騙過羊的夥計主動提出給我幹這活兒，可我下不了那狠心。我只是找來一根十米來長的繩子，繫在小黑的脖子上，不讓牠跑出圍場去。要不是有人說小黑身上有跳蚤，我會在屋門上破開一個洞，好讓牠夜裡能進屋來找我。每天夜裡臨睡覺前，我都把牠拴在一棵小楊樹上，牠趴在前腿上，睡得好像在自己家裡一樣。我還靠著樹放了一個大木頭箱子，裡邊鋪了稻草，上邊遮了一塊油毛氈用兩塊石頭壓著，每逢颳風下雨時，小黑就縮進這個簡易狗窩裡去。要是我夜裡忘了拴上牠，牠肯定會悄悄地溜出營地去的，牠是個鬼機靈，總會在天亮前就回來。

在我們準備離開這裡去朝鮮本土接受甄別時，我開始爲小黑發愁。我們是不許帶走任何動物的，不過要是把牠扔在這兒，那牠就只能去周圍村裡人家或飛機場那邊找吃的了，那牠肯定活不了幾天。要是有個美國兵收留牠，我會很放心，美國人不會餓著自己的寵物。王永讓我扔掉牠完事：「不就是個啞巴畜生嘛，隨牠自己去吧，啊？我們顧人都顧不過來呢。」我知道，要換成他，二話不說，早把小黑扔了。

沒辦法，我到伙房去，跟南山求情，他常常餵小黑的。我求他：「我們去甄別的時候，你能不能帶上小黑？」

「我盡量吧，可牠路上瞎叫喚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我只想能養牠多久就養多久。要是牠被發現了，我不怪你。」

「馮長官，你有顆菩薩心。你讓我怎麼著我就怎麼著。」

他動情的話倒把我嚇了一跳。

南山果然沒有食言。他從醫生那裡弄來幾片安眠藥，碾碎了。我們上船之前，他把小黑藏在一口大行軍鍋裡了。他把一個土豆切兩半，都抹上安眠藥粉，給小黑吃了，小黑很快就呼呼大睡過去，南山再用一塊空麻袋把牠蓋上。這樣，小黑神不知鬼不覺地通過了衛兵的檢查。

第三十五章　非軍事區內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日，我們到達了釜山，從釜山我們再開往中立地帶，又叫「非軍事區」。那是在小鎮文山城外的一個巨大戰俘營，在開城以南幾公里遠。小城已經被炸彈毀掉一半，幾處房子只剩下禿牆，雖然還沒倒塌，房頂卻幾乎全沒有了。我們十六日進入戰俘營時，最後的甄別已經進行好幾天了。中立地帶由印度部隊把守，來自波蘭、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士四國的人士組成監管委員會。聯合國、北朝鮮、大陸中國都派來很多代表。上面通知我們，在新營地第二十一大隊，我們將停留至少十二個星期。

爲什麼要待這麼久？我們心神不寧又疑惑不解。

整個戰俘營由大約四十個大隊組成，其中三十三個關押著中國戰俘。現在的伙食好一些了：早飯是奶粉煮大麥粥，午飯和晚飯有米飯摻和著豌豆或黃豆，也有土豆和捲心菜。每人可以分到更多的香菸了，每兩天一包。

戰俘營東邊往臨津江去的方向，有一個果園，裡邊的蘋果樹和梨樹都枝葉茂盛，清晨起來，枝頭上常常蒙著一層白霜。西邊有一座小山，山上不長樹，卻覆蓋著高高的野草，有很多花脖子野雞。我們常常站在鐵絲網前，看那些大鳥飛起來，帶著清脆悅耳的叫聲遠去。在遠處看，雄鳥五彩繽紛的翅膀在陽光下熠熠閃亮，活像一簇小小的燄火，常讓我們這夥人驚呼不已。這裡的土壤油黑油黑，肥著呢，可莊稼地都荒了，被炸彈炸得坑坑點點。不過，野地裡總還會有些糧食粒、草籽、漿果，可以讓鳥兒吃。和人類不同，戰爭倒讓那些野雞繁殖得更快了。

我們住的大隊營房，很明顯地是駐過軍隊的，因爲帳篷內安的都是上下鋪位，不是鋪板床。印度衛兵手執警棍，總的來說對我們挺禮貌。我們剛到的那天，他們甚至還給我們每人一杯咖啡、一塊巧克力。可他們把門把得極爲嚴格，沒有得到許可，誰也不能走出大隊一步，這樣一來，所有的大隊之間就相互隔絕了。要是有人生病，非去醫院不可，就派兩三個衛兵跟著去，其實醫院就在中立地帶裡邊。另一方面，印度當局卻允許中國派來的代表每天向我們連續廣播三個小時，有些代表竟然威脅我們，說：「想想你們的家人，他們可都在大陸，就算爲了他們，你們也該回中國。」他們的話把大家嚇得要死，我們大隊裡很多人因此不肯和中國代表見面。王永暴跳如雷，弄了兩個倒放的油桶，派了幾個人用棍子猛敲，好蓋過廣播的聲音，卻只是製造了更多的噪音，我們還是可以斷斷續續地聽見廣播的聲音。於是王永又命令他的保鏢，去把掛在柱子頂上的喇叭打爛，幾個保鏢果眞用石頭把喇叭給砸壞了。印度人也沒再修復。

王永急於和其他大隊聯絡上，試了幾次都沒成，快急眼了。一天，有人提議讓小黑給二十二大隊送信去，他們在我們南邊九十多米遠的地方。他們把小黑抓住，在牠脖子上綁了一封信，大門不遠的鐵絲網上有處破洞，他們把小黑從那裡推出去。小黑最適合當這個信使了，由於二十二大隊裡有人認識牠，他們一吹口哨，牠就會奔過去的。可是衛兵從一開始就注意到牠了，我爲牠的小命提心弔膽，懇求祕書別再用白紙寫信了，白紙太扎眼。

現在南山成了小黑的主人了，這我不介意，因爲我如果最後被遣返了，沒辦法帶牠走。南山會把小黑照料得更好；他有東西餵牠吃，又已經和別的炊事員說好，讓小黑睡在伙房牆角裡。南山對小黑這樣好，讓我很欣慰。

有天夜裡，小黑跑出去送信，卻沒有回來。我想牠是不是又上哪兒會女朋友去了，但牠不可能越過中立地帶，而這裡邊據我所知，再沒有另一條狗了。南山和我兩人一直等牠到半夜，快兩點時，我睏得支撐不住，就上床去睡了。

第二天早上，南山一個人到大門口找印度衛兵，他不會說英語，可他用中文懇求那個中尉：「求求您告訴我，小黑哪兒去了？」我朝他們走過去時，那滿臉鬍子的中尉正一個勁地搖頭呢。南山看到他們眞的搞不懂自己在說什麼，急得開始學狗叫，又兩手按地學狗的樣子爬著，印度兵都被逗得哈哈大笑。

我走到中尉跟前問他，他們看見小黑沒有。他的灰眼珠一轉，公事公辦地對我說：「那條狗是個信使，所以被我們處理了。」

我告訴南山：「他們把小黑殺了。」

南山一聽，就朝中尉撲了過去，掄起了小拳頭，我也流淚了，但還是攔住了他，把他拖回營房，兩個人一起在伙房裡哭了一陣子。

當天晚上，那個大鬍子中尉來晚點名時，兩個戰俘突然向他撲過去，每人手裡拎著塊磚頭。中尉朝圍牆那邊飛跑，更多的人朝他追去，有人手裡還揮著棍子。他們人人一臉殺氣，我嚇呆了，一時不知該怎麼辦。他們打他幾下子我是不反對的，但要殺了他，可就給我們自己惹下大禍了。還好，他們還沒來得及追上他，一個班的印度衛兵從圍牆外邊衝進來，舉起了步槍，拉開了槍栓，大家這才放過了中尉。

小黑的死，使我們和外界的聯絡又中斷了。但除了南山和我，別人沒過幾天就把小黑忘了，他們想要印度中尉的命，其實並不是給狗報仇。大家的未來前途未卜，很多人被弄得既絕望又易怒，想抓住這個機會發洩一下情緒。

王永給達堅和我派了一個任務：盡可能多跟印度士兵攀談，收集關於甄別的資訊，每天晚上向他報告。爲這個，他多給了我們兩人一些香菸。這樣，每天我都去接近衛兵，和他們聊天。從他們嘴裡，我開始對我們的處境有了更多的了解。不妙的是，我們對處境知道得越多，就越沮喪。中國部隊有兩個師就在北邊四公里以外，一旦他們進攻，臨津江就在身後，我們無路可退。而且，掌控非軍事區的印度偏向中共，可能會默許他們把我們送回大陸。我們估計，去成臺灣的可能性只有一半。有天下午，在跟一個印度軍官聊天中，我聽到以前從沒想到的消息。那個方下巴的軍官告訴我，如果你既不想去臺灣，又不想回大陸，你可以申請去第三國。

「那是哪兒呢，查克？」我問他。我不知道他姓什麼，他的人都叫他D長官。

他眨眨他的魚泡眼，用很重的鼻音說：「印度、巴西、阿根廷之類。」

「眞的？」

「絕對沒錯。」他很肯定地強調著，「你知道，已經有幾個這樣的戰俘了。」他撓撓頭巾，手裡拿著我給他的香菸。

「有多少人？」

「七八個人。」

「他們到那些國家以後幹什麼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肯定有活兒給他們幹吧？」

「什麼活兒呢？」

「那就看他們有什麼本事了。」

這個消息一整天都在我腦子裡打轉。不論好歹，我是一定不去臺灣的，因爲那就等於宣佈我是共產黨的敵

人，共產黨肯定要把帳算到我母親和未婚妻頭上。另一方面，要是我洗不清通敵的嫌疑，我也不該回到大陸去，一個像我這樣背景的人，又和親國民黨的人有關係，就算不被關監獄，也可能永遠被監視。要是我肯定知道裴山和常明也回大陸，我還可以冒冒這份險，因爲他們總可以幫我澄清。但是，我又怎麼能肯定他們願意保一個我這樣的人？比較來說，第三國是個更好的去處，雖然我完全不知道我在那裡會過上什麼樣的生活。我甚至拿不準我在外國的土地上能不能生存。

可是，如果我去了第三國，共產黨就不會害我母親和菊蘭了嗎？也許不會，因爲我沒當他們的敵人。也許我太天眞了，但我受自我生存本能的驅使，覺得第三國對於一個像我這樣的人來說是一個更好的去處，我常常是個圈外人，進不去任何自己同胞的政治團體。一旦我在外國安下身來，就請人把母親和菊蘭接出來。可共產黨能放她們出來嗎？可能會，也可能不會。但第三國仍是最好的出路，是我願意冒的險。

下一個問題是我上哪裡去。去巴西和阿根廷太不容易，我一不會葡萄牙語，二不會西班牙語。印度雖然可以用英語，但那個國家人口太多，失業率太高，我還聽說那裡有社會等級制度，我到那裡去，差不多可以肯定會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就再沒有一個中立的英語國家可以去了嗎？等輪到我被甄別的時候，我第一個問題就問這個。我要避開中國來的代表，用英語跟中立國的代表直接對話。要是沒有另外一個國家了，我可能會選擇去巴西，巴西國土遼闊，也許謀生的空間大些，機會多些。我不在乎幹幾年苦力；我還年輕，應該有能力重新開始我的人生。另一方面，我就得準備做一個沒有祖國的孤獨人，一輩子得說一種我永遠不會覺得親切的語言了。

雖然此時我已經打定主意，我卻越來越緊張了，喉嚨裡老是升起一種麻木的感覺，弄得我只得不停地往下壓。那天晚上我跟伙房的人一起喝了一杯他們自己釀的米酒，極力平靜下來，好去隊部匯報。在向王永匯報今天聽到的情況時，我沒有提有些中立國也接受戰俘的話題，我怕他會懷疑我。我只說，共產黨派來的代表全面慘敗——印度軍官告訴我，到目前爲止，他們只說服了大約八十人回中國。

第二天晚上，從另外一個聯隊來了兩個人，他們剛剛通過甄別，來給我們講講。我們都集中到最大的一個帳篷裡，和那兩人一起坐到會議桌前。第一個人長得很英俊，細細的鼻子，兩眼炯炯有神，個子高高的，微微有些駝背。他先說起來：

「弟兄們，叫到我名字時，兩個印度衛兵走過來，帶我去了第十五號帳篷。裡邊從各個國家來的人很多，我一眼就看出來赤匪是哪些了。他們都站起來笑著對我鞠躬，跟哈巴狗似的，其中一個說：親愛的同志，我們代表祖國歡迎你回來。』

「我一口啐到他臉上，說：『你們不能代表中國，你們是蘇聯人的走狗，我爲什麼要聽你們的？』

「我坐下來以後，他們還是對著我笑。另一個又說：『萬平漢同志，你的爹媽在等你回家。他們很傷心，日夜號哭。』

「我罵起來：『操你奶奶的！你們共黨五年前就砍了我爹的頭。我媽眼睛都哭瞎了，沒過三個月就死了。這會兒你們還有臉來跟我說他們還活著，還想念著我呢！』

「那人還不死心：『這麼想想吧，你是中國的好兒子。我說你爹媽，指的是老一輩中國人民，他們盼著你回家呢。』

「我聽了都要氣瘋了，從兜裡掏出石灰，跳起來就朝他臉上扔過去。他尖聲號叫著去擦眼睛，這時候我抓起屁股底下的折疊椅使勁朝他砸去。砰砰砰，印度衛兵衝過來，把我拖走了。」

掌聲響起來。有人高呼：「誓與赤匪血戰到底！」我們都舉起拳頭，跟著高喊。

那人又喊：「蔣委員長萬歲！」我們又跟著他一起喊。

接著那個年紀大一點的人開始發言。他長了一張滿是粉刺的臉，一副暴牙，結實的大鼻子，一對招風耳。他操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讓人想起毛澤東。他對我們說：「我在帳篷外邊的休息區等了半天。輪到我了，他們把我帶進帳篷。共黨跟別的國家來的人坐在一塊兒，一副鬼樣子，就跟一群餓狼一樣。我看見他們身後窗戶外頭有十幾輛大卡車，上面插著紅旗，那陣勢把我嚇死了。卡車那頭豎著一個高拱門，上邊一道橫幅，寫著『回到祖國的懷抱』。他們這是安排好了要把我們一車車運回去。我這一坐下，有個共黨把他的手放在桌上，身子往前一探，說：『同志，你在敵人手裡一定受苦了，我們是代表祖國前來解救你的。你現在自由了，跟我們回祖國吧。』

「這個『同志』一詞叫得我心跳，勾起我的千仇萬恨，但我忍住了。『其實我在戰俘營裡沒受太多罪，』我跟他說：『美國人給我們飯吃，給我們衣服穿。我倒是在你們共產黨部隊裡眞正嚐到了受罪的滋味。你們對我跟對牲口、對炮彈一樣，只是讓我賣命罷了。』

「『同志，我以名譽擔保，你是個自由人了，在我們國家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可以繼續在部隊當幹部，也可以回家奉養雙親，或在城裡工作和生活。同志，想——』

「我終於忍不住了，知道他在胡說八道。我喊起來：『誰是你們的同志。別把我當傻瓜，我知道你們全都說瞎話不臉紅。我操你親娘和祖奶奶！』我衝著那瑞士人大聲宣佈：『我要去自由中國。』

「那外國人朝我直點頭，又跟翻譯說了幾句。那翻譯是海外華人，可能是個大學生。然後外國人跟我說：『你現在可以走了。』臨走的時候，我一腳踢翻了共黨的桌子，踢得他們紙筆到處飛。把我氣得直跺腳啊，差點兒走進回大陸的門。翻譯把我抓住了，告訴我：『喂，走那個門。』這才把我救了，要不然又掉回共黨陷阱裡去了。」

全場哄堂大笑。王永站起來，對大家說：「我們很快也會到那些帳篷裡去聽他們解說了。大家要格外小心，不要上共黨的當。還有，一定記住，要是你出了差錯，你們組的弟兄們都沒好果子吃。聽明白了嗎？」

「明白了，長官。」我們喊道。

白達堅舉起了手。王永問他：「你有話要說嗎？」

「對。」達堅站起來，對著人群說：「根據他們兩位兄弟的經驗，你聽共黨說得越多，就越冒火。我建議，咱們一進去，就朝他們吐口水，敞開了臭罵他們，表達咱們去臺灣的意願就行了。也就是說，別給他們開口胡說八道的機會。」他坐下來，直盯著我看，剃得錚亮的腦袋上有幾處鼓包。我的心開始亂跳：不知他是不是看出我的計畫來了。我鼓起勇氣，迎著他火辣辣的目光，他終於把眼睛轉開了。他怎麼變得這麼堅決要去臺灣了，難道他決定拋棄他漂亮的未婚妻了？

王永對眾人說：「這是個好主意，按白長官說的做，進門就啐他們，咱們快點完了這他媽的鬼事。」

聽他們講完，我清楚了，中國代表和各國代表是坐在一起的，我得在中國代表面前露過臉，才能接觸到仲裁國代表。這可太不妙了，不過我或許能少聽中國代表說幾句，直接跟外國人說話。只要我小心和鎮靜，應該能夠實現自己去第三國的計畫。

夜裡臨上床時，王永到我們營房來了，對我說：「你來一下。」

他這一叫，讓我心一下子懸起來了，可我還是跟他出了屋，我倆一起往大隊部走去。夜晚的空氣帶著涼意和清爽，從印度人的伙房那邊，飄來咖喱的味道。兩支手電筒在我們營場大門那頭閃爍，月亮把我們傾斜的影子投在地上。隊部屋裡燈火通明，卻悄然無聲。屋子中央放著一張桌子，桌上放著兩個盤子，一個盛著撒了鹽

的炒黃豆，另一盤裡是燉豬肉。盤子旁邊放著兩個杯子，一瓶清酒。一看見吃的，我頓時鬆了口氣，知道王永只是要跟我喝一杯，不過我還是摸不清他的意圖。他示意讓我桌前坐下。「馮延，我今兒晚上要跟你好好聊聊。」他說。

「好啊。」除了這話，我也不知道還能說什麼。

他給兩人的杯子倒上酒，然後把胳臂肘放在桌上。「我們認識日子不短了，我覺得現在更了解你，比以前更喜歡你了，這是心窩子話。」

「謝謝你一向的關照，隊長。」

「別跟我叫隊長，好不好？叫我王永，要不就叫王大哥。」

「好，沒人的時候我就叫你王大哥。」

「咱們到了臺灣，你有什麼打算？」

「老實說，我還沒個打算。不過，我是希望他們讓我留在軍中的。」

「當然會讓你留在軍中。他們決不會埋沒你這樣的人才。可是他們不會要我，又不識字，又啥技能也沒有。」

「別這麼說，咱們都一樣，都給共軍幹過，都是戰俘。」

「那可不一樣，你是黃埔軍校畢業生，這就跟別人大不一樣啦。」

「這裡過去的黃埔生可不少，我不過是其中之一。」

「不，你最特別。」

「我？怎麼講？」

他晃了晃杯子裡的清酒，吞下一口。「你英語說得地道。你可別看我又不認字又不會寫字，就以為我看不出誰好誰差來。我看得出來你英語說得多漂亮，咱們這兒好多大學生學了十多年的英語，在美國人面前也就會說個『你好』，『謝謝』，『再見』，你就不一樣，說起話來底氣足，還不費勁。我看連美國人都特拿你當回事。」

「你把我想得太不得了了。我跟你一樣，也是個囚犯，到了臺灣也得碰上一大堆困難。」

「你不用灰心，兄弟。我敢擔保，他們會給你個好差事。他們總得跟美國人打交道是不是？行了，有你這副口才的人，他們上哪兒找去？」

「希望如此吧。」

「多吃點兒肉。」

「行。」

我挾起一大塊肉，有滋有味地嚼起來。王永把炒黃豆嚼得咯咯響，說：「馮老兄，有一天你當了大官，可別忘了老弟我呀。」

「哪能忘呢。」我的眼淚一下子湧上來，舉起杯子吞了一大口，然後說：「你是個好人，王大哥，你心眼實在。和你在一塊兒，我就覺得心裡踏實。咱們一輩子都是朋友。」

「有你這話我就放心了。」他笑起來，厚眼皮底下眼睛都快看不見了。

我們聊著聊著，他從皮夾子裡拿出一張照片遞給我。「你看這姑娘怎麼樣？」

我看了看照片，說：「挺漂亮。」的確，一看就是個典型的東北姑娘，十八九歲，一張圓臉，圓眼睛，圓下巴，圓嘴唇。

「你眞覺得她漂亮？」他問。

「當然。」

「你想和她交個朋友嗎？」

「我大陸老家還有個未婚妻呢。」

「所以我只說和她交個朋友。我不是要你跟她訂婚。」

我這才明白他的目的，問他：「這是你什麼人？」

「我在臺灣的侄女。她正在念商學院，學會計的，知道怎麼管錢。」

「我現在還沒法決定，不過我能先收著她的照片嗎？」

「當然可以，拿著吧。」他很高興，「你什麼時候想見她，只管跟我說。你要是喜歡她，她在臺北的家就是你的家。」

我一點也不想要那姑娘做女朋友，可我想討她叔叔的歡心。王永雖然對我一向偏愛，卻是個火暴脾氣，要是惹毛了他，他翻起臉來什麼都幹得出來。所以我還是不敢什麼都對他直說。

第二天早上，我正在讀《聖經》，通訊員跑進來，通知大家到院子裡集合。我知道甄別的時刻到了，趕快把《聖經》塞進外衣口袋，出去集合。只見外邊人們已經站好隊了，旁邊停著十八輛卡車。開車的都是美國人，這對戰俘們來說是個好兆頭。不待停留，我們每兩個班約三十人在一輛車後邊排好隊，陸續登上卡車。等大家都上了車，卡車發動起來，晃晃悠悠開出滿是泥濘的院子，然後加速，直奔不到兩公里遠的聯合國甄別中心。

那是個晴朗的早上，只是樹上還掛著一層薄霜，從遠處望去，那些樹枝一片霧濛濛的。沿著路邊散落著已

經爛了的沙包，有些裡邊還有沙土呢。我沒有想到聯合國中心有這麼大，足有四十頂嶄新的帳篷，三分之二都是爲這次甄別用的，前院裡有幾個很大的像畜欄一樣的空圍欄。我們一從車上跳下來，就被帶進一個圍欄裡，我們在裡邊排好隊，分了組，等待接受甄別。王永把幾個當官的安排在隊伍最前面，好讓他們給我們開個好頭，而且，當官的先進去了，出來以後可以指點後邊當兵的，怎麼有效地對付共產黨代表。王永把我放在第二行的頭一個，這樣很好，我可以不必在凜冽的北風裡等得太久，而且可以集中精神，執行自己的計畫了。

九點半，十幾個印度士兵過來帶我們第一批人進去，六十人跟著他們走出圍欄，我也在列。甄別中心帳篷外邊共有四個等候廳，沒帶武器的衛兵帶著我們朝其中一個走去。在我們前方，各個國家的國旗在風中嘩啦啦地飄揚，好像這是一場節日的盛典。我一邊走，一邊把自己的計畫再盤算一遍，極力保持鎮靜、注意力集中。幾分鐘後，我們到了等候廳，這裡印度兵更多了，把我們一半人帶到帳篷裡去。一個高個子衛兵檢查了我的身分卡，然後領我去七號帳篷。在帳篷門口，他先搜了我的身，才讓我進去。

帳篷裡邊十分暖和、舒適、明亮。四壁底部是一米來高的夾板，夾板頂部鑲著寬寬的塑膠玻璃，陽光從玻璃外邊照進來，玻璃上端是帆布，一直拉到房頂。帳篷中央坐著一個鼓肚大爐子，裡邊呼呼冒著火苗；這爐子燒的是油不是煤，比我們營房裡的爐子大得多。這個帳篷和我以前見過的不一樣，高級多了，還鋪著硬木地板呢。帳篷一角，幾個人正在交頭接耳，有一位拿著個快空了的飲料瓶子。一個像是波蘭人的走過來，給我拍了照，讓我有點慌亂，因爲波蘭和捷克人代表社會主義陣營，而瑞典和瑞士代表自由世界。我被帶到一張大椅子上，面前是一張蓋著綠色絨布的長桌子。很顯然，印度人採取了措施，防止戰俘攻擊中國代表——椅子是固定在地板上的。

我坐下來，抬起頭，不由得大吃一驚，我看見了一雙熟悉的眼睛。郝超林！我幾乎叫出聲來。他坐在最中

間，旁邊是兩個中國代表，他們都穿著整潔的毛料制服，胸前掛了塊紅綢子，上邊寫著幾個金字「解說團工作人員」。桌子另一端坐著兩個北朝鮮官員，我左邊一端，坐著五個中立國來的仲裁員，都穿著自己的便裝，我身後的角落裡，坐著聯合國的三個代表，其中一位是個中國人，一定是翻譯了。超林的出現讓我太震驚了，以致我一下子頭暈目眩，趕快伸出手去抓住印度衛兵。

「你怎麼啦？」他問。

「對不起，有點頭暈。」我恢復了鎮靜，小心翼翼地抬起眼睛，去迎接超林的目光。

他站起來，嘴張著，幾乎要繞過桌子向我奔來，接著他似乎清醒過來，只對我伸出手來。我們握了握手，他不自然地笑著，好像哪顆牙疼起來了。他臉上剛剛青了一塊，也許是被哪個反共的戰俘打的。我們對視著，誰也沒說話。這時他的同志開口問我的姓名，我下意識地就報了化名，那人說：「歡迎你，馮延同志。」看得出來，超林一時不知我這會兒是他們的敵人還是朋友。我腦子裡閃出一個念頭：他已經看見我了，要是我拒絕回大陸，他肯定會向上級報告，那我母親和菊蘭可就要因爲我倒楣了，我們一家就會成爲反革命家屬。我該怎麼辦？我呼吸急促起來，感到噁心想吐。

「俞元同志，」郝超林嚴肅地開口了，故意提醒我，我的眞實身分，一雙看穿一切的眼睛緊盯著我的臉，「你應該回家，黨和人民在那裡等著你呢。我很高興我們終於又見——」

「我什麼時候說我不回家了？」我打斷了他。「你知道我是怎麼陷入親國民黨戰俘營裡的，對不對？」

他吃了一驚；其他兩個代表也很驚訝。那個一定是瑞士來的紅頭髮瘦瘦的仲裁員很好奇地看看我，又看看超林。超林意識到我那問題的意思，回答說：「我清楚，你是在他們核對指紋時被發現的。」

我說不出話來，很驚訝他竟知道當時發生的一切。我很想哭，但是控制住了。

他又說：「我保證，我們不會再虧待一個你這樣的好同志了。你知道嗎？裴政委在開城等著見你呢。」

「你是說，他被放出來了？」

「對，昨天出來的。」

「那常明呢？」

「也放出來了。他們是回來的最後一批『戰犯』。」

我緊緊盯著他，他的眼睛告訴我，他說的是實話。我說：「說實話，我從來也沒打算過去臺灣，可我害怕累母親和未婚妻，除了回中國，我是決不可能去任何地方了。

「俞元，我會永遠支持你。是黨送你去釜山的，你不必承擔由此產生的後果。」他熱淚盈眶了，一定是想起了我們一起度過的戰俘營歲月。

我也動情了。我說：「你會給我作證，我是因爲被迫才待在親國民黨戰俘營裡的嗎？」

「當然，我會作證。」

「不，我的意思是說，我落到他們中間，是因爲我被派去頂替了常明。」

他低下眼皮，然後又抬起眼來正視我：「俞元，你作出了很大的犧牲。沒有人會責怪你。」

「要是這樣，我就回家。」

我轉向坐在桌子一頭的仲裁員，用英語說：「我想遣返回國。」

「你可以有五分鐘的考慮時間。」他提醒我。

「我已經決定了，回家。」我說。

年輕的翻譯斜了我一眼，也許有點不高興我沒用他幫忙翻譯。

「你的要求被批准了，」仲裁員說：「請進右邊那個門。」

「謝謝您，先生。」我站起身，鞠了一躬。

我剛要轉身離開，超林衝過來向我伸出手，我握住了那隻潮濕的手掌。然後，他又抱住了我，呼出來的氣又酸又熱。我們都流出了眼淚，緊緊地抱住對方。他喃喃地說：「俞元，我以爲再也見不到你了。感謝老天，你活著回來了，眞是一個奇蹟啊！」我什麼也沒說。我哭的不是這個，我覺得痛心和無助，從來沒想到自己會這樣回到他們隊伍中。

我倆一起向門口走去，走向那扇把我引向完全不同、也不可知的命運的門。整個過程就像我作了一場夢。

第三十六章 不同的命運

當天下午，和十一個要回國的人一道，我到了開城，那是中立地帶西北十六公里外的一座城市。到達之前，我就把那本《聖經》扔進路旁的荊棘叢裡去了。裴政委和常明見到我以後，都抱住我流了淚，顯然很高興看見我回來。這一次，雖然眼睛潮濕了，鼻子堵塞了，可我沒有哭。他們告訴我，我們明天就一起動身回國了。回家的時刻到來得這麼突然，使我有些不能承受它的意義。

裴政委看上去比我最後一次見他時至少老了十歲，下巴上的鬍子都花白了，但一張凝重的臉，似乎比過去更加地精神飽滿。他的頭髮現在有些變灰，髮際比三年前高了將近一寸，這使他的前額寬闊了好多。他眼中的神色是憂鬱的，但依然充滿信心，走起路來腰桿筆直。我驚訝地看到，他腳上穿著的是一九五一年春天跨過鴨綠江那天他穿過的同一雙膠鞋，當然，現在鞋已經很破爛了，滿是針線縫過的補釘——在戰俘營裡，他總是拒絕穿美國軍鞋。儘管他對我很親熱，我卻不能不對他留個心眼了，因爲他深深地傷害過我。和他相比，常明還像過去一樣樂呵呵的。他微微有些駝背，但他厚實的肩膀看上去依然強壯，老是笑口常開，彷彿不說點笑話就不能張開他那張大嘴。

那天下午，出了一件挺不尋常的事兒。快四點時，有位軍官來叫常明和我跟他去見朝鮮同志。他帶著我們來到附近一個院子，我們一進門，就看見一個中年男人，穿著灰色列寧裝，在端詳著我們。我認出他來，「朴先生！」常明也喊起來。我們疾步上前，被他擁抱在懷裡，常明激動得哭起來了。朴先生不會說中文，但是他

很激動地用朝鮮話對我們不停地說話，從他的表情和手勢，我猜他是祝願我們未來一切順利。他邊說邊一個勁地拍我們肩膀，慈祥地笑著，模樣和去年見他時沒有差別，因爲穿了一身毛料衣服，好像還更英俊了些呢。

我們一起出席了爲朴先生舉行的招待會。一張桌子上擺滿火腿片、醃雞蛋、板鴨、泡菜、醃蘿蔔，還有兩瓶中國的竹葉青酒。在他的翻譯幫助下，我向他祝賀身體健康，還有他作爲朝鮮戰俘重要領袖取得的勝利。可他做了個鬼臉：「我現在前途未卜，不過很高興的是我要和家人見面了。」作爲一個下級軍官，我不便細問他這話是什麼意思。他喝了幾杯竹葉青，說是比清酒味道要純正，喝過以後好久好久還餘香滿口。招待會後，他沒多停留，就動身去平壤了。吉普車載著他開走了，排氣管噴出一股藍煙，車上的收音機裡奏出〈朝鮮人民軍軍歌〉。（很多年以後，我驚訝地在一本期刊上讀到，朴先生在俄國長大，是蘇聯公民，在哈巴羅夫斯基上了大學，後來被分配到一個集體農莊當負責人。在與日本的作戰中，他和蘇聯紅軍一道回到朝鮮。被關押在巨濟島高級監獄期間，不知爲什麼，他把自己怎樣計畫和實施對貝爾將軍的扣押都對美國人坦白了。從那以後美國人對他很優待，可一年以後，他又「反變節」了，因爲太想念家人，希望和家人團聚，哪怕冒著被北朝鮮當局關進監獄的風險。那一定是他對我所說的「前途未卜」的意思了。但我還是迷惑不解，爲什麼他做事像個任性的孩子？這始終是我的一個疑團。不管怎麼樣，我希望他的蘇聯國籍能保護他，不至於被北朝鮮領導人往死裡整。）

那天晚上，我們刮乾淨鬍子，收拾得整整齊齊，來到一間小民房，童將軍接見了我們。他長著一張瘦削的臉，尖鼻子，老鷹眼，用茉莉花茶和煮花生招待我們。我們十八位剛返回來的戰俘，邊吃喝邊簡單地匯報了我們的遭遇。他聽得很仔細，不時地提問，了解其他同志的情況。他勉勵我們努力學習，跟上國內形勢。又告訴我們，在遼寧省昌圖縣，爲我們這些遣返的人設立了恢復中心，我們都先到那裡去，恢復一段時間。他和裴政委過去就認識，我們告辭以後，裴政委留下了。

那天夜裡，常明和我住在一間房裡。我們聊了很久，有太多話要說了。他告訴我，命令我頂替他去釜山，是因爲裴政委離不開他的伺候，不管他自己多想離開，政委也不放他走。我意識到，雖然我是個首先可以犧牲的小卒子，常明同樣也不過是裴政委棋盤上的一個棋子。對於讓我受了這麼多罪，常明說他很抱歉。這樣我對常明的怨恨也減輕很多，不過裴政委派我去釜山，肯定還是爲了保住他，這也是事實。我們的話題又轉向裴政委，常明告訴我，政委在獄中常常情緒低落，因爲他感到祖國已經拋棄了我們。有時候他極想用酒精來麻醉自己，甚至要拿他的氈帽跟那些粗工去換酒，然而他們從來沒那麼做。我們又說到政委的政治前途，我們的前途和他的前途息息相關哪，我眞擔心組織可能不要他了。常明意味深長地笑了，搖著頭說：「俞元，你是個聰明人。」

「這話什麼意思？」

「說實話，有一段時間裴政委情緒很差，他怕一旦回國，組織會處分他，會降他的級。直到今天，種種跡象都很好，上級對他很理解，很同情。我覺得他不會有什麼事。」

我並不完全樂觀，但他的話還是給我吃了些定心丸。要是裴政委地位不變，他就有能力保證我們這些人無事。常明又說：「你不必多慮。你還沒入黨呢，就算要處分，肯定也先從黨員開始，還落不到你頭上。」

這話很有道理，於是我釋然了。他接著告訴我，裴政委現在心裡有了底，組織對我們在戰俘營中的英勇鬥爭是賞識的，尤其是國慶節升國旗那次。漸漸地，話題轉到我們個人的生活，我倆都想儘快結婚了，因爲人生對我們已經變得如此寶貴，我們一天都不想浪費了。

夜裡近兩點裴政委才回來，眼睛放出柔和的光芒。他說他茶喝得太多了，睡不著覺，我們就接著聊天。門

外的秋風把橡樹吹得沙沙作響，落葉更多了，颳落的橡子時不時掉在房頂上，又從房頂滾到房簷，啪嚓一聲落到地上。

「俞元，」裴政委用吸菸過多而變得粗糙的嗓音說：「我想問你一個嚴肅的問題。」

「您問吧。」我答道。

「你願不願意加入共產黨？」

我愣了好一會兒，才回答：「我想，但是我覺得自己還不夠格。」

「怎麼不夠格？」常明插嘴說。

「我上過黃埔軍校，前幾個月又一直和追隨國民黨的人待在一起。」

「別把那個當包袱。」裴政委說。「是我派你去登記的，組織會對產生的結果負責。至於在國民黨軍校的過去嘛，你已經用行動改正了。」

我怎麼能改正自己的過去？他的話讓我納悶。常明說：「別那麼謙虛啦，俞元。在戰俘營裡，你對我們的鬥爭貢獻很大，你早夠格了。」

「對，」裴政委說：「除了常明，我看沒有哪個同志比你對我們的鬥爭貢獻更大了。我不是要強迫你申請入黨，但如果你想加入的話，我很樂意做你的入黨介紹人。」

「還有我。」常明補充說。

「謝謝你們，我記住了。」我說。

附近村裡的公雞已經開始打鳴了，天已經濛濛發亮，我們這才上了床，去睡幾個小時。這一天經歷了多少啊，起來以後就要動身回國了。

我們到達昌圖時，正趕上今年的頭一場雪。大雪覆蓋了全城，給樹木戴上了白雲一樣的樹冠，麻雀在樹上不停地嘰嘰喳喳。返回祖國的六千多名戰俘，在這個叫做「歸來人員管理處」（簡稱「歸管處」）的地方住下來，被安排在大軍營裡。頭兩個星期裡，一些省裡的領導來看望我們，帶來了活豬活羊，和來自市民的幾千封慰問信，還帶來一個劇團，爲我們進行了兩次演出。附近中學的一群女學生，到我們這裡爲我們唱歌，還送來兩個巨大的鮮花花籃。最讓人激動的是，我們每個人都被授予一枚沉甸甸的銅質獎章。歸管處的領導對我們說，我們應該好好休息，努力學習，跟上國內形勢，不久後，我們就要奔赴不同的工作崗位了。所以我們感到又興奮，又感激。團以上的幹部都住在招待所裡，不過他們的伙食和一般戰士一樣。這裡的伙食比一般部隊戰士還好得多，我們常常有肉有魚，豆腐蔬菜管夠，只是麵食要比大米多，東北這地方大米很少見。儘管吃上了這些有營養的伙食，我們大多數人還是面有菜色，比這裡同年齡的工作人員顯老得多，就好像已經是他們父母那般年紀了，不少人禿了頂，鬍子灰白，還有人牙齒都掉了。

我在這裡高興地碰見了我那小朋友山民，他變化不大，只是長高了一些。他告訴我，韋明中風了，住在瀋陽市的醫院裡。我倆一起給他寫了封信去，可是再沒有聽到過那好人的消息。

頭幾個星期裡，我們參加了學習班，聽講國內發展的情況，不過大多數時候我們只是休息，恢復身體，恢復精神。所有的人都喜歡熱水澡，我卻很少去洗，怕在澡堂裡讓別人看見我肚子上的刺青。非要洗澡不可時，我脫衣服總對著牆，進澡堂時，腰裡就纏條大毛巾。身帶刺青的人不止我一個，有四十多人，身上都有反共標語。我去過醫務室，懇求梁大夫給我從肚子上拿掉刺青。梁大夫給別人開過這種刀，知道怎麼去除這些不體面的東西。有時候他沒法去除得徹底，只去掉一兩個字，讓反動話沒了意義，或是變了不同的意思。他懂英語，

會在字母上動腦筋，看見我這幾個字，就說這事不難：留著FUCK，把COMMUNISM只留下U和S兩個字母，別的都抹去。剛開始我不樂意，但是有位負責訓練工作的幹部正好在旁邊，一聽就拍巴掌說，這眞是個好主意，我也就同意了。大夫幹得很好，還在每個字後邊加了三個點，最後，原來的刺青就變成"FUCK…U…S…"了。

我們一到歸管處，立刻給家裡寫信，可是收到回信的人不多。我等得很焦急。常明也是，他未婚妻在廣州，三四天應該就能收到他的信。

從第五個星期起，眞正的學習班開始了。此時，我們已歸東北軍區管轄；也就是說，北京方面已經不管我們了。我們被命令坦白交代在敵人監獄裡所犯下的罪行，對照英雄黃繼光檢查自己：人家在扔光手榴彈後，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美國鬼子的機槍。主持學習班的負責人對我們宣佈了三條規則，從現在起我們必須人人遵從：

第一，你們成爲戰俘，是可恥的。你們應該與敵人戰鬥到最後一口氣，但你們沒有。所以，你們是一群怕死鬼。

第二，怕死怎麼能繼續開展與敵人的鬥爭？即使在戰俘營裡有過一些反抗活動，也主要是因爲你們想苟且偷生。所以你們沒有什麼可誇耀的，而必須坦白自己幹過的壞事、犯下的罪行。

第三，你們必須從主觀上反省自己，不許爲當了俘虜找一堆客觀原因。

這樣的學習班把我們嚇壞了。在戰俘營裡當過幹部的人，一律被當成「通敵」，誰告訴敵人自己的眞名字和部隊番號，一律被畫爲「出賣國家機密」。你抽了美國菸，就意味著你向敵人屈服——吃了敵人的飯還情有可原，但接受奢侈品如香菸，那不是投降是什麼？當戰俘時給我記的那四次軍功，就像輕煙一樣消失了，更別提被裴山授予的埋葬在巨濟島上那些死難戰士的特等功了。很多人被急轉直下的形勢氣得跳腳，常常去找裴政委，爲受到的不公正對待叫屈，請求他講公道話，把給他們記的功討回來。在大家眼裡，政委還是共產黨的象徵，所以他們指望他來證明自己立過的功勞，那是他們對祖國赤膽忠心的憑據。裴政委答應大夥兒，會讓大家立下的那些軍功得到組織的承認，其實他現在一定也心裡有數了，他的上級永遠也不會承認那些軍功的。

裴政委自己也受審查了，他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有傳言說，第八戰俘營的美國人，有一回給他吃了迷魂藥，讓他發表了一次反動演說，後來在收音機裡廣播了，他自己還不知道呢。這會兒，他也沒法從通敵的罪名中洗清自己了。而且，我們師少說有五千人被俘，上級認爲，那麼大的被俘數量，表明了師領導沒有率領全師決一死戰，因此，作爲首長之一，裴山要對我們的失敗和被俘負責。爲了避免和戰士們打照面，他不再跨出屋子一步。幸虧他對我的問題還遵守諾言，聲明是他派我代替常明去釜山登記的，我是在爲黨的事業工作時，落到親國民黨人的戰俘營的。這樣，我總算沒被打成叛徒，然而，領導們並不會輕易放過我，對我進行了多次批判。

山民堅決替我辯護，說是我把他從國民黨人的魔爪下解救出來的。除了山民，常明也站在我這邊。領導命令我交代在第十三戰俘營的所作所爲，我說，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學英語。他們又問我拿什麼學；我不敢說是《聖經》，就說是從一些報紙和雜誌上學。每天我都要交代是怎麼幫伍德沃斯牧師教聖歌的，是怎麼充當王永的隨從、給他當翻譯的。很多細節我已經記不清了，於是他們就不放我過關。

有天下午，在學習班上，常明站起來替我說話。他臉紅脖子粗地對那幾個幹部說：「俞元同志幫助伍德沃

斯牧師是有不對，但他從牧師那裡弄來了紙筆，都交給了我。他不像別的黃埔軍校畢業生，對共產主義事業光說空話，他是眞幫我們的忙，一直投身我們的鬥爭。我們去濟州島上船前，他出面跟美國人斯馬特將軍交涉，救了裴政委，這事除了他，我們誰也做不到，對不對？」有幾個人跟著他表示贊同。常明又說：「被關在監獄裡時，他領著兩個同志發明了『裴氏密碼』，沒有『裴氏密碼』，裴政委和戰俘營之間根本不可能聯絡。後來，他又幫助他們大隊長，把一份不該簽字的文件從敵人手裡追了回來，這樣敵人就沒法用它撇清自己的罪行了。這裡的一些同志都親眼看見的，他在那次鬥爭中擔當的是什麼角色，要不是他去和美國軍官談判，我們不可能把那簽字的文件討回來。去年春天，他又奉命代替我到釜山去登記，他沒說二話就去了。我們都以爲他不會回來了，因爲美國人很可能會除掉他們叫去的四個人，很多同志看著他走都流淚了。你們說，你們還需要什麼才能證明一個同志對黨的忠誠？黨讓他去死，他就去赴死了。他能回來簡直是個奇蹟。我告訴你們：我們從朝鮮回來的路上，裴政委和我決定介紹他入黨，這裡沒有人比他更配——」

「夠了，常明！」一個負責的幹部吼起來。「你還不知道你自己保不保得住黨籍呢，還想介紹別人，你一定發神經了。你忘了自己是誰了吧？就跟四處給人記功的裴山一樣。簡直荒唐，好像你們個個都是大英雄。從現在起，你必須首先把自己當成一個罪犯！」

那麼清白的常明也嚇傻了，閉了嘴。不過他的話還是幫了我，從那次起，就不常有人逼我，對我也不那麼橫眉豎眼了。

接著，他們對通不過自我批評這一關的人開始挨個兒審訊。據說，我們中間有大量美國特務和國民黨奸細，上級誓言要把他們全挖出來。每個星期都有人被逮捕，送進撫順監獄，那是離這裡大約一百六十公里的一個煤礦城市。這可把我們嚇懵了，讓我們更順從了。很多人極力討好當局，開始「揭發」別人，更厲害地貶

損自己，有人承認自己確實就是怕死鬼，幫了敵人的忙，其實，對於自己的罪行，他們拿不出任何讓人信服的證據。有幾個人甚至說，要是他們被關押的時間再長一點，他們就會叛變了，幸虧黨及時解救了他們。我弄不懂，他們幹嘛要把自己說得這麼難聽，好像自己眞的是叛徒似的。也許他們的負疚感太深，深得使他們不知道該找什麼樣的合適方式來表達，常常哭得像個可憐的小孩子。

我終於收到未婚妻她哥哥寫來的信。他用紅墨水寫道，我母親一年前已經去世，要是我眞的爲他妹妹好，就不該再給她寫信了，因爲她不可能嫁給一個「可恥的俘虜」。他還說：「別把菊蘭想得太壞。她對你母親很好，一直照料到她臨終那天。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妹妹，明白她處境多麼難。」我感到彷彿時間給我開了個殘酷的大玩笑。要是我在朝鮮就知道母親的死，要是我能預見到家再也不是原來的家了，我一定不惜任何代價，到第三國去，做一個沒有祖國的人，也許要一輩子當個孤獨的苦力。我還可能去臺灣，在那裡重新開始我的人生。現在，一切都晚了。我徹底垮了，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個星期。我又給菊蘭寄去兩封信，退還了那半塊玉簪子，卻從來沒收到過她的隻言片語。

接著，災難落到了常明頭上。在一封給未婚妻寫去的信上，他說：「我恨我們國土這麼廣闊，要是沒有這些高山大河擋著，我們不就能早點見面了？」他一向是個謹愼的人，這一次卻犯下了致命的大錯，忘了我們的信件都是要經過檢查的。那句話被早等著要整他的人抓住了，他竟惡毒地巴望我們的國土不要這麼廣闊！一下子被打成了反革命。我覺得他太無辜了，可是我對他一點忙也幫不上。

我平靜下來以後，看得越來越清楚了，我們這些戰俘，早就被一筆勾銷了。我們在板門店的代表之所以還經常提到我們，是因爲他們可以用我們受的罪給敵人抹黑，是因爲如果不對我們表示一點關切，就會有更多的人跑到臺灣去，大陸中國就會丟臉。現在我們回來了，再也不可能加入國民黨了，就不再是黨的心事，黨終於

用它喜歡的任何方式處理我們了。

最讓我吃驚的，莫過於我們的最高首長裴政委的遭遇了，他一點也不比我們這些人好多少。換句話說，他和我們都是黨的棋盤上的一顆棋子，只不過裴政委佈置了自己的棋盤，把自己手下的人放在棋盤上，彷彿他的一盤棋和黨的一盤棋是一致的。事實上，他也不過是個卒子，和我們沒有太多不同。他也是戰廢品。

直到第二年夏天，我們才得以離開歸管處。我們幾乎沒有例外，都被不光彩地開除了軍籍，也就是說，我們都變成了社會的渣滓。我們中間的所有黨員，全被開除了黨籍，因爲開赴朝鮮以前，他們都對黨宣過誓，不論在任何環境下決不投降，因此，黨組織把他們的被俘，看成他們對誓約的違背。數百人作爲叛徒和奸細再次入獄。從現在起，我們畢生都將處於特殊控制之下。常明被送回四川老家，靠給公共澡堂挑水爲生；他的未婚妻和他在北京大學的一個同學結了婚。山民被送回老家當農民。裴政委去了遼西盤錦的一個國營農場種稻子，名義上是農場的副場長。後來來到歸管處的郝超林，被分配到一家鋼廠，當了一個車間主任。我們都以爲他能保住原來的級別，因爲他在中立地帶當過「解說官」。不過那次解說工作可悲地失敗了——他們只爭取了不到四百人回來。所以，和我們一樣，他也受到了處分，被降了級。

和他們大多數人相比，我還算幸運。因爲我不是黨員，既沒有任何誓言能違反，也沒跟著親國民黨人去臺灣，我被分到一個中學去教語文、地理，後來又教英語。我喜歡教書，一直幹到六年前退休。從一九五四年秋天起，我一直住在長春，再也沒有回過四川。

一九六五年，常明到我家來了，託我在城裡給他找個飯碗，因爲在老家沒有工作了。他身穿一件黑外套，裡邊的棉絮都露在面子上，好像撒了一身的雪花。他走起路來兩腿向外彎著，讓我想起十三年前在巨濟島上他演過的杜魯門。找飯碗我是一點也幫不上忙，我只是一個中學老師，還背著沉重的歷史包袱，怎麼可能給他找

到工作？他住了四五天後，帶著深深的失望走了，我給他買了回家的火車票，又給了他三十塊錢，這是我大半個月的工資了。我能爲他做的只有這些。後來他再也沒來過信，不過聽人說，他被家鄉一個老婦人收爲養子，夜裡總算有個躺下來睡覺的地方。一九七二年夏天，當我再次受審，讓我交代過去當戰俘的一些問題，有個審問我的人對我說：「常明已經到另一個星球去了。」聽到他的死訊，我幾乎當著那些人的面哭起來。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有天早上，兩百多個紅衛兵來到我家，把我帶到學校開鬥爭會。他們讓我站在臺子上，一個姑娘跨上來，拉起我的衣襟，給臺下的人看我肚子上的刺青，說我一直在夢想著美國。其實，當時"FUCK"這個字已經從他們所有的英漢詞典上給刪除了，所以他們不知道這個字的意思。我用手指頭指著那個字，一點不含糊地告訴他們：「這個字意思是『操』，要是我眞的崇拜美國，就不會說『操』它了，對不對？」聽眾大笑不止，這一笑，總算救了我的命。

和其他遣返回來的人比，我各個方面都是幸運的。未婚妻和我一刀兩斷以後，我發誓再不沾女人，一輩子就當光棍了。可是，儘管我們個人會遇到不幸，生活還是在繼續，我凍硬的心，不到兩年就化了。我愛上了一個同事，一個化學老師，非常漂亮的一個女人，沒有男人注意她，因爲新中國成立前，她父親曾是上海的一個資本家。我們幾個月後就結婚了，後來生了兩個孩子，一個男孩，一個女孩。他倆都大學畢業了，兒子後來到了美國，在喬治亞理工學院拿到一個土木工程的碩士學位，我甚至有了一對美國孫兒孫女，我非常喜歡他們，希望能和他們多待在一起。據我所知，從聯合國戰俘營出來的人，還沒有幾個人的孩子上了大學，他們有歷史污點的父親們不可能讓他們受到良好的教育。直到二十七年後的一九八〇年，所有遣返戰俘才最終獲得平反。而我家，我妻子和我兩人把兒子女兒都教得很好，「文化大革命」以後恢復高考時，他們都以優異成績考上了大學。

中國開始向外國人開放後不久，一九八六年夏天的一個晚上，我偶然看見白達堅出現在東北電視臺的螢幕上。他從臺北回來，到他在遼寧的老家探親，被當作貴賓接待，因爲他沒有忘記出生的地方，給當地縣裡捐錢建了一座小學。很顯然，他是個有錢人了，看來他到臺灣以後幹得很不錯。我一眼就認出他來，他的左手只有三根指頭。他現在發福了，一頭灰髮，也就四十幾歲的樣子。他微笑著，一雙眼睛有些暗淡，可是曾經籠罩著他的不自信陰影，已經在他生氣勃勃的臉上一掃而光了。

我認識的幾個昔日戰俘也看到了這條新聞，經常談起那些拒絕遣返回家的人們。他們私下裡嘆氣和後悔，當年九死一生地回到祖國，結果追求和實現的是一個虛幻的忠誠。當年去了臺灣的戰俘，大部分都過上了很好的日子，這是事實。有的人上了大學，還有一些在軍隊裡升到了高層。大家現在都到了退休的年歲，有人甚至回大陸來定居了，都在家鄉受到當地政府的禮遇，有的人甚至還被安上些頭銜。中國政府寬大地歡迎他們，把他們看作愛國人士，哪怕他們的愛遲到了這麼多年。現在，國家對當年那些拒絕遣返的戰俘重返家鄉的態度是熱烈歡迎，因爲他們回來，有利於臺灣和大陸的統一。就連一九五三年就回國的一些戰俘，都給地方政府寫信，對國家的這一新政策表示擁護。

可是那些人回到家鄉，卻不一定都是歡天喜地。有些人看到的是，活下來的家人已經沒幾個了；還有人感到，家鄉依然是極爲貧窮和閉塞；有的人活著回來了，可父母兄弟姊妹見到他都嚇昏了，因爲都以爲他三十年前就死在朝鮮了，當了革命烈士，家裡人每年清明都到他的空墳上去祭奠。

我很想知道王永過得怎麼樣，他侄女的照片還一直在我相冊裡收著呢。

看到電視上的白達堅，一連好幾天我都思緒萬千，心煩意亂，覺得自己起碼不比他能力差吧？當然，我也明白，能像他這樣成功的商人，在去了臺灣的戰俘中間也是不多見的。不過很快地，我就恢復了自己的心理平衡。不管一個人的遭遇有多麼不幸，總還有人更加不幸。和常明、郝超林、還有裴山他們相比，我幸運多了：有一個和睦的家庭，一對有出息的兒女，三個孫兒孫女。我沒有理由沉湎在哀怨自己失去了什麼之中，一個人一定不要對自己的命運懊悔。

這些天來，我常常看動畫片《辛普森家庭》，我很喜歡這個節目。上個星期，我看了巴特，這個愛惡作劇的孩子，從胳臂上把自己的刺青拿掉了。看到這裡，我想到自己，也把刺青拿掉吧。我問兒子能找誰給我拿掉，他打了一圈電話，在亞特蘭大一帶，找到了艾莫利醫院的斯通醫生，他經常給人做這樣的手術。兒子跟醫生說，我肚子上被共產黨刺了一條反美口號，我看，他對我的情況，頂多能說清楚到這個程度了。我每個月的退休金還不到一百二十美元，所以斯通醫生同意考慮給我一個優惠價。他說，雷射手術只需要幾分鐘時間，不會覺得疼。我很高興下個星期二就會找他去做這個手術了。

自從一九五四年離開歸管處，我就再也沒見過裴山，不過我與超林一直保持著聯絡，四年前他死於嚴重的心肌梗塞。一九九五年，他告訴我，最近他去天津看望了裴山，裴山的肺癌已經到了晚期，他妹妹把他接到城裡做化療。我們的老政委痛切地自責，說自己毀了兒子的前程。他兒子當時已經四十多歲了，還沒有結婚；二十多歲的時候，因爲父親的歷史問題，沒有哪個年輕女子肯進他家的門，後來他對女人就失去興趣了，寧可當個光棍，父母怎麼催他結婚生孩子，他都不理會。裴山還有一個遺憾：未曾記下早年的警衛員虎子家的地址；虎子四十四年前救過他的命，但他只記得虎子是從甘肅來的。要是他能爲虎子的爹媽做點什麼該多好啊，他們大概早已不在人世了。裴山對超林說：「虎子是個好同志啊，我現在還常夢見他呢。」

超林還告訴我，幾個星期後，他最後一次看望了裴山，當時他已經在彌留之際了。老政委最後對他說的一句話是，「把我們的故事寫出來！」

超林歪著乾枯的嘴唇跟我說：「俞元，我腦子現在一點也不好使了。我能寫什麼？一想起來就只有失敗和傷心——心裡頭沉得，像壓著塊大磨盤。腦子裡邊，過去的事都攪成了一鍋粥，根本拾不起個兒來。」他還剩了幾顆牙，就著杯熱茶吃核桃酥時，嘴裡不停地往下掉碎末。的確，他老得很厲害，我覺得他已經沒幾年能活了，瘦成了一把骨頭，身軀萎縮得比四十年前矮了好幾寸。

到這裡我要結束這本回憶錄了，這是我頭一部，也是最後一部想寫的東西。我快七十四歲了，身患痛風和青光眼，再也寫不動了。但是，可不要把這部回憶錄看成「我們的故事」。在我內心深處，我從來就不是他們中的一個。我只是寫下了自己的親身經歷。

作者手記

這是一部虛構作品，所有主要人物都是虛構的。但是，大多數事件和細節都是眞實的。感謝下列作者和他們的作品，爲我的小說提供了原始的素材：

大鷹，〈志願軍戰俘紀事〉，《崑崙》一九八七年第一期，一五七—二三八頁。

何孔德，《一個畫家眼中的朝鮮戰爭》，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劉郎，《流血到明天》，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五年。

《反共義士奮鬥史》，臺北，反共義士奮鬥史編纂委員會主編，一九五五年。

王建國，《人海大悲劇》，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五年。

王樹增，《中國人民志願軍征戰紀實》，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張曙光，《毛的軍事浪漫主義：中國與朝鮮戰爭》（*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 China and the Korean War, 1950-53*.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5.）

張澤石編，《美軍集中營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Bradbury, William, Samuel Meyers, & Albert Biderman. *Mass Behavior in Battle and Captivity: The Communist*

導讀
戰爭的印記

馮品佳

小時候有個節日叫做「一二三自由日」，早在我們出生之前就存在，而且每年還要大肆慶祝。那時稚齡的我不懂得這個節日的來源，只知道是紀念一群英雄「投奔自由」的日子，他們的身上大多都有著一些刺青，彷彿是某種祕密團體的記號，也建立了我對刺青的第一印象。定居新竹之後，竟然在住家附近的麵館裡看到一位手腕有著刺青的老伯，兒時的記憶突然湧現，雖然知道這是參與過韓戰的「反共義士」的標記，只是尚未釐清自由與刺青的關聯，直到閱讀了哈金的《戰廢品》（War Trash, 2006），才知道那些刺青是個命運的印記，決定著華人戰俘在海峽兩岸的歸屬。

《戰廢品》一本哈金一貫的寫實風格，透過第一人稱的敘事紀錄韓戰時期「抗美援朝」的中國「志願軍」身陷朝鮮半島的戰場與俘虜營經驗。除了戰爭、政治鬥爭、乃至於酷刑的場景以及戰俘營生活的細節，主角俞元身上的刺青就是小說中最具體的寫實符號。俞元出身黃埔軍校，在中國大陸易主之後加入人民解放軍，被編入「志願軍」加入韓戰被俘，一心只想要回到中國與寡母及未婚妻團圓。在戰俘營中俞元肚臍下方遭到紋身，但是並非自願之舉，而是親國民黨人強迫他在甄別時必須選擇反共「起義」的手段。隨著俞元輾轉於國民黨與共產黨的俘虜營隊之間的經歷，他的刺青也有了不同的意義與功能。「操共產主義」（FUCK COMMUNIUSM）的刺青幫助俞元在親國民黨陣營保住性命；回到中國之後刺青改裝成了「操老美」

（FUCK…U…S…），又變成他在文化大革命時逃過紅衛兵迫害的「護身符」。反諷的是五十年後俞元赴美探訪兒孫，此時這個反美的刺青有如芒刺，讓他寢食難安。小說最後，俞元在美國醫生的幫助下消除了這個跟隨他半個世紀的印記，也爲他的回憶錄畫上了休止符。

小說的引子記述俞元帶著畢生收集的資料在美國開始撰寫他的回憶錄，希望以之作爲留給「美國子孫的唯一禮物」，希望兒孫能夠感覺到「肚皮上刺青的全部分量」。因此小說一開始就設定要以這個意義不斷改變的紋身記號作爲俞元生命書寫的代表，具體呈現他在時代洪流衝擊之下遊移於不同命運的旋轉門之間的遭遇。國民黨或是共產黨都不是他心之歸屬，兩個政黨也都不認同他爲同志。去臺灣或是回大陸更不是他的最佳選擇，他嚮往的是第三國的可能。雖然最終他仍然迫於情勢返回家鄉，俞元在如此險峻的環境中依然試圖保留部分的自由意志，拒絕成爲可任意拋棄的戰爭垃圾。他的努力引導我們看到小說中最爲正面的訊息，爲無情的戰爭世界帶來一線光明。

俞元穿梭於國共陣營卻都不被接受的遭遇，使得閱讀《戰廢品》有如瀏覽了一個荒島倖存者的手記，明明是在眾人的重重包圍之下求生求存，主角俞元的心靈卻孤獨地像是漂流至無人島嶼的魯賓遜，靠著紀錄生活中的點點滴滴證明自己依然活著，依憑戀人的信物、或是回憶親人以及替他醫治傷腿的美國女醫生，他在自我的想像世界維持人類的正常關係。巨濟島與濟州島的戰俘營，似乎也成了這個荒島求生冒險最佳的背景。而俞元在濟州島執行掃文盲運動所調教出的弟子山民，則有如學舌的星期五，是這場殘酷的戰爭中唯一一個因禍得福、自我提升的「特例」。回到中國之後，俞元發現所有堅持回家的理由都不復存在，親人已逝，戀人走避，只留下他孤獨地面對曾經身爲戰俘、遭到懷疑叛國的屈辱。小說結尾，俞元憶及戰俘營中最高統帥裴政委的臨終遺言是「把我們的故事寫出來」。俞元雖然寫出了這個故事，卻在小說最後強調切勿將他的回憶錄視爲「我

們的故事」，因爲他從來不是「他們中的一個」。這種強烈的孤寂感，正是戰爭帶給他的最大心理印記。

首爾的戰爭紀念館立有一塊石碑，上面寫著「自由不是免費的」（"Freedom is not free."）。戰爭是否眞的能會爲我們帶來自由呢？這一點仍然值得商榷。但是戰爭在眾多人身心必然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卻是不爭的事實。今年適逢「一二三自由日」的六十周年，對於許多當年如同「給朝鮮土地當肥料」的倖存老兵而言，不論他們最終身在海峽兩岸的何處，那一段強迫離鄉背井、面對生死挑戰的經驗，藉由哈金的小說書寫得到了誌記。哈金將此書獻給曾是韓戰老兵的父親，傳達了爲祖輩留史的用心，也保留了珍貴的戰爭記憶。

閱讀指南

1. 在《戰廢品》中，俞元在戰俘營中一直擔任翻譯的工作，他也努力把握任何閱讀英文讀物的機會。俞文對於英文的強烈渴求，除了可以當作他求知慾的表現之外，還有什麼其他詮釋的可能呢？

2. 《戰廢品》中除了戰爭之外，政治的操作也是相當重要的主題，然而小說中也一再提及俞元閱讀聖經，甚至幫助軍中牧師翻譯詩歌的場景，似乎暗示俞元對於聖經的喜愛已經不只是如他自己辯稱僅僅藉此學習英文而已。請討論聖經、乃至於宗教在這部小說中的意義。

3. 《戰廢品》中出現幾次戰俘的藝術表演，哈金也鉅細靡遺地描寫戰俘們如何準備道具服裝等等的努力。請討論除了再現歷史事實之外，哈金爲何在這部以戰爭爲主題的小說之中加入有相當分量的藝術活動場景呢？